

860 DAYS. ONE STEP AT A TIME.

有史以来最大胆的丛林之旅！
——贝尔·格里尔斯

One of the boldest...
jungle journeys ever undertaken.
—Bear Gryllis

860天
近10,000千米
全球徒步穿越亚马孙河第一人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以置信的旅程

Walking The Amazon

全球现象级 | 同名记录片 | 百余国际媒体 | 创吉尼斯
热销 | “豆瓣”9+好评 | 追踪抢报 | 世界纪录

电鳗出没·毒枭当道·原住民追杀·路遇美洲豹
顶级绝境生存大师·丛林之王
埃德·斯塔福德（“德爷”）
亚马孙河徒步搏命之旅
他平常的每一天，都可能是让你送命的一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征服亚马孙 /（英）埃德·斯塔福德著；纪乃良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6

ISBN 978-7-5596-3126-8

I. ①征… II. ①埃… ②纪… III. ①游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4760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9-2275号

WALKING THE AMAZON

Copyright © Ed Stafford 2011 First published in 2011 by Virgin Books, an imprint of Ebury Publishing A Random House Group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征服亚马孙

作者：（英）埃德·斯塔福德 译者：纪乃良

产品经理：于海娣 版权支持：张婧

责任编辑：李红 徐樟 特约编辑：付宇灿 丛龙艳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6千字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0.25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3126-8

定价：6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版权
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010-57933435/64258472-800

(1) 译注：Bruce Parry，英国探险家、电视节目主持人。

(2) 译注：意大利式西部片泛指一些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由意大利人导演及监制（多与西班牙或德国联合制片）的西部片。

(3) 注：利什曼病是一种经由沙蝇叮咬所传播的原虫病。

(4) 译注：英国家庭里通常有个小房间或橱子放置暖气系统的主要电热组件，因为这个空间通常很暖，因此英国人会在里面烘干衣服。

目录

CONTENTS

[封面](#)

[版权信息](#)

[目录](#)

[序](#)

[引言](#)

[Part 1 秘鲁与亚马孙河源头](#)

[想法诞生](#)

[寻找亚马孙河源头](#)

[走下世界最深的山谷](#)

[Part 2 红区](#)

[红区](#)

[阿沙宁卡人](#)

[加迪尔·乔·桑切斯·里韦拉](#)

[Part 3 到哥伦比亚的黑暗行程](#)

[“看好你的英国佬，否则砍掉他的脑袋”](#)

[忧郁](#)

[在伊基托斯重新振作](#)

[通往哥伦比亚的毒品走私路径](#)

[Part 4 巴西](#)

[进入巴西](#)

[饥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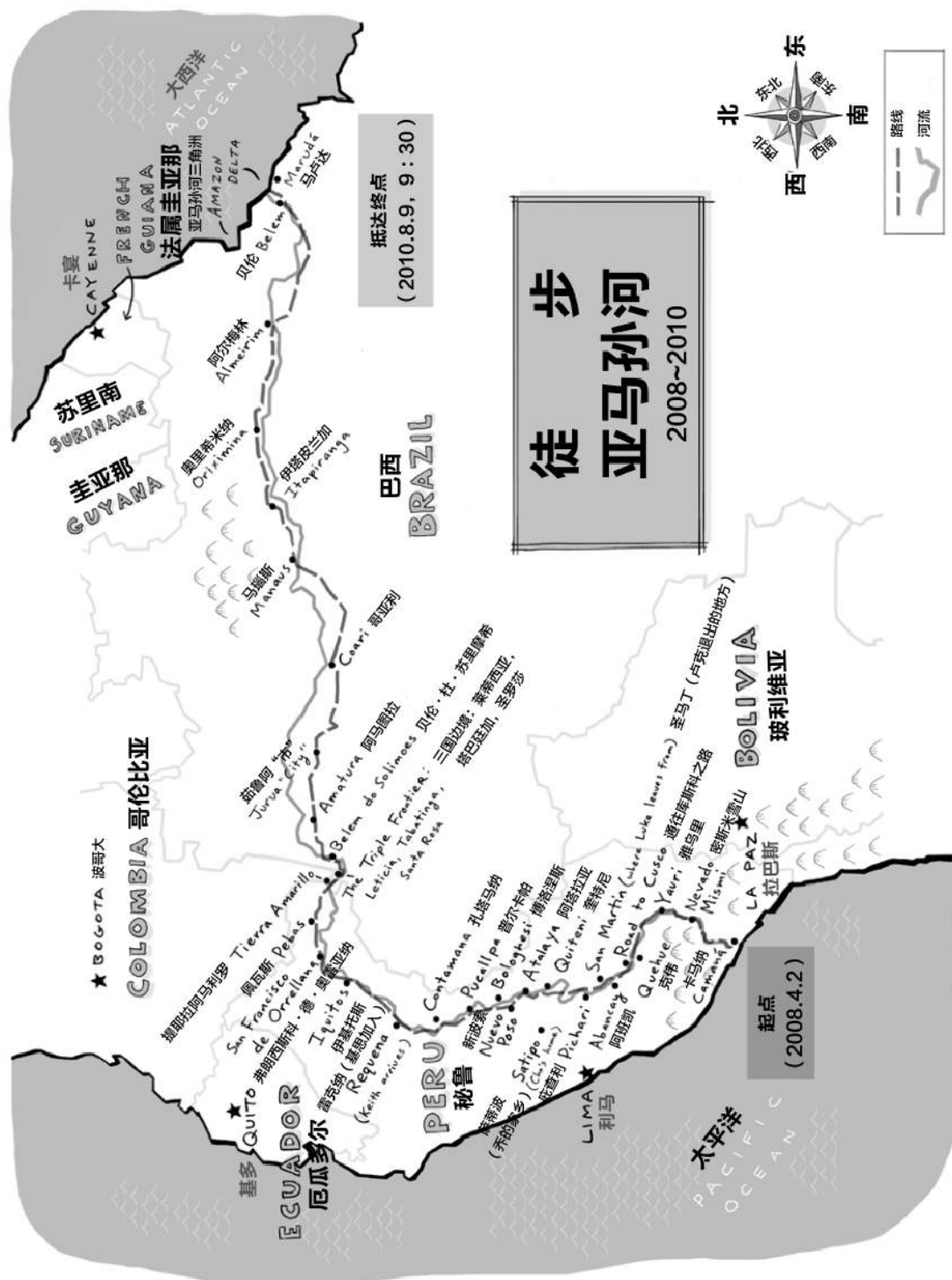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全心投入”](#)

[“那个外国佬话不多”](#)

[最后冲刺](#)

[后记](#)



徒步 亚马孙河

2008~2010

抵达终点
(2010.8.9, 9:30)

序

当环球探险信托基金会（Transglobe Expedition Trust, TET）第一次听到埃德·斯塔福德试图徒步走完亚马孙河全程时，我们向研究这个区域的几位知名学者征询意见，他们的回应是，不可能。我们想赞助的是极具挑战性因而有失败风险的计划，也喜欢分摊这类风险，希望在排除万难后，探险终能成功，对人类的进步产生深远影响。我们的赞助人威尔士亲王，即查尔斯王子，在描述1979年的环球远征队时，称之为“疯狂”（因为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非凡”（就其成就而言）。埃德·斯塔福德的计划显然很疯狂，他如果跌破专家的眼镜，成功达成任务，也同样是非凡的成就。

埃德出发时，有一名同伴即卢克·科利尔（Luke Collyer）相随，但由于许多原因，卢克在三个月后受够了，返回了英国。然而埃德未受阻碍，继续向前。在整个探险之旅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面就是他成功的决心；他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足以劝退大多数人的阻碍，但他展现了在如此艰难且危险的环境中要成功必须具备的顽强意志力。探险之旅五个月后，埃德遇上了当地人加迪尔·乔·桑切斯·里韦拉（Gadiel ‘Cho’ Sanchez Rivera），他同意和埃德一起走五天。两年过后，埃德和乔仍一起大步向前。

TET为埃德和乔的成功感到欣喜，也非常钦佩，不只在于他们实质的成就，更在于埃德全心致力于在他TET的网页上传播他目睹的环境和充满人道关怀的故事。世界各地的学童和大人都密切注意着，这些故事让人们注意到亚马孙盆地及其周遭的真实问题。我很高兴能以赞助人的身份参与这次探险，并期待听到埃德的下一次探险，那一定是全然的疯狂，希望那一次也能同等非凡。

雷纳夫·法因斯爵士 (Ranulph Fiennes)

引言

接收到高频无线电传来我们如果决定继续这段旅程将会丧命的警告后，我们抵达了亚马孙河中一座砾石岛的下游，我将便携式充气筏丢进浅浅的褐色水流中，将沉重的背包从僵硬脏污的背部卸下，扔进橡皮筏。

“埃德，小心背后。”乔冷静地说。我转身看见五只独木舟飞快地朝我们而来，上面满载当地印第安人，其中许多人站在狭窄的船上，张弓搭箭瞄准我们，坐着的则拿着巨大木桨拼命划船。

妈的！我的T恤紧黏着身体，汗从鬓角涔涔而下，我的身体静止不动但心跳加速，肾上腺素冲上脑门，让我能应付眼前的危险，我感觉时间慢了下来。独木舟在起伏的河中顺水而下，这个危险画面的背景是一片绿色悬垂的丛林，亚歇宁卡人（Asheninka）男男女女的棕色脸庞看起来尚武又好斗，鲜红的脸部彩绘线条相当显眼，女人全都拿着大砍刀。

靠岸后，他们跳下船朝我们而来，现在男人因愤怒而紧绷着脸，瞪大双眼，女人看来像着了魔一样。乔和我手无寸铁，无处可逃，像动物一样被困在岛边，所有感官都警觉起来，我们的意识中只有生存一事，别无其他。

Part 1
秘鲁与亚马孙河源头

想法诞生

一场狂暴的热带大雨笼罩着无墙的酒吧，滂沱的雨势盖过了泥泞对街持续的克里奥尔鼓声，大雨划破平日的湿气，使得夜晚凉爽清新。我和一名探险向导伙伴卢克·科利尔坐在酒吧里，啤酒在手，我们呼吸着大自然清净的空气，靠在木头矮椅上，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兴奋与不安。我们刚做出一个将永远改变人生的决定，并达成了共识，要一起徒步走完亚马孙河全程。我的眼睛发亮，咧着嘴对卢克微笑：“他妈的，老兄，这一定会很疯狂。”

那是2007年1月，我们在中美洲的英国前殖民地伯利兹为英国远征部队探险组织特里克福斯（Trekforce）进行环保考察，我刚把野外基地从首都伯利兹市移到靠近危地马拉边境、较具拉丁气息的小镇圣伊格纳西奥，这里的居民多数是当地玛雅人和殖民者西班牙人的“混血儿”，但是也有少数较新的克里奥尔移民⁽¹⁾。

隔天早上，我们穿着四脚裤踉跄地走在野外基地附近，吃炒蛋三明治，喝进口伯爵红茶。出乎意料的是，再度提起徒步亚马孙河这个话题时，两人都没有要退出这个君子协定的意思，我们大可以将这个想法归结为酒后狂言，但就在我们抓搔着胡楂等着淋浴时，这个想法比昨晚还令我们兴奋。

两年前，我受雇于一家英国公司，到阿根廷巴塔哥尼亚成立科学研究考察小组。当时我刚开始和一名叫克罗伊的女孩约会，我们都热爱旅行，决定一起申请这份工作，主导并管理这个在寒冷天气条件下开展的考察活动。克罗伊比我年轻，她的笑声粗哑，身材曼妙，她热切地想做善事，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我们陷入了热恋，想做一番事业，而且我们在这个未知国度生存的意图非常强烈，也很快地爱上了巴塔哥尼亚人讨喜的自信与谦卑。我们找到阿根廷生物学家一起工

作、从旁协助，克罗伊和我很努力地让这义工性质的考察活动顺利进行。

这次考察非常成功，但在内心深处，我渴望返回热带，一方面是因为我畏惧寒冷，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担忧我们依赖的设备数量以及在山上生存所需的经验。我开始梦想一个我更熟知的简单环境——丛林；在动辄八小时的长途车程中，我让自己的思绪驰骋——我能构想出什么样的终极冒险呢？

我从未去过亚马孙，我的丛林经验多半来自中美洲，以及一些到婆罗洲的短途旅程，但亚马孙确有其神秘之处，想必那里的树木更高大，野生生物更丰富多样，人也无疑更凶猛、与世隔绝。想着要去亚马孙河，我相当紧张，由于不知道该地区详细的地理信息，我的想象受限于我的知识：有一条巨大的河流由西至东几乎贯穿整个大陆，还有……就这么多了，我听说有人用皮划艇从源头划到出海口——惊人的耐力展现，历时五个多月。但问题是，我是个蹩脚的划船手，当童子军时的确在英国的水道里划过几次，但那种冰冷、令人沮丧的经验足以让我一辈子对划船失去兴致。这项运动真是无聊又痛苦，由戴着蠢头盔的啰啰唆唆的笨蛋指导。

我所娴熟的是徒步探险。在一次长途车程后，我兴冲冲地冲进巴塔哥尼亚野外基地，深知自己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世界第一。“徒步亚马孙河”，我键入几个关键词，“从亚马孙源头到出海口”“亚马孙探险”，时间分秒飞逝。

我不断搜寻并且露出微笑，除非有人能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提出反证，否则人类史上没有人曾“徒步”走完亚马孙河全程。这可能真的是前无古人的世界第一，它深深地吸引着我。

回到伯利兹两年后，卢克到来并宣布要在亚马孙河划皮划艇，使得我必须采取行动。我从未为梦想设定时间表，但当时我刚和克罗伊分手，那段时间以来我头一次能够独立思考，不用担心别人或向别人妥协。我立刻向卢克指出，在亚马孙河划皮划艇这种活动已经有人进行过五次，最近还有个斯洛文尼亚的胖小子在亚马孙河低海拔区游泳。我提出了我的想法——世界第一的想法——徒步。卢克想了五秒钟。“算我一份，”他笑着说道，“咱们行动吧。”

我们对于这次探险要花费的时间毫无概念，但希望一年内完成。在我们脑海里，这件事很好办，于是把6992.6千米（根据华盛顿国家地理学会测量的河流全长）除以365天，得出一个看来很合理的速度——每天走19.2千米。由于我们的丛林经验多半是行走在小径和小路上，卢克和我天真地为能在十二个月后返家而欢喜不已。多么干脆利落。

卢克三十五岁，我三十一岁，我们尽管个性大不相同，但内心深处都有“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渴望，都希望成就一番日后回首时引以为傲的事迹。

我看得出来卢克真的很渴望证明自己。他从未加入军队——这让他有点后悔——但自我认识他以来，他带领过几次探险，大致来说，他也很讨人喜欢。发现彼此的状况类似、有相同的探险梦想的确是种征兆，这种巧合为我们指出一条令人兴奋的方向，我们也都能轻易地感染彼此的热情。

卢克二十多岁时就失去了双亲——他的父母在短时间内相继过世，因此他必须非常独立。他存够了钱到澳大利亚旅行，“发现自己”。但在他远行期间，两个兄弟中的一个过世了。他在澳大利亚学会了杂耍，从大砍刀到玩火样样都会，并且成了街头艺人。回到英国之后，他取得了好几项户外活动教练的资格，并且热衷于登山。他从事户外活动教学多年，薪资微薄，但他乐在其中。2004年，他因其户外技能成为探险向导，到了2007年，他四次带领为期三个月的丛林探险——全都是去伯利兹——最近的三次是到戴维斯瀑布国家公园。当时卢克有一位正认真交往的女友凯蒂，她的家人也成了他的家人。

我的人生则大不相同，我是英格兰中东部地区一个十六岁单亲妈妈生的小孩，自婴儿时期起就由杰里米和芭芭拉·斯塔福德夫妇收养，除了我父亲时不时生病之外，我们家就像其他家庭一样幸福。将我养成探险向导的家庭教育包括：第一，我们住在小乡村，我在乡间长大；第二，父母从小就鼓励我和姐姐自己做决定；第三，我父亲坚定的信念影响了我——如果你说出要做某事，就要试着去做，除非自己已经尽了全力，否则不该放弃。父亲鼓励我加入英式橄榄球队和童子军，这两者对我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给我的爱显而易见，收养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

知道自己有打橄榄球的天分后，我的自信大增；十三岁，我就约有1.83米高，并且发现自己能从对手手中抢到球，然后闪过所有人。我觉得这真是一项了不起的运动，这种自信扩展到生活其他方面，从私立石门中学毕业时，我是级长，也是骄傲的橄榄球队队长。

我在童子军领域也发展得很好，学会了露营、健行和户外活动，童子军的基地就在我家邻近的富列柯尼小镇。我父母很重视教育，让我和姐姐上私立学校，在童子军的经历不只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训练，也和我的私立学校教育并行；和橄榄球一样，户外活动也是我所擅长的，我热爱学习亲近自然所需的技能，在户外很自在也很能干，富列柯尼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粗陋，但并不讨人厌，我们不用围着圈圈大喊“Dib, Dib, Dib”⁽²⁾和练习打绳结，而是玩轮椅橄榄球、造东西、生火。

在阿宾汉姆住宿学校就读的经验无疑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个学校仍正式为维多利亚女王服丧——男孩子们穿得一身黑——却不懂得如何让多数男孩子（包括我在内）举止得体。我很快就感到幻灭，而且变得叛逆。

这里的老师没有儿童心理学背景，除了极少数人，其他人显然对于教育儿童以及养育他们的第二职责都感到厌烦；每个学期约有十二周，在学期间很少见到父母，年长的男孩主掌宿舍，以他们在十七岁时认为对的古怪方式“教育”学弟。我们很幸运，没有遭受太多身体霸凌（那个年代差不多已经结束了），但那样的环境无益于健康、均衡的教养，我和许多男孩头一年几乎都是在恐惧和困惑中度过的。

近四年后，我预料我的高考不会考得太多，也终于因为一些原因被退学，特别是因为破坏公物。我一向喜欢危险和刺激，当时带着线锯和工业用断线钳溜出宿舍制造混乱是最主要的发泄方式，当然这完全是误入歧途的行为，但在门禁十点而且无法处理多数孩子真正需求的男生宿舍里，这样的行为也许可以理解。

我深信这所学校对我和许多与我一样的孩子管教失当，至今依旧认为，身为代理父母，他们有责任探究我的行为、善加利用我热爱冒险的精神，而非只是给我贴上“坏学生”的标签。

在邻近马基特哈伯勒镇的布鲁克豪斯学院取得优秀的成绩后，我进入了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尽管大学三年里前两年都在大麻烟雾缭绕的日子中度过，我还是取得了地理学荣誉学士学位⁽³⁾；被排他的大学橄榄球队拒于门外后（只要上了“对”的学校，包你进入先发十五人队伍），我加入当地乔德人⁽⁴⁾在惠特利湾组成的罗格克里夫男子橄榄球队（Rockcliffe RFC），尽情享受每周一次的校外生活。

之后我大学毕业了，因为害怕坐办公室，加入了英国军队。这对一个无法适应寄宿学校的人来说，也许是个奇怪的选择，但我自认能够忍受规范以便拥有需要体力的户外生活。这是一种我能发挥所长的生活；我一直坚信军队不会改变我，我希望能从中学习一些有用的东西，但不想成为那种官拜少校、傲慢自大的白痴。我从未真正摆脱人们第一次进入军营时会描述的那种恐惧，尽管在军队里度过了一些不错的个人时光——大多和在塔姆沃斯的夜生活有关——但我不觉得自己融入了军队。经过顺遂的四年，2002年我升至上尉，但我很高兴合约即将到期，决定不予延长，在一次到北爱尔兰南阿玛郡的克罗斯马格伦服役尾声，我这么告诉指挥官。体认到这也许是最好的决定（而且我确定这对军队而言不是什么大损失）时，他微笑以对，我开始找工作。

在伦敦金融界找了几星期工作后，我偶然间看到一则启事——征求探险向导到中美洲进行环保工作，这份工作提供三个月的合约。我接受了，这样我可以等到经济复苏，更有希望成为股票经纪人。这次经验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我爱上了冒险、那里的人以及那种生活方式。它以户外生活为业，却没有军队的规矩和固有的严肃，更重要的是，这整件事通向我坚信的目标——我当童子军的日子意味着我对大自然有强烈的归属感，并且真切地渴望保护雨林，这都带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快乐。充满保时捷 911和满酒吧金发辣妹的梦想消逝了。

★

我从那时起担任探险向导，至今已经过去了五年，现在我是特里克福斯在伯利兹的首席代表。我开始计划如何让卢克和我的个人亚马孙探险之旅成行。我们列了各方面必须做的准备，从下面这份列表中可以看出计划成行必须做的所有事项：

1. 研究。要做足功课，确认我们的计划至少在理论上可行。
2. 使命。这次探险的目的是什么？是纯粹为了成就一己的英雄事迹还是有更深层的目的？
3. 风险评估。我们必须衡量风险，标记最危险的区域，积极准备，确保我们不是去送死。
4. 撤退计划。万一出了差错，我们如何得到医疗援助或抵达安全地点？
5. 训练。我们必须具备适合这次探险并游刃有余的技能。对于那些可能会因为我们无知而带来危险的领域，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6. 语言。光是在秘鲁就流通三十多种语言，我们至少必须能用西班牙语（秘鲁）和葡萄牙语（巴西）交谈，以了解环境，掌握局面。
7. 花费。我们必须估计探险的总花费和所有支出的账目。
8. 募捐。我们在英国计划、组织时需要钱，探险活动本身也需要钱，我们的个人支出必须尽可能得到赞助（免费送给我们或以折扣价出售），让整体财务支出减至最少。
9. 保险。我们必须找到适用于身处亚马孙流域的保险套餐，保障范围涵盖配备故障、遭窃或遗失，以及紧急医疗运送和治疗费用。
10. 通信。我们如何和外界联系？在雨林覆盖下何种通信方式可行？如果设备出了故障，怎么办？
11. 网络。这是我们与赞助者、慈善机构、公众以及其他所有人交流的窗口，也是大多数人体验这次探险的途径。
12. 慈善机构。我们想帮助谁？如何募款？如何和这些慈善机构合作？
13. 许可和签证。我从何处着手取得前往巴西原住民部落的许可？他们处于自治状态，没有政府部门监管他们的福利；我如何合法地在两个主要的国家待超过一般旅游签证允许的三个月？

14. 配套设备。我们必须确保带上最好的设备，能够长期暴露在丛林的潮湿环境以及山上的酷寒中，从丛林靴到保暖手套、吊床、煤油火炉等所有装备都须备好。

15. 公关。人们如何认识我们？如果没人认识的话，我们如何达成目标？

16. 摄影。我们如何记录这段旅程？从何处着手确保将来有一天会有人看我们拍下的内容？我们能在镜头前自在地说话吗？

17. 出书。如何取得出书合约？我们会写作吗？

18. 向导。我们能找到一天收费7美元的向导和我们同行吗？而且这名向导得能说英语、西班牙语和克丘亚语⁽⁵⁾。

19. 拍照。两个蹩脚摄影师如何捕捉绝佳的影像以便对人述说我们的故事？

上述事项中最重要的显然是为此次探险找到捐款，有了赞助，其他事项就能按部就班地进行，如果解决了现代社会最令人生厌的烦恼——金钱——我们重返自然的梦想就能成真。

在试着写提案时，理解到这次探险必须有个值得让我们抛下一切的目标，我们立刻想到唤起保护雨林意识这一点。我们可以架设网站，定期写博客，让大人小孩都能阅读，及时跟上我们的探险进度；我们可以天天记录雨林的状况，以及它是如何被人类破坏的，让在学校或在办公室的人都能参与，开始感受到自己和雨林的关联。我们两个都不希望成为环保斗士，我们都清楚，贴上这个标签就可能会与巴西当局为敌，难以取得徒步许可，因此并不想发起“立即行动”运动，但是我们认为可以培养并提高他们保护雨林的意识。我们一说到这里，便觉得这个目标很恰当也值得，现在我们有了值得在一年中抛下一切的目标。

为了让此行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必须绝对精确，要百分百走完全程，绝不使用车辆、船只甚至利用水流推进。当然我们必须渡水，这种时候会乘小船，但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渡水时的每一米路程都要用手划，让此行完全以人力前进。

我们也想到直接为慈善机构募款。我们希望找一个保护雨林的团体，因为这样做很合理。有一个和我们探险目的相符的代表性慈善团体：雨林关怀组织（Rainforest Concern）。我父亲几年前因癌症过世，姐姐罹患肌痛性脑脊髓炎（现在仍是），因此英国癌症研究中心和肌痛性脑脊髓炎协会是另外两个我想帮助的慈善团体。最后，我们想挑选东道国能受惠的慈善机构，后来找到了两个总部在伦敦的儿童慈善机构：秘鲁计划（Project Peru）和为巴西儿童行动（Action for Brazil's Children）。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回馈所经之国，又不会因为强烈支持反森林砍伐组织而惹恼当局。

我从不曾想装作我们是因为慈善组织和雨林意识才选择徒步亚马孙，这是我们的信念，也很高尚，但我们最初的动机较为自私。一开始冒险、挑战和获得认可是核心动机，但冒险是让另一部分动机得以发挥的必要条件——一场前人已经做过的安全徒步旅行不会吸引媒体的注意，也就不会有同等的行善潜力。同样，我们也认为纯粹出于自私的理由去冒险空洞又无意义。自私与无私的目标不只是兼容的，到最后二者不可或缺。

我们兴奋得昏了头，认为这也许可以拍成一部好纪录片，因此我和认识的唯一一位电视台工作者克雷格·朗曼联络。克雷格是个说话温柔的家伙，在一群强势的人中间总是退居二线，但他说的话更值得一听。“你们真的疯了，”他说，“我爱死了，这能拍成一部好电视纪录片。”他同意帮我们找制作公司，和我们一起拍摄纪录片。

接下来要研究的是许可和签证。当时秘鲁和巴西通常只给三个月的旅游签证，我写信给曾乘单人滑水板（hydrospeed）顺亚马孙河而下，之后乘坐独木舟的南非探险家迈克·霍恩（Mike Horn），问他怎么处理。他太太亲切地回了信。

亲爱的埃德：

谢谢你的来信。我们认为，不要对领事馆和大使馆透露太多关于你的探险行动的信息，通过常规渠道取得所需的签证，并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例如携带全球定位装置、卫星电话。当局不懂得如何处理常规之外的事。

预祝探险之行一切顺利！

谨致问候。

凯西

凯西的话多么睿智，现今回过头来看，我当时应该完全遵照她的建议，但那时候我坚持行事必须光明正大，因为和凯西的丈夫迈克不同，我们对慈善团体有所承诺。因此，为了安全起见，我认为我们在每个国家都必须百分百遵守法律。

我联络领事馆和大使馆，开始了一段漫长且曲折的历程，试着取得在秘鲁和巴西各停留九个月的长期文化签证，要是我们的行程在每个国家超出六个月（我已经开始认为有此可能），这会让我们有一些缓冲时间。

说服企业提供免费装备很值得一试，但并非易事。我们两个头顶渐秃的无名小卒，计划着远超出过往经历的探险活动，企业几乎难以从这种“赞助”中看出获得任何回报的可能，因此，我们写了无数封电子邮件但成效有限。

我认为我在巴塔哥尼亚看过的一件装备可以完美地运用在丛林里——便携式充气筏，一种单人小船，轻到可以放进背包里。我们知道自己必须渡过上百条支流，因此要有可行的策略。阿派卡充气筏

（Alpacka）产地是加拿大，我写信给制造商询问他们能否提供协助。他们的回应很友善：他们有一些表面受损的筏子，可以以一只300美元的价格卖给我们，这可以让我们每只省下475美元。我认为这笔交易很划算（此外，这是我们收到的第一个正面回应），我用信用卡买了三只——一只给卢克，一只给我，另一只给理论上的当地向导。接着轩尼诗吊床公司（Hennessy）愿意提供一两套吊床设备，阿尔滕贝格公司（Altberg）提供几双手工丛林靴，每件小小赞助品都带给我们极大的满足，我们努力一点一点地让此行成真。

尽管取得了这些胜利，累积了一点装备，但是我们现在负债几千英镑，真的需要财务赞助。在伯利兹计划此次探险时，我收到了第五个慈善机构——雨林关怀组织——寄来的一封措辞谨慎的电邮：

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并没有鼓励你去从事对你个人福祉有极大风险的行为，你有探险背景，但我们希望和你会面，进一步讨论。你

已经列出了我们能设想到的危险，但同样我确信你能预期到进度有时会极度缓慢。

第二，猎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捕鱼可能是你们的计划之一，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但我们并不鼓励在非必要时猎捕哺乳类和鸟类，必须讨论这一点。

第三个问题是你们可能会和原住民接触，这未必符合他们的最终利益。

这几点都非常合情理。我们订了禁猎原则，探险行动开始成形，我们着手计划如何携带食物以及在沿路的落脚处再补给。卢克和我都略过了关于原住民的问题，因为我们鲜少和他们打交道，只能想出很薄弱的说辞：“我们是好人，尊重所有人。”多么天真啊。

我们最早设定的出发日期是2008年1月1日，这样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可以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理论上来看，这也是个可靠的日子。我们和秘鲁一家登山公司联络，他们坚定地告诉我们要避免在12月到3月间行走于安第斯山脉：那时是冬季，会有大雪，此外高涨的河水和峡谷也无法通行。

可恶！

我们两人都缺乏雪线之上的经验，就算不选在冬天探险，光是“越过安第斯山脉”就够吓人了，因此我们将出发日期延至4月1日，以确保海拔5000米以上的路途尽可能舒适。我心里已经开始怀疑这场冒险会超过一年，因此我们可能至少必须忍受一次亚马孙的洪水季。

现在是2007年5月，卢克和我成了好友，过去我们是友好的工作伙伴，现在我们有明确的目标，要让这次探险成行。

尽管我们保证能有装备、目标和许可证，但事实上和我们聊过的探险界人士中没有一个觉得徒步走完亚马孙河真的可行。主因是，亚马孙河流域地势低洼，容易引发严重的水患，河水经常冲上河岸，水流从主河道灌进远至70千米处的森林，这意味着毗邻河道的森林一年到头大多遭遇水淹，不利于行走。

在我简单的想法里，我知道这种情况，我想，只要和主河道保持安全距离即可，问题是我无从得知每个区域淹水的范围，因此遍寻网络找更多信息。最后我偶然间发现了一张分辨率很低的照片，似乎将洪溢林（flooded forest）与硬实的土地以不同颜色做了区分。这张照片属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布鲁斯·查普曼（Bruce Chapman），因此我写信给布鲁斯，问他能否分享这些数据。两天后，他寄来一张CD，没有收费，里面有整个亚马孙河流域在高、低水位时的绝佳影像。航空航天局的数据让我清楚地从上空看穿整个雨林，并且对洪水高峰期淹水的范围有了整体的概念。

这是一大突破，有了这些数据，我就可以在洪水来临时在地图上做批注，并且可以规划路线，绕过水患最严重的区域。没错，这些图是1995年拍的，但从那时到现在，那里的地形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只有一些河形改变了。我们有可行的计划。

我们还是必须渡过每条支流旁的洪溢林，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我们可以用航空航天局的图片数据从洪水水道最窄处渡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水太深以致无法行进，我们只须将充气筏充气，手持砍刀乘坐充气筏在林中推进。想到坐着充气筏穿越矮树丛，想象着躺在水上吊床的夜晚，甚至设想一种可以在幽暗水上用树桩点火的燃烧盘，我们既害怕又兴奋。

一直以来人们不断地前往丛林，事实上，目前有上百万人居住在亚马孙河流域。亚马孙河流域人口稠密，有利于粮食补给和装备损毁时应急，水上交通也很繁忙，因此，如果发生紧急事件，那里足以提供天然撤退策略，这些都是优点。但问题在于，一旦我们远离主河道以避开洪水，所有原本容易解决的危险处理起来都变得有了难度。如果到了没有人烟的地方，我们就必须自力自强，从这些地方自行撤退既耗时又困难，保守风险评估的结果是“不能接受”。在许多地方没有直升机、没有搜救队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出决定，如果要进行这场冒险，就必须承担这些风险。因此，受伤或需要急救的病痛，如盲肠炎、蛇咬伤或头部重伤，都可能致命。

卢克在5月底获得了第一件赞助装备，他争取到麦克派克公司（Macpac）为我们提供帐篷和背包，这对卢克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投身湖区的外围工作，无法在探险计划上投入和我一样多的时间。

为了找到资助此行的赞助商，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高此次探险的知名度，赞助商如果看到我们至少上了一些媒体版面，就会对此刮目相看。问题是我和卢克没有一张在丛林的合影，因此我和我的准姐夫杰里米一起挤上车，前往康沃尔郡伊甸园区潮湿的热带植物温室拍摄一些“真实的”丛林照片。

在杰里米为我们拍摄快照并且时不时提醒我们微笑的几个小时里，卢克和我觉得我们显然在热带蕨类植物和棕榈树之间站错了边。一些染蓝发的老太太因为我们在拍照，判定我们一定是名人，因此向我们索要签名。

2007年6月1日，我去伦敦和本·梅杰会面，他是我在伯利兹和婆罗洲担任探险向导时的老伙伴。我们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大楼的咖啡厅吃了午餐。本现在是儿童电视节目主持人，他答应给我一些BBC商店出品的秘鲁地图，但它们的用途有限，而且只能提供我需要的52张秘鲁地图中的一小部分，我有点失望。但本接着提到，有一家公司也许能提供偏远地区医疗训练（我肯定需要），因此这场会面不算完全浪费时间。

吃中餐时本犹豫了一会儿。

“埃德，你去过圭亚那吗？”

“没有，本。”

“你知道怎么架设高频无线电吗？”

“不知道。”

“你和摄影团队合作过吗？”

“废话，你知道我没有。”

“你想不想为BBC的新探险节目工作，担任丛林营地经理？”

“让我考虑一下……”我咧嘴而笑。

他们提供本这个工作机会，但他因为主持另一档儿童节目而无法接下，他让我到BBC位于布里斯托的自然历史部门面试。由于在面试前一天我的双眼做了激光手术，所以，我在几乎看不见的情况下参加了制作人史蒂夫·格林纳达的面试。面谈很顺利，史蒂夫对我刚动的矫正手术很感兴趣。两天内我就加入了这个团队。我从未做过电视工作，但这是份幕后工作，他们只是要找个能到圭亚那的人，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管理印第安人团队以建立偏远丛林营地，之后摄影团队会抵达，我的工作管理当地人，并确保营地随时都有航空燃料和厕纸。一纸三个月的合约，这也是前陆军探险向导的理想工作——我做得来。

环保考察的向导工作薪水微薄，因此BBC提供的薪水是我近年来的最高薪。卢克能理解，如果我拒绝，那就太蠢了。现在距离出发只有七个月，我如果参加这档节目，就有足够的钱在出发前四个月都不用工作，可以在伦敦租公寓，支付生活开销，我必须在伦敦会见可能的赞助商；缺点是，我远行时，所有准备和筹钱工作都会落在卢克身上。

与此同时，卢克安排了和医疗用品公司艾克斯梅德（Ex-Med）的会面。我们一起到赫里福德郡（Hereford）寻求建议，看应该带什么医疗用品，并希望他们能安排一些基本的热带地区医疗训练。得知我们要会面的都是经验丰富的军方人士，我和卢克便毕恭毕敬地上门。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主管格德·希利（Ged Healy）。

在我们做自我介绍时，格德说：“嘿，埃德，你下个月要和BBC一起出发去圭亚那，不是吗？”我有点讶异，也很佩服，我回答说“是”。他们调查过我们。

我们被带进了一间房，墙上框着一面烧得半毁的联合国旗帜，卢克指着铜匾上刻的“赫拉特（Herat），西部地区，阿富汗，2004”咯咯地笑了起来，我感觉到热血涌上了我的脸——这样巧合的概率有多高？

“闭嘴，卢克！”我默默地祈祷。

“埃德，你不是有个关于这面旗子的故事吗？”卢克兴高采烈地说，而格德一脸冷漠地在一旁看着。

“什么故事？”格德问道。

浑蛋！我别无选择，便开始叙述职业生涯中最自贬的一个故事。2004年我在赫拉特工作，在阿富汗史上第一次总统选举期间为联合国提供建言。我住在联合国位于市中心的大院。当时掌控赫拉特的军阀伊斯梅尔·汗（Ismail Khan）被美国大使革了职，正如当时司空见惯的场景，当地阿富汗居民决定发起暴动，联合国大楼的高墙和建筑外的浅蓝色标志成了明显的目标。当时我和一名叫马格斯（Mugs）的津巴布韦顾问走进大院。他是来自罗德西亚⁽⁶⁾陆军的老兵，是个可爱的老头儿，年轻时阅历丰富。他到阿富汗赚钱——养家糊口对津巴布韦的白人来说日益困难。

一开始我们站在一旁，看着群众从外头不断敲击允许车辆进出的金属大门，接着石块像雨一样落到院内，打在我们身上。这没什么稀奇的，因此，我们只是冷静地留意可能会击中我们的投掷物。接着，石块变成汽油弹，建筑物多处都着火了。

火光激起了暴动群众的狂热，他们更猛烈持久地冲击大门。一名聪明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驾驶一辆四轮驱动车抵住车辆大门，防止群众冲撞进来。马格斯以浓重的津巴布韦口音转头对我说：“应该也安排人到人行大门那里这样把门抵住，那边随时会失守。”

我同意——应该有人去。我们两人都没有去做这件该立即做的事，只是看着，接着那扇小金属门果然朝内爆炸，愤怒疯狂的群众蜂拥而进，挥舞着金属棍棒和汽油弹。

我们手无寸铁，别无选择，只能逃到另一扇金属门后的地下室（稍早的时候，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已经撤退到那里），透过敞开的大门可以看到选举计划中心（Electoral Planning Centre）的计算机遭群众洗劫，被扛到了大街上。

现在我们四周以及上方的建筑都着火了，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就会被烧死在地下室里。我们向邻近的美军基地要求派遣一支护卫队。没多久，两辆悍马车抵达，从愤怒的群众中间强行开道进入大院，两辆车一辆在前另一辆殿后，所有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和顾问挤上

白色的车，并形成一条长长的护送队伍，我开着一辆白色的联合国四轮驱动车，穿过狂怒的群众，从地下室加速驶上斜坡。

这是我第一次在阿富汗开车，我知道，一旦停下来或有所耽搁，群众就会袭击车辆，而我们将任凭处置。以占领军的身份在北爱尔兰待过，我知道下场会是什么。

我们摇下车窗，让粉碎的玻璃不再溅到身上；加速穿过群众时，我们不断遭到石块攻击。石头砸进车内，抱着头部的手被割伤了，我发疯似的开过毫无法纪的街道，群众在最后一刻从前面的马路上跳开了。

当美军基地的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时，我的肾上腺素水平终于恢复正常，从各地面作战单位传回来的无线电报告说，城里的许多联合国建筑物都被烧成了平地。

从那天起，我和马格斯再也无法直视彼此的眼睛，因为我们没有采取行动，造成了一场灾难。当时有一名艾克斯梅德的医生也在那里，他在撤退时匆忙带走了一面正在燃烧的旗帜。

这就是这场会面的开场白，而我的原意是让格德对我和卢克的专业与经验刮目相看的，天啊！

但格德没有反应，我完全不知道他作何感想。随着谈话转向探险，他问我们一些基本事项：用什么吊床？怎么净化水？打算穿哪种靴子？他在考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够资格尝试这种探险。

到了某个时刻，他显然很满意，问我们想要他提供什么。我告诉他需求列表，他开始告诉我们他能提供的服务。他说，他可以提供完整的亚马孙河流域疾病简介，为我们配备专业的医疗用品包，并且详细介绍这些配备。太棒了，我们心想，但我们负担不起这种服务。格德问我们医疗配备的预算有多少，我们说一份500英镑。“好，就以这个价格提供。”卢克和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们内心狂喜，太神奇了，看来格德很支持我们。

他接着提到了训练——我们需要进行几天的基础训练，帮我们应对难以处理的状况。格德说要给我们提供五天高强度的创伤治疗课

程，接着提供三天热带用药课程。心里掂量着我们有限的预算，我告诉格德，恐怕我们无法负担这样的课程。又一次，格德问有多少预算，我们告诉了他。“就以这个价格提供所有服务。”他说道。这一刻我和卢克都惊呆了。

他接着问，当我们需要建议时，是否有二十四小时待命的医生接电话。我们当然没有，接着他提供这项服务——免费。

最后，格德说：“如果你们真的遇上麻烦，无法得到医疗援助怎么办？”卢克和我迅速回答，这是这次探险固有的风险，我们没有解决办法，我们接受更大的风险，就是死亡。

“要是我们有个前军方四人小组，可以在十六小时内飞到你们传送过来的任何坐标，你们觉得如何？”

“这太好了，”我们结结巴巴地说道，“但同样地，我们负担不起这种等级的服务。”

格德告诉我们有家保险公司处理这类服务，支付一定的保费，这个四人快速行动小组的服务就会含在套餐里。

会面自然地到了尾声，我们向格德和他的合伙人道谢，离开时还有点困惑。之后，我们直接前往赫里福德郡的酒吧喝酒庆祝；艾克斯梅德为我们提供量身定做的医疗用品包、大量训练、整个行程不间断的医疗建议，以及包含全世界最训练有素的医生为我们服务的保险套餐，他们会从遥远的地方来救我们于危难之中。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喝着啤酒，咧着嘴傻笑，这次探险因为这次简短的会面而更加安全了。

2007年8月3日我飞往圭亚那。那个节目叫作《美洲豹的失落之地》（Lost Land of the Jaguar），与当地印第安人和朴实的BBC自然历史部门团队合作是我的一大荣幸。

我的职责是确保制作团队的营地建成，并妥善管理当地人。制作团队抵达时，我自然而然成了当地人和团队之间的联络员，并管理营地的每日运作。

经过三个月重振精神，我在10月底返回英国，准备处理徒步亚马孙的最后筹备工作。现在我有钱在伦敦租房子了。在我离开后，事情进展不大，但现在我身处事情进展的核心，可以投入全部精力让探险启程。

尽管对此次探险的乐观看法压倒了一切，但我偶尔也会感到阵阵忧虑，担心的并不是被之前与世隔绝的部落杀死，或在渡河时撞上岩石，而是不能找到赞助者，不能取得长期签证，以及不能为慈善团体筹得足够的款项。

虽然这些烦恼都很真实，但我经历过够多的压力时刻，我明白，只要坚持下去，等待时机，就会有好事发生，让好运持续下去。

我搬去和一名叫詹姆斯·韦克福尔德的人同住，他在伦敦斯托克韦尔的公寓有间空房，我把阁楼当作办公室，开始认真申请办签证和许可证。

2007年11月我和卢克去参加皇家地理学会组织的周末探索活动。这个活动并不是针对我和卢克这类人，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拓展了人脉，直接的成果是，艾斯特公司（AST）同意赞助，并且给我们提供两个宽带全球局域网（BGAN）的卫星网络连接终端，现在我们可以通信了——不只有卫星电话，还可以在丛林中使用宽带网络。这种装置非常好用，每件的重量差不多与一本精装书相当。在后来的探险中，我用它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做访谈直播，在全球240个地区播出。

尽管有这么多好运，但重点是，我们迫切需要财务赞助商，如果没有，我们就必须取消此行。我痛恨向企业要钱，也不善于此。我写信给上百家公司，向它们解释与卢克和我在同一战线会对他们的生意有多大的好处，但我自己都不相信这样做有用，因此毫无意外地，没有人愿意提供赞助。我觉得自己应该多打一些私人电话，因此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而产生了罪恶感，因为我缺乏积极作为，这场冒险还没开始就要失败了。

12月13日晚上十点半，我和室友詹姆斯坐在沙发上看汽车节目《英国疯狂汽车秀》（Top Gear），用水烟袋抽着调过味的烟草，电话响了。

“埃德，明天要不要一起去射击？”

是老朋友索尔·夏纳格，他是个有趣的怪人，曾是爱尔兰禁卫军军官。

“飞靶射击？”我问道，假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不是，是猎雉鸡。”索尔说道。这时候我产生了那种身处在一个自己无法应付且不自在的社交场合中常有的感觉。

“索尔，我没那么高贵，没打过雉鸡。”我嘀咕着，希望这样能拒绝他。

“你有花呢夹克吧？还有绿色惠灵顿长筒靴吧？”索尔的口气听起来像是每个体面绅士的衣橱都该有这些标准配备。

“没有。”我说，“我只有连帽运动衫、破牛仔裤和一双耐克运动鞋。”

“那就去借，我明天六点来接你。”电话挂断了。

詹姆斯也在军队里待过，幸好他是个传统的军官，不像我，他有全套适合这类场合的得体服装。他好心地借我花呢夹克、斜纹厚绒布裤子以及一双绿色惠灵顿长筒靴，救了场。我就算感到自己格格不入，但至少看起来也要像他们中的一分子，嗯，除了大光头和胡楂。

打猎活动正如我所恐惧的那样开场：一群在伦敦金融机构工作、事业成功的富豪聚在一起拍背示好，吹嘘他们的枪管长度。但索尔是个好伙伴，而这些人是他的朋友和生意伙伴，因此我尽力与其他所有人和睦相处。就像在这种场合中常见的情况，当你努力且真诚地试着和他人好好相处时，隔阂便消失了，你最终也会很开心。他们当然都是好人，只是和我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第一轮射击令我非常尴尬——因为我什么都没打到。当大家围着讨论射中几只时，我心想“这下该难受了”。我装作无动于衷，只是来玩玩的，也不在意能否射中任何猎物；但我当然介意——我气死了。

第二轮射击时，情况不同了。他们指派一名助猎者当我的教练，他教我随着雉鸡移动枪管，说：“尾巴、身体、嘴，砰！”这是个神奇的公式，我一只接着一只打中，看起来可能有点残忍，但我很享受。看到羽毛爆开如烟火，雉鸡在它的路径上停了下来，接着砰的一声落地，那是什么感觉？“砰”，我又击中一只，“砰”，又一只，真是不可思议——我震惊于自己原始的狩猎本能复活。在第二轮射击结束时，我已经射中九只，整个人志得意满。

午餐时间我们在一栋庄园宅第休息，吃着丰盛的餐点，酒香四溢。我非常放松，大谈接下来的探险行动。因为这是个惊险且充满男子气概的话题，同伴们都能接受，也对我做的事有兴趣。

这天结束时，大家都说：“今天真愉快！”彼此热烈地握手，将雉鸡丢进各自的后备厢后离开。在我们就要各自踏上归途时，其中一人把我拉到一旁：“埃德，真高兴认识你，刚刚在屋里因为有其他人在，我不想多说什么，但你的探险正是我们公司有兴趣赞助的类型。这是我的名片，下星期打电话给我。”

“哇！”我心想，“我没听错吧？”虽然还不确定，但的确是他自己走过来说要提供赞助的！

在一个月內我们就有了钱，这次探险全程有人付账。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没有认真为探险筹款且射杀雉鸡的罪恶一天，成了一年之中收获最大的一天，我和卢克的亚马孙之行得感谢乔纳森·“长枪管”·斯托克斯（Jonathan ‘Long Barrel’ Stokes）和他的公司JBS赞助，有本事不如有人脉啊……我们在艾克斯梅德接受了极佳的医疗训练，用这笔新得的财富买了更多的设备，支付了极其昂贵的保险（包括艾克斯梅德的快速反应小组），也订好了机票。在圭亚那工作挣的钱已经花完了，我的信用卡积欠了大笔账单，大多是酒账。我们就像要出征的战士一样开派对狂欢，完全忽略了体能训练。卢克和女友订婚了。2008年3月1日，我们带着满溢的行囊、充血的眼以及好几层下巴，登上前往秘鲁的飞机。亚马孙召唤着我们，我们准备好面对前方的挑战了吗？压力、危险、辛苦和灾难就在眼前。我不认为我们有任何头绪，我们希望自己，但有点担心，接着又喝了一杯酒。

寻找亚马孙河源头

坐在远离欧洲的飞机上，我们用惯常的自嘲和幽默来掩饰紧张，但在内心深处，我们都了解，这次投入的是比过去任何事都具挑战性的工作。如果相信专家，那我们很有可能会死。想着这次探险的全貌让人既急躁又紧张，因此，我们专注在更具体的事物和细节上，忽视整件事的不祥阴影。

我们搭船和飞机走访沿途的几个主要城市，结交一些人（警察、侨民、地方政府人员），并且留下日后徒步回来时可用的补给品。3月底，我们终于来到秘鲁首都利马，在一位说英语的友善秘鲁人马莱内的帮忙下，获得了秘鲁国家地理研究所提供的52张地图，以及内政部提供的两份九个月的长期签证（后来发现是非法的）。我们从夜间巴士的后车窗向可爱的马莱内挥手道别，然后将座椅放平。第二天早上要抵达的目的地是海滨度假小镇卡马纳（Camaná），我们打算从那里出发，以太平洋海岸为起点，越过安第斯山脉，寻找亚马孙河的源头。

吃了安眠药，睡了近十二个小时，我意识到卢克在戳我的肋骨，指着窗外。借助因药物而迷蒙的双眼，我们饶富兴味也暗暗忧心地看着窗外，这景色跟我们设想的有些微偏差，太阳还低悬在空中，在无尽的沙丘上投射出长长的阴影。

“埃德，你到过沙漠吗？”卢克咯咯地笑着，我们开始嘲讽自己的不专业。

“也许我们应该戴帽子，”我提议道，“还需要一些防晒霜，可能还需要一瓶水。”放眼所及，没看到任何灌木丛。

我们入住卡马纳一栋巨大的粉红色钢筋水泥旅馆，旅馆内有个空荡荡的游泳池，没有西方人来这里。这里也许一度是旅游胜地，但在2008年3月，我觉得没有人想在这烟尘弥漫的边区村落度过宝贵的假期。那天晚上，我忍不住想到海边看看太平洋——我们实际的起点——我不记得卢克为什么没有和我一起去。我上了一辆出租摩托车。开了4千米路后，我要司机等我，我下车仔细观察这肮脏多石的海滩、小镇的污水出水口以及成群的海鸥和秃鹰。

景色枯燥乏味，但我非常激动，我就站在这里，经过多年的梦想和十五个月的准备，就站在旅程的起点。然而，当我看向陆地时，漫天烟尘的小镇背后隐约可见的贫瘠山丘令我非常忧心，我决定回到旅馆查看新的地图，看能否全程沿着水道穿过沙漠，进入安第斯山。

大体上来说，每每想到这整个旅程，我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振奋起来：部分是为这纯粹的冒险激动不已，部分则是对我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能完成的任务感到异常兴奋。

首先，我们必须和奥兹碰面。我们一开始决定不用向导，因为我是退役军人，而且我们俩都是探险向导，认为有能力独立完成这次旅程。但随着行程日益接近，我越发怀疑我的西班牙语是否够好，另外，在只讲克丘亚语的安第斯山脉落脚时，我们该怎么办？那就更不用说光在秘鲁就可能遇上32种语言，卢克只会说几个西班牙语单词。出发之前，有个朋友帮我们联系了秘鲁年轻人奥兹即奥斯瓦尔多·泰拉卡亚·罗萨尔多（Oswaldo Teracaya Rosaldo）。奥兹是个有抱负的向导，二十四岁，据说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克丘亚语、西班牙语和英语。通过两封简短的电邮，我和他谈成一天7美元的薪资（从5美元开始讨价还价），并且要他在2008年3月30日和我们在卡马纳会面。我们至少在电子邮件上有一名向导了。

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生活期间，我和许多南美登山向导合作过，所以，我想象奥兹是个有个性的人物，高大黝黑，留着粗糙的胡茬，饱经风霜的脸庞带着世故和犀利的智慧。但出现在我面前的男孩骨瘦如柴，剪个西瓜头，战战兢兢地多礼到没个性。他穿着红色的英格兰足球衫、红色尼龙运动裤，几乎没有任何装备，也只会说一点英语。我深吸一口气，试着往好处想。我的西班牙语比他的英语好，这代表最终我们会以西班牙语交谈，结果就是，我的西班牙语会进步。卢克

多半用英语对奥兹说话——他们俩只能进行最基本的沟通，其余都靠我来翻译。

我们给奥兹一些钱让他去买夹克和一些靴子。去年，奥兹和我那位朋友共事过，所以我依旧相信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回来时带着一件仿皮赛车手夹克，上面缝满仿冒的赞助商标志。那件衣服很可笑，既不防水也不保暖，我开始疑惑这孩子到底有多少登山经验。

卢克和我将通信器材分成三份，我们看着奥兹把器材塞进我们给他的防水袋，接着使劲地试图把那一袋重物塞进背包。我和卢克忧心地看着对方，只有自己尝试过这种不可能的“技艺”后，才会理解这样做多荒谬。他连打包都不会。因此，卢克出手，很有技巧地指点他。

尽管事情的进展不是很顺利，但其实我不太担心，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会说克丘亚语也能和我们沟通的人，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再说，我们可以教奥兹和我们一起行走必须具备的技能。但最重要的是，他对这次新探险很热情也很兴奋。他花自己的钱来到秘鲁的海滨会见两个外国人，对他而言，这已经是很勇敢的一步，因此，我判定奥兹还可以——而且我们很幸运能有个秘鲁人同行。

我们决定在4月1日愚人节出发——诡异的日子。我们还没准备好，还没把地图剪下来，还没做好许多必要的调整。早餐吃煎蛋时，我们决定延迟一天，多给自己点时间，在第二天从容出发。

4月2日早上，我们下楼吃早餐，这次背着庞大的帆布背包。这是我们第一次背上装有十天食物的背包，背包的重量让我们相当震惊。当时没有磅秤，但仔细想想，我会说我的背包有48—50千克重；奥兹的比较轻，因为他的个子和背包都小很多，但一定也有近35千克。有背包健行经验的人都晓得，背这种重量简直愚蠢，而且，你计划的还是长达一年（或更久）的横跨整个大陆的步行。

我们都清楚这一点，但问题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思想上的牢笼，想着这是十八个月的探险，而非三周登上密斯米雪山（Nevado Mismi）的行程。我们承诺要写博客，这表示一人带一部苹果笔记本电脑，还要带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和数码摄像机。我们有两套追踪装置，目的是在地图网站上自动更新所在位置——这两套装置的大小和重量与一

般的砖头没两样。我们想拍纪录片，所以都带了高清摄像机、五块备用电池、四十卷迷你DV录像带和一些基本清洁用具。我们在金吉尔电视台（Ginger TV）接受过一天半的摄影训练。我们也要写书，所以带了好几本防水的“雨中书写”日记和适用于任何天候的特殊笔。我们希望能做电台访问，能打紧急求救电话，因此有第二套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附带一块备用电池和附属电话，可以用作卫星电话。

每件电子仪器都有充电器，多数有电线彼此连接，也都有各自的橡胶干燥袋，里面有一些硅石小袋防潮。

这些还不包括步行所需的装备，例如帐篷、衣服和导航仪器。对任何机会或想法我们都接受。“再来800克如何？”我们会无知地一笑，最后加起来变成了惊人的重量，我们现在因为那些承诺而步履蹒跚。

我们向旅馆主人道别，走到街上，拦了两辆出租摩托车去海边。我和两件背包在前头上了第一辆摩托车，卢克和奥兹带着剩下的背包坐第二辆。我非常兴奋，背包的重量也压不住我探险启程的满心欢喜。

我们对着摄像机说出“最后感言”：“我们来了。”我们穿着丛林靴步入海洋，让这次行程名副其实——徒步横跨整个大陆。

我们走上沙滩，大海已在我们身后，沉甸甸的重量压得双脚陷入卵石中间，我们开始交换眼色。100米后，我们气喘嘘嘘，400米后，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必须徒步4000米回到卡马纳，到沿着山丘蜿蜒的河流的起点。我们再度回到小镇时，已经是正午了，我们意识到所有人都在指指点点——巨大的背包是个奇观。我们装作满不在乎地走着，就像我们常干这种事一样，还对着讪笑的群众挥手。到达旅馆时，我有个想法：趁笔记本的电力还很充足，我可以用旅馆的无线网络上传启程视频，写博客。

我们都极度疲累而且有点惊讶，所以，大家卸下行李时都跳跃起来，还想着如果不在这里吃午餐就太蠢了。我们在午餐时间写博客。下午两点，外面的太阳让人无法忍受。

“我们可以再待一晚，明天再出发吗？”我大胆地提出来，尽管有些怯懦，因为我们希望第一天就能远离卡马纳，实际上却只是从海边出发走了4000米。但这个提议再度被接受了；我们还点了啤酒。

“明天，”我告诉自己，“我们会奋发，继续向前迈进。”我们对前方所知有限，现在似乎犹豫不决，打包了十天的粮食——真的需要这么多？还是需要更多？前方有没有商店？几个当地人给我们的信息很少，但我们不太担心，未知本身也会令人兴奋。

隔天早上，我们再度打包，最后一次离开这家有空调的旅馆。因为对前一天的进度有罪恶感，我们决定摸黑离开，在寒冷的清晨大步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背包也变得能够负荷。

我们远离了卡马纳，随即进入烟尘弥漫的宽广山谷，小河蜿蜒其间，一条同样灰扑扑的道路通往内陆。我们在整点休息十分钟，然后继续前进。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背包似乎也越来越重，背带紧紧勒着尚未习惯的肩膀，我们显然无法负担这个重量，但我的看法是，我们一定很快就能上手。

在地图上标出第一晚要抵达的小村庄后，我们埋头继续向前，傍晚时抵达灰蒙蒙的落脚地点。当地人向我们外来客投来奇怪的目光，半掩的门悄悄关上，小孩也跑开。我们问是否有商店，他们指向一户用泥土和枝条建造的小屋，里头卖汽水和甜饼干。我们喝着色彩鲜艳的廉价汽水，问矮小友善的老板娘知不知道哪里可以过夜。

“当然！”她笑道，“你们可以在我的后院搭帐篷。”她领着我们穿过阴暗的店铺，来到围着篱笆的后院，里面养着鸡和家畜。

因为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户慷慨人家，对这一晚我铭记在心。这就是我期待的徒步探险——来到某地，遇到一些和善的人，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第一晚是在满是猪和鸡的院子里搭起三顶单人小帐篷。第一天的步行把我们累坏了，我们决定试着减掉一些背包重量。

老板娘和她的家人因此得到了英文小说、鸟类图鉴、望远镜、一把大砍刀、指南针、多余的衣物、帆布背包、钓具、电池、其他多余的刀和其他许多东西。我们那些“以防万一”的装备，数量多到让我

尴尬，也让我意识到我们被这次探险的庞大规模影响了。不过这一家人显然很兴奋，他们友好地争辩着谁该分得什么东西。

第二天，我们收拾好帐篷。背包明显轻了许多，我和卢克的背包现在剩42千克左右。我们又在正午的酷热下艰难地苦苦挣扎着行进，汗如雨下，没有太大的进展。卢克的表在阳光直射下，刻度显示为50℃。他的靴子太小，脚已经起了大水泡，别无他法，他只能换上卡骆驰鞋（塑料凉鞋）。

第一周大多在平地上行走，但酷热和背包重量让我们的身体吃不消。马杰斯山谷（Majes Valley）宽阔丰饶，我们一开始对沙漠的担忧到目前为止是多余的，河水非常冰冷，因为它直接来自安第斯山脉的冰河。我们在种植绿色作物的原野里艰苦跋涉，四周环绕着被灰尘笼罩的棕色山岳。

接着，我们看似走到了路的尽头，河水又宽阔又急切地流过谷地。充气筏不在我们身上，因为进入南美洲时，我们把筏子存放在库斯科（Cusco）了，准备到了丛林再使用，因此往前的路似乎中断了。然而就在这时出现了一名老者，指示我们跟着他走。他领着我们爬上陡峭的山崖，沿着山壁上一条狭窄的小径行走。左手边的坡又陡又近，我们没有问他从谷地绕路要花多长时间，他只是一直向上爬，接着他转身，含糊地往山谷上方一指，就返回了他的村落。我们意识到自己被带进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沿着幽暗的小径行走；光线渐渐暗淡。

晚上六点一过，我们就开了头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寻找下一个不知在何处的安身地点。可怜的奥兹只有一只我们在英国买的手摇式手电筒。我们担心能否找到平坦有水的地方扎营，彼此嘲笑着来掩饰不安。山上土石松软，我们移开好几个石块，将它们推下山坡。如果我们中有人从小路上掉下去就麻烦了，因为左手边的山坡非常险峻，而且我们走的这条路还是条沿着陡峭山崖延伸的小径。我身后断断续续地传来奥兹摇手电筒的呼呼声。

我们对于陷入这样的处境一直感到焦躁，直到终于开始下坡。接着，我们听到了远处的狗吠声，向黑暗处看去时，发现了微暗的闪烁

灯光，继之来到一个偏远的村落。我们希望这里的人很和善，能让我们扎营。

我后来发现，入夜后出现在秘鲁乡村往往是不明智之举，因为当地村民对夜行者较为迷信。当时我们来到一户人家门口，尽可能热情地说“晚上好”。一名老妇人出来应门，问我们是谁、来这里做什么。我们向她解释，她说有几名背包客不久前也经过这里，我们一定认识。

“多久以前？”我们问道。

“大概两年前。”她说。

她和她儿子不但允许我们在屋外的泥地上扎营，还邀请我们坐到锡顶小屋里的火炉边，送上大杯的甜热饮。在暗夜里焦虑地走过山崖后，这杯饮料真是棒极了，我为之着迷，问这么神奇的饮料到底是什么。老妇人笑着回答：“茶。”

接着他们又端上几大盘用大蒜和奶油煮的淡水虾（当天才捕获的），卢克、奥兹和我狼吞虎咽地吞下肚，眼里满是喜悦和难以置信，一再地说“不胜感谢”。用完餐，我们在黑暗中搭帐篷，带着疲倦、饱足感与身处安全之处的欣慰钻进睡袋。那晚，我们裹在主人慷慨款待的温暖的毯子里安然熟睡。

第二天早上，我们僵硬的身上的毯子被掀了起来。奥兹为我们翻译这位老妇人认为我们该付的高额账单。尽管知道这个价钱不合理，但前一夜我们吃得好睡得好，我们也就付了，只是这意味着，往后在接受任何款待前，我们必须先尴尬地与主人讨论价钱，要不然很快就会把手中的钱花光。

这个村落鲜有人至的一个迹象是，村子里有几个毫无遮掩的印加墓地。卢克和我原本甚至不知道印加人会做木乃伊，直到我们在途中真的碰上一具木乃伊。接着，我们发现带着毛发和皮肤的尸体、人头散布在山坡上。这景象让人着迷，也令人毛骨悚然，我们意识到，这一定是最近山崩后才露出来的。

马杰斯山谷的北端尽头通往著名的科尔卡峡谷（Colca Canyon）入口，尽管山谷宽阔如画，但走过峡谷底部没那么容易。科尔卡峡谷是世上第二深的峡谷，仅次于我们几个月后就要通过的阿普里马克大峡谷（Apurimac），在这两座峡谷最深之处，山顶与河床的落差高达3000米。通常河水填满科尔卡峡谷两侧垂直山崖之间的谷地，中间没有小径，有些地方也无法步行通过。因此，我们必须计划路线，取道其中一侧的山顶。沿着峡谷两侧山间取道的问题在于，我们将很难取得水源，此外，在每次遇上流进科尔卡河的支流时，都必须爬上爬下几千米，但别无他法。

在第一周的偏远地区探险后，我们到了马杰斯山谷北端。这里的建筑和我们之前见过的由树枝、泥土建成的零星小屋大相径庭。这里与秘鲁的道路系统连接，因此我们突然间又回到了有饭店、旅馆甚至游客服务中心的地方。有个名叫赛诺莉塔·梅布尔的漂亮女孩在游客服务中心工作，她帮我们计划通过科尔卡峡谷的路径。她在峡谷周围的几个山上偏远村落有熟人，可以联络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就要抵达。她怎么和这些只有步行或骑驴子才到得了的偏远村落联系呢？当然是用手机打电话。

接下来要抵达的第一个山村叫乌诺（Uñon），坐落在海拔2700米处，比赛诺莉塔·梅布尔所在的游客服务中心高出1800米，这是两天的步行行程。可爱的梅布尔问我们是否需要她请乌诺村派个人和驴子下来，帮我们上山。我们已经有点吃力了，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因为我们即将开始爬一些险峻的山。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卢克和我对于这次探险该如何进行的看法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他希望尽可能享受这次探险，因此用驴子驮装备的想法对他而言非常诱人。我想，对我而言也是，只是我觉得这样做不对，我心里总是希望我们背着自己的所有装备，因此我同意用驴子来扛食物和水，但我们自己背装备。

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认同这是一次人力探险，我真的觉得这是我想践行的方式。从前的探险家如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到非洲后，以大批的当地人作为挑夫，还用成群的牲口驮着所有行装。我喜欢的现代探索方式是，自己动手，投入精

力，这是和单纯观光不同的地方，因为用体能展现本身的实力就是巨大的挑战。然而我还是妥协了，同意雇用驴子。

和驴子会合的地点安排好了，梅布尔也通过手机联系对方，让驴子驮一天分量的食物下来。我们第一天攀登得相当快速，因为只需背一天的食物。那天晚上，我们在预计和驴子碰头的地点扎营，并且在一座灌溉用蓄水池下方淋浴。这个人造游泳池里的冰水从一个小石孔里溢出来，形成一道近乎冰冻的水柱冲到我们满是瘀青的肩膀上，冷冽的力道让我们高叫出声。

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驴子的踪影。到了第二天早上，情况很明显，看来我们被放鸽子了。因此，我们吃下仅存的食物当早餐——用覆盆子果酱就着一小盘意大利面咽下去——上山前往乌诺。

如果说在平地上行走已经很吃力，那么爬陡坡更是让步调瞬间减慢。我们举步维艰，因此要为自己设定小小的目标才能持续前进并且保持乐观态度——我要前进到那个拐弯处、那块石头那里、那棵仙人掌那里。到了上午十点左右，在灰扑扑的小径上行走数百米后，我们看到两头驴子和它们的主人从陡峭的山坡上朝我们走来。持续不断的攀爬让我们又饿又累，只想把背包堆到驴子背上。我们热情地和那人打招呼。他似乎认为这是个快乐的出游日，便骄傲地拿出依约准备的食物：一包干意大利面和一只刚宰的鸡。这不是你在陡峭的山崖上会想到的食物，但奥兹终于在我眼前发挥出了他的潜力。没一会儿工夫，他已经拔好鸡毛、切块，佐着大蒜，用卢克修理好的破旧煤油炉煎，而在给意大利面加水前甚至烘过。不到四十分钟，我们已经开始大口吞食鸡肉意大利面了。

补充了体力后，我们拒绝将背包放到驴背上，而是自己背着，艰难地缓步上山。驴子主人对我们的行为很讶异，和驴子跟在我们身后，但现在他们显得有点多余了。我很高兴卢克也认为他必须背自己的包。前往乌诺的路途非常峻峭，但我们停下来喘口气时，看见了美丽的印加残垣，以及来自早已消逝的古文明的古老梯田。

我们转进一个高悬在陡峭峡谷上的村庄，那里有着整齐的农田和一座座土石建的房子，我们为乌诺古雅的美深深着迷。这趟上山花了十小时。因为赛诺莉塔·梅布尔，我们受到了村长埃拉德（Elard）的

热烈欢迎，他带我们参观整个村庄，包括我们要睡的空房。没有公路通到这个村庄，因此我们看到学校里有网络 and 手机信号都大为惊奇，每一件东西（碟形天线、发电机、计算机和沙发）都是驴子驮上来的。村里有座漂亮的粉红色教堂，俯瞰美丽的广场，广场上成千只蜜蜂从土里的小洞飞进飞出。

埃拉德告诉我们，乌诺因为气候变迁而必须做出改变。过去一年下雨四个月，现在每年下雨几乎不会超过一个月；作物干枯，牲口也受害，村民必须另谋出路。他们唯一设想得到的生存方式就是争取让道路系统延伸到村子里，让他们同秘鲁的其他地区以及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如果能实现这一点，由西班牙人建立、“二战”中德国人持续开采的金矿就能重新启动，给他们带来收入。对于这个几个世纪以来与世隔绝的美丽村庄要通过道路和秘鲁其他地区相通的想法，卢克和我感到哀伤，也很荣幸成为最后一访其浪漫而隐密的面貌的少数几个人。

要翻过山到下一个村庄阿约（Ayo），我们必须先从海拔2700米处爬升到海拔4500米处。越过山脊，我们的第一位向导和他的驴子已经完成任务，于是我们雇了另一个当地人——赫克托耳——和他的驴子同行，那头驴子驮着这趟行程的食物、水以及卢克过小的靴子。卢克在挂靴子时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知道我认为把靴子挂在驴背上是对的，而我知道他对于扛自己的所有装备和以人力完成这趟行程的约定不太在意。对我而言，这动摇了此行的基本原则，也使我们无法宣称我们遵守了最初的约定。这里几乎没有水源，因此驴背上的大半重量来自两个装满水的十升容量的罐子。

少了食物和水，加之除了我们认为必要的装备，我们尽量减少行李，卢克和我的背包变得更轻，剩35千克。尽管负担轻了，卢克还是把脚步调整得非常缓慢。他受到这个海拔高度稀薄空气的影响，显然很担心这段路程会让他的身体无法承受，因此坚称，他不会急速行进，我们会很久才能抵达目的地，但绝对到得了。赫克托耳和奥兹没有耐心，不久便消失在前方，我和卢克落在后头，但也希望能加快速度——至少加快一点点。

在十二个小时里，我们一点一点爬升，直到登顶，并且找到掩蔽处扎营。剩下的半天里，我的速度变得和卢克的一样慢，我纳闷，我

们之前有没有背着这样的重量在这样的高度走过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卢克也没有——这是我们必须适应的状况。我们已经行进了两周，而且我们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回想起来，当时走过的路不算什么，只是小意思，但这已经是我们两人艰苦跋涉过的最远距离了。

那天，卢克和我最后找到了节奏，那也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合作无间的最后几次之一：我们定时休息，并且努力保持稳定的步调，甚至把奥兹和赫克托耳抛在身后；我们俩就像个团队，在彼此的陪伴和支持下获得了力量。到了山顶，赫克托耳递给我一个他啜饮了一整天的塑料瓶子。“这是治感冒的。”他说。我笑了，完全清楚这是什么饮料，便接过来牛饮一番。灌入的药草汁和酒精在我的胸腔里扩散，感觉就像尿液温湿了保温潜水服一样。

卢克穿着卡骆驰鞋很舒服，我也想不穿袜子和厚重靴子，因此加入他的行列，穿上这种非常规的登山鞋。没错，我们得不时停下来从脚上拔下仙人掌刺，但是，我觉得我解放了，风吹过脚踝，脚也不会被闷在大皮靴里。

在海拔4500米的高山上扎营很冷，赫克托耳用马鞍被做了个铺盖。第二天，拖着受冻的双脚，我们早早就启程下山前往阿约，并在傍晚抵达，由于赫克托耳很讨人喜欢，我们也受到了欢迎，获准睡在村民集会所。

受够了驴子和斜坡，我想从这里改变路线，沿着峡谷底部靠近河流的地方行走。我们和一些当地人讨论，他们认为这样做太疯狂了：谷底水位非常高，无法通行。然而，另一条路也同样危险：先是一条狭窄蜿蜒的碎石上坡路，接着是600米高的陡峭山脊，我们得攀爬很长一段距离，因为这些路对驴子来说太陡了，而这次我们每人又背了近40千克的重量（多出了食物）。

对我而言，卢克是一名好搭档，因为他是登山教练和皮划艇教练。我一开始就清楚地告诉过他，那两个领域归他主导，因为他的登山经验和皮划艇经验都比我丰富。那天早上，卢克抬头看着我们要翻越的山，他的话是“死定了”。

我们在漆黑中出发，从阿约走到山脚，横越谷底。从那里开始，我们以“之”字形路径爬上渐陡的碎石坡，直到抵达山顶几近垂直的

峭壁。放眼望去，我们根本就看不到要走的路，因此对前方相当恐惧。我又穿起了丛林靴，但赫克托耳的驴子弄丢了卢克的靴子，因此，他得穿着卡骆驰鞋征服这段非常危险的山路。

赫克托耳已经回家了，由艾福伦接替，他是个结实的男子，带着镐在不太稳固的碎石路上为我们辟出踏脚处。他轻轻松松爬上斜坡，而卢克、奥兹和我背着沉重的背包步履艰难地落在后头。我们爬上险峻的沟渠，横越细长的岩架。这段路并不安全，我们很清楚，落石有好几次掉到我头上。我们慢慢通过峭壁，手握之处的石块通常会碎裂——我们只有一次用到绳索——深知只要一失足就会丢了性命。这次攀爬虽然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却是最冒险的一次，我很高兴自己好歹没有穿着卡骆驰鞋。卢克脱掉他的凉鞋，穿着袜子走了一会儿。有好几段路，我都提议用绳索将我的靴子垂降下去让他穿，但他拒绝了，似乎很有自信。有一次，他几乎丧命，他紧抓的石头开始摇摇晃晃，几乎让他失去平衡，跌落悬崖；他在死亡边缘徘徊，最后他稳住了，石头掉落，人没有跌落。那时，艾福伦很乐观地握住了绳索，但卢克比这位矮小的向导重很多。

危险无疑让我们进入高度警戒状态，卢克和我最后爱上了这最后阶段。另一方面，奥兹则清楚地表示，登山向导也许不是他最佳的职业选择。在好几个路段，我们都必须指导他怎么做，因为他吓坏了，也冻坏了。

下山的路没那么糟，我们抵达一个叫康可（Canco）的小村庄，它坐落于科尔卡峡谷最难抵达之处。康可是个安逸的地方，只有几户人家在这片狭小的谷地耕作、饲养牲口和种植作物。这类村庄的啤酒稀有又昂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高兴能买几瓶冰啤酒，庆祝我们挺了过来。

第二天，我们走上峡谷南边的陡坡前往卡瓦纳孔德（Cabanaconde），我因为近距离看到大量的安第斯秃鹰随着峡谷的上升气流飞翔而振奋不已，这种展翅近三米宽的巨大鸟类振奋了我的心灵，也给了我力量。我试着引起卢克的兴趣，但他看到秃鹰后，继续埋头苦走。我们那天失算了，累计爬了4000米，但距离目的地还差几千米，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路边的沟渠过夜。

从卡瓦纳孔德到拉里（Lari）的22千米路又是公路，而且我们这次整天走的都是缓下坡。拉里这个天主教小镇是科尔卡峡谷末端的一个金矿，我们将由此开始寻访亚马孙河的源头。在高耸的安第斯山脉阴影的笼罩下，我们知道从这里到密斯米雪山和卡尔华圣塔河

（Carhua Santa）——距亚马孙河出海口最远的支流——上游只有两天的路程。我们已经走了三个星期，现阶段非常疲惫，需要休息，因此，我们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并且在攻顶之前调整装备。

卢克的未婚妻凯蒂此刻正在秘鲁旅行，希望能和卢克见面。他显然也很想念她，在我们行走时，只要能收到手机信号，他就会给她打电话或发短信。我们知道自己会在拉里停留几天，所以，他们在那里会面很合理。卢克和凯蒂入住一家旅馆，奥兹和我则睡觉、买补给品，之后就无聊至极。

我们三个星期的长途跋涉、经由科尔卡峡谷登顶的路线是受到了迈克·霍恩的启发。迈克在20世纪90年代乘单人滑水板在亚马孙河顺流而下，在更下游时使用独木舟，他没有使用机动车横跨整个大陆。我们想继承他的衣钵，完成同样的行程，但这次不借助水流。我们如果采取步行的方式，就是第一批从亚马孙河源头出发、完全以人力横跨整个大陆的人。迈克已经设定了标准，因此，搭巴士到通往密斯米雪山最近的道路是不可行的。

凯蒂和卢克泪眼汪汪地道别，并承诺几星期后在库斯科再见。卢克、奥兹和我从拉里出发，寻找亚马孙的源头，我们将十天份的粮食绑在新向导费里西亚诺的几头小驴子上。这段路的地图很棒，是一份比例尺为1：100000的军用等级地形图。因此，我们将源头的经纬度输入全球定位系统，然后出发。卢克过去的登山经验很快就不足以应对这次攀爬的高度了，他看来比我们都为高山症所苦，这一点我无法理解，因为：一、我们服了药片；二、我们在过去三个星期是逐步往上爬升的，因此，他的身体现在应该适应了。我确定他一定感受到了我的沮丧，他也同样拐弯抹角地表达他的沮丧，在博客里写道，登顶日那天，当他在后面艰难地行进时，我跑在前头把奥兹高举过头，还做出了跳跃动作。这当然是虚构的，是他的夸张描述，但我发现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疏离感。

在为我们抵挡强风的羊棚待了一晚后，我们登上了密斯米雪山的山脊，寻找位于北端的村庄，在那里可以找到亚马孙河的源头和著名的白十字。我们的坐标在目的地的7000米之外，但卢克和我已经多次研究过山峰的形状，凭直觉就知道该往何处寻。我们都觉得自己仿佛来过这里，让“内在力量”引导我们下到一座宽广平坦且绿草如茵的山谷，跳过长满青苔的小溪，最后，我指向一大片岩石裸露的绝壁底部，卢克也认为看到了十字。

我们快步冲上最后几米，一切就如同我的想象，一道显眼的瀑布从十米高的岩壁上倾泻而下。我们很明显地看出为何十字架会立在这里，如画的泉水恰巧直接从岩壁表面流出来。

我们拍了几张照片、录了视频，然后注意到在15米之下还有一个铁十字架，那是1971年立的。有人声称那里才是亚马孙河真正的源头。另一处还有一块巴西国家地理研究所的牌匾。我对这些考察队的无聊举动——他们在这道山坡上的不同地点宣称其为亚马孙河的真正源头——翻了翻白眼，事实上，我们隔天又发现了第二块牌匾，标明了亚马孙河的第四个“正式”源头。

我们回到平坦的区域，在卡尔华圣塔河旁的谷地扎营，那晚我们将闹钟调到清晨四点半，准备早上五点出发。

2008年4月25日早上5：45，我看着表，一阵恐惧冲上背脊，好像太迟了就会有麻烦了。我无力地爬出睡袋。暗夜的酷寒穿透薄薄的防寒衣，夜空晴朗，我们的帐篷结冰起皱，我叫醒一个个睡得迷迷糊糊的同伴。

我们曾想把费里西亚诺留在营地看守装备，但是后来改了决定，因为：一、就算有人大老远上来了，也不会偷我们的东西；二、费里西亚诺在山底住了一辈子，如果能看到上面的风景，那实在太棒了。他欣然接受了。

我们是在海拔4990米处扎营的，因此距离山顶只剩610米了。费里西亚诺穿着用老旧轮胎做的人字拖，我们带着刚好够用的必需品，开始缓步上坡。只有卢克带着装有绳索和医疗装备的背包，当他慢下来时，我提议帮他拿。也许这让他觉得他必须依赖我，他拒绝了，并且继续缓慢上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必须承认，处理和卢克的关系花

费了我太多心思。我们就要登顶了，上面是亚马孙河的源头，天空是最清澈的蓝色，景色美不胜收，而我想的却都是：“他为什么不把那个该死的背包给我？”

幸好我们明白走这趟山路必须保持警觉，随后便都不再生彼此的气，我们走上陡峭的雪堆，破雪开道，一直迂回爬升，直到置身于明亮的阳光下。

我不曾有过恐高症，但爬上山脊时，我拿着摄像机，看着脚下垂直陡立的山崖，竟全身冻结——吓坏了。那是一种急遽上涌的恐惧感，我必须克服，以微笑化解、嘲笑自己的忧惧，才能够在锐利的山脊上行走。

我和卢克轮流在前面踢步开道，带领四人小组爬上山脊线，爬上山脉的最高峰——密斯米雪山。尽管先前有些牢骚，但我们在中午之前走完最后一段路，登上海拔5600米的高峰时，都欣喜地互相拥抱。

我不是登山高手，登顶的经历让我深深陶醉。想到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沿着亚马孙河最长的河道行走，过游牧民族式的生活，背着必需品靠我们的智慧生存两年之久，我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走到这里，我非常开心，这一刻我可以清楚地想象我们完成整个旅程后的样子，可以看到脏兮兮的我们冲向大西洋——这种成就带来的狂喜已经深植在我的灵魂里，我知道自己在完成探险之前绝不会放弃。

卢克则更加欣喜，他的手机能收到信号，他给凯蒂打了电话。我很清楚我没有任何想通话的人，仔细想了一下这是否困扰着我，接着我对自己微笑，还很高兴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能自在地过我想过的生活。

走下世界最深的山谷

虽然徒步亚马孙听起来该像《男孩故事报》[\(7\)](#)里描述的到处都是水虎鱼[\(8\)](#)、蛇和美洲豹的历险，但在行走200千米后，我们离丛林或大家熟知的亚马孙河还很远，跨越安第斯山脉比较像一次冒险跋涉的度假——但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还是得跨越。

离开位于密斯米雪山北坡的营地，费里西亚诺穿着他轮胎制的凉鞋，带着驴子返回拉里，卢克、奥兹和我则往反方向迈步，沿着卡尔华圣塔山谷前进。那里的土地贫脊且空旷，让我联想到辽阔版的英国峰区国家公园（English Peak District）。在这高海拔的广阔地域，树木无法生长，有些地方相当泥泞，我们沿着平原上的蜿蜒小溪行进，因为背着沉重的背包，即使在平坦的地面上也很难行走，我们一天只往山下走了几米。

4月28日下午，我记得我被奥兹惹毛了。他很自豪地说他一点都不累，而我那天走得很辛苦，激怒我的原因是，我背着他的食物（理由我忘了）。因此，当我们停下来休息时，我甩下背包，拿出奥兹的食物，鲁莽地扔到他面前。我当时不能理解为何我的情绪会受到影响，但那天晚上的日记表明了我真正的想法：

2008年4月28日日记：

今天我任由自己想着卢克的负面影响，但这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如果他不是个好的伙伴，那我也只能怪自己，因为他是我选的。我开始气我自己，他是徒步亚马孙计划的另一半，我越快调整到最佳状况以至能够不浪费精力生他的气越好。我知道我够坚强，可以和卢克一起完成这次探险——我只要积极乐观，不要被他激怒。就如我所说的，他是个好人。

第二天，卢克看起来很疲倦。奥兹提议走一条穿过原野的路线（卢克也同意），结果那条路很泥泞。奥兹和我换个角度看待这件事，拿我们湿答答的鞋和裤子解嘲——那天是大晴天，脚湿了没关系；但是，卢克跟了上来，满脸怒容，咒骂奥兹。这是卢克第一次这样对待奥兹。

“够了，卢克。”我打断了他，对他指出，在大晴天湿了脚只是小事一桩。

我们爬过一小面陡坡，走上烟尘弥漫的小径。我走在前头，转头看到卢克和奥兹在争辩谁该走在后面，真是鸡毛蒜皮的事。我必须承认我大声嘲笑了他们两个。卢克勃然大怒：“你竟敢在奥兹面前嘲笑我！”他愤怒的眼神比他的话语还凌厉，因此，我转头默默地继续向前走。

没多久，我们在一个山丘上休息，我跟卢克说，他不该将他的沮丧发泄在奥兹身上。

“听着，卢克，我昨天因为一点小事冲奥兹发了火——我并不是只责备你——但我们不该因为疲倦而拿彼此出气，也许相互嘲笑一番是更好的方式，免得我们做出傻瓜一样的举动。”卢克还是认为我应该更支持他，因此又走了约莫一小时后，我为在奥兹面前嘲笑他的事向他道歉。

我已经厌倦了和卢克争辩。我们争吵得越来越频繁，都变得更敏感易怒，嬉闹玩乐在我们之间消失了。由于卢克看起来非常疲倦，他在4月30日提议买两头驴子时，我勉强同意了，毕竟对这次探险他也有有一半的话语权。我们还是可以说我们走完了亚马孙全程，但我希望没有驴子协助，不过为了相处和谐，我让步了。

5月1日，为每头驴子付了40英镑后，我们从一位老农夫那里领了两头老驴。它们已经一年没有工作了，防止它们逃跑的方法就是绑住它们的后腿。有一次给它们松绑后，照管驴子的奥兹试着给它们套上缰绳，但它们趁机逃了。我们在原野上追了很远，终于抓到它们并且给它们套上了绳索。这两头驴子非常狂野，但奥兹接下了训练它们的挑战，而且似乎对这项新任务很满意。我必须承认，驴子让我们的体力消耗减少了，但到丛林时，我们就会把它们卖掉。买到驴子的第一

天，我们没有走太远，因为我不舒服。我们早早扎营，午睡过后，我看到了美丽的夜晚。卢克和我走上山丘，坐在岩石上长谈。

卢克告诉我，由于我先前没有支持他，他依旧感到伤心。因此，我决定对他完全坦承。我告诉他，我对于他语言不通以及拖慢大家的速度感到沮丧。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事实，但这是我第一次让他知道我真的感受。我认为，我们还有两年的路要走，如果保持良好的关系，就必须对彼此诚实，否则我们的探险计划不可能成功。他知道我的感受真是太好了。无论我说的是否是残酷的事实，至少他现在知道了自己的状态，而且看来能够接受。

这番谈话后，空气似乎变得清新，我们也都松了一口气，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大豆蛋白、肉和洋芋粉），并且与奥兹练习英语和西班牙语。情况看来好转了。

隔天我们横越一片广袤无垠的平原，接着右转第一次进入狭小的阿普里马克山谷。阿普里马克河就是一片错综复杂的河网的起点，我们将沿此河网到达真正的亚马孙河。走过阿普里马克河后是埃内河（River Ene），之后是坦博河（River Tambo），接着是流入亚马孙河的乌卡亚利河（Ucayali）。阿普里马克河很窄，在险峻的山谷中蜿蜒流动，山谷散布着裸露的岩层，让人仿佛置身于威尔士。在荒芜的平原上走了一个星期，美丽的景致振奋了每个人，我们抬头挺胸，又开始谈笑起来。傍晚时分，夕阳温暖了大片成列的金色高耸岩石，傲视着壮丽的河谷。这个区域被水侵蚀，水在白天渗入岩缝，在晚上凝结，导致岩石裂开，结果形成了一片破碎的荒原，四周有着摩天大楼般大小的嶙峋墓石。

2008年5月4日日记：

今天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棒的一天，并不是最兴奋的或最有趣的，但却是最怡人的一天。看着阿普里马克山谷壮丽的风景，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口角。午餐时间我们去游泳了，饭后甚至在鹅卵石河滨上打盹。

山谷渐深，开始变得更像峡谷。对驴子来说，路渐趋难行，小路不是太陡就是过窄，难以通行。因此，我们被迫往上走，离开山谷，向两边较平坦的空旷处走去。

在峡谷之中，有时候路就在前方，我们便沿着路走。我们通常走在广阔的大草原上，而羊群、南美野生羊驼和美洲驼就在草原上吃着草。

5月11日，结束漫长的25千米路程后，我们抵达克伟地区（Quehue）的克丘亚镇（Quechuan）。那天是市集日，广场上挤满了戴阔边高顶毡帽的男子和穿着彩色裙子、戴棕色圆顶帽的妇女。奥兹告诉我，克丘亚妇女穿的传统服装和帽子是西班牙统治者留下来的传统服饰，当时每个地主的工人都有其特定款式的服装，以和其他地主的工人区分开。这在我看来很诡异：这么著名的民族服饰，实际上却是以前的农夫必须要穿的制服。

克伟有种奇怪的氛围，我们穿过广场时，受到的骚扰比平常还多。乞丐拉着我们的背包讨钱，孩子们指指点点，笑着我们。我们不以为意，但因为驴子害怕嘈杂的群众，我们便离开了城镇，在往北400米的地方找到一片有掩蔽的平坦原野扎营。

一直有人告诉我们，这里的人不一样，其中有较多的小偷和不会帮助我们的“坏人”。不知是我们想多了，还是我们变得更与世隔绝了，我们都觉得，旷野的帐篷比镇公所或镇上的教堂舒服多了。我们匆匆吃完从镇上带来的鲑鱼和一些面包，在六点半天色变暗时爬进了睡袋。

对于那些到秘鲁观光，想稍微超出舒适范围而不只想待在拥挤的印加小径上的人来说，阿普里马克河的上游会很惊艳，这里的峡谷不到2000米深，两旁桉树丛生，蓝色的冰冷河水汨汨地流过肥沃的谷地。

尽管此刻我们都对团队较满意了，但从日记上看得出来，我开始盼望有其他伙伴加入。至今，卢克和我同行75天，我渴望有不同的话题，遗憾的是，我们的兴趣并不相符。我很快就对他的皮划艇历险之旅和在英国某处攀爬峭壁的故事生厌，而他似乎对我热衷的话题也没兴趣。我们都爱看电影，有一次，我们讨论彼此都看过的电影，却发现只有几部而已。

这是一项挑战，只需要积极面对并且寻找彼此的优点就行。这真的是一项挑战。

5月17日，我们在下午稍早的时候抵达偏远小村落圣露西亚（Santa Lucia），坐在阳光下空无一人的广场上喝可乐，吃着在当地商店买的秘鲁版奥利奥巧克力饼干，四周被高山环绕。

那家商店在该区域很典型：几个木架子上摆着各种颜色的温热的气泡饮料和一包包的甜饼干，有时候会有鲔鱼罐头、咸牛肉或一袋袋的意大利通心粉。商店老板很亲切，告诉我们有个人和我们走同一个方向，可以和我们同行。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个人，因为当地人总是知道捷径的。我们出发了，卢克殿后，和新朋友走在一起。没多久，卢克就追上来，告诉我，他虽然说不好的西班牙语，但也可以感觉到那个人有点怪。我往后退，和那个人说话，发现他的确怪怪的，但两分钟后我就觉得无聊了，因此再度加快了步伐。

当蜂鸟正好出现在我面前，我迅速拿出摄像机拍摄这种难以捉摸的生物时，那个人开始拉扯摄像机，要看屏幕。快如闪电的蜂鸟并不好拍，而如果有个古怪的秘鲁人使劲扯着摄像机，那就更难拍了。

我们再度上路，我把这个怪人塞给奥兹，因为他们可以用克丘亚语沟通。五分钟后，奥兹就生气了，他说那个人疯了，我们得和他走不同的方向。他说，那人认为我们是偷驴贼，从他们村子偷了这两头驴子。我们绕道往山丘上走，希望能避开那个在正下方小径上行走的不受欢迎的伙伴。

但是，他跑上山丘，朝我们而来。他挡住去路，捡起一块石头，说，不准通行。奥兹那青春的双眼充满了怒火，他斩钉截铁地告诉那人，他的行为多么愚蠢，我们只是旅客。那人指着我的登山杖，说我们持有秘密武器。他一直骂，我和奥兹就在一旁看着。那个小小的秘鲁人拿着块石头，让我们既困惑又好笑，然而他并不觉得好笑。幸好有个头脑稍微清楚一点的当地人出现了，让那个人冷静了下来。

出面调停的人叫艾斯特凡，他警告我们，不要经过前方那个满是疯子的村落，他说那里的人都一样，老是互相吵个不停。

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沿着据说较窄也较危险的高处路径走，以避开“傻子”村。最后我们在那个村落的正上方400米处扎营。我想我们多少都认为夜里会有人造访，因此隔着帐篷大声说笑，说要布陷

阱，等挥舞着干草叉的疯狂村民到来。后来我们都睡着了，而他们并没来。

库斯科是一座西化的大城市，有两座大教堂，虽然它不在我们的路线上，但我们必须前去拜访。它位于阿普里马克峡谷北方40千米处，是我们抵达利马前存放丛林装备的地方。库斯科有诱人的西式食物和酒吧，在我们刚刚徒步行走50天后，对我们的吸引力非常大。

整体而言，秘鲁的物价很便宜，大约5新索尔兑1英镑，我们通常可以在秘鲁人工作、吃饭的地方以少于1英镑的价格吃东西。库斯科则大不相同，物价高过伦敦，你如果选择去通宵营业的夜店和酒吧，就意味着可以住豪华旅馆、吃精致美食和吸食特制的毒品⁽⁹⁾。由于库斯科邻近马丘比丘（Machu Picchu）遗迹，它成为南美最大的旅游景点，在这里不用说西班牙语也能通行无阻。

我害怕在库斯科待太久会将探险精神抛诸脑后，也会花太多钱，还会让体能下滑，因此建议只让卢克去库斯科换装备，并再度和凯蒂见面，我和奥兹以及那两头驴则待在阿普里马克的一个小村庄里。

但到了5月20日，离库斯科只剩一天的路程时，我们都很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曾连续步行过50天，而文明的呼唤太强烈了，于是，我改变立场，建议奥兹跟我也舒舒服服地休息几天，将驴子交给阿普里马克一位好心的农夫，我们向光彩夺目的大都市出发。

在卢克和凯蒂见面的同时，我赶工处理行政工作——算账、将已拍摄的视频数字化，并且把录影带快递回英国。我整理将在丛林中使用的装备，并且将羽绒睡袋、防寒衣和雨衣也寄回了英国。此刻，我终于知道此行真正会历时多久、会花费多少，原本从JBS取得的赞助金不够我们抵达终点。因此，我和他们联系，追加资金，此刻我对金钱的忧虑远超过对旅程中会遭遇的天险的忧虑；我终于联络上JBS的首席执行官乔纳森。他通情达理，并且答应帮忙。我松了一口气，但知道从这里开始必须严格控制花费，这意味着少去城镇、少从国外买昂贵的器材，必须尽可能使用在南美洲可以取得的装备。

此时不提到我和卢克迥异的金钱观就很难清楚地叙述这个故事。卢克到马丘比丘观光（由凯蒂付账），而且依我看来在餐厅里吃了最

好的食物（由探险基金付账），很快就恢复了体重。我开始厌恶他出现在这次探险中，我们的关系尽管在抵达库斯科的前几周渐入佳境，但此时再度恶化。

当时我们的一些朋友正在库斯科旅游，因此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在酒吧里拿我和卢克的问题烦他们——我怀疑我的判断，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不可理喻。我真的很希望他们说是我大惊小怪了，但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的看法和我的相同。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他们虽然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法，但似乎也认为我和卢克不是合拍的旅行搭档。

我们是6月初离开库斯科的，我冷漠地看着卢克和凯蒂道别——凯蒂哭成了泪人儿，他们想再见面的需求似乎和我们要完成的事业相悖。这是世界首次的徒步探险，我们必须全神贯注，必须给予承诺。我觉得奥兹比卢克还认真。

我们领回驴子，付了农夫一笔超时寄放费用，高兴地再度上路。我意识到，在走路时，我的脑袋会找一些事情想，因为通常没什么好想的。这种瞎想常会带来负面情绪，而这种负面情绪最终会聚焦到探险伙伴身上。我落入了这个陷阱，在脑海里把此行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卢克。有一些是他的错，但回顾起来，我很快就发现归咎于卢克其实让事情变得更糟了，因为我会认为错在他而不在我，从而觉得自己无法控制局面。我如果能对某些事情担起责任，就能取得更多优势，对我而言，调控心态是个像山一样高的学习过程，而我还在小丘上。

6月11日，我从晚上八点睡到第二天清晨六点，睡了整整十个小时。起床时，我觉得现在是几个月来最清醒的时刻。时机正好，因为那天要往上爬1100米。

在海拔约4000米处，我们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的小村庄，在绿草地上一条汨汨流动的小溪旁扎营，结果证明5月在库斯科丢弃防寒装备为时过早，我们穿着棉衬衫在薄薄的丛林睡袋里度过了寒冷的一夜。我们太过期待丛林，以致过早换装备以期远离高山，真是白痴。

在漫长艰辛的几天里，我们经常上上下下超过2000米。我试着专注在具体的目标上，由于不喜欢和驴子同行，所以我专心想着，度过接下来的十来天、卖掉驴子后，这次徒步探险就会变得更灵活也更有

趣。这次艰辛的苦行，有了驮兽后，就变得沉闷了，也没有挑战性了。我梦想着丛林、吊床、钓鱼和营火。

我们有自己的驴子，因此没有让熟悉路径的当地驴夫跟随，这表示我们必须自己认路。卢克和我决定轮流领路，一人一天，这样才不会意见相左，此外没有当班的那个人那天也可以放松。

尽管我喜欢拿我进行探险的方式开玩笑，但其实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对别人的期望也很高。在我看来，卢克带路时太笼统，他常说“过了这个山嘴”就到了，这给我的印象是，他不太确定我们所在的位置。要不是我们互有口角，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并不需要非常精确的数据，然而对我来说——我希望这样说没有对他不公平——这是他没有做出适当贡献的另一个例子。

我的每一篇日记都显示，我一直感到多么失望，以及过了这么久感觉一直没变是多厌烦。事后看来，我竟然从未找出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我总是认为我们会解决争端，或者认为我们一旦进入丛林，这次探险就会有所改变，我们都会快乐一些。

隔天一早（我想，我是在找麻烦），卢克过来提议和我一起浏览路线，我告诉他我不需要这么做——这天是他带路，我只需要跟随他。我不太记得确切的争吵过程，但当我告诉卢克他带路差劲极了时，争吵就爆发了。

卢克大发雷霆。我知道会发生这种状况，然而我在一旁看着，对他连珠炮似的愤怒咒骂大为惊奇。他对我非常生气，但我愚蠢的那一面在他的爆发中得到了乐趣。我完全承认，是我制造了这个状况，我想打破在我们好好相处的尝试失败后长久的沉闷，看到他释放一些怒火，我感觉很舒畅。奥兹和驴子耐心地在在一旁看着，就像看着两个英国佬释放彼此压抑着的敌意。我们都在颤抖，就像一段走味婚姻中最激烈的争吵；我们如果在伦敦，早就分道扬镳了，但这次探险让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一起，因此释放一些压力是必要的。

争吵使我们延宕到午餐时间才出发，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气氛变得清新了，也感到了宽慰，不用再压抑那些情绪。对我来说，这是必要的真诚的发泄，可是，我不知道这是卢克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之后我们又一起走了两星期，但他已下定决心要离开。

我们在布满尖刺植物的灰色山丘上沿着似路非路的小径行走；在满是羊和南美野生羊驼粪便的斜坡营地搭起防雨帆布帐篷；对喝醉酒的克丘亚男人们胡说八道，想把他们搞迷糊；也好奇老人家们的嘴在嚼了一辈子的古柯叶后，仅存的几颗没有刷洗的牙会那么脏。

在我们渐渐靠近丛林时，卢克坚持认为他需要从美国寄来的专业用丛林靴。我们全都累坏了，因此将驴子交给另一位好心的农夫，前往阿班凯（Abancay），去邮局领卢克的靴子。由于卢克坚持认为靴子非常重要，我就把靴子的运送问题交给他。我们等了一天又一天。

这次休息代表我们有机会放松一下，让腿好好休息。几天后，卢克的靴子仍然没寄来，我告诉他，无论如何都要出发了——我无法忍受这样枯等。我们沿着公路又走了几天，直到到了胡安尼帕卡（Huanipaca）——山谷的一个出口，卢克才收到靴子。

我的日记显示出了我对前方路途的无知：我认为要走到埃内河才会有丛林；我认为谷地会很宽阔，可以沿着谷地在河边行走；而且我认为关于红区（Red Zone）——秘鲁恶名昭彰的恐怖分子堡垒和毒品走私中心——的谣言都太过夸张，走过那个区域是小事一桩。

我们走过一个大山嘴进入峡谷时，遇上了两名矮小的男子。他们不许我们通行。意识到要进入红区了，我们恭敬有礼，拿出护照和许可证，但他们不肯让步。我后来提出了个想法：雇用他们。他们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因此护送我们踏上他们的土地。在行走和聊天时，他们说这里正上演矿区所有权的土地纷争，我们被误认为是外国的矿场调查人员。

他们也买下了那两头驴子。我们不再需要驴子了，而且可以走在它们无法通行的谷地上。我们以略少于买进的价格卖出，我很高兴，这次探险终于有了进账。看着它们离去，卢克很难过；我必须承认，连我都稍稍受到触动，因为这两人各拉了一头驴往反方向走。这两头老驴可能是第一次分离，天晓得它们会分开多久。

驴子走后，我们转而雇用两名当地的小伙子赛吉尔和鲁宾，他们同意收费同行。他们只是单纯务农的孩子，不习惯背重物，因此老是要停下来。我们往下走到谷底，在热带高温下挂起吊床，卢克和我试了试刺网，半小时内就抓到了一条鳟鱼。河里的生物生气勃勃；想

到在剩余的探险行程中马上可以在清澈的水中洗澡了，我们都非常开心。身后是让我们肮脏、汗流浹背了几个月的贫脊山丘，而现在我们可以泡在河里，只要我们高兴，随时都可以洗掉脏污。

这两名当地的年轻小伙子说，我们走过的所有古柯叶田都是种来加工成可卡因的。小农在夜里将叶子卖给毒梟（毒贩），毒梟接着将古柯叶加工成一种潮湿的、像奶酪一样的物质，之后将其包装好，送到阿班凯等地，再分销到哥伦比亚做进一步的加工和提炼。

2008年7月1日，早餐吃了炸鱼和面条，一行五人从谷底出发。我们知道，如果峡谷两侧无法通行，那么我们可能必须绕道，往上越过小山嘴。但少了驴子拖累，我们有信心应付各种地形。

没多久我们就抵达一个路段，那里的水向一面直立的山崖奔驰而去，鲁宾和奥兹都不会游泳，所以，无论如何，过险恶的湍流都不是选项。卢克决定往上爬行，越过右边的山丘，我也同意了；除了往回走，我们实在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阿普里马克峡谷的陡峭两侧没有路径，要徒步上去并不是那么容易。那里太过险峻，连走都困难，我们必须握住尖刺的植物，同时希望脚下的石头不会滑落。卢克决定直接走上去，这和三位秘鲁人的建议相左，然而他们还是跟着他走。没多久，坡变得实在太陡，当地人就向左分岔而去，绕着山侧而行，直到他们找到一处可以攀登的山脊。在山上待过几周以来，闷热让我们难以忍受，汗水湿透了衣服，贴在身上。

我呼喊卢克，建议他跟随当地人走，他没有响应。

“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我在他身后叫着。

“听到了！”他粗鲁地回答，又继续攀爬。

我们四个撇下卢克，让他继续令人胆战心惊的攀爬。我们跳过一个容易跨越的溪谷，接着开始攀登一个岩石山嘴；在某个路段，我们的右手边出现了一幅远景，我们可以看到卢克正在爬坡。

“天啊，”我心想，“看起来好危险。”

卢克正在爬一个山丘，他凭借着松垮的石块，紧抓着细小的植物，一失足就会丧命；他爬两步，地面可能会滑动，他又回到原点。真是不忍卒睹。但我们可以看出他现在全心投入，而且，就算往回走可行，他也可能会更危险。他花了约20分钟爬了40米，我真的觉得我随时会目睹并且拍摄到他的死亡。当他爬完最陡的路段时，我们也决定再次开始攀爬；攀爬变得越来越困难，山嘴顶点看似遥不可及。

如果大声喊叫，卢克和我可以听到彼此的声音。我问他还剩多少水。“几乎没有了。”我听到了微弱的回答。我祈祷那遥远的山嘴是一条路径的起点，路径另一端是个安全有水的地方。经过六个半小时的攀爬（最后三个半小时没水喝），我看到走在前面的两个当地人和奥兹的身影出现在上方山嘴的水平线上，卢克和我没有走在一起，但在差不多的高度上，在他们下方约100米。

很难说清此刻我多么疲惫，土质松软的山坡和背包的重量让我不胜负荷，我跌落10米，摔到了仙人掌堆里。因为筋疲力尽，我一动不动地躺了两分钟，身上扎满仙人掌刺，口干舌燥，脱水，头部阵阵作痛。

奥兹在上方大喊，为我加油打气，但我觉得很虚弱，几乎虚脱，感到挫败，开始不在乎是否能爬到顶。接下来发生的事我永生难忘：二十四岁的奥兹，小我八岁、比我轻30千克，走下山丘来帮我。他来到我身边，卸下我的背包，把背包背上山，我奋力地跟上他。最后一段路花了约五分钟，到了山顶，我瘫倒在地。

我觉得难为情，被这地形、酷热、草木以及年轻的秘鲁男子击败了，他们现在怜悯地看着我。我有半个小时没想到卢克，但等我躺在山脊上时（爬坡的四个小时滴水未进），我开始担心他的安危。

接着，奥兹带来了坏消息：这里没有路，我们无法在一天内下山找水。我们被困在了世上最深的峡谷里渺无人烟的贫脊山嘴上。

“卢克，”我叫道，“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我听到了微弱的回答：“我眼里进了东西。”

“我派奥兹下去帮你。待在那儿别动。”

“他可不可以带些水来？”卢克回应道。

我没有回答。

奥兹和赛吉尔也都没水了，他们下去帮卢克，我知道我帮不上忙，这让我非常厌恶自己。我躺在一株仙人掌下，鲁宾盯着我看。

25分钟后，赛吉尔爬上山，奥兹背着卢克的背包跟在身后，最后才是卢克，他在我身旁倒了下来。

“我们这次搞砸了。”他很实在地说道。

“还有更糟的呢，老兄，”我说，“没有水了。”

卢克承认他一路上有几次几乎晕过去，我们都觉得无法继续前进。赛吉尔告诉我们，在山嘴之上的两小时路程外有个小镇，加上背包，我们至少要花四个小时才到得了。现在我们完全咽下了自尊，派赛吉尔和鲁宾带着空袋子和100新索尔钞票上山去镇上，要他们买下商店里的全部饮料。他们大约在下午四点出发。我和卢克躺在尘土上，奥兹用大砍刀砍下仙人掌的叶片，拔去尖刺后切成碎片。咀嚼仙人掌后，汁液渗进我们干涸的嘴，感觉真是棒透了，我很快就恢复了活力，能够坐起来了，并且想着也去砍几片，而我也这么做了。

那两名当地小伙子在天黑一小时后回来，几千米外，我们就看到了他们的手电筒。他们倒出袋子里所有的东西：借来装了十升水的罐子、两瓶三升装的印加可乐（黄色）和可口可乐，以及十罐炼乳。我们留了一半以上供第二天早上和登山时饮用，接着开始大口咕噜咕噜地喝下这些提神的饮料，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珍惜过饮料。那天，卢克和我被击败了，多亏这三位秘鲁年轻小伙子，我们才撑过去，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难堪且羞耻的一课。至今我仍不知道，为何和当地人相比，我们做得如此糟糕。

隔天早上，我们花了三个小时到达镇上，遇上了对我们感兴趣的群众。他们听说了蠢白人没水喝的故事。尽管才上午，我们就住进了一家有着锡顶的泥墙旅馆，洗衣服、洗澡，然后整个下午躺在阳光下。

旅馆主人很友善，想帮我们找到新向导，因为赛吉尔和鲁宾返回他们村庄了。经过一番寻找，我觉得他因为没能找到向导而感到不好意思，因此同意和我们同行——但我恐怕没有记下他的名字。

我们到达下一个高悬在峡谷边上的村庄后，好心的旅馆主人继续帮我们找向导，最后找到一名叫路易斯的男子。他有着淘气的笑容，体格健美：宽大的胸膛、结实的大腿，矮小的身躯没有一丝赘肉。路易斯同意丢下新婚妻子和小婴儿与我们同行，他热爱走路，很兴奋地加入我们——我完全不知道他会待多久。

那位不知名的旅馆主人、路易斯、奥兹、卢克和我再度走下阿普里马克峡谷。这个路段谷地宽阔，风呼啸地吹下来，我们在河边扎营，卢克和我为秘鲁人煮晚餐；卢克整理了一张再补给需求列表，架设宽带全球局域网，并且发了一封电邮到英国，在那封电邮之后发生的事将永远改变这次探险。

(1) 译注：西印度和南美洲各地的西班牙、法国移民的后裔。

(2) 译注：Dib, do your best, 尽力做到最好。

(3) 译注：授予成绩优良的大学毕业生的荣誉学位。

(4) 译注：Geordie, 对英格兰东北部泰恩赛德区人的昵称。

(5) 译注：南美洲原住民语言。

(6) 罗德西亚为1965年至1979年非洲南部一个国家，领土相当于今津巴布韦，实际上它是英国南非殖民地南罗德西亚的继承国。1980年4月，该国的独立获得国际认可，定国名为津巴布韦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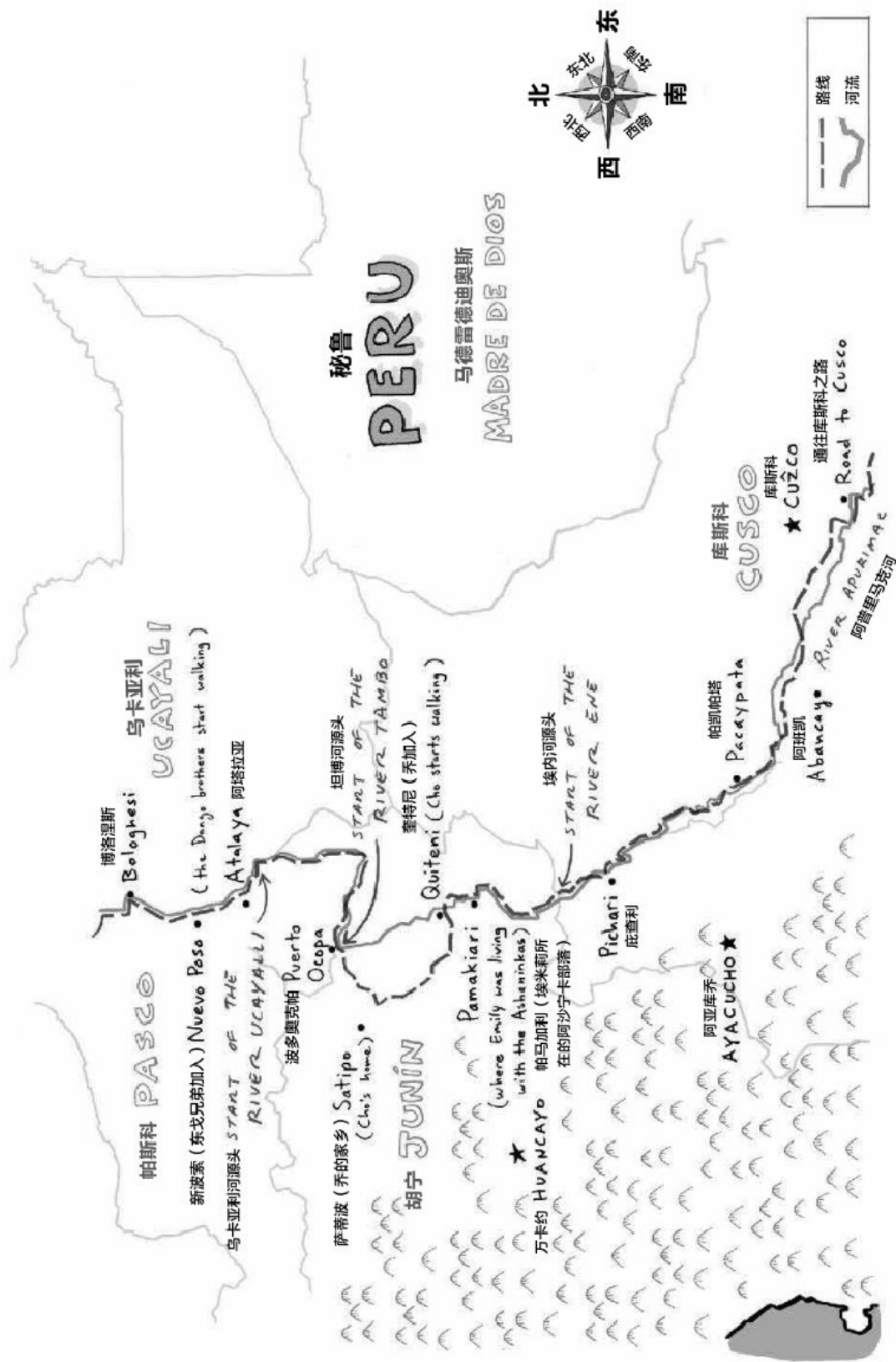
(7) 译注：Boy's Own, 1879—1967年在英国面向青少年发行的故事报，内容多以探险故事为主。

(8) 译注：又名食人鲳，原产于南美的淡水鱼，有时结群咬死人和动物。

[\(9\)](#) 译注：Designer drugs，受管制药物的衍生物，由制毒者在化学结构上加以改造，以规避当地现今的法律条文。

Part 2

红区



红区

2008年7月3日日记：

卢克决定回家。今天早上起床时，我非常恼怒，他已让他的未婚妻凯蒂寄30千克的再补给装备到秘鲁，30千克！！因此我要求他连上卫星电邮，试着阻止这份包裹寄出，因为这会花上300英镑。当他用笔记本电脑时，他念出要求的物品清单，这样我才能提出意见，判断哪些是必需品、哪些不是。清单包括一个MP3播放器，这又让我生气了，因为我要他给我也弄一台，他却只要求寄一台。

因此我对卢克说：“老兄，为什么只有一个MP3？你知道我也想要！”

“因为我要退出这次探险。”卢克用疲倦、灰心的神情说道。

“什么？”我结巴了，向他提起他承诺过的对象：慈善机构、赞助商、学校。

“我知道，”他说，“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决定之一，但我宁愿不要失去我们的友谊，和你产生不愉快。我感觉已经出现问题了。”

“老兄，我们可以谈，会没事的。”

“埃德，听我说，”卢克提高声调，“对你来说，只要谈一谈，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对我却不是，上次你所作的评论至今仍能刺痛我，我们上次争论过后我就想离开了。”（大约两个星期以前。）

“妈的，老兄，好吧，”我颤抖着说道，“如果这是你想要的，那么你就走吧。”

我对于接下来朝我袭来的情绪毫无准备，那是全然的兴奋，我就要随心所欲地进行这次探险了，我可以减少待在城镇里的时间，可以在各方面完全掌控这次探险。

卢克要离开，我并不难过，但很失望，我们的关系在这趟旅程中搞砸了，我想，他会后悔自己做出了这个决定——放弃一生一次的机会——但我丝毫不想改变他的心意。所有事情都变得明朗，尽管我未曾预料到卢克会离开，但突然间，一切都更合理了。

卢克并没有改变心意，因此我们为他的退出做计划，我提议给他一半探险赞助金，这样他可以自己继续步行或和奥兹同行，但他没有兴趣。这是个很安全的提议，我们都知道他只想回家。我们再次爬出阿普里马克深谷，来到圣马丁镇（San Martin），在这段长时间攀爬的过程中，我的脑子忙着想我刚得到的自由。我要小心，别在卢克面前表现出对此行的前景多么兴致高昂，而且，对他的离开表现得太兴奋也很不体贴。

我为什么不难过一点？是这样的，平心而论，卢克和我在投入这次探险之前是同事，我们在伯利兹的考察之初以及末尾共事了大约三星期。那段时间我们相处愉快，但回到英国后，我们从未给对方打过电话，甚至没有互通电邮，省下了卢克会寄给通信簿上名单的群组信。

我记得我对卢克的心态，在探险开始之前，我觉得他是完美的搭档：他是探险向导，我们相处得愉快；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发生争吵，那也不会是世界末日，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密友。

有趣的是，每次我们吵到一定程度，谈及无法再一起行走时，我默认的选项是“必须独自继续向前”，卢克的选项则是“想回家”。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

因此，卢克的决定最初引发的震撼一消退，我就立刻感觉自由之情高涨，现在我可以抛掉过去几个星期的负面情绪，开始以我的方式进行探险了。

2008年7月5日日记：

今天我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我的头脑清醒，脑袋里各种灵感和想法在转着。这让我觉得自己比前几个星期更有生气，对此次探险更加富有激情。

卢克在那天早上五点上了巴士，我起床为他送行，我看得出来他很难过——他就像在一段破裂的关系中分了手。在离别时刻，我认为我们俩都想着：“我们办得到的，让我们再试一次。”但内心深处，我知道他离开的决定是对的，我为此感谢他。

回想起来，对于所发生的事，我必须负很大的责任。探险的想法是我提出来的，但我选择了让卢克加入，我认为是我让他认为，划皮划艇是娘儿们做的事，我们应该徒步走过亚马孙。我认为是我用热情诱使他投入一次他从未渴望完成的探险，因此，他的那些行为或表现都没错，他只是在做他自己，他已经尽力了，最后他做出了高尚的决定，选择自己离开。

卢克走了之后，我慢步走向铺位摇摇欲坠的旅馆，奥兹和路易斯刚起床，路易斯的双脚在地板上腾空摇晃，他坐着时露出了早晨调皮的笑容。他的笑容安抚了我，我和两个好人在一起，我并不是只身一人，我们会没事的。路易斯是个很亲切的人，身上流露出自信的气质，那天他告诉我，他以前如何赚到比我给他的日薪50新索尔还多的钱，他曾是毒品走私犯。当他讲述自己如何在漆黑的夜里沿着蜿蜒狭窄的小径走过一大段上坡下坡路时，我可以看出他热爱那份差事；他带着一小包（几千克）的可卡因，整个过程中肾上腺素水平不断上升。尽管才二十二岁，路易斯已经有太太和一个小婴儿了，因此他不想再从事那种危险交易了。他的眼中闪烁着光芒，这告诉我，他现在是个好伙伴。

那天奥兹在路易斯的协助下买了食物补给品，我开始重新计划探险的事，我们很快就发现几乎不需要更改原计划，卢克的两个主要工作是买食物和煮饭，而奥兹根本没问我就接过了这些任务。这支探险队更精简了。

我接下写博客的工作，这本来也是卢克的工作之一。我写信给所有的慈善机构和赞助商，让他们知道卢克离开了。他们都能体谅我，

也很支持我，长途探险总会发生这种事。

那天晚上，我们三人在圣马丁坐着，向下凝视着峡谷，一边啜饮印加可乐，一边讨论行程。我们在阿普里马克峡谷的东侧，峡谷两侧的高处都有小径，但令人痛苦的是，每一次遇到水道流进峡谷，我们就得上下攀爬1000米，这让人筋疲力尽，也会消磨我们的精神。也因为我刚取得单独领导的地位，我建议我们稍微冒险一点，采取更有趣实际上也更容易的方式；我的想法是，走到谷底，沿着河流行进。下面没有毒品走私犯，我们可以钓鱼，而且，我们整天都是走下坡路，再也不用爬坡。

他们两人赞同了——或答应了，我不确定——但事后看来，我可能没有征询过他们的意见。我们隔天早上出发，不断地往下走，进入黑暗的峡谷深处。前半段灰扑扑的路很容易走，但往下走的话，我们要穿过密密麻麻的竹林才行。这经常使得我们必须匍匐前进，然后从缝隙间钻出来，走进底部臭气熏天的泥塘，我的凉鞋深陷泥沼里，就像双脚被包在满是猪油的塑料袋里一样。

因为现在天气暖和了，我们想要甩掉一些重量，因此我让卢克带着雨衣回利马了。后来回想起来，更惊人的是，我竟然让卢克把我的靴子也带回去了，这说明我们经常走在空旷的满是尘土的小径上，也说明我一开始对单独领导的地位多么不安。

我们在峡谷底部湍急的河边扎营，很难找到平坦之地睡觉，因此凿了一个石头平台放床垫。我们现在丢弃了煤油炉，因为奥兹很会煮饭，他用石头堆成一个小圈，在里面生了火；这几乎就像个烤炉，不仅能让锅子保持平衡，也能让那有用的微小火光保持在圈内。

奥兹总是能煮出更好吃的食物，那晚的开胃菜是草莓果冻粉（15人份）做成的浓稠甜饮料，我们三个人分着吃，接着他烤米饭，并且用大蒜煎罐头鲔鱼。

吃饭时，我注意到奥兹和路易斯的对话速度太快，我很累的时候会听不懂（直到我的西班牙语有显著的进步），卢克走了之后，简单的交谈也没了。晚饭后我很快就去床上了，并且拍了一段视频日记，写了日志。奥兹和路易斯又聊了一阵子，他们的声音盖过隆隆的水声，我刚好听得见。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世界上最深峡谷的崎岖谷地醒来。前一晚，我们累到无暇欣赏周遭的风景。每块构成“鹅卵石河滨”的石头直径达三到四米；河水高涨时会填满谷底，水位远高过我们头顶，水势凶猛危险。

我们小心翼翼地在石头上行走，我计划的问题立刻浮现出来：我们的背包太重，以致我们无法敏捷地行动，同时一直冒着扭伤脚踝的风险在大圆石间大步跳跃。我们前进得相当费力，既危险又缓慢，而在峡谷拐弯处是更可怕的光景：河岸消失了，河水的力道集中在两面峻峭的岩壁之间。

意识到我将大家带上了一条危险路径，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各种选项在我脑中飞快闪过。河道无法通行，前一天走过的右侧岩壁看来又太陡，我们无法再往回爬；只剩攀爬左侧岩壁——毒贩使用的那一侧——这个选择了。我们开始爬上左侧的一个山嘴，随即被竹子和荆棘阻碍了进度，我们的手、膝盖和脚踝扎满黑色的小尖刺。三个小时，我们前进了200米，而且喝光了水。

我问路易斯上方是否有水源。“有，”他说，“但我们不能去那里，那是毒贩使用的。”我开始急躁不安。我们到底在干什么？试图爬上一面眼前没有小径的峭壁，而且，这峭壁出奇地陡峭，密密麻麻布满针刺植物，还是毒贩经常出入的地方？

接着，在惊恐和压力之下，我仓促地做出另一个决定：我们必须再走回河边，穿过狭窄的峡谷。奥兹和路易斯使用那两只便携式充气筏，我在后面游泳，从而避免使用船只顺流而下。不借助河水前进，这是我探险规则的灰色地带，但在紧急情况下，我试着果断一点。在我们小心翼翼地下山回到河边时，我想到即将游泳通过峡谷，胃里就剧烈翻腾，而奥兹和路易斯都不会划船，是水上生手，无法直线航行。我们下到谷底时已经是下午了，俯视峡谷下游看不到峭壁的尽头，因此无法估计这段狭窄谷地的长度。我拿出地图计算这段峡谷的长度，好知道要在水中行进多长的距离：2500米。我开始觉得事态越来越失控，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遇上激流（很有可能），这绝对是拿所有人的生命在开玩笑。我在想什么？我只是从一个悲惨地狱换到另一个罢了。

“斯塔福德先生，你来到桑赫斯特⁽¹⁾，你们村里是不是少了个白痴？”我的脑海里可以听到在陆军受训时我的第一位掌旗军士满是嘲弄的苏格兰口音。

“来根雪茄吧，斯塔福德先生。”后面这句是套用英国电视上一支雪茄的广告，意思是，深呼吸，给你自己思考的时间。我知道，因为我加在自己身上的压力，让其他人失望了，我太仓促，需要冷静下来深呼吸。我告诉自己：“我们没有时间给自己加压力。”我看了看表，下午两点半；我决定先扎营。我们找到一小块沙滩生火，我坐在石头上，往喉咙里灌进又热又甜的咖啡，接着拿出地图，慢慢审视所有的选项。

我一镇定下来，唯一一个明智的选择便自动浮现在眼前——我发现山谷东侧（右边）有个山嘴，那里够矮，我们可以爬上去。虽然这会花上一整天，但是我们可以接上四十八小时前离开的小径。这意味着我承认走下峡谷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也意味着第二天早上要爬一大段路，但考虑到毒贩这一点，这仍是比较安全的一侧，而且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爬到顶端，那里就会有条可以重新接上原路的小径。

找到较安全、较适合的路径后，我难为情地回想这一天，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我坐在阿普里马克峡谷的谷底，感到前所未有的渺小和可怜。我有能力独自走完这旅程吗？我会不会害我们三人都丧命？

我翻出朋友乔治给我的古巴雪茄。这是他让我在欢庆时刻抽的，但我想自己现在正是需要抚慰的时刻。我点燃雪茄，吸着那温顺如皮革般的烟味。我做了三个错误决定，让我们陷入了两个困境。我和自己约定，不要寻找简单的选项，也不要让自己在压力下做出特殊的决定，从现在起，我要对所有人的生命负起全责，我必须深入探索，找到能带领我们离开这狼狈处境的沉着和自信。

隔天早上我起床时觉得好多了。奥兹很快地在地山嘴上找到了小径，我们只爬了四小时就抵达这条小径（我们三天前离开的那条）。

这条路径迂回地环绕着高悬于山谷一侧的山嘴，直到我们进入一个如画的村庄——洛马华克（Locmahuaeco）。这个村庄位于一个满是

沉甸甸的橘子和甜柠檬树的山谷。在这美得不可思议的村庄里，我们发现了一家商店。这里有新进的汽水和饼干，经营商店的年轻夫妻很高兴地欢迎他们的第一批来客。我们立刻在这愉快的氛围中放松下来，放松到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没有要求见村长。这对年轻夫妇看上去悠闲又友善，建议我们把吊床挂在足球场的门柱之间。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见村长。

抵达足球场时，我利用这宽大的空间摆出四块约1.83米长的卷式太阳能充电板，为笔记本电脑使用的12V的摩托车干电池充电。好奇的小孩过来给我们甜柠檬，直到我们再也吃不下。

就在我躺在吊床上正要写日记时，村长传唤我和奥兹参加村民会议，要求看我们的通行证。我们当然没有。我们像调皮的学生一样，一路咯咯笑着去参加会议。在金属屋顶的小屋里，我解释我们是谁、在这里做什么，接着，奥兹再复述给那些听不懂我蹩脚的西班牙语的人听。整个村庄的人都集合起来，讨论如何处置这些突然出现并且在足球场扎营的外来客。每个人看起来都相当严肃，妇女较男性更甚。村长记下我们的护照和身份信息，说因为这里是红区，如果我们发生什么事，他们就会受到怀疑；还告诉我们，之后每进入一个村庄都要告诉村长。我们深深地表示歉意，并且感谢他们的建议。当他们说我们可以走时，我走向户外的黑暗中，松了一口气，觉得不会再有问题了。

“白痴！”奥兹大吼。他说得太快了，距离小屋也太近了，我们全都拔腿狂奔，就像孩子在街上恶作剧那般。我必须认真看待这些人，他们置身于法律之外，因为这里根本没有法律，当然没有警察，反而有大量的毒品交易。

“该长大了，斯塔福德，”我在吊床上斥责自己，“这不是游戏。”

第二天早上，这对刚搬到村里的年轻夫妇为我们煮了一只老母鸡和一种当地的根类植物丝兰（yucca）当早餐，比起其他多数村民，他们明显更悠哉和正常。我们离开时，大家都满脸笑容，我们沿着一条宽阔的道路爬上谷壁，离开这个村庄。吃完早餐后，大家都感到身强力壮，但这条路很陡，我走路时必须全神贯注，才能跟上那两个秘鲁

人。在山顶时，路易斯没有改变步伐，用大拇指和食指张开弹弓的橡皮圈，瞄准了右边的树丛。他经常这么做——向左边、右边丢小石子——但都徒劳无功。不过这次他高声欢呼，抖掉他的背包，去矮树丛里捡东西。他打中了一只小山鸽，我们晚餐有肉吃了。

那天很辛苦，多次出现岔路，我们每次都要猜走哪一条才对，最后走到了路的尽头。我们发觉自己正小心翼翼地走下山坡，边走边紧抓着树根和树枝，但依旧时而失足滑倒。

我们在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溪里脱光衣服洗澡，洗去一个早上的脏污。我们猜想走丢的那条路就在上方，因此我们开始沿着一个山嘴向上爬，通过越来越浓密的树林。我才意识到，经过三个多月的探险，我们终于第一次踏入了丛林。我筋疲力尽，对于被树丛包围的熟悉感，我露出微笑，树荫的阴凉和植物潮湿的气味欢迎我回到这久违的环境。

三个小时后，我们水平前进了400米，垂直爬升了200米，穿过了茂密纠结的矮树丛，在倒落的树木间爬上爬下地前进。现在已经是傍晚了，没有道路的踪影，也没有水。我们扎了营，生小火，油煎那只鸽子。由于没有水，我们细细地咀嚼那多汁的鸽肉，并且以香蕉口味的甜饼干当作布丁。由于进度一直非常缓慢，我们都认为不能继续在河的这一侧穿越多山的丛林，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而且根据地图显示，照这样的速度，我们可能要几个星期后才能到下一个村庄。路易斯知道在阿普里马克峡谷的另一侧有一条路可以一路通往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因此，尽管遇上毒贩的风险大大增加，我们还是计划利用那条有毒贩的小径，尽快离开这里。

隔天起床时，我们没有水喝，但是有毛毛雨。我们几乎是一路直直地下了坡，到达河边，走了1500米，下降了650米。当山坡陡降时，我们如猴子般在树木间摆荡，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河边，最后危险的几米，我们掉到了湿滑的岩石上。最后我们把筏子充好气，渡到了对岸。每个人都咕噜噜地大口喝下两升的水。奥兹煮了一大锅面，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我们看到上方有农田，这意味着有路，有路就会有进展，我们开始攀爬陡峭的山坡。

2008年7月10日日记：

在50米上坡的某处，我双臂环抱着路易斯的腰以增加他的重量，好让他把奥兹拉上一面没有可握之处的垂直岩壁。很滑稽的行为，但别无选择。关键全取决于枯树不会突然折断或一丛杂草不被拉出地表。我们一走上小径，便静静地上坡——突然间非常清楚自己已在毒梟的地盘。

我们稍稍放松，便停下来，坐在树下猛吃甜柠檬。我今天吃了八个，这是免费的食物，又不用背——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继续爬坡，背着沉重的背包爬了800米后，我意识到爬坡变得多么容易，我们的体能够胜任。我们找到一条很棒的路径——保持着极高的标准——拐过弯后，进入被苍郁森林覆盖的山谷。尘土飞扬的山丘日子已被我们抛在身后，两群吼猴在深谷间嚎叫，仿佛宣告着我们已来到丛林入口。吼猴的音量在哺乳类动物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蓝鲸），它们的叫声充满了峡谷，就像一群群恐龙正相互叫阵，准备大打一场。这些喧闹声令我振奋。离开经验不足的山区，进入我最爱的环境——热带雨林——这令我感到舒适。

阿普里马克河后段仍属于红区，我慢慢了解到埃内河也一样危险，在平和宁静的表象底下，我察觉到了不祥的真相：大量的毒品制造与走私活动在此进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应付毒品走私犯。路易斯警告我，我们如果误入运作中的毒品工厂，就会立即被杀掉。“没别的选择。”他说，因为利润太过庞大，毒贩不能冒着让外人知道位置的风险，当地人如果知悉制作细节也会三缄其口，他们珍惜自己的生命。

毒品工厂拥有卫星电话、网络、全球定位系统和现代武器，配备远比秘鲁警方精良，因此警方根本没有胜算，唯一能成功打击毒梟的是军方，但这种打击显然并不常见。

我们睡在路边的壕沟里。早上五点半，我们启程后，大约在早餐时间晃进一个叫密拉维珍（Villa Virgen）的小镇。小镇刚从前一晚的盛大派对中回过神，多数人还醒着，但是烂醉如泥。镇长摇摇晃晃地朝我们走过来，满脸通红，眼睛充满血丝，他要求看我们的文件。我笑着问他能否推荐好的旅馆，他一脸迷糊地指着旅馆的方向，并且

欢迎我们来到密拉维珍。我们待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向笑容可掬的路易斯道别，奥兹和我继续上路。

2008年7月24日日记：

我们现在在庇查利（Pichari），奥兹对未来几天、几星期非常忧心，他很怕当地的印第安人和毒品走私犯。我觉得他的恐惧心理可以理解，没有人认为前方的路是安全的，所有人都不断地告诉我们过去从来没有人徒步行经这里。

我也很担心，但在心底，我认为这是对未知的恐惧，事情会比我们预期的容易。

今天我再次查看阿塔拉亚（Atalaya）和普卡尔帕（Pucallpa）之间的地图，那里简直偏僻得可笑，连绵数百英里的丛林，一条蜿蜒的蓝色河流贯穿其中，无论成功与否，接下来的几个月都将是一次历险。

我当然知道我有可能死在这趟旅途中，但我是如此坚定地投入，想完成，我认为这是值得一冒风险的，我们到目前为止都很幸运，谁说我们的运气不会继续好下去呢？但我不希望奥兹死去，我不想这样。我今天让他有更多机会选择离开，他在考虑，我看得出来，但我不想说服他留下，因为若是他死了，我必须负起责任。

我觉得就要进入关键时刻了，我将把生命交给命运。这并不是夸大其词，而是我真实的感受。

今天和克罗伊讲话了。尽管已分手两年，我们还是很亲近。我只带了她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我们在斐济山上的湖边的合影，那天我们很开心。克罗伊，我爱你。

我们在两天内要抵达的城镇是纳蒂维达德（Natividad）。据说那里的每个人都有武器，他们通过对空鸣枪召集镇民会议，所有人都涉足毒品走私。那里没有警察，有很多印第安人。累了，我要睡了。

7月25日，奥兹和我背着沉重的背包从庇查利出发。我们现在要背路易斯之前背的装备。我们似乎到了红区的核心地带，我可以感受到

奥兹的恐惧。我们吃力地背着新增的重量，所以几乎没有交谈，走了5000米后，一辆轻型小货车驶过，后座有个人大喊：“他们会在这里没命。”奥兹被这句话吓得浑身发抖，因此我建议休息一下。我们有三分钟没说话，接着奥兹说他有话要说。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我叫他等我拿出摄像机开始拍摄时再说。

“我决定回家，埃德，很抱歉。我太害怕了。”

我并不意外。由于只走了5000米，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返回庇查利，为奥兹的离开做出安排。我们去搭便车，上了一辆轻型小货车，最后发现自己坐在一桶桶的古柯叶上。多么讽刺啊，载我们的是个友善的毒贩。他让我们在镇上下车。

我们情绪低落，入住一家肮脏的旅馆，开始检查我可以独自携带的装备：医药箱里的药和现在这个区域里的白人一样多。最后，我把所有的东西放进帆布包，包的重量减至45千克，里面有摄像机、录像带、计算机、卫星连接系统、电话、卷式太阳能充电板、12V的干电池、充电器以及各种配套的电线，当然，还有一些丛林求生装备。奥兹会把其余的装备带回库斯科，然后寄去利马存放。

我写了日志，度过了一个失眠夜，思考自己到底能够做什么。我不想惹上麻烦，但也不想放弃。

隔天早上，奥兹同意帮我找新的向导。我们小心地在镇上询问，结果普遍的共识是，和外国佬一起走并不安全。当地人认为，美军正在这个区域执行任务，企图铲除可卡因加工厂。在这里，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涉足毒品交易，因此他们不太喜欢美国人，而我的平头和印满赞助商及慈善机构标志的衬衫，让我看起来像美国人，也像军人。

我们如果是在河里划皮划艇，就可以疯狂地划过去，而不至于惹人注目，但我们没有在皮划艇上。如果美国人最近没有开始扫荡这个区域，那我们也不会被当地惊恐的可卡因制造者视为警惕对象，但根据当地的传言，美国人的确在此展开了行动。我扔了探险衬衫，在街上摊贩处买了一件便宜的T恤。

我们最后去找向导的地方是一家杂货店，我买了一些钓具当礼物送给印第安人。店老板对我们很感兴趣，我们把这次探险的事告诉他

后，他变得很严肃。“你不能徒步经过这里，”他坚持这么认为，“你必须搭巴士回利马，然后在阿塔拉亚重新开始你的行程。白人不可能徒步经过埃内河。”我问他如果试图这么做会怎样，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他们会杀了你。”

我们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计划这么做。他叹了口气，建议我到巡逻队办公室取得通行证。我听说过巡逻队，但一直不太清楚他们是谁，直到奥兹向我解释：秘鲁警方不被准许进入这个区域，这里实际上是法外之地，而巡逻队是由受人信赖的当地民众组成的，他们被选来维护当地治安，处理毒品以外的犯罪，巡逻队的人也都插手毒品产业。

我们带着鱼钩、铅锤和尼龙绳离开商店。我认真地考虑要不要去见巡逻队，如果他们说我不能通行，我们的处境会更糟。不过，我和奥兹还是紧张地穿过广场，敲了那栋迷彩建筑的金属门。我向来不能理解，为什么南美洲的准军事单位（还有真正的军方）要把基地涂上迷彩，难道他们认为这样别人就看不到基地了？真可笑！我们被叫了进去。在那阴暗的房间里，有个胖男人坐在金属桌子和一台老旧的打字机后方，他狐疑地看着我们，点头示意我说话。

我向他说明来意，事实上，我说了一点谎，我知道他不希望我们行经这里，但我也知道，在之前的探险中，曾有人乘皮划艇经过此地，因此，我假装我们是皮划艇探险者，问他是否介意开一张通行证，让我们通行。这位“主席”（他是这么介绍自己的）告诉我们小心点，但他显然很欣赏我们提出请求的恭敬态度。他说，我来对了地方，他当然会为我写许可信。在他敲打笨重的打字机时，我祈祷通行证上不会明确提及交通工具。大约40分钟后，他咳了咳，签了通行证，盖上印章后，把它交给了我们。太完美了，上面没有提到皮划艇，我们有了出自自卫委员会（Comite Autodefensa, CAD）——亦即巡逻队——的正式许可，可以通过这个区域。

回到水泥广场耀眼的阳光下，这个小小的胜利给了我新的希望，而谈及皮划艇也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奥兹，如果我们坐船前行，你会留下来吗？”我问道。他说会，但他提醒我，这会违背我的探险原则。

“我们一直在恐惧下一阶段，因为我们一直在听恐怖的传言，”我继续说道，“但每次我们往下游走，就发现事情从不像传言的那么可怕。我们先划充气筏去下游，自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如果都放心了，再回头走这段路；你如果不放心，可以在靠岸后离开这次探险。”

奥兹同意了，这是一条漫长的路程，但也是个计划。而在此刻，我仍有向导。我们必须回庇查利继续赶路，但我们至少知道将要面临什么状况。

阿沙宁卡人

隔天早上，在一家肮脏的咖啡馆喝完牛蹄汤和印加可乐之后，我和奥兹走到河边，将筏子充气，之后在晨雾中在阿普里马克河上漂流。这条20米宽的河里到处都是岩石，还有起伏的小湍流和漩涡。这里到波多奥克帕（Puerto Ocopa）——下一个通了道路的落脚处——的直线距离是155千米，但是，河道蜿蜒曲折，因此路程也许超过200千米。我们预计在四天内抵达。出发时，我们一定是心烦意乱了，因为身上只带了三包草莓饼干。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和步行相比，漂流太有趣了，水流非常湍急，两旁的河岸呼啸而过，我们急速往北前进。

但奥兹开始做出怪异的行为，每遇到小湍流，他都要尖叫，像看到鬼一样。他原本紧绷的情绪几乎要在充气筏上崩溃了。我试着安抚他，让他冷静下来，但我们正在一条危险的河上急速前进。周围不仅有湍流，沿岸还散布着可能给我们带来危险的印第安小屋。我的安抚徒劳无功，他开始疯狂地大笑。

之后湍流变得更急，有一次，我判断错了形势，水流的力道将我压到一块岩石边。不到一秒钟，充气筏就完全进水了，我想我麻烦大了。奥兹从后面朝我而来，脸上带着疯狂的笑容，我挥手要他别靠过来。他安全通过后，我设法移动充气筏，很高兴地发现筏子尽管充满水而且被水淹没，但并没有沉下去。我划动筏子，离开湍流；只有我的上半身和帆布包在水面上，整个充气筏都在吃水线之下。

那天我们遇见了很多看来像原住民的人，其中多数人手持猎枪，大部分的人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

傍晚六点，我们在一道石头河岸扎营。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两名年轻男孩正用鱼钩和线钓鱼，我们过去问是否有食物吃。奥兹用一种惊恐、狂乱的语调问他们问题，让我觉得有点尴尬，我知道他真的该回家了。男孩们并没有被奥兹的行为困扰，告诉我们第二天早上会有客船经过。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这条河除了划独木舟和皮划艇，还能行船，这让我精神大振。他们把丝兰给我们吃，我从未煮过丝兰，因此，奥兹教我如何切碎和烹煮。我们一人吃了一大盘。丝兰尝起来有点像马铃薯。奥兹稍微放松了点，在填饱肚子和知道第二天不用再坐充气筏后，他感到安适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搭客船到波多奥克帕，我在那里付给奥兹我当时能给出的钱，告诉他，我会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把余款汇给他。然后，我送他上了一辆破旧的出租车，让他前往萨蒂波镇（Satipo），他在那里可以搭公交车到利马，接着转另一辆公交车回到他在库斯科的家。这一切都是公事公办，没有夹杂情感，但当时我很高兴奥兹离开了，他的恐惧会感染我。此外，他也帮不上忙了，他已经做得非常好，尽其所能地带我到了这里。我非常感谢他，在他应得的薪资之外，我也转了一笔足以到向导学校上下一期课程的钱。那辆有凹痕的出租车在扬起的尘土中消失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奥兹的身影。

探险进行了四个月，我已经送走了卢克和奥兹，但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坚强了，生理和心理都在适应这次探险的新需求。我感到自己充满活力，每天都在体验全新的感受和风景。

我们搭乘的那艘客船的大块头船长叫鲁宾，他很热心地带我到波多奥克帕附近的阿沙宁卡（Ashaninka）部落找新向导。我要找能说当地原住民语言的人。那个村落的房屋沿着满是尘土的街道整齐排列，基本上是木造房屋（棕榈树干作屋顶）。阿沙宁卡村落和波多奥克帕殖民区的差别在于，印第安人干净整洁，而殖民港口混乱污秽。这里的房子都有稻草铺顶，而且通常没有墙壁，但连接房屋的泥土街道与西方村庄的街道没有太大不同。我们大约试了五次才找到合意的住所。我们来到一户人家，那户人家的门外坐着一对阿沙宁卡中年夫妇和一个男孩。鲁宾向他们说明我的来意，那个孩子马上笑开怀，说：“我愿意做。”

“太好了！”我说，对我已经找到向导而感到意外，“你几岁？”

“十六。”埃利亚斯说。

再过几个小时，船就要离开了，它会返回上游。我重新打包行李。我背一个很轻的包（少了笔记本电脑、太阳能充电器以及其他留在那家破旧旅馆的重物，因为我们还会再回来），还把一个很轻的帆布包给埃利亚斯背。我估计埃利亚斯不到1.53米高，但他的肩膀宽阔。他咧嘴大笑时，露出那种几乎像非洲人的笑容。我帮他买了一双橡胶底帆布鞋和一件衬衫，然后我们一起上船。

在船上，我问埃利亚斯关于他的家庭的情况。他告诉我，那对夫妇是他的叔叔和婶婶，他之所以和他们住一起，是因为他母亲被杀害了。

“很遗憾，”我说，“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星期三。”埃利亚斯回答。

我无法用流利的西班牙语和埃利亚斯谈论这个问题，而且我也不是很想谈，因为这是很敏感的话题。看来在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母亲过世还不到一星期。很难以置信的是，我如鲠在喉。

回到庇查利，埃利亚斯和我住进我与奥兹之前待过两晚的旅馆。为了减轻重量，我把笔记本电脑留在波多奥克帕，所以现在无法查看电子邮件。因此，我打电话给在利马的朋友马莱内，请她转达所有重要的信息。和马莱内讲话让我觉得欣慰，听到她的声音里流露出对我安危的担忧，也让我感到不远处还有人关心着我。

在过去几天里，我有时候会焦虑，害怕自己的生命会有危险，但当我仔细思考进行这次探险是否正确时，我认为我只是害怕未知的事情，而且，我大概会没事。那些警告一定是针对一般的旅客的，我告诉自己，我跟他们不同，也提醒自己，我曾在北爱尔兰服役，在阿富汗待过四年，我应付得来。特别是，如果埃利亚斯在母亲被杀害的六天后也能应付得来，那么，我也可以。

2008年7月30日，沿着没有铺柏油的曲折道路走了35千米，埃利亚斯和我抵达纳蒂维达德。在听过所有的警告后，我的脑海中对这个法外之地有一番想象——那里全都是戴着宽边帽、留翘八字胡的持枪毒贩。但与我的想象相反的是，一对温和的夫妇让我们住进了一家算是旅馆的店里。接着，我去找奥兹的姐姐保利娜，她正巧在纳蒂维达德教书。找到保利娜很容易，因为她是镇上唯一的女教师。看到漂亮的女版奥兹真是棒极了。听到奥兹不再与我同行的原因后，她十分担心我，说，我也应该现在就回家。我试图笑着向她保证我能接受这个风险。于是，她建议我去见镇长，让我看上去尽可能坦荡，而且对这些毒品走私犯无害。

保利娜陪我去镇长家里，但我们抵达时，他正在洗澡。在外面等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乔治·布什在阿富汗的塔利班据点外闲晃，生怕被认出来。我希望没人注意到我，但整个广场的人都停下手边的事盯着我。

接着，我看到了一群彪形大汉。“好戏上场了。”我心想。四名持枪男子穿过广场，明确地向我走来，一脸不怀好意。而我也相当狂妄，在他们抵达之前，走上前跟他们逐一握手，并直视他们的眼睛。

我向他们说明来意，并出示了我在庇查利的巡逻队办公室取得的许可信。现在我开始意识到，那封信真是他妈的少见。

那封信有点把他们搞糊涂了，但这些大汉似乎认同我有待在这里的许可，不过他们要求见埃利亚斯。当时他在旅馆里，因此我在枪口的护送下回到了下榻的旅馆。恼人的是，埃利亚斯不知道把任何证件带在身上的必要性。这在秘鲁这样的国家是一大错误，因为法律规定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他勉强逃过了一劫，只因为他是个孩子。

看过信和埃利亚斯，他们要求看我帆布包里的东西。我带他们去我的房间，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看，并极其详尽地解释那台摄像机如何使用。基本上，我是在给他们灌输过多的信息。没多久，他们就厌烦了。我一直担心摄像机会被没收，因为他们不想让外人知道的就是这个区域的毒品交易。然而他们看过所有东西后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因此又露出不怀好意的表情，感谢我拨出时间，并欢迎我来

到镇上，让我有任何问题就找他们。“我们就是王法。”他们这么说，以免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

之后我走到大街上，一名留着山羊胡的高瘦男子从我身边溜过：“当心点，英国佬。”要不是所有人都警告我在这里要当心点，我会笑出声。纳蒂维达德的人都太自以为是了。那些人不过是有枪的孩子。但这是相当致命的组合。

那天晚上睡觉时，我很讶异，因为我又能睡在旅馆的床上了。我将摄像机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把它调到夜视模式以防夜里又受到打扰；不过事实上并没有。

我们在清晨六点吃早餐，在炒蛋和面包下肚后，我们向保利娜道别，走出纳蒂维达德，朝埃内河出发。埃利亚斯和我走在一起，这看起来很滑稽——我约1.85米高，而他不到1.53米；他穿着衬衫和全新的橡胶底帆布鞋，看起来更像个孩子。

上午，我们抵达波多埃内（Puerto Ene），在那里遇见了乔纳森。他是个强壮精瘦的男子，身上没有一丝赘肉，在两秒内就决定丢下妻儿和我们一起上路。乔纳森知道路径，并且有着长年居住在此的当地人的自信。重要的是，他有魄力和个性，立马开始激励埃利亚斯和我，让我们走快一点。他坚定地领着我们通过树木丛生的小径。注入的这股新鲜血液让我们完全恢复了活力。

现在是8月初，埃利亚斯、乔纳森和我在雾霭中行经一个又一个原住民部落，每到一处就有人请我们喝一种叫玛沙托（masato）的饮料。那是一种发酵饮料，由妇女将丝兰咀嚼一番后吐在碗里制成——她们的唾液在发酵过程中至关重要——最后的产物是微含酒精的乳白色饮料。拒绝喝这种饮料是很无礼的，但我还不知道可以礼貌地拒绝续杯，因此，我们一整天喝了几升这种发酵饮料。

原住民部落让我紧张，但这些阿沙宁卡人也同样对我感到紧张。他们是我在整趟旅程中见过最真实的未曾改变的原住民，我很希望当时能有更多的经验，可以更放松地享受这一切。但情况就是如此，我只能去适应、去学习，并且尽可能去吸收。我努力去放松，但这远在我的舒适范围之外，我从未真正放松过。

阿沙宁卡的男人和女人都穿着一件棕色衣服或蓝色衣服。这种衣服被称作库斯玛（cushmas），差不多就像一个布袋，以传统方式手工编制而成。男女的个子都很小，没有人高过1.68米。他们还带着大串的珠子首饰，脸上涂着红颜料——通常是画一道细长的直线，从脸颊两侧画过鼻子。少有人穿鞋；许多人手持弓箭闲晃。他们大都以阿沙宁卡语交谈；我对乔纳森和埃利亚斯说西班牙语，希望知道每个人大概在说些什么。过去有少数传教士乘船来过其中某些部落，但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史上第一位徒步来到他们村落的外地人。

乔纳森在听到高频无线电传来他女儿生病的消息后，必须离开我们。我很遗憾他要走了，他一直精力充沛，我会怀念他的干劲和催促所有事情快快完成的不耐烦。他真不是个典型的南美洲人。

乔纳森和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我躺在吊床上写日记，他把我从胡思乱想中拉出来：“斯塔福德！斯塔福德！来和我们一起喝酒！”

他向印第安人买了一桶十升的玛沙托，希望我和他一起喝。在我拒绝他的好意后，他偷偷溜上我的吊床，说我无论如何得付这一桶100新索尔（20英镑）的钱。

“滚开！”这是我对他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早上，埃利亚斯和我继续前进。少了那位自大的朋友，一切都变得沉闷又安静。最后我们抵达一个叫帕马加利（Pamakari）的部落，他们对我说：“不！”我因而无法通行。当地人明显害怕我到来，惊慌地聚在一起，对我大声吼叫，埃利亚斯和我都被泼了好几桶水，一名妇女还用手在我的脸上涂抹红色植物染料。

有一名女子站在这群人后面，她特别突出，比他人高出很多，约有1.82米高，身材瘦长、白皮肤，像西方人，但脸上涂有同样的颜料，也戴着阿沙宁卡人的珠子首饰。我盯着她看，不确定她到底是谁，而她也看着我。她走向前。“你是英国人吗？”她用优雅的英国腔问道，“我是埃米莉。”

“你知道你来到了什么地方吗？”埃米莉继续责备地说道，“你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事吗？”我被两种情绪拉扯，一方面喜于有人能

和我好好沟通，另一方面则因对阿沙宁卡人所知贫乏而感到困窘。

村民让我们说话，但埃米莉一开始明显有所提防，不对我太过友善。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意大利的人类学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来自附近城镇的阿沙宁卡人共事，直到得到他们的信任才获准来访。之后，她住在其中一个部落里，研究他们的文化。

她扮演中介角色，因为埃利亚斯太年轻，对这些人不具说服力。他们全都不欢迎我的到来，问我是否从管理埃内河沿岸阿沙宁卡人的原住民组织埃内河阿沙宁卡部落办事处（Central Ashaninka del Rio Ene, CARE）那里取得了通行证。我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组织，我觉得自己愚蠢、天真，也没做好功课。阿沙宁卡人拒绝接受我的礼物，并且送我到河边等船，埃米莉看着我拎起背包和埃利亚斯走到河边。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们说我必须去的地方是几百千米外的萨蒂波——就是奥兹回家途中会经过的城镇——先搭船再搭出租车。

正当埃利亚斯坐着等待，而我在棕色的河里洗去脸上的红颜料时，埃米莉来到河边。她说，她和村里的一些长老那天碰巧也要去萨蒂波，船上还有空位，我们可以和她一起去。

当时我可以拥抱埃米莉的，她不知道我多么想哭，觉得自己多么悲惨，而她伸出了援手。我、埃米莉、埃利亚斯和几名阿沙宁卡长老一起登上了小船，往下游出发，前往埃利亚斯住的波多奥克帕。那里也是埃内河以一条灰色道路通往外界的地方。

一上了船，埃米莉就放松了下来。少了整个部落的人的盯视，我们一起坐在船舱的木板上，她笑着递给我一支薄荷烟。我大可以亲她的。她已经洗掉脸上的印第安颜料，鬋曲的长发垂落到自信且有女人味的地中海人脸庞上。她以平常的样子现了身。看着她抽着烟的柔软嘴唇，还有对我讲述阿沙宁卡人历史时的和善态度，我觉得胸口一阵灼热。

过去这个地区发生过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埃内河畔的阿沙宁卡人在恐怖组织光明之路（Shining Path）——企图夺取秘鲁政权——的手上遭到了无情的对待。当时的政府给阿沙宁卡人配备了现代武装，他们进行了激烈的反击。然而，整整一代的阿沙宁卡男子都被歼

灭了，只有少数二十五岁以上的女子在进攻期间逃过被一再强暴和殴打的命运。而新的威胁则是，石油公司想进驻这个地区，从阿沙宁卡人脚下掘出石油（这已经在本区域的其他河流发生了）。除此之外，古柯叶的入侵（殖民秘鲁人以武力或欺蒙拐骗的方式占据了原住民的土地）和非法伐木密切相关。因此，阿沙宁卡人视所有外人为威胁并不意外。

埃米莉也告诉我，泼水是缓和严重问题的方式，那些人真的很怕我们，但他们心肠很好，不想有麻烦。她告诉我，前一天早上，有个女人用水泼了一名酒后殴打老婆的男人，这是不使用暴力来表达严重训示的方式。

埃米莉说，她会为我引见部落办事处，帮我取得通行证，让徒步之旅继续下去。她为了一个陌生人，竟冒着赔上自己的声誉和村民的信赖的风险。而我必须承认，在这么筋疲力尽又极度疑惧的情况下，我被她修长的双腿深深吸引了。

我遵照她的建议，为阿沙宁卡村民买了价值800新索尔的礼物。包裹里大多是抗生素、止痛药和硬糖，部落办事处相信了我的善意，给我发了通行证。他们原本建议给部落带去大砍刀和铁锹，但后来的共识是带药品，因为药品比较轻（我们必须把所有东西背上肩）。他们甚至从组织里派了一名叫奥斯卡的向导和我们同行，他熟知部落，也获得了部落的信任。带着大包的礼物、通行证和一名受到信赖的阿沙宁卡向导出发后，我觉得一切又回到了正轨。我在镇上的一家旅馆待了几晚，和埃米莉外出用餐，享用披萨，喝红酒，聊着家乡的生活。我觉得自己焕然一新，准备再次挑战埃内河。现在一切就绪，还会出什么错？

奥斯卡是和我年纪相仿的阿沙宁卡人，留着20世纪80年代德国足球运动员那样的前短后长发型。他请求提前一天支取薪水。付钱时，我想：“这么做是因为他是部落办事处的人，我必须相信他。”奥斯卡非常高兴，我们约定隔天早上七点在他下榻的旅馆碰面。

早上七点零一分，我在阴暗的旅馆敲着奥斯卡的门，没有听到回应。他不在了吗？该死的，真是令人沮丧，我已经付过钱了，向导也没了。我问旅馆老板他几时离开的，她说他还在房里睡觉。我再次敲

门，事实上是用拳头不断地死命敲：“奥斯卡！早安，朋友！”七点二十分左右，整个旅馆都醒了，而且对我很不爽。终于，房门开了，一双充血的眼睛从阴暗、散发着恶臭的门缝里冒出来，试着聚焦在我身上。奥斯卡喝得烂醉，廉价酒精的臭味熏得我倒退了一步。

“好极了！”我微笑道，“船在等着呢！走了，朋友！”

奥斯卡抓起他的小背包，我匆匆地拉着他上了一辆出租车赶往港口。他在车上立刻又呼呼大睡，我才不在乎呢，回到我想重新开始步行的地点需要坐两天船，他有的是时间从宿醉中清醒过来。

三十多个小时后，船回到帕马加利部落。我上岸时，那天泼我水的那个女人也在。奥斯卡向她解释，他是来当向导的，我已经取得部落办事处的书面许可。此刻，奥斯卡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那个女人不会读写，那张通行证对她来说没有意义，她从黑色粗糙的刘海儿后对我微笑，像是在说“这次让你通过”，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

由于当时是早上，我们没在部落停留，可以赶点路。这趟往返耗掉的时间让我开始担心进度，我希望现在就把埃内河抛在身后。我们走过丝兰田，接着走在穿过丛林的猎人小径上。情况允许时，奥斯卡会找其他人为我们指出通往下个部落的路，因为他也不知道路，在绿油油的次生丛林迷宫里很容易迷失方向。

尽管有奥斯卡在，我到多数部落时依旧感到恐惧。我和奥斯卡相处得不错，但不是真的与他有交情。我也知道，他是对族人忠诚而不是对我，但我非常依赖他。

两天后，我们抵达一个看起来很文明的部落，茅草铺顶的房屋外围有个维护得良好的足球场。我们把背包丢在一个小棚屋下。奥斯卡去找村长，我坐下来等他。等了又等，我开始感到不安。奥斯卡终于回来了，看起来有点忧心。

“把摄像机放下，跟我来。”他说。

“什么？”我拖延着。我听到了奥斯卡说的话，但不想照他说的办。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事，我想把它们记录下来。

“把摄像机放下。”奥斯卡又说了一遍，他看起来一脸担忧，我只好顺从了。

我们走出村子的中心区，来到一所学校。奥斯卡在前面领路，为我指出村长。就在我走向村长，向他做自我介绍并且与他握手时，一桶脏水朝我泼了过来。泼水的女孩用阿沙宁卡语愤怒地咆哮，高亢短促的话语随着脏水刺痛了我。

第二桶是满满的稀水泥，接着又来两桶，我环顾围绕着我的村民，没有人笑。我全身沾满了稀水泥，虽然觉得有点可悲，但我非常冷静。那个女孩接着把湿水泥混合物塞到我嘴里。所有女人都对我尖声大叫，既警觉又愤怒，但我着实感觉到在一旁静默地看的男人眼里流露出同情。

“我们该走了。”我一边吐着沙子和水泥，一边对奥斯卡说。我和村长握手，谢谢他，并转身离开，前往河边。奥斯卡显然心绪不宁，我们走路时，他一句话都没说。到了河边，奥斯卡告诉我，下游的部落已经备好“成堆的尖刺”对我丢掷。

奥斯卡向我解释事态的严重性。他们认为我是阿根廷石油公司派来的；他们前一天才收到部落办事处通过高频无线电传来做好准备以防外国佬来偷地下石油的消息，接着我就出现了。

考虑到阿沙宁卡人的立场，我可以理解这个错误——我是白人，出现的时机很糟。我忍不住要想：考虑到我的话，部落办事处发出警告的时间也许可以拿捏得更好一些，不过他们不会担心我。奥斯卡说我们不能再往下走了，因为他也被部落赶了出来，再走下去，会让部落办事处和这个部落不再信任彼此。真是一团糟。奥斯卡说他不打算和我再走下去。我问他，如果走埃内河的另一边——殖民区那一边——他是否愿意。但身为阿沙宁卡人，他害怕走那一侧，他说毒贩太危险了。

我们将充气筏充好气，先划到河对岸，这样我才能用全球定位系统标出这个位置。在确定返回时能找到这个位置后，我们开始往下游划。我心神不宁：我带着那张重要的通行证，但和奥斯卡只走了两天，又要返回波多奥克帕。我自问为何要和奥斯卡一起回去，但疲惫以及在部落遭受的族人对我发火的折磨，让城镇变得很有吸引力。我

需要再找个人同行，也许应该找个不是阿沙宁卡族的人，这样我就能走毒贩那一侧了。现在，印第安人比毒贩还令我忧心，因此，我的注意力转向河的左岸（西边）。我们离开一段距离后，奥斯卡和我开始休息，之后顺着水流漂移。

那天晚上，我和一名男子在港口愉快地聊天。他告诉我，印第安人在这方面“很糟糕”，他们在阻碍秘鲁进步。他这是在重述秘鲁总统加西亚对秘鲁人灌输的宣传话语。电视广告不断播出开朗快乐的人开采石油和其他天然资源的影像，把“秘鲁的进步”告诉秘鲁人。这让我觉得恶心，因为我知道，阿沙宁卡人在这蓬勃的未来里分不到一杯羹。

第二天，我和奥斯卡回到萨蒂波镇。埃米莉让我看一张地图，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秘鲁境内亚马孙流域（除了少数保护区之外）都在计划进行某种资源的开采。一条惊人的法律声明，秘鲁人的土地所有权只到地表之下五米处，政府可以把阿沙宁卡人居住地区的地底探钻权出售给多国公司，原住民没有置喙的余地。这是埃内河刚发生的事，也是部落所要抗议的。我不禁选了一边站——尽管阿沙宁卡人把我赶了出来，但我完全理解，我也开始为他们猛烈抵抗的精神感到骄傲。

埃米莉谈到其他石油公司已经开采的地区，那里的原住民部落已经被改变了，再也无法挽回。开采的过程很脏，而且会造成严重污染（大多污染源是在运输时溢出的），使得河水污浊，再也没有鱼类生存。当地居民通常会获得薪水补偿，例如一个月1000美元。这足够让他们在部落里过着帝王般的生活，而且可以让他们永远喝得醉醺醺的——这通常伴随着家暴事件的大幅增加。当啤酒甚或更糟的烈酒被带进部落时，传统价值观便被破坏殆尽。埃米莉说，每一次她所在的部落办完派对，就会有约三分之一的女人遭到醉酒的丈夫毒打，无一例外。

阿沙宁卡人对我有这种反应其实很好，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土地和生活方式。我希望他们能顾及两者，愿他们能好好地生活下去。我不想再激怒他们了，因此我计划埃内河剩余的路程都改走西岸。

回到萨蒂波，我心力交瘁，放出风声要找向导，但来应征的人不是不太合格，就是开出我付不起的高价。后来我放弃了，决定单独行动。因为河水水位还很低，我会紧沿着河岸，并且将充气筏保持充好气的状态，一旦遇上危险，我就能够马上逃离。这是个冒险的计划，因为没有向导，我感到更加脆弱。

就在我预计出发时，埃米莉说她一个朋友的弟弟正在找工作，他是个林地工人，熟知埃内河西岸的情况。埃米莉安排我去见加迪尔·桑切斯·里韦拉。

加迪尔·乔·桑切斯·里韦拉

我们在他哥哥位于萨蒂波镇的家昏暗的厨房里碰了面，他看起来精明又有才智，头发修剪得很整齐，上衣和裤子都烫过。我带了一些地图与他一起研究。他仔细钻研着地图，揉着非洲人一般的厚唇，指出他熟悉的区域以及我们该避开的地方。他很明智，希望自己快点进入状况，把事情做完，然后离开。他说他懂一点阿沙宁卡语，因为他曾在偏远地区居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阿沙宁卡人不会说西班牙语，因此他被迫了解了基本对话，这样才能与阿沙宁卡人沟通。我们拟妥计划，相互握手。

加迪尔——朋友都叫他“乔”——和我经由现在已经很熟的路径回到河边：先从萨蒂波坐几个小时的出租车到波多奥克帕，接着再从波多奥克帕坐一整天的客船到西岸殖民区一侧的奎特尼（Quiteni）过夜，然后前往我的充气筏曾经抵达并且和奥斯卡一起在全球定位系统上标记的位置。从那里开始，我们计划沿着新开的伐木路往山里走，远离河边，避开埃内河下游较凶猛、较少和外界接触的部落。这条路线未经开辟，但可以让我们离我惯常走的河边远一点。

我在奎特尼写了以下的日记：

我的心好累，缺乏动力。我的身体没问题，但乔的西班牙语似乎有点特别，我听不太懂。他通情达理，看起来强健、聪慧，但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会讲阿沙宁卡语。这是个问题，明天我必须再找一个会说阿沙宁卡语的向导。

乔也是个积极劝人信教的基督徒。我刚上了一课，知道为什么教堂里不放基督的圣像。上帝也会忌妒，就像如果我女友和乔上床，我也会忌妒一样。

我实在很厌倦那些虚张声势的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故事，这会消磨人的干劲。然而，所有的人又一次说我们明天要走的路径太疯狂；马奇根加人（Machiguenga）不明白，我只是他妈的想走路。

乔大约1.73米高，身材中等，但赘肉不多，穿着橡胶底帆布鞋。我们行走时，他会展开喉咙用西班牙语唱基督教歌曲，一开始这让我露出笑容，他的自信显而易见，而且他正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步行。他邀请我一起唱，但我实在还无法摆脱焦虑的状态，去毫无顾忌地唱歌。我一方面欣赏乔的自信，一方面又被他像唱童子军歌曲的励志方式感到恼火。“你的动力是什么？”乔一再问我，这种问题就算我以前无所谓，现在也会激怒我。我刚走了四个月的路，一路上没有人鼓励我、逗我开心，我不喜欢有人打搅我的世界。

新的伐木路通往山里，乔和我走得卖力，速度也很快。我看到了此行的第一只王鹫（紫色、红色和黄色的头部不可能被人认错），那时它在路上吃腐尸。我们惊扰了它，它飞走时，我想起几个月前在科尔卡峡谷看到的巨大秃鹰。伐木路刚修好——也许就在一个星期前——推土机完工后，还没有车辆行经，这意味着，这条让我们避开埃内河的路径是在我走在河边时完工的。傍晚，我们抵达一个来自马奇根加部落的印第安小村落。

对我而言，马奇根加人与阿沙宁卡人的长相、穿着和声音差不多，但语言显然不同。我们询问能否在某户人家待上一晚时，我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出现让他们不舒服。乔后来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毒品走私犯，背包里装着可卡因。他们给我们一小盘丝兰当晚餐，索价50新索尔。我心不甘情不愿地付了帐，感觉这一切都不对，我们很高兴能在隔天早上离开此地。

乔一直很担心某个部落，他认为在那里会遇到麻烦，因此带我走一条隐秘的小路进入山里，避开那个村落。他的知识无价，他告诉我，那个村落“很坏”，不会让我们通行。他在这里工作过，认识山丘上的住户，我们经过那边没有问题。

2008年8月14日，乔和我抵达一个叫马苏朗奇里（Masurunkiari）的小镇。这个镇很特别，因为很现代，有两三层楼高的木造及水泥建筑，有镇公所、电以及大学校，但镇民都是印第安人。这些马奇根加

人卖了森林，现在有了钱，他们能够接受外来者，显然也常和殖民区的秘鲁人打交道，因此不觉得难以应付一个英国佬。

乔和我在两天内走了80千米，他是个步行机器，唯一的弱点是那双粗劣的帆布鞋造成的大水泡。

和乔走了五天后，我们又回到波多奥克帕，但这是第一次步行抵达这里。走在刚开辟出来的伐木路上，我们平均每天的里程是惊人的35千米。遗憾的是，伐木场景实在太可怕了。乔说，我们所见的伐木行为中只有10%是合法的，其他全是非法的。我天真地问他当局为什么不采取措施，禁止人们非法砍伐森林里的大型原木。答案显而易见，当局也牵涉在这庞大的利益里——“秘鲁的进步”。

在地方上，土地所有者被奉上惊人的条件，如果他们拥有有价值的硬木，那么伐木公司就会买下这些木头，开一条路进来砍伐。他们走后，给土地所有者留下清理过的农场，现在这些农场已经连接上秘鲁的道路系统，他们也有钱投资畜牧业。他们没接受过环境教育，加上政府提倡资源开采，谁不卖呢？

从太平洋开始，我已经走了四个半月，越过安第斯山脉，走下整个阿普里马克和埃内河，声名狼藉的红区也已在我身后。从波多奥克帕（乔答应陪我一起走到这里）开始，我还必须走下坦博河及乌卡亚利河，之后才是真正的亚马孙河，我并不想再花六七个月才走完秘鲁的部分。

我们坐在木造旅馆下方的酒吧喝啤酒，之前我把多余的装备都留在了这里。我们俩对于过去这几天的步调和进度都很满意，又一场大雨洗去了黏腻，空气相当清新。

一个白人如果在此处会被投以奇怪的眼光，那么再加上一个黑人向导，得到的关注就会加倍。和许多南美洲人一样，秘鲁人很直接地叫乔“黑鬼”，叫我“英国佬”，这表示，他们很容易就能叫出我们的名字。由于乔明显有部分非洲血统，因此他很习惯让自己看起来与众不同。我们有共同点。

旅馆餐厅播放着典型的秘鲁流行音乐录像带，不晓得秘鲁音乐是怎么回事的人还真幸运。进入秘鲁一定要带耳塞。在缺乏天分以及音

乐素养低这方面，没有其他国家可比拟。奥兹曾试着教我分辨各地区不同的曲风，但我根本不想学，因为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同一类型，全是狗屎。在山里，曾有个胖女人穿着花花绿绿的宽大洋装，两脚轮流跳着，看起来像被锁在公厕外。她对着廉价麦克风高声嘶吼，活像在生孩子。在丛林里，十五个丑男人和着完全相同的低俗合成乐，一遍又一遍刺耳地唱着略有不同的歌词。在秘鲁郊区，有发电机的地方就会有一台大箱型电视、一台廉价DVD播放器，音量全开，放着世上最糟的音乐。

我从绝望中跳回现实。我向乔提到，下一阶段必须再找一个向导。他沉思了一会儿。“我可以跟你走到阿塔拉亚，”他说，“不会太远，而且坦博河有些部分我也很熟。”

乔和我正好用了六天时间走完坦博河。他怀抱着勤奋工作的樵夫心态，我们有任务要完成，所以他不会捣乱。如果没有他这样的态度，我们很可能要走上两星期。

有条翻过山的路径可以从波多奥克帕到阿塔拉亚，但乔和我早就准备好回到河边了。我们如有必要才会远离河边，现在，我们希望尽可能贴近坦博河，穿过散布在河边的阿沙宁卡部落。

坦博河上游入口相当壮丽，两边都有丛林密布的高山，形成进入这条新河流的俊秀门户。河流因山势而呈S形，河道被迫转向东边，之后再往北流。坦博河标示着群山的终点。

很难描述乔和我看待彼此的方式。尽管他自信又聪慧，但我肯定，我们永远不会有一致的看法，因为彼此的信念大不相同。我认为，在找到能流利地说阿沙宁卡语的向导之前，乔很不错，他有些地方让我觉得不自在，但我说不上来。

不过，我的心情比前几个星期好了很多。阿普里马克河后段以及整段埃内河让我疲惫不堪，我觉得自己无法适应、不健康、没有活力，感到疲惫、苍老，几乎无法正常生活，但我现在放松许多，树木丛生的高耸山岳让我再次留意到所经之处的美丽景致。

8月21日，我们绕过一道凸出的河弯后，在河滨扎营。乔很不安，他注意到400米外有个当地人。当我在河里洗澡，从带着污渍的身上洗

去白天的脏污时，乔决定去和那人谈一谈。

乔回来时浑身颤抖，我从没见过他那样。“我们该走了，”他说，“如果在这里扎营，他们会杀了我们。”虽然很气愤于不能就这么爬进睡袋里，但我还是同意离开，以避过即将临头的杀身之祸。我们走进那个渔夫的风子里，得到了目前为止最冷淡的招呼。乔通常都很开心、健谈，这是他第一次保持沉默，因此，我率先开口，给他们看通行证，跟他们解释这次探险的事。在场的三名男子都带着猎枪，说我们必须由他们陪同到下游一个叫切尼（Cheni）的村落。

切尼在2000米外，我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身后还有枪口对着。我并没有因为这些挑衅而心烦意乱，还特意问他们的名字，表现得非常友善。最高大而且看起来最邪恶的男子不太甘愿地告诉我他叫维克托，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样很有趣。

维克托要我们在村外等着，他去和村长谈。没多久，一位戴着大学生样式的围巾和圆眼镜的修长男子走出来见我们，他用手巾擤了擤鼻子，说话时声音明显带着娘娘腔。

“你上周是不是住在萨蒂波的蓝旅馆？”他问道，脸上带着查尔斯·霍特里⁽²⁾（他在英国电影《非洲也疯狂》里饰演汤卡国王）般的笑容。

“什么？呃……对，呃……我在找向导。”我笑了起来。

“跟我来。”他带我们进他家里，要维克托和其他的彪形大汉离开。他解释道，他们虽然粗鲁，但在领土外围可以展示很高的防卫能力，这是件好事。

他说他叫法比安，并且开始指点我们。秘鲁人一旦出过国，就会与以前不一样。显然他受过教育，在西班牙待过，有些朋友在当地的大学。他现年二十八岁，是切尼的村长，他安排人为我们做炒蛋和鲜鱼。我们受到了上宾般的款待，他甚至让我睡在他的新水泥风子里一个有床铺的房间，虽然那张床没有床垫，但是有过被维克托用枪指着走在黑暗中的经历后，我们居然还能睡在床上，还能冲澡、好好吃一顿，实在令人惊奇。

如果说有个妄自尊大的未来秘鲁原住民领袖正在成长，我会说那人就是法比安，他知道自己村里的重要性，也乐在其中。他谈及莎士比亚和贝多芬，让我很难相信自己正身处偏远的秘鲁原住民部落。法比安的待客之道无懈可击，因此我们以药品回赠。

接下来的两个阿沙宁卡部落稍稍刁难了我们。在我们向波耶尼（Poyeni）部落攀爬时，有群脸上涂着染料的女人在高处河岸上大吼尖叫，我们甚至都不被允许进入那个部落解释来意。我们只好再爬下去，继续沿着河岸走——完全避开这个部落。

接着到了奎马利一加（Quemarija）部落，我们和乔的老朋友豪尔赫、他太太内莉以及他的小女儿碰了面。这对夫妇很亲切，但担心他们的小女儿——她的头和脚上有好几个脓疮。他们要我帮这个小女婴看一看。我说，虽然我给每个部落带去一些药，但我并不是医生。然而，他们还是渴望听到我的意见，因为这个部落没有医生，也无法取得药品。我给她的父亲四分之一剂量的阿莫西林，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抗生素，但我告诉他，用在宝宝身上之前，一定要先问问下一个村落的医生。

礼物对阿沙宁卡人来说很重要，在他们的语言中，“生意伙伴”和“朋友”是同一个词。药物尽管有潜在的危险，却是我能带给部落最珍贵的礼物。我试过送其他较平常的东西，像鱼钩、钓线、打火机和手电筒，但他们最珍视药物。多数部落都有一个受过基本用药训练的人，我通常把药直接给那个人。

傍晚五点左右，我们还在与豪尔赫和内莉聊天，这时号角声响起，村里召开会议。乔和我待在这对夫妇有茅草屋顶的房子里，拉起吊床准备睡觉。几分钟后，我们也被召到会议上，被村长狠狠地训了一顿。他戴着正式的羽毛头饰——我在之前的部落里从未见过——慷慨激昂地说部落有自主的权利。演说一结束，他立即要求我们离开。

我们满头雾水，收拾好行李，希望能在日暮前抵达下一个村落。我问乔哪里出错了——我们贡献了药品、出示了通行证，甚至有熟人在部落。

“他喝醉了。”乔说。

在一些“较文明”（殖民区秘鲁人这么说时没有一丝尴尬）的部落，受教育的阿沙宁卡孩子想学西班牙语，甚至想学英语；他们希望学会使用计算机、穿西服。我看得越多，就越不觉得有什么好惋惜的。在我看来，阿沙宁卡人的生活方式不但无法延续下去，也没有意义。不像他们过“打猎—采集”生活的祖先，现在这些住在部落的家庭终日围坐在一起喝酒，让彼此的妒心增长。接受教育后，他们的生产力会提高，他们也能再次自豪起来，也许到那时候，做丈夫的就不会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痛打太太。

我们走出狭窄的坦博山谷后，广袤平坦的丛林向四面八方展开，热带季节干旱林已经被抛在我们身后。我们进入生物更为多样的热带雨林，这意味着，这里有种类更多的动植物，我们所熟知的亚马孙盆地即将展现在我们眼前。惊人的是，从这里到亚马孙河口只用再下降380米——由此开始约5268千米（3274英里）的距离。

乔和我仔细地研究地图，看着到北方下一个丛林城市普卡尔帕（Pucallpa）之前那一大片毫无特色的绿。我原本打算花一个月走这段路，但在研究过那广袤的平坦雨林、巨大的河湾、散布的牛轭湖后，发现沿途也没什么部落（亦即没有小径），对于到底要走多久我们毫无头绪。几个月来，我头一次感受到兴奋之情，乔热爱这种纯粹的冒险，最后他还是告诉我，他不回家了，他要和我继续走到他的出生地普卡尔帕。

在阿塔拉亚，我发现所有留在利马的备用探险装备都被卢克带回家了。我姑且相信：也许他认为我宁可把备用药物和滤水器都放在英国。但这表示，我必须在秘鲁从头采办一切。由于在阿塔拉亚买不到碘也买不到氯，乔和我在走到普卡尔帕的两个月路程中，都无法净化冷水来喝。我和卢克在这段期间激烈的电子邮件交流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联络。

从阿塔拉亚往北，所有的部落开始被称为亚歇宁卡（Asheninka，第四个字母是e），而非阿沙宁卡（Ashaninka，第四个字母是a）。同样地，对外行人来说，这些原住民村落看起来都很相似，不过，埃内河的阿沙宁卡人围坐在地上的芦苇垫上喝着紫色的玛沙托，而乌卡亚利河的亚歇宁卡人则是围坐在架高的木制楼（有些还有木制墙壁和隔间）里喝白色的玛沙托。颜色的差别只因为乌卡亚利河没有埃内河所

咀嚼的紫色颜料。而原住民穿的一件式宽松外衣（库斯玛）也越来越少见，我们越来越多地见到亚歇宁卡人穿短裤和T恤，只有少数长者穿传统服饰。红色脸部彩绘在男人和女人身上仍然很常见。9月5日，我们待在密拉维士塔（Villa Vista）一对年轻夫妇的家里。他们有一半的亚歇宁卡人血统，另一半是秘鲁人和殖民开拓者所生的后代混合血统。他们给我们吃咖哩鱼和一种叫查波（chapo）的甜香蕉饮料（比可怕的玛沙托好喝多了）。他们养了一群狗和一头大肥猪，我们隔天早上离开部落时，那头猪陪着这家的主人曼纽尔和我们走了几里路。

因为不知道当地的小路，我们这次大多数时间走在河岸上，此外我们也认为沿着河岸走比较不扰人，因此，我们行进得很慢。有些河岸既杂乱又陡，有些则有连绵不断的缠人杂草绊住我们。蚊子大军出没，我小腿上的“红豆冰”比白肉还多。

两天后，我们在早上抵达一个叫圣卢兹（Santa Luz）的部落，并无意停留。那里的人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原住民管理机构阿塔拉亚地区原住民组织（Organization Indigena Regional de Atalaya, OIRA）发的通行证，但建议我们待到下午三点（高频无线电时间）和下一个部落宾西维尼亚（Pensilvania）通话，他们还愿意代表我们和对方通话。

那天村里有个集体劳动，这是有效集合所有人免费劳动的方式，发起人最后要提供食物和饮酒作为村民工作的报酬。我和乔接受了邀请，加入他们，从上午到午后和村民一起工作，清除矮树丛以开辟新的稻田。之后，我们吃到了好久以来最棒的一餐，有鸡肉、米饭、大蕉、丝兰和豆子。

到了三点，我们和村长一起通过无线电与宾西维尼亚通话。对方的回复非常清楚，如果有英国佬进入他们的部落，格杀勿论，这是我亲耳听到的。

听到这回复，我很难过，我多么希望他们不再有敌意。这无可避免地让我们有点担心。乔想出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在圣卢兹待一夜，早上前往河边，用充气筏横渡到一座大砾石岛上。我们可以在那里走，避免经过宾西维尼亚。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圣卢兹的一栋房子里，耐心地等着村长调他珍贵的无线收音机频率，当他终于收到一些模糊难辨的音乐时，我问他这些信号是从哪儿传来的。

“中国。”他面不改色地说。

第二天，乔和我在滂沱大雨中出发。下到河里时，我们穿着T恤的身体在颤抖。我们将筏子充好气，在灰色的薄雾中往砾石岛出发。上了岛，天气放晴，我们决定不把气放掉，将充气筏夹在腋下或顶在头上。强风阵阵吹着。走到岛的尽头，我们把充气筏丢进水里，接着将背包放进去，这时乔朝我身后点了点头。

“埃德，小心背后。”

前言中叙述的场景上演了。我转头看到至少五只独木舟朝我们而来，全是武装好的亚歇宁卡人。许多男人站在狭窄的船上，不是拿猎枪就是拿弓箭，女性则持大砍刀。船一靠岸，男男女女便拥到岛上，愤怒地逼近我们。

关于我的反应，日记里写得比我的记忆还清楚。“又来了”是我脑海里的真实想法。我有点被这些要来杀我、不懂得体贴的印第安人惹火了，难道他们不晓得我们在赶时间吗？

我的脑海中一定有应对的方式，我也知道情况的严重性，但这种冷漠的态度似乎是我应付高压时的自然反应。我缓慢、镇定地通过合乎常理的方式，让这些族人冷静下来。我并没有勉强挤出笑容，因为这可能会被误解成对亚歇宁卡人严肃以对的事情的侮辱。我出示原住民组织给的通行证，看得出来，那位首领因为太过激动而无法读信——他的眼睛根本没有注意到这纸文件（我后来才知道他会读西班牙文）。乔和我都认为，如果我们冷静、给予帮助而且不具威胁性，这些人也会有相对的反应。

我以为是首领的那个人愤怒地说着连珠炮的话，激动地比手画脚，下令把我们带回部落。被弓箭指着，我们上了充气筏，努力地跟上领头的独木舟，但充气筏无法像独木舟那样乘风破浪，我们一不注意就会往下游漂，必须用尽全力才能跟上队伍。抵达象征部落入口的泥岸时，我们累得全身发抖。

全程在猎枪和弓箭的押送下，我们进入村子中央的茅草屋顶小屋，接受真的村长的训斥。当时他并没有出现在岛上。

村长瘦小结实，大大的头上有双铜铃般的大眼，当时我觉得那双眼充满邪气。在全村人的环视下，他咆哮着说，我们没有获得允许就想通行是对村子的侮辱，他们是自治部落，有自己的法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他这样斥责我们。

大约就在此时，他提到了部落的名字——新波索（Nuevo Poso）——我才察觉我们不是在宾西维尼亚，这不是之前威胁要杀我们的那群人。

他们下令要我们清空背包，并且让我们解释每一项装备的用途。现在这已是我熟悉的惯例了，我慢慢地拿出每一样东西，详细说明其用途。由于对我们背的东西着了迷，再加上整件事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看起来已经冷静下来。最后，我们鼓起勇气问他们要吃的，因为我们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他们允许我们去问一位正在烤大蕉的女人，问她我们能否向她买食物。她还有一些巧克力饼干，我们像动物一样，三两下就补充了能量。这是我和乔头一次能单独说话，我们都承认情况一度危急，但后来乔坚称，他从不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我认为，他根深蒂固的南美洲男子气概也许和他的认知有关。我深信，如果我们是入侵者，这些村民是会带着战斗意图下水的，准备捍卫领土。如果考虑到他们中多数人曾和恐怖分子激烈奋战过，杀过人，那么事情不会像一开始看上去的那样离谱。

我很高兴那天没有携带武器；在整个行程中，很多人都说我们穿越丛林却连把猎枪都不带简直是疯了。我们推想着，如果只带一个背包进入部落就已让当地人受到惊吓且对我们怀有敌意，那么带把枪会遭遇什么反应？我们必须尽可能看起来不具侵略性，所以，枪支完全不被列入考虑范围。

人们带着弓箭的另一个理由是为了打猎，但我们有禁猎条款，因此，最初携带武器的理由也被排除了。我们知道，看到成群的野猪时，我们可以用呼喊或尖叫吓走它们；美洲豹的威胁到底是否真实存在，我们和当地人的看法也大不相同。总之，我们更乐于不带武器。

村民知道他们最终不得不让我们走，因此当我们返回时，他们说会写一张临时通行证，够我们到达下游的下个城镇，但我们必须搭充气筏，脚不能踏上陆地。

我向他们解释，我们不能用筏子，必须步行，因为这是此次探险的意义所在。这让我觉得自己很蠢，但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得到了正面的回复。我们可以继续步行，但必须雇用村长和他的弟弟当向导，并且和他们一起回阿塔拉亚取得下一份通行证。这次要去警察局。

2008年9月7日日记，新波索：

我过得不开心，要不是承诺了要进行这次探险，我会立即回家。今天被亚歇宁卡人拦下来之前，我们勉强走了1000米。

这群人是坏人，尽管我觉得简单地将人分类很可笑，但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从他们的眼里，我看得出他们不了解我们，或者不想去了解。

我们被押送回村庄，一路上至少有四把枪或四支箭指着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冷酷的表情，女人用亚歇宁卡语惊恐地呼喊，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结果这个部落根本不理睬管理亚歇宁卡人的组织（阿塔拉亚地区原住民组织），他们不信任原住民组织，因此这张通行证没有分量。

到头来，村长说，他可以和我们一起到阿塔拉亚从警察那里取得通行证，并且和我们一起到博洛涅斯（Bolognesi）……我怀疑他知道自己可以从我们身上弄到钱，他们不是我会挑选的同行者，但看来我只有这样才能继续走。

第二天早上，我们全都挤进一艘附挂5马力发动机的独木舟，轧轧地回到上游。在船上待了一整天，我们屁股僵硬地抵达阿塔拉亚。我提议请所有人——那是一大群从新波索来的亚歇宁卡随从——外出吃晚餐，我们去吃中国菜（这是我在秘鲁第一次吃中国菜），这些人看来非常高兴。隔天，我们和村长兄弟到警察局。因为他们是当地人，我以为其中一人会向警方解释事情的经过，以及我们的来意，但他们

紧张地空等着，不发一语。看到这两人出了他们的势力范围来到殖民镇上后表现得如此不同，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见鬼了，那我来吧。”我这么想着，开始向警察解释，我是个作家，想从乌卡亚利河徒步旅游到普卡尔帕，希望他能帮我写一封信，说明他同意我这么做。他记下细节，几分钟后，我们就拿到了信，完全没被问到我的动机或交通工具。我们得到了许可，这对亚歇宁卡兄弟非常高兴，现在他们可以和我们同行。

隔天回到部落，这两兄弟立刻如鱼得水，他们召集村民会议，宣布从阿塔拉亚凯旋。他们骄傲地告诉村民，多亏他们的协助，我现在有了待在这里的合法许可，我们要公开讨论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薪水。

太好了！

考虑到亚歇宁卡人的语言中其实并没有数字，我觉得我也许可以在讨价还价中哄过他们。西班牙人抵达这里之前，他们只有三个字词代表数量：“没有”“一”和“很多”。而我中考时的数学成绩很优秀，还了解二次方程式，我想，我应该会占上风。

我付给乔一天25新索尔，打算也给他们这个数目。

“你要付我们多少钱？”他们问道，群众安静下来等着我回答。

“我通常一天付15新索尔，”我说，“但是，你是村长，而你是村长的弟弟，所以我想应该多付一点，我给你们每天20新索尔！”

“不能接受，”村长说，“我们是东戈兄弟，一天低于25新索尔，我们不会离开家人。”

“就这么办。”我站起来和他们握手成交，双方皆大欢喜。这对开心的兄弟叫阿方索·东戈和安德烈亚斯·东戈，都会说基本的西班牙语（对我来说很棒了，尽管乔说他们只会基本的）。我们四人团队要挑战乌卡亚利河。

我的西班牙语水平足以听懂会议上30%的内容，在这个会议上，大家相互交谈，没有直接对我说话，我感觉有点雾蒙蒙的，无法随时看

清事情的全貌。一知半解让我觉得自己仿佛被一层薄雾围绕着，觉得所有的事情更像梦境。现阶段我只能直白地问，听懂浅白的回答。

第二天，我们首先要通过的村庄是宾西维尼亚。

“我们怎么获许通行？”我问那对兄弟，“他们曾说要杀了我。”

“他们已经同意你通行。”村长安德烈亚斯说。他解释道，在我们回阿塔拉亚向警察申请通行证时，宾西维尼亚的村长也在那里，他们一起喝了啤酒——安德烈亚斯已经开始赚取他每天的25新索尔了。

不夸张地说，这对亚歇宁卡兄弟棒极了。他们很高兴能离开部落，他们不仅能探索丛林，还能到以前鲜少拜访的其他亚歇宁卡部落，这趟行程变成了东戈兄弟之旅，而我们能轻易地进入多数部落。

“这位是埃德华多（Eduardo）先生，是我们从英国来的好朋友，也是位知名作家。”他们会这么说，会很真诚很高兴地介绍我。

我们在部落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但他们急切地提醒我，没有他们，这段旅程不可能完成。当我逗弄他们，问我和乔独行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时，他们就会上演一出哑剧：要么比出割喉的动作，要么是箭从我的后脑勺射进来，我的脑浆爆裂，溅洒在最近的树上这样的情节。他们认为这样很有趣。

我毫不怀疑这些人很危险。他们想要对抗外人，保护领土，因此一直处于警觉状态；我们要是态度不对的话，是不可能获准通行的。

然而还是有些部落对我完全封杀。

我从不知道不让我们通过的确切理由，但很多和我们谈过话的人都认为外国佬吃婴儿。你如果将这类传闻和真实的入侵者（如伐木工、古柯叶农以及石油公司）结合来看，就会发现，有些部落不愿意让任何外国佬踏上领土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吃婴儿的传闻很荒谬，但也许有其原因。遇到这种状况时，我们就被迫原路返回，横渡到河的另一边，希望对岸的部落较为开明、宽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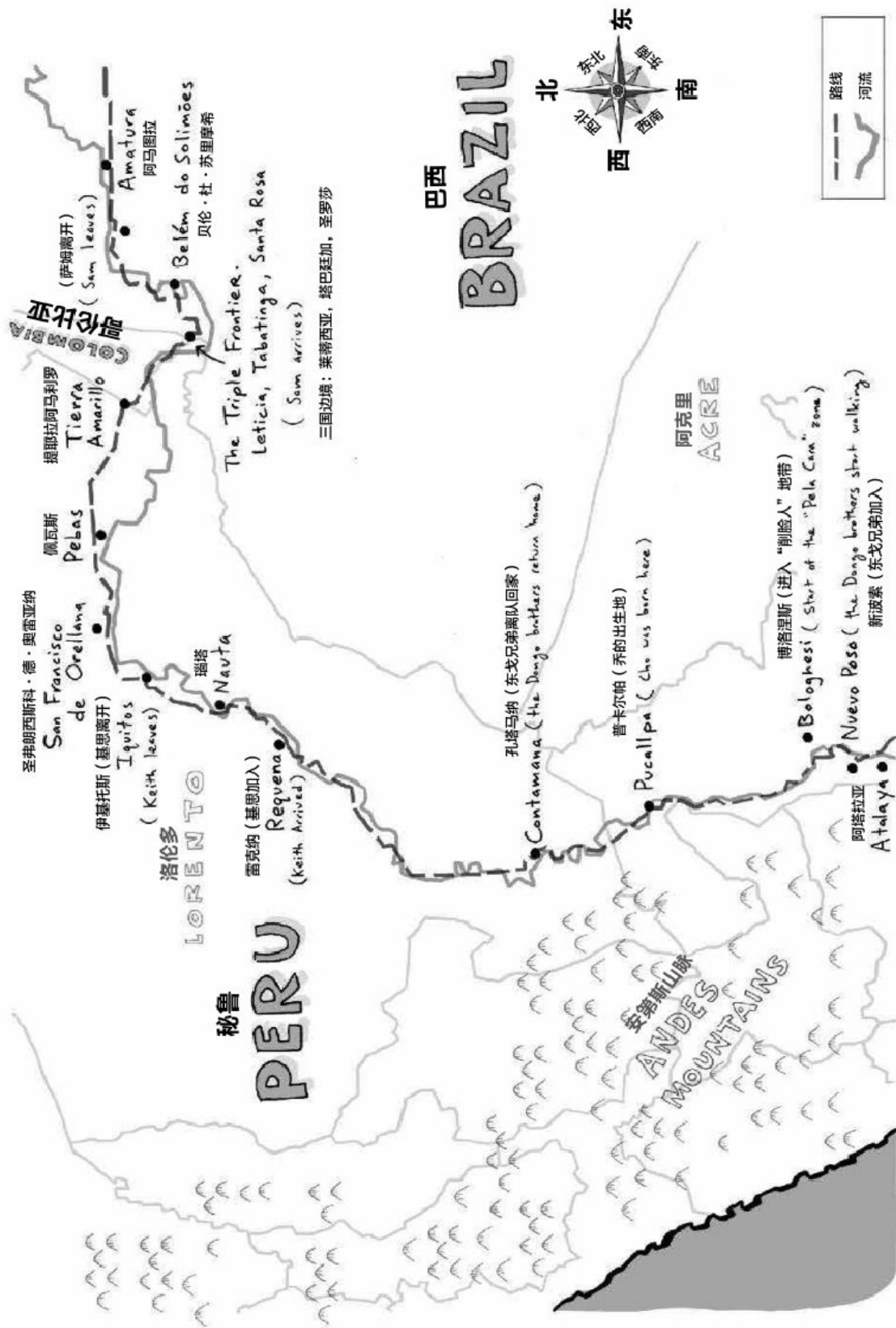
目前让我们心烦意乱的是“白斗篷”，这是指成群的沙蝇和蚊子。我们只要靠近水边（这是经常发生的），就会被它们团团包围。我们很难计算出每一次有多少咬人的蚊虫围绕在我们身边叮咬，但它们一定数以万计而非以百计。

“当湿季来临时，情况会更严重。”乔兴高采烈地说道，“到时候就真的很恼人了。”

(1) 译注：Sandhurst，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所在地。

(2) 译注：Charles Hawtrey，1914—1988年，英国喜剧演员。

Part 3
到哥伦比亚的黑暗行程



“看好你的英国佬，否则砍掉他的脑袋”

随着我们向前推进，我的一些想法变得越来越黑暗，误解越来越深，性格开始发生变化。这是从让人满身大汗的丛林小镇博洛涅斯南边开始的。

“Pela cara!” 有人在一辆满载的货车的车顶上对我大吼，当时乔、东戈兄弟和我正走在通往那个小镇的伐木路上。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他 / 它削脸”或“削脸人”，因此，我以为这只是人们对我的诸多侮辱之一，他们因为我在本地与众不同而对我大吼。也许我晒得有点黑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在镇上又听到过几次相同的辱骂，还伴随着窃笑。我问乔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回答很模糊（因为他也没听过这个词），因此我以为这里的人在开玩笑，要剥下我的脸皮。

这条河有500米宽，我们只有两只充气筏，但要载四个人，这意味着，把人送过去之后，必须再回头接其他人，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根本难以为继。方法其实很简单，但我们花了几天才想出来：每只筏子必须坐两个人和背包，其中一人划船，另一人要找话题聊，并且尽可能保持不动，重心越低越好。

公认最瘦小的安德烈亚斯在我的筏子上，我们总重约27英石⁽¹⁾。我们的筏子不稳，是因为我们无法压低重心，导致头重脚轻，老是要翻船。在一片高低不平的河滩上待了一晚后，我们将充气筏充好气，两两挤进一只充气筏里，小心地划到对岸一个叫“十月九日（Nueve de Octubre）”的部落。抵达时，我们看到所有人都面带微笑，他们都在笑四个大男人怎么挤进两只小玩具船里。我们之前用高频无线电与他们打过招呼，因此这个席皮波（Shipebo）部落已经在等我们。

席皮波部落是第一个看起来不一样的原住民部落。妇女留着乌黑的长发和清一色的朴素刘海儿，她们都穿着宽松的蓝色短衫，让我想到克丘亚山区居民在殖民统治下出现的服饰，而非阿沙宁卡人、亚歇宁卡人及马奇根加人的简单库斯玛。至于男人，毫无例外都穿着短裤和T恤。

我在部落商店买了木薯粉（丝兰做成的颗粒状糖类食物）和糖。我很放松，提及来到这么友善的部落真是太好了。那位席皮波妇女说，当他们通过无线电听到我要来后，最初的反应是“杀了那个‘削脸人’！”，但得知我的目的后，他们同意让我通行，我因此得到了通行证。

“什么？！”我请她解释“削脸人”的意思，她告诉我，最近这区域发生了器官走私案件，还发现过少了器官的尸体。

“罪犯是美国人——像你这样的外国佬。人们听到你要来很害怕。”

我不太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有太多人想对我娓娓道来，但接下来的事让一切真相大白。

我们离开这个直线形的村庄——小路连接起一排较为孤立的房舍，里面住的全都是席皮波家庭。我们踏入其中一户人家，我露出一贯热情的笑容向他们挥手（表示我是个没有威胁性的好人），但屋主没有回应我。他看着我，吓呆了。

那人问走在前面的向导阿方索：“他是不是偷这个？”他说“这个”的时候，用食指比画着自己的脸，他仍然惊恐地看着我。

阿方索和安德烈亚斯笑出声，向他解释我只是游客，但那人没有跟着一起笑。

我们继续向前，在下一户人家里，女主人喝玛沙托稍微喝多了，差不多醉了，立即对我大吼，因为她听说“削脸人”要来带走她的小孩。

我的向导再次向她保证，用当地方言说明我此行的动机，但因为她醉了，不能理解也无法冷静下来，我们只好快快离开。

这里有许多人认为外国佬偷他们的小孩，杀人取器官。我不知道这种非法走私行为的起因有几分真实性，但也无关紧要，因为席皮波人相信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多次受到警告，如果入夜后被原住民发现，那么他们会不由分说地干掉我。因此，我们仔细安排路线，理智地规避风险，确保每天结束时一定能到达一个部落。

我很难不受影响，乔、阿方索和安德烈亚斯很高兴地进了部落，但他们不是注目的焦点，我才是。此外，眼下我还受限于自己的西班牙语水平，那对亚歇宁卡兄弟当然以亚歇宁卡语交谈，席皮波人则讲席皮波语。虽然向导让我的行程得以继续，但理解上的缺乏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将我推入了自己的哀伤世界。我讨厌他们怕我。此外，每次进入一个部落，在他们放下戒心接受我之前，我都要力证自己是好人，这也让我心力交瘁。我们从未在同一个地方待过一晚以上，这意味着我每个晚上都要一再重复所有的苦差事，因为这条河边上满是偏远部落。但是待在部落外面更危险，会被认为是在躲藏，会带给这些防卫心很强的部落更多不必要的猜疑。所有事情都变得令我越发难以忍受，每天早上穿上湿衣服成了一种心理障碍，步行变得更吃力，一切都索然无味。对于我们穿过的丛林，我视而不见，我也尝不出鱼汤是否太淡或鼠肉是否太韧。我当时一定很忧郁，然而内心深处还是有个声音跟我说：“你还走得动吗？”“可以？”“那一切就没问题。”

为了长远的目标，我完全认为娱乐是次要的。我以一种不合乎人性的方式生活，每天早早上床，也不和向导们聊天，我不再更新博客——除非遇上特别自信的日子——害怕外界看到我现在的模样。在录制博客视频时，我会试图隐藏真正的忧郁，我像个紧张的青少年，眼睛盯着地面。我无法给家人或朋友打电话，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再对此行有所展望，我无法面对他们平常的样子或幽默。我非常痛苦，许多夜里在吊床上默默哭泣，任泪水自怜地滑落脸颊。

在不幸的海平面上，我还是瞥见了一个拥有幽默、美和善的世界。乔想学一些基础的英语，在辛苦的一天结束后，他会对我说：“我们去洗澡吧！”这只是琐事，却能让我微笑。亚歇宁卡兄弟也看出我在挣扎；安德烈亚斯（现在是我的充气筏搭档）在我们面对面坐在像澡盆一样的船里独处时，会看着我的眼睛，问我“还好吧”。现在，他的表情和善，独特的举止也能让我微笑，他会努努嘴来表明他要说的话。我们因为在湍急的河里相互扶持，现在产生了紧密的连接。

2008年9月11日，我们抵达迪欧班巴（Diobamba），那是一个亚歇宁卡部落。安德烈亚斯和阿方索的叔叔住在那里。就在抵达前的半小时，阿方索还捡到了一只乌龟，把它当礼物送给了部落。基于这两个理由，我们受到了比往常还热烈的欢迎。我们待的那户人家，一家之主是个二十四岁的单亲妈妈，她先生过世了。以亚歇宁卡人来说，她长得很高而且健美，有着和“花蝴蝶”格里菲斯·乔伊娜（Griffith-Joyner）一样优美的女性线条，更明显的是，她非常自信，直视我的双眼，笑得很狂野。东戈兄弟嘲弄我，说她想要我做她的丈夫。从她的态度看来，他们不是信口胡诌，一股没预料到的振奋和温暖在我体内升起。在自我怀疑的脆弱时刻，这种殷勤让我措手不及，我还不够镇定，无法做出任何表示，只能在她给我们食物、饮料以及热情招待的时候微笑道谢。她是我见过的笑得最爽朗的女性，我内心深处有个开关“啪嗒”启动了，我开始爬回有生气的世界。

那只我本来以为会成为宠物的乌龟，像豆子罐头一样被砍刀开肠破肚了。他们从壳开始剥，给龟壳刷上盐用火烤，让我们当作前菜吃一点。女主人炖了一锅乌龟肉，还上了一大盘狢狢肉让我们大快朵颐，我可以感觉到身心都恢复了力量。

尽管得到了这么热情的招待，但我的心理严重扭曲，不是光凭这件事就能疗愈的。在吊床上，我记得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了东戈兄弟的对话，确定他们是在谋划杀我，亚歇宁卡语里有个词和西班牙语的“杀”听起来很像，部分的我知道这是被害妄想症所致，但另一部分的我无力掌控，无法阻止自己在吊床上胡思乱想。

沿着河岸走，意味着我们每天必须多次渡河。可行走的河岸随着河湾在两岸间交替。由于水位很低，这么做还是比在林间茂密的矮树

丛里劈出一条路径来得快。

在这些每天必须多次渡河的日子里，东戈兄弟头一次同搭一只充气筏时发现，如果不那么努力划，河水会带他们去下游，我们就不用走那么多路了。他们的想法可以理解，那天，乔和我无法阻止他们一再这么做；问题是，我承诺要步行走完全程，而阿方索和安德烈亚斯每次渡河就往下游多漂500米。因为我们必须一起行动，所以，乔和我也借由水流加快了进度。

看得出来，彼此对于这一点都焦躁不安。我们要的是徒步亚马孙，没有人想投机取巧。

“乔，必须告诉他们，从这里开始，绝不能再让河水带我们去下游。如果再这样做，我们就必须走回渡河处的对岸。”

“不只这样，”乔回道，“我们要往回走，今天重来一次。”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乔对这次探险的承诺之坚，他的价值观判定今天不算数。我们相视而笑、握手，并计划好，到了下个部落，我们要租艘船回头，重新走这一段。

这给我上了一课，烦扰我一整天的疑虑或罪恶感被做对的事的纯净感战胜了。尽管这会导致进度落后一天，但我们问心无愧。随着周数不断推进，这将成为我所依循的本能反应。这辈子，我第一次学会如何依照感觉的对或不对来行事。

我们从博洛涅斯花大价钱租了一艘船，将那段路重新走了一遍。一旦了解了我们意欲何在，东戈兄弟也就完全接受了这个观念。

因为我们打算在傍晚返回博洛涅斯，于是，我们将所有装备存放在那里，只带了最少的行装：几瓶水和全球定位系统。但这段河比预期中的还长，夜色开始降临，我们只好在河岸扎营。岸边有个人在钓鱼，他借给阿方索鱼钩和钓线。在面对晚餐可能没有着落的情况下，阿方索钓上一条又一条鱼，展现了惊人的钓鱼技巧。我们和那位渔夫分享捕鱼的收获，他则让我们用他的火煮食，还给我们一些很有嚼劲的乌龟肉。天气渐渐转凉，乔找到一小块用1米×2米大小的塑料布搭

成临时遮蔽处，我们像军人一样排成一列躺在下面。从膝盖到胸部能被棚顶遮盖，我们祈祷有个温暖干燥的夜晚。

晚上十点，风势转强，到了十一点，令人不安的雨开始滴滴答答地打在覆盖头顶的塑料布上。随着风雨渐强，我们缩起膝盖坐成一排，强劲的雨水平地打在我们身上，我们全都湿到了骨子里。睡觉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只好一起坐在黑暗中，颤抖地等待黎明。雨在凌晨渐歇，我们得以小睡一会儿。为了让湿衣服变暖，我们尽可能一动不动地躺着。

从这时开始，我们有了条铁律：如果以充气筏或其他船只渡河，我们必须走向与上船处的水平面垂直的地方。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视作借助水流前进。

一般人会认为丛林的危险来自美洲豹、蛇和电鳗，但其实是昆虫让我快发狂了。我们经常会穿过隐藏在树叶底下的黄蜂窝，只要听到有人喊“黄蜂”，我们就会四处逃散，躲进矮树丛以减少被叮咬的次数。经过草木时，我学会尽可能地轻手轻脚，因为小蚂蚁会爬上我的手臂叮咬，留下小小的潮湿的伤口。

2008年9月20日日记：

我们的处境一团糟。我们没有抵达目标部落，没有水，所以没吃没喝没洗澡。蚊子是我遇过的最糟的东西，我一爬上吊床，就有三十只蚊子飞进蚊帐。我觉得它们全被我打死了，但接着又会见到一只。

我知道它们在咬我，因为每次一打蚊子，它们就会喷溅出鲜红的血。但我没有起反应（对叮咬没有出现反应），也许我和当地人一样，产生了抵抗力。蚊帐外有上百万只蚊子。上百万只！

今天真是糟透了，向导们在猜我们的方向，我什么都不清楚，没有路。

凌晨四点三十分，补记：

我刚起床尿尿，往下看我的肚子，发现起码有四十只蚊子在吸我的血。我用手拍赶，肚皮上留下一大道血痕。

现在睡觉也成了问题，尽管每天几乎都有十二个小时黑漆漆地躺在吊床上，但其中有好几个小时我会担心如何进展到下一阶段。一开始我服用抗组胺药帮助睡眠，但接下来，我要服用安定、曲马多甚至吗啡才能有足够的睡眠以继续前进。我收到了前女友克罗伊的电子邮件，她简单地问我是不是在吃药。她很了解我，可以根据博客看出我头脑不清醒。她猜得没错，但不吃药我更难忍受，我依旧无法停止脑中奔腾的思绪，在绝望中看着太阳升起。

第二天早上，乔又是最后一个整好行装的，他还没掌握快速整装的方法。因此，我们三个准备好后还要等他二十分钟，这已成了惯例。我们终于上路后，我用恶毒的言语攻击乔，他的反应是递给我一瓶新鲜的雨水，那是他机灵地在晚上收集的。我大口灌下昨晚到现在的第一口水时，因自己对他恶声恶气而感到内疚：他收集的雨水够那两兄弟和他自己每人喝一升，我多等二十分钟又怎样呢？

很难解释我为何没有领路。过去几个星期，我们一直沿着河道行进，因此不太需要领路人。此外，我以为东戈兄弟善于在丛林里行走，因此我没有操心，只是跟着他们走。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感觉我们并非一直在同一个方向上，因此，我开始至少用罗盘确认方位。

我们向北走了半小时，接下来的半小时又转向南，此时还不确定这是否在他们的计划之中，因此我只观察他们。最后一切真相大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我开始跟他们谈，指出我们理论上应该走的方向，让他们知道河在左手边。我很讶异，他们真的迷失了方向。我后来发现，过去两天乌云罩日，他们因而无法用太阳定向。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罗盘。从那时起，我要确保他们走在大致方向上；在探险的头一年，方向是往北。

这也让我在导航上多花了点心思，我身边现在有个坚强的团队，我再没有借口打马虎眼。我必须掌握状况，并且随时清楚我们和河的相对位置，一旦出事了才好撤退。我开始明白，当向导坚定地告诉我“部落就在那个方向”时，这只是他们的最佳猜测而非事实，因此我还是得一直确认方位。

这的确有助于我再次振作起来，因为身为团队中唯一一位不用靠太阳定向的人，我是掌握进度的关键。

各位探险家、冒险王或登山客可能会很讶异，我怎么到这个阶段才开始留意导航的问题。为了减轻罪恶感，我只能说，这次步行现在已经变成一种生存挑战而非探险了，我们只是松散地沿着河走着。现在我的展望和处理许多事情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我把心思全放在安全问题或财务问题上了。

在秘鲁境内的亚马孙河岸，草木丛生的区域受到河流的严重影响，可能非常险恶。树冠低矮，只残留一些老树，树与树之间充满荆棘和刺藤；不带大砍刀劈出通道，我们根本无法通行。森林地表就像半干涸的湖底，露出的根部和藤蔓在厚厚的泥巴里纠结交错。当地人可以像豹一样轻松地在狭缝中快速通行，而我笨重的背包却老是和植物悬垂的枝节纠缠在一起。把它们扯下后，尘土和蚂蚁掉到我满是污垢的颈子上，我落在队伍的最后，感到越来越沮丧。

待在亚歇宁卡部落比待在席皮波部落舒服，因为席皮波人较认真地看待“削脸人”的传闻，所以那里的气氛可能冷淡又诡异。相反，亚歇宁卡人会以我们到访为由，举办和东戈兄弟重聚的派对（东戈兄弟可能认识当中一些人），他们会整晚开心地畅饮自制的甘蔗朗姆酒。

然而读我当时的日记，可以看出，我并未感到十分自在。

2008年9月26日日记，塞尔瓦（Selva）：

我已经厌倦了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那些笑话要么是我听不懂的，要么就是根本不好笑。我可能只是太累了，但这些笑话有一半是说我走路多么逊，另一半则是说要杀了我。

“看好你的英国佬，”他们会这么跟乔说，“否则砍掉他的脑袋。”

乔大笑，东戈兄弟也笑，整个部落跟着笑，大家都在笑，除了我。此刻，除了吃和保持洗澡后的清爽，我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

我真希望自己的西班牙语能再好一点，每个晚上我都累得没有力气学习，或者无法集中精力去理解那些话。因此，我让自己对这些噪声充耳不闻，不花心思去翻译它们，结果，我能听懂的就越来越少。

有一段时间，我不断质疑，我的徒步之旅是否太过自私，是否不必要地打扰了当地人，能否避免出现忧虑情绪，我是否认真思考过自己对这些人造成的影响。

这个区域的亚马孙河原住民渴望进步，他们想要电、手电筒、卫星电视和手机，无一例外。我走过的部落在未来二十年间将改头换面。它们并不是与世隔绝的部落，而是贫穷的村落；八卦和谣言也造成了无知和不必要的恐惧。

因此我的结论是，无论他们一开始是否感到不快，这次旅程都有其正面意义。这些部落虽然必须随时保持警觉以保护他们的土地，但对外面的世界无知绝不是好事。尽管我欣赏此地原住民自我防卫的精神，但并非所有的白人都是一个样。如果他们遇上一个不想偷土地、木材、小孩或器官的外国佬，那么这是件好事；如果他们遇上一个傻傻地微笑挥手，还在当地商店买木薯粉和糖的外国佬，那么这也是件好事。

我的进度又落后了，我现在预计这次探险需耗时两年。到达丛林大城普卡尔帕将标志着我的旅程完成了四分之一，那也是我数月以来梦想到达的地标。9月28日，我们已经走了六个月又两天，但还要三天才会抵达普卡尔帕。英国记者马克·巴洛克里夫（Mark Barrowcliffe）预计来和我们同行，他帮《卫报》写报道。由于马克不会说西班牙语，他会和马莱内一起从利马过来。我必须先搭船去和他会合，一接到他，我们就会全部坐船折返，从中断的地方开始走。

这次经验对我有益。待在河上，我能看到20米外的东西。想到夜晚能睡在床上，我更是觉得自己如入天堂。我极度渴望找间冷气房，多那么几分舒适都能让我一夜好眠，但是身边跟着亚歇宁卡兄弟和乔，我负担不起。

再次见到马莱内真是太好了。她是个可爱的女子，不太像典型的秘鲁人，非常另类，笑起来和骂脏话的时候都像个军人。我觉得马克一开始有点紧张，我对于他的加入也同样担忧。我想我们都注意到了

彼此的不安，他刚到没多久，我就告诉他那些关于“削脸人”的威胁和我经历的悲惨时光。

马克有妻子和一个小女娃，因此，他认真考虑和我一起步行通过此地是否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他指出，走这段路的后果必须自负，这些部落的行为无法预料，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么做其实帮助不大。

马莱内很有胆识，要和我们一起走。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她努力地在湿滑的蜿蜒小径上走了一天，几乎整天的处境都很艰难，之后，她搭船离开了。

马克和我们走了三天，到最后很高兴他可以离开了。对他而言，丛林探险是个严峻的考验，我则很高兴有个英国人和我讨论体育、学校、电视和所有的英国事物。我们截然不同，但享受彼此的陪伴。马克让我发现自己走了多远。当他在丛林踏出第一步时，我看起来完全像个专业人士。我照顾了他三天，忘了担心自己，这正是我需要的。我意识到，我这时候对脚下的探险已经很娴熟了。通过马克的眼睛看丛林，我了解到，跟他比起来，我在树丛里多么舒适自在。

在最后一天，马克看着汹涌的河水笑道：“我一度以为要横渡这条河！”我笑了，他立即明白我们真的要渡河。我们相互扶持，脸朝着上游，缓缓地渡河；凶猛的水势几乎要冲退我们。

我不认为马克觉得自在，他似乎对这里的人和丛林很紧张，在此异地，我同情他。我们握手道别时，马克感谢我，我则希望他享受了一段愉快的经历。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他对我的心理帮助有多大，我多么感谢他的来访。乔和我现在有了新裤子，因为马克从户外衣物供货商那儿免费得到的物资都不要了。我们同马克挥手道别，看起来就像一对精力充沛的童子军士兵。

接送马克时雇的船、旅馆住宿、马莱内的飞机票，再加上城市较贵的饮食，让我们在短短几天内就花了近1000英镑。因此，我们步行到普卡尔帕时便快速通过了，没有留恋。我们必须去花费较少的地方。行进时，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的装备，以及部分的团队装备：锅、船、计算机、卫星电话、EPIRB（紧急无线电示位标）、摄像机、录像带以及电池等。我以我认为公平的方式分配在每个人身上。安德烈亚

斯和阿方索说，他们会再与我们一起走七至十天，到孔塔马纳镇（Contamana）后，从那里打道回府。

10月20日，我们看到前方有个亮红色和黄色的东西，以为到了伐木营地，靠近时才发现那些颜色其实是停在直升机场上的两架直升机。那个营地太过气派，不可能属于伐木工人。我们划船过河，来到伐木营地，在充气筏上向他们微笑挥手。营地工人看起来是外国人，可能是阿根廷人。看到两只橡皮艇上有一个英国人、一个秘鲁黑人和两个亚歇宁卡印第安人向他们挥手，他们都相当困惑。

营地的法国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他解释道，他们是来做地震研究的，想找石油，但没找到，营地在今后几个星期就要拆掉。我试着捞出我在学校七年学的法语，但连“午安”都忘了怎么说，因此我们以西班牙语交谈。这位法国人很友善，但对我们没什么兴趣，他说我们可以待在后面的工人寓所里。

那儿尽管是营地里唯一没有空调的建筑，但对我们来说已经相当豪华。我们得到了一份安全简报（我必须捏一下自己，我还在秘鲁），可以使用热水淋浴和冲水马桶。我看到钱能把杂乱的丛林变成干净的营地时，觉得很惊讶。这些人过着奢华的生活，有自己的健身房、酒吧和餐厅。我们吃了一大盘烤鸡、米饭和蕃茄，并且用他们二十四小时供电的发电机充满所有电器。

吃完丰盛的早餐，我们必须溜过别人的花园，继续走河的这一边。我们很快就抵达一个叫霍兰蒂亚（Holandia）的席皮波部落。霍兰蒂亚似乎荒无人烟，因此我们直接通过了，去下一个叫圣胡安（San Juan）的村庄。在那里，我们遇上了带枪的男子，遭到拘留，并且被押回了霍兰蒂亚。

霍兰蒂亚的治安官很老，在我姐姐和一位疯狂的澳大利亚职业高尔夫球员交往过后，我还没对谁马上这么反感。他告诉我们，有个人失踪了，我们有谋杀的嫌疑。这实在太荒谬了，因此我们不太把他说的话当回事。

在日记里，我似乎把这位老先生称作“浑蛋先生”，如果我不继续使用这个对他完全适合的名字，那就太可惜了。“浑蛋先生”想在我们身上挑出所有毛病，这样他就能觉得自己很精明了。他宣称，我

的护照无效，因为女王没有亲自签名，他还要我证明，马克·巴洛克里夫（马克还名列在许可文件上）回了英国，而不是躲在附近的灌木丛里。

经过两个小时的单独讯问，他接着要我解释背包里每件装备的用途，我必须承认我的耐心快被磨光了。因此，我告诉他，为何不问坐在他身边的圣胡安村长，他手上有完整的清单，四小时前，我们被他的村落拘留，那些清单就是那时一起汇总的。

不行。我必须再次清空背包。

在这磨人的过程中，“浑蛋先生”猜疑地翻着马克·巴洛克里夫的喜剧小说《幸运儿》（Lucky Dog），仿佛我们的谋杀计划就详细地写在里面。他还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序号也记了下来，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不只是对我如此，“浑蛋先生”还花了两个多小时讯问阿方索、安德烈亚斯，最后轮到乔。幸好我有本书可看。那天全都用来讯问关于一名失踪的席皮波人这件事了——他可能只是喝醉了，不知晃去哪里呼呼大睡罢了。

幸好不是所有的霍兰蒂亚人都和“浑蛋先生”一样，有两户人家要煮饭给我们吃。在一阵混乱中，我们接受了两次招待，吃了两顿丰盛的烛光晚餐。

隔天早上，在留宿警察局（一栋木造小屋）之后，真正的治安官来了，我们才知道“浑蛋先生”只是代理人。这位较年轻的男子看了我们一眼，笑着问我们是不是要到孔塔马纳镇泡温泉。他向我们道别，也祝我们好运，然而最后他还是毁了这一切，他说我们有义务捐献50新索尔来修缮霍兰蒂亚警察局的屋顶——之后，我们就可以走了。

那天将尽时，他们几个在街上和年轻的女孩子聊天。我不该妄下评断，但这些女孩子才十三四岁，而我们团队所有人都超过了三十岁，当地多数十五岁以上的女孩都嫁为人妇也身为人母了。我是唯一觉得这情景古怪的人。每个想找单身女子的男人，都找十四岁以下的。

隔天早上六点，我们离开霍兰蒂亚，都想弥补浪费掉的时间。通往孔塔马纳的道路很平坦，我们大步走在路况越来越好的小径上，到最后，我们走上了铺过路面的道路。晚上七点，我们在黑暗中来到建筑物密集的镇上，入住旅馆。这里不再是木造小屋城镇：这里的建筑物都是由水泥砖建成的，绿色广场上花朵种得整整齐齐，这里还有垃圾桶，而且真的在使用。

忠实的亚歇宁卡兄弟——阿方索和安德烈亚斯——要在此地和我们分别。他们一夜好眠，洗好澡，穿上整洁的马球衫和便裤，抹上修脸霜，准备返回位于上游的部落。他们已经走了四十七天，离家太远了，影响力渐微，因此回去是对的決定。我走进他们房间付薪资和道别时，对团队即将解散这件事感到难过。除了我阴郁的心情之外，这四十七天非常精彩，我知道，没有他们帮忙，我无法通过那些骇人的部落。我们握手道别，这对兄弟进城为部落买了一副全新的附挂发动机。他们留给我温暖的感觉，我是在和真正的朋友道别。

那晚，我回头读遇见阿方索和安德烈亚斯那天的日记：

这群人是坏人，尽管我觉得简单地将人分类很可笑，但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从他们的眼里，我看得出他们不了解我们，或者不想去了解。

到底谁不了解？

忧郁

反省过后，我认为自己和探险本身斗得太厉害了，因此，我排除了娱乐、轻松聊天等诸如此类的事，忽略了多数对我的进程没有直接帮助的互动和活动。直觉告诉我，这两者的比例失衡了，我知道我变得孤僻了。但我还是退缩了。

部分的压力来自财务问题。JBS现在每个月给我1000英镑的津贴，但这只够我们一半的开销。我10000英镑额度的信用卡已经预支了9500英镑。我甚至不知道怎么付利息，还得支付在英国的贷款，而我的房客刚表示她要搬走了。我知道从林里有些地方美不胜收，因为我偶尔停下脚步时，会将四周美景尽收眼底：被丛林覆盖的山丘群聚在一起，就像绿色的鸡蛋壳堆在一起；陡峭的堤岸给藤蔓丛生的山崖让路，高耸地俯瞰着小溪。以前没有人行经这里，因为这里的草木如此茂密，没有砍刀根本无法通行。遇上如沼泽之类的天然屏障而绕路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背着沉重的包袱奋力前进，又原路返回也会时有发生。

乔很快找到一名席皮波向导，名叫巴勃罗。他也是一脸和善，我对他很有好感。我预付他150新索尔，否则他不会来——男人在远行前，要给妻子留下足够的安家费，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巴勃罗、乔和我穿过了至今遇到的沼泽最多的森林。穿着原本那双丛林靴让我患了轻微的战壕脚病⁽²⁾，因此，我改穿亚歇宁卡人穿的鞋——橡胶底帆布鞋——但这只是暂时的，等奥特伯格公司补上排水更好的靴子后，我就不穿它们了。现在，脚踝暴露于外，我感觉像是赤裸地走过丛林；因为脚踝缺乏保护，我易受扭伤、荆棘、刮伤之苦，更须注意蛇。但橡胶底帆布鞋是如此轻薄简便，让我能走过泥塘，而不会患上战壕脚病。

在这丛林深处，蛇更常出没。如果是走在丛林小路上，蛇是个容易应付的危险；但如果是要穿过浓密的草木，而它们大多半栖息在树上，那危险就更大了。它们和其他所有的动物一样，不会无缘无故攻击我们，因为人类太过庞大，它们难以吞食。但是，我们打扰并惊吓到其中一条蛇的可能性比以往都大。当我们在森林里经过响尾蛇时，我越来越倾向于绕过它们，而不是像当地人那样倾向于杀了它们。通常，我们走过的区域现在也不会有其他人走，因此，有人跟在我们后面被蛇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些蛇可以活下去。

在丛林里，我每天进行一套清理脚部的惯常程序。早上穿袜子之前，我会先涂凡士林，接着穿上前一天在河里洗过的干净（但潮湿）袜子；一天结束时，我会在晚餐前洗澡和洗袜子，在脚上撒粉；晚上，我会穿着凉鞋或卡骆驰鞋让脚透气，保持干燥。

除了穿第一双奥特伯格靴子的那段时间，这个方法在这次探险中非常管用。第一双靴子太厚，而且“排水阀”被泥巴堵住了。我之后向他们要的靴子的“排水阀”换成了圆孔眼，优点是排水性极佳，但缺点是靴子会在河床上积沙。如果行走于多沙的区域，或者要跨越很多河流，我们就必须定期清洗靴子，否则脚会红肿脱皮，还会感染病菌。

直到现在我才认为，我可以告诉乔我没有宗教信仰。我之前没有说谎，只是避免明说。他平静地接受了。看得出来，在行走时，他把让我改变信仰视为一项挑战。巴勃罗必须回家保护女儿，让她免受村里一位男性无端的骚扰（他通过高频无线电收到了这个消息）。继之加入团队的是豪尔赫。

豪尔赫和我们到目前为止雇用的当地人很不一样。他不是原住民，而是西班牙的殖民区秘鲁人。他比其他人的年纪都大，约五十岁，有个大肚腩，以及像讨喜的大叔一样冷静自在的态度。

11月9日，我们也找来了劳尔。他是个年纪相当的当地人，非常瘦，但强健且有肌肉。我担心钱的问题，感觉处理不好财务问题。雇了一个不知道该往何处去的向导真是令人火大，这是直接提醒我，我在浪费钱；劳尔宣称他知道路径，因此我们组成四人团队出发了。当

我们走错路、原地绕圈时，我变得易怒，而且明白地向劳尔指出，我认为他表现不佳。

在一个叫新德里佳（Nuevo Delicia）的村庄，我们四人坐下吃粥和鼠肉时，我径自提起关于向导的话题。

“我们明天早上要找新向导。”我宣布。

所有人低着头继续大口大口地吃着。

“我们要找知道路的人，才不会整天打转。”我继续说道。

我想，乔和豪尔赫都赞同，只是大家显然都很同情劳尔。他不发一语。

乔大胆地问道：“劳尔怎么办？”

“他回家，”我说，“我们已经付了他今天的薪水。”

我非常肯定我是当着劳尔的面说的。“可以吗，劳尔？”我问道。

“可以。”劳尔说。

那天晚上，我看完了《偷书贼》（The Book Thief），那是1942年在慕尼黑发生的一段充满勇气的故事。我躺在吊床上哭泣，这本书让我想起我爱的所有人，以及生命中重要和不重要的事。和战争时期的苦难相比，我的徒步之行简直微不足道。我意识到，我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要放松，要替别人着想，不要活在刚愎自用的孤立世界里。

在廉价安眠药的作用下，我睡得很安稳。现在，我指望用安眠药来驱走对钱的忧虑，让我一夜好眠。

在新德里佳，一只老鼠从头顶的椽上掉到早餐餐桌上，我们全都笑了，但气氛仍不太自在。劳尔因为被“革职”而不太高兴，但他没有承认，反而尽其所能地继续告诉我前方的路，他讲得越多，我越发现他知识丰富。我盯着地图沉思。

“乔，你觉得我让劳尔回家的决定正确吗？”

“这里你做主。”乔说。

“但我是在问你的意见，乔。”

“那好，”乔开始说，“我认为你太没耐心了，这次步行需要时间，你必须放轻松。当我们走了两个小时却发现小路最后通往刺藤和荆棘时，你要深呼吸，微笑，并且懂得这是探险的一部分。”

劳尔和豪尔赫全程听着，所有人（包括我）都知道乔说得对。这也提醒我不要自视过高。我觉得很羞愧，转向劳尔说：“抱歉，劳尔，我昨天对你太严厉了。如果你愿意，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劳尔没说话，但我可以感觉到，他接受了道歉，并且会留下来。

对我不足之处的清楚揭示以及接下来的诚实以对，反而让情势好转了。我们行进得很顺利，隔天晚上的日记里，我写到，我们形成了另一支坚强的四人团队，就像和东戈兄弟组的团队一样。休息的时候，我们分着抽廉价的香烟，他们教我用西班牙语咒骂。我们开始有了欢笑，我也明显感到自己更融入团队了。

第二天，我们经过殖民部落。现在遇到的原住民部落越来越少，我们也受到越来越热烈的欢迎。我偶尔还是会听到“削脸人”，但现在听起来，更觉得他们像是在开玩笑。正值午餐时间，总是能及时抓住机会说要好好吃一顿的豪尔赫提议停下来吃一顿。一位十八岁姑娘出现了——她是我来秘鲁后见过的最美的女孩——当她为我们上饭、豆子和大蕉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狂跳。她的名字叫索尼娅，她当面问我能否待几天，我解释不能留下的原因，然后在三个同伴的嘲笑下，踏着雀跃的步伐离开了村庄。

我们经过的许多部落仍有酗酒的问题，很遗憾的是，在多数部落里，大白天就有几个男子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并没有高歌或打起架来，只是烂醉如泥，神志不清，醉得不省人事。这些人的脸孔看起来还是很像原住民，他们尽管都说西班牙语，但很少和这里的纯种西班牙人混血。和印第安人部落一样，他们对酒精的耐受度较低。

我们行进的顺序通常是劳尔、我、豪尔赫和乔。劳尔只带了一个轻轻的小背囊，很喜欢披荆斩棘，我就在他身后导航，豪尔赫和乔殿后。有一次走在部落之间的小路上，乔要我们停下来。

“看！”他说。

我注意看着乔所指的矮树丛下，发现了可怕的响尾蛇。它盘绕着，蓄势攻击。这条蛇在半路上，因此，劳尔、豪尔赫和我现在距离这条被激怒的毒蛇仅有几寸之遥。俗话说，第一个人吵醒蛇，第二个人激怒它，第三个人被咬。而乔是第四个，他看到蛇往回缩，准备发动防御性攻击。

被这类响尾蛇咬一口可能会很危险，响尾蛇已经成了矛头蝮属中许多毒蛇的通称。主要是，它们有血液毒，会破坏细胞，造成大出血和组织坏死。被狠咬一口可能会导致所有器官和组织衰竭，会因毛囊、眼、耳、鼻和指甲出血而亡，死状骇人。

它在路上，所以很可能会攻击路过的村民。劳尔拿一根长棍痛击它的头部，随意地打死了它。无论是不是环保人士，我都认同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么做是正确的。

现在，我穿着这双橡胶底帆布鞋，觉得很容易受伤。因此，到了下个村落，我采取劳尔和豪尔赫的穿鞋风格，买了些橡胶靴和足球袜。我立刻爱上了这种搭配，也很喜欢在过河之后轻易地把靴子清空。晚上，我把靴子倒挂在竿子上，到第二天早上它们就干透了。和潮湿的鞋子或鞋带沾泥沙的靴子相比，我能轻松愉快地穿上它们。穿这种靴子有个缺点，蹚过脏水后，靴子里面还是会有荆棘和尖刺，它们是经由靴子顶端进来的，我们到达干燥地面后，就得马上把它们清出来。这不是什么麻烦事，因为橡胶靴很好穿脱和洗涤，不过这也不是完美的方式。

随着和乔、劳尔、豪尔赫一起生活的日子从几天进展到几周，我们有了固定的模式，不需要闹钟，在清晨五点半的晨曦中就能醒来。只要想到必须穿上湿衣服，我就觉得原本整晚不方便不舒服的吊床突然间成了最温暖舒适的便床。

双脚一落地，我就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所有事情都跟随既有模式，日复一日地重复。前一晚，我都会在河边洗T恤、裤子和袜子，所以它们总是湿的，而且一定或多或少含沙。潮湿的环境意味着衣物不可能隔夜就干。当然，一穿上就无所谓了，反正没多久我就会开始流汗。因此，衣服永远不可能有干的时候。在探险后期，我和乔发展出一套火上晾衣绳设备，每天晚上把衣服烤干。

在村庄里，我们通常会喝用公鸡睾丸和老母鸡煮成的汤当早餐。这种汤虽然有点平淡无味也缺乏变化，但够营养。我多半会让向导们去聊天，因为我的大脑需要一段时间来“暖机”。

我会包扎被感染的脚，服用抗生素，避免它们恶化成热带溃疡。接着，我会涂上一层凡士林，套上足球袜，最后穿上黑色的橡胶靴。

村子里通常没有特定的地方用来排便，大家会走远一点，到丛林里排泄。这种做法既杂乱又不卫生。尽管有足够的昆虫和虫子分解少量的排泄物，甚至可以分解一个家庭的分量，但整个村子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厕所，就会又脏又臭。

我就像忧郁症患者一样，心情起伏多变，也许我就是忧郁症患者。看到长相特殊的有须狐尾猴，我会兴高采烈，但可能马上又会变得沮丧，因为我们遇上了长满多刺树木的沼泽，无法渡船过去，必须原路折返4000米。当身上到处因擦伤、蚂蚁咬伤以及背背包而觉得疼痛时，我也会因为脱光衣服洗澡而产生一种纯粹的喜悦。当然，所有事情都是相对的，但我可以因在棕色的充满杂草的污浊牛轭湖中洗澡而产生洁净感。

受到几条正面留言鼓励后，我犯了个错误。我想从博客中寻求慰藉以提振士气，但这种强心剂完全不可靠，而寄希望于收到善意的留言也不利于保持平稳的乐观心态，因为我有时候根本收不到留言，有时候则会收到愤怒、负面的留言，说我不负责任或是更糟的言辞。

整个探险中，听音乐是最佳的逃避方式。我在当地大约买了七台便宜的MP3播放器，全都用不久。音乐的唯一问题在于，经历了一整天的单调乏味，我的脑袋处于半休眠状态，但躺在吊床上打开“兴奋剂”后，我就变得非常亢奋，又睡不着了；我会好几个小时地听文明世界的声音，或我所知的正常的声音以及西方世界的声音。

2008年11月13日日记，圣拉蒙（San Ramon）：

忧惧不足以形容我的感觉。再也没有河岸，小路要么满是泥泞，要么被水淹没。很快，我就必须冒险，进一步远离河岸，找到坚实的土地行走。

劳尔非常担心陷阱。我们进入的区域的打猎方式是，使用自制的猎枪陷阱，在小径上搭起绊线。目标猎物是大型啮齿类动物，如中南美洲天竺鼠、刺鼠，粗制的枪管能近距离地在动物身上轰出几个大窟窿。在离地约15厘米高的地方，我们如果误触一条绊线，就会断了脚踝。而且，似乎没有人标记出陷阱所设的位置。我们很有可能踏进布满这类陷阱的区域，就像踏进具杀伤力的地雷区，走在前面变成一件不受欢迎的差事。

2008年11月17日日记，波多维木德斯（Puerto Vermudes）：

下午两点，我让团队停下来，因为我太累了，双腿颤抖，累得几乎要哭出来。真有趣，我成年后长时间出国在外，但总是待在有其他西方人的团队里。我待在军队里、去探险和从事风险顾问工作时，都从未长时间单打独斗。这是我第一次彻底深入一个国家及其民间。至今，卢克已离队四个半月，其间，我有几个晚上和埃米莉通电话，但仅此而已。（当时我完全忘记马克·巴洛克里夫来过这里了。）

我应该多听别人说话，多和他们互动，但我太累了，所以，我的西班牙语一直没进步。我只是让噪音从头上飘过，对它们充耳不闻。

事后，我很难为这样的行为辩解。我为什么不多努力一点，多和人互动，每天多学一些单词？我还在日记中提到，波多维木德斯的村长叫作璜·洛哈斯，他很友善，请我们吃黄金果。那是一种圆形的绿色水果，又甜又黏腻，如果不知道怎么吃，就会被它黏住双唇。我还写到，他有五个小孩，是我遇到的最自信且有礼貌的孩子。他们其中一位提议带我们走4000米去下一个村庄，并且把书包里的芒果全给了我们。他才六岁大。身边有这么多善意和慷慨，我却不能专注在美好的事物上，因为我的固执和坚持，我把自己困在一个不想待的地方。因此，我仍旧很低落。

我的胖向导豪尔赫已经和我走了一个星期，他今年五十岁，热爱步行。我认为他看扁我了，我知道我蹩脚的西班牙语可能让我看起来没那么聪明，最近他问我在军队中爬升到了什么官阶后，很讶异地发现我曾是个上尉。“但不是在步兵团吧？”他问道。“是的，”我回道，“是步兵上尉。”

我知道我变得不像自己了，对豪尔赫的反应并不讶异。

2008年11月19日日记，圣洛克（San Roque）：

今天和乔做了一场激烈的宗教辩论。我总是转移话题，因为我知道我们不会达成共识，而我需要他当向导。我想他不会在意我信不信宗教，也不认为我不信教会有什么影响，但有趣的是，他认为我会下地狱，因为我不信上帝。我向他解释，我认为宗教是若干世纪以前用来控制民众的一种聪明手段，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宗教了。我借用了一点艾迪·伊扎德⁽³⁾的表演桥段，要乔“解释恐龙”。

快十二点半了，我得睡了。一切都会没事的。

11月20日，我们更靠近丛林大城伊基托斯（Iquitos）了，我们想在那儿休息，过圣诞节。目前还有300千米路要走，我们决定从一道河湾的顶点穿越到下一个顶点，直线视距是7千米，但沿着河道走就成了24千米。劳尔打前锋，他整天都在开道，只带了一个小行囊；乔、豪尔赫和我轮流走在第二位，把路径再开阔一点，好容我们的帆布包和豪尔赫的大肚腩通过。

我们大约早上七点起程。第一个小时总是凉爽清新——或者说较为凉爽清新——到了八点，我们已经汗流浹背，蚊子也成群出没。走在第三位或第四位是最糟的，成群的蚊子飞到身上不停地叮咬，被叮的数目多得离谱。因为防蚊液太过珍贵，不能一直使用（它们很快就会被汗水冲掉），我们会留到吃饭的时候或想得到一些安宁、不希望有恼人的嗡嗡声在耳边响个不停的休息时间才涂抹。这意味着，走路、站立或空等（在我们劈路穿越矮树丛时是常有的事）时，我们会不断遭受攻击。

任何时候都有5只蚊子叮我的手背，我看不到叮额头和颈后的蚊子，保守估计，当时这些部位每分钟至少被叮10次。以一天走8小时来

算，我一天就被叮4800次，一周33600次，一个月就是惊人的145600次，不过通常没那么糟，因此，我估计整场探险下来，实际被叮的数目大约只有20万次。这足以说明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不再对叮咬起反应了。

世界各地的纸上探险家一定会恼火地把这本书扔掉大喊：“为什么不用防蚊罩？”或者喊：“手套呢？”这两样我都带了，但从来没用过。一来是因为我是唯一有这些装备的人，我不想像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外国佬，躲在花哨的装备后；再者，它们在这种场合使用也似乎格格不入，我的同伴都很强悍，习于丛林徒步，因此，我也必须和他们一样。因为同样的道理，我也很高兴自己扔掉了那件含有氯菊酯杀虫剂的可笑的探险衬衫，满意在当地买的橡胶靴，享受当地人体验亚马孙的方式。没有那些浮夸的外国佬行头，以当地人的方式行走，这些都令我骄傲。

在劳尔开路时，我们需要小心拿捏才能让他保持在要行进的方向上：一方面我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在纠结中选择“阻力最少的路径”，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让他保持在大致的方位上。所以，我必须经常冒犯他引以为傲的“内建罗盘”，帮他重新定位，让我们回到要行进的方向上。

这时候我已经开始担心洪水了。湖还好，因为我们可以乘充气筏划过去，尽管会很耗时；草木茂密的沼泽就比较麻烦，因为筏子很容易被刺穿，因此，我们常砍下棕榈树和其他草木做浮桥，渡过长满杂草的大片危险深水区。

到此刻我才了解，沿着洪水边缘行走比想象中艰难许多。洪溢林相当分散，我们也无法做出预测，我们使用的秘鲁地图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了。洪溢林是你所能想象的最杂乱的环境，藤蔓和树根在我们面前形成一张纠结盘错的木网，上面爬满各种咬人的蚂蚁。我们在高高的树根和低矮的枝干间爬上爬下，很快就弄得满身是擦伤、尖刺和伤口。

我的双脚外侧因为穿橡胶靴长了水泡（靴子稍微小了点）。由于双脚几乎一整天都泡在脏水里，就算我已经用完一个疗程的抗生素，双脚还是一样会受到感染。

11月20日傍晚五点，我们判断到不了7000米远的另一边，因此匆匆扎营。每人只剩半升水，附近没有小溪，大家很快便躲回自己的蚊帐里，没有生火，吃着配给的半罐鲭鱼、一些木薯粉和一点糖。我把这三样东西和在一起，加了一点珍贵的水，等那又甜又腥的味道一入口，我就后悔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早早拔营，走了一小时就看到树木在眼前展开，阳光洒了下来。当我们穿出林木线，期待看到水上生物的踪影时，发现河流已经改道，我们到了一个干涸的牛轭湖。

沿着湖边走了一小段路，我们遇到了两个当地人。他们笑我们搞错了，还说现在河道已经在4000米外。他们有一小块地种些作物，还有间小屋，我们受邀进屋喝鸡肉汤、吃大蕉。吃过昨晚那餐“烂稀泥”后，这些食物很受欢迎，我们每人都吃了一大盘，临走前还大口往肚子里灌了一些他们收集的雨水。两小时后，我们抵达一个叫塔璜廷苏育（Tahuantinsuyo）的小村庄。村里有足球场和商店；一位好心的女士为我们煮猪肋排，我们全忘了前一天的不适，因为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咸排骨的肥美油脂上。

每当我抵达一个城镇，大家都会盯着我看。我去洗手，大家也盯着看；换掉湿透的衣服，大家还是盯着看；即使我在吊床上，开头灯看书，有十几二十个人坐在一旁盯着我看也不稀奇；甚至在有卫星电视的部落，我都比电视有趣。

如果只有几天是这样也就算了，但被盯视长达八个月，我难以忍受，变得更孤立，因为希望避开这些注目。我祈祷大家别来烦我，但我必须避免这种孤僻的行为，我需要他们的帮助才能继续下去，毕竟我正经过他们的土地，睡在他们的村庄里。但这不是我想象中的丛林探险，我渴望巴西的广阔雨林和荒无人烟。

当我努力和人攀谈时，话题都一样。

“你疯了，你不可能走那么远；你会被印第安人射杀的，会被美洲豹吃掉的。”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享受团队的陪伴。豪尔赫和善体贴，劳尔老是拿我们的困境打趣。我坐下休息时，蚊子从裤管那里飞进

来，瞄准我的下半身。我当然觉得这很讨厌，但劳尔觉得很好笑，黑色幽默把我们凝聚起来。

和乔的对话渐渐增多（多半和宗教有关），我开始感到自己更加融入这个团队。豪尔赫和劳尔就像之前的东戈兄弟一样，形成了紧密的关系。可以想见的是，他们说的笑话全都带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但并不是出于恶意，这只是一群一辈子没想过什么是政治正确的人开玩笑的方式罢了。

2008年11月24日，距伊基托斯还有246千米，我在凌晨三点四十五分起床，通过和桑赫斯特的老战友本·桑德斯（Ben Saunders）联系进行在线直播。他正在皇家地理学会演讲，主题是探险通信。我架好苹果笔记本电脑，把Skype（即时通信软件）镜头对准镇上广场的灌木丛。在他演讲之前，我们聊了一会儿，当时天很黑；之后，我们在天刚破晓时开始直播。这看起来很适合展示丛林。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宽带全球局域网和Skype做访问，进行得很顺利。在雨林前直播真是不可思议，而且这些装备都是徒步背来的。

能和本简短地说些话真是太好了，但遗憾的是，几分钟后对话就被切断了，他不知道我心里多么纠结，也不知道这次体验让我多么振奋。

此时此刻，乔郁郁不乐。和一个难相处的人一起行走很不容易，他常嘲笑我，告诉别人我没有信仰（他这样做只是想看他们的反应）。他不断告诉我（当然还有同性恋）我会下地狱，我告诉他至少我还有伴。这种直白的幽默以及对女性、同性恋和异族的迂腐态度，让我觉得融入这样的世界真令人丧气。所有人的想法都和我如此不同。

现在是湿季，我们又不时进出水里，靴子因而时常灌满水。我们会用手抓住脚后跟，做四头肌伸展运动，这样，我们就不用脱下靴子倒水了。虽然我们大多时候都可以把水倒出来，但这也意味着，没被倒出的水会在靴子里流动、变暖，将皮肤泡软，让皮肤变得容易被割伤、受霉菌感染。

我决定赌上我的靴子，在鞋背上开了两个洞，就在和之前的丛林靴一样的位置。现在，防水功能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水位总是高过靴子，但几个向导绝望地看着我改造后的靴子。

效果棒极了。我现在涉过深水后可以继续向前，不用停下来清空靴里的水，而且用不了多久，靴子会干得更快，因为我的体重会将里面的水不断挤压掉。我的皮肤好转很多，长水泡之处开始复原。这种设计也意味着，我可以长让长裤盖过靴子，避免荆棘、尖刺等讨厌的东西从靴子开口处进来。

在没有真正的丛林靴前，这是我最喜欢的靴子设计：脚背有洞的橡胶靴搭配被剪短到刚好盖过靴子顶端的裤管，可以防止东西跑进来，又不至于在脚踝处沾满泥土和脏东西。

2008年11月27日日记：

我今天真的很愉快，如果没有乔，我会更愉快，但我知道，我必须有个让负面情绪集中的焦点，而目前的焦点就是乔。我不认为我是心智坚强的人，我有决心，因此我会完成任务，但我不太会控制情绪。

我已经减少药物的服用量。现在，我只吃胃药奥美拉唑（omeprazole）和疟疾药四环霉素，感觉好了很多。不再服用安眠药和抗组胺药物帮助睡眠后，头脑清醒多了。

我好想有个朋友可以聊天，或有个女友吐露心事，我好想有个酒友。

2008年12月1日日记：

今天非常悲惨。我们早上七点离开巴加赞（Bagazan），找不到当地向导，大家都不敢和“削脸人”走在一起。我们希望在上午抵达一座湖，但进度比以往还要慢，一天只走了6000米。这里是洪溢林，进度奇慢无比，蚊子也多到令人难以置信。

我有一套用帽子不时拍打蚊子的方法。我先拍打另一只手，接着是左颈、左耳，然后是前额，再来是右耳、右颈，之后再从头来一

遍。防蚊液已经全部用完了。

我走在—根枝干下时，撞翻了蚁穴，它落在我的背包上，上千只咬人的蚂蚁爬满我的身体和帆布包。我泡到水里，但必须尽快脱掉背包，把衣服脱到腰部，一只一只拨掉它们。我到现在还闻得到蚂蚁的味道，那股腐坏的土味我绝不会搞错的，一整窝味道很刺鼻。

我们在傍晚五点找到了湖，并且在另一头发现了屋子，我们划了过去。那里的人同意我们（经过一番说服后）待在他们的学校里，我非常疲惫。这是我这辈子行走于丛林中最不愉快的一天。我人生中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待在丛林里，每片丛林都绝对不相同。

随着水位上涨，情况会更恶劣，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必须进一步远离河岸，洪溢林无法行走。

现在再有人提到“削脸人”，他们就会得到标准的回应：“抱歉，我已经懒得讨论了，只有没受教育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蠢事。”

现在对我来说，最后一句话听起来很直接而且无礼，然而我完全记得当时的情绪：我已经厌倦装出他们的故事值得一听的样子，已经厌倦了那种无知。这不是他们的错，我越思及此越觉得，尽管说他们很蠢并不会对谁造成伤害，但我有时可以更礼貌一点。

2008年12月4日日记，马格达莱纳（Magdalena）：

今天，我们早上五点半起床，收拾好行李，囫圇吞下一些用水冲泡的木薯粉和糖后上路。天空下起倾盆大雨，我们整天都湿答答的，每个伤口每次轻微摩擦都令我感到疼痛不已。

我的左后脚跟现在有个开放性伤口，背包的腰带让我腰部疼痛，手上的伤是因为跌倒所致，全都不可能清理干净或保持干燥。

跟着劳尔在泥泞中走了两个小时后，我们无意间来到一个茅草屋部落，原来是艾马富士特（Elmer Fawcett）。这个部落距离我们标志在地图上的位置有5000米远。有户人家聚在小屋里围绕热腾腾的锅坐着，他们请我们过去，因此我们爬上薄木板，躲避滂沱大雨。

“锅里是什么？”我问道。

“猴子。”女主人答道。

我们很高兴能避雨，接受这家人的邀请一起吃，我也很高兴他们没把“猴子”头给我。锅里的“猴子”其实是蜜熊，那是一种夜行性的树栖哺乳类，就像浣熊一样。这只蜜熊看起来只用水煮过，没有调味，因此肉很韧，也没有味道。豪尔赫吸吮着头骨，汤汁流到他肥胖的下巴上。

屋主和他的儿子同意带上猎枪，在雨中带领我们去马格达莱纳。我们在最狭小的桥和道路上来回行走，穿越洪水和沼泽地。没有他们对此地的了解，我们至少要在迷宫里奋战一整天，最后我们只花了两个小时。

在这两个小时的沼泽行进中，有一次，那人的儿子指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东西——我看到一条又粗又壮的棕色影迹在浅水里蛇行。

“快看，乔！一条巨蟒。”

我抓住摄影机，开始拍摄这种神话般的巨蛇。以巨蟒来说，它还不算大——大概3米长，腰身为15—20厘米——但我是第一次在野外看到巨蟒，热切地想拍下来。男孩的父亲问我拍完了没，我笑着告诉他拍好了，心想“真是难得一见”。接着，他敏捷地走上前，用大砍刀将这条巨蟒剁成几块喂狗吃了。

12月6日日记，雷克纳（Requena）：

好吧，我很忧郁，非常忧郁。我是有过一些短暂的欢乐时光，但都一闪即逝，因此整体而言，我不快乐。

我们昨天抵达雷克纳，我觉得还可以，但很累。厌倦了步行，厌倦了向导，也厌倦了这次探险，再加上很容易就能上网，情况更恶劣了。满是啤酒、女孩、朋友和爱的世界就在屏幕的另一端，然而我从来没有如此孤独过。

我要少想着外面的世界，专注在这次任务上。我必须对自己应付丛林的能力有信心，我不能在情感上依赖任何人。

我该专注在什么事情上才能更开心？语言。我还有三个月才能离开秘鲁，可以每晚都念西班牙语，我也可以用MP3播放器听葡萄牙语，这样，在进入巴西时，我才不会又遇上同样的问题。

我必须掌握自己，要一天比一天坚强而不是脆弱，要做俯卧撑运动提高体能，要想着积极的一面，要想着我们到目前为止的成就。

我不能再想着生命中出现过的女人。这没有帮助，只会让我更加低落，我必须懂得，目前没有交往对象是为此行做出的牺牲。

基思（Keith，摄影师）明天抵达，我必须让他看到一个热爱自己工作的积极乐观的探险家。十一点了，熄灯。

在伊基托斯重新振作

早上七点左右，乔来敲我的门：“埃德，基德（Kid）来了！”（南美洲人发不出“基思”的音。）

“什么？啊？谢谢，乔。”我对着门咕哝着，双脚踏在旅馆冰冷的瓷砖地板上，轻声走出房门。

在走道上，我看到一个高大的英国人。他理个平头，背着大帆布包，带着相称的微笑从门口走进来。

“是埃德吗？你好吗？”基思笑容满面，一口伦敦腔，“想抽根烟吗？”

我从未见过基思·迪卡泰尔（Keith Ducatel），他是我朋友的朋友。得知我的探险后，他希望有机会来亚马孙拍照。我看过他的一些作品，他的确很有天分，但不知为什么，他给我的印象比较年轻，也许是因为摄影只是他的爱好，而非主要工作。

现在这个带着烟的家伙站在我面前，对于他所在之处以及即将开始的探险非常雀跃。他将近四十岁，此行经历了一些波折才来到这里，但他很自在，也不因此烦扰，我马上就开始和他交谈。

这多少让我感觉得到了解脱，有个和我国籍相同而且年纪相仿的人真是一大快慰。我们一起到镇上各处办行政手续，聊个不停，我很高兴能够再次和人交流。我发现我笑了，能够表达出细微的想法，能够说笑，能够和人产生亲切感。积极的心态、活力、幽默感和生命力开始回到我身上。

基思抵达的那天早上，我们重新整理他的背包，然后离开雷克纳。豪尔赫、劳尔、乔、基思和我形成五人团队，但因为我们都不是当地人，不知道当地的路径，因此每到一个村落都得问路，最后来到一条大支流旁。这里原本有桥，但桥断了，中间少了一大段，下面的水流相当湍急。

我们不可能游过去，这是确定的，但在我还没思考好是否要乘充气筏渡到对岸之前，已经融入团队的劳尔和豪尔赫开始从附近的树上砍下大树枝，没一会儿就砍了十根又长又直的大树枝，并砍下藤蔓作为捆绑用的绳子。我万分敬佩地看着，因为他们不加思索地修复了桥，而且没有用到一枚钉子、一把榔头。基思借此机会习惯了状况，并拍下这些人只靠着大砍刀就轻松工作的画面。十分钟后桥就可以通行，不只有我们，接下来几个月想渡河的人都可以从这座桥上过了。基思很受震撼，我也为身旁这群认真能干的队员感到骄傲。

我们进入一个叫圣罗莎（Santa Rosa）的部落。在我们研究地图，计划路线，啜饮廉价橘子水时，村子里的孩子围着我们看，十分入迷。这里的村民并非纯粹的印第安人，他们全都认为自己是殖民地居民，只说西班牙语。这里距离大城伊基托斯只有几百千米，因此，居民和西方人相处得很自在，我们也得到了近乎和善的款待。我们买了1.5千克的烟熏犰狳后，继续上路。

基思和我在路上一直聊天。我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我发现我现在可以轻易地应付任何问题，一旦两人之中有一个跌倒了，我们就像老友一样大笑。能恢复正常的心态，我很激动。这是快乐的时刻，和几个月来的忧郁、孤独形成强烈的对比。步行再次充满惊险和乐趣。

基思也能负担他的背包重量了，他在英国做过一些训练。虽然他加入的是一个已经走了数月的团队，他却没有半句怨言。他还未适应这里的环境，汗如雨下。从他的T恤上可以看到随着汗水流失的大量盐分，他的背部和手臂都是叮咬的痕迹，又大又红肿又多的咬伤足以让最强悍的人倒下，但他只是微笑，看向积极的一面，拿着摄像机在成群的蚊子中间不断拍照。

他有个缺点是抽烟，他不只是会抽烟，事实上，他相当热爱抽烟。身为一名戒烟人士，我可以看出他在休息时得到的纯然喜悦——

坐在原木或岩石上，深吸着让人平静的烟。没多久，我就破戒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整个团队（最后乔也加入了）在离开每个村落前一定会带上香烟。抽烟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我们只是一直走下去而已，在此之后，我们能够放松起来，并且享受这次行程，像朋友一样共享简单的喜乐。

有时候我们会雇用知道通往下个村庄的路径的当地向导，那些路大概只需徒步几个小时，因此，团队人数维持在五到六人不等。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我虽然对目前运作良好的团队感到满意，但知道必须尽快解雇豪尔赫和劳尔。而现在，部分是因为团队里有这两位较年长的向导会让人感到安心，我把他们留了下来。我安慰自己，我们不仅要往前赶路，还要进行得很顺利，还要享受行程。而我，只要找到钱就行了。

这期间，我的自信心不断增长。只凭着对自己的能力有所了解，我就从完全的自怜状态中摆脱出来了，重建了自信。这个过程简直无可比拟。现在我可以说自己是一个正常的英国人了，除此之外，我还懂得了如何跳过湿滑的原木，懂得操作大砍刀，还懂得带领一个团队。在桑赫斯特的军事训练中，前五周是一段高强度的睡眠剥夺期，许多人因为失去重心和失去加入军队的理由退出了。我们看着失去动力的人离开，看着人数一排排地减少。但是，留下来的人也有感到沮丧、低落和可悲的时刻。接下来，军队训练系统会巧妙地接手这些沮丧的士兵，并且重建他们的信心。这些士兵开始精通各方面的军事技能，例如行军、射击、导航等，信心渐增。这些训练的目的是要让士兵对军人的身份感到自信且自豪，而不是对他们之前的成就感到自豪。他们在一年之内脱胎换骨，年轻邋遢的学生变成了自信又能干的英国陆军军官。

我可以看出，这和我目前的经历很相似。此日之前，我一直很骄傲，我的自信来自别人的赞美或别人对我能力的评价。现在，这种虚假的自信从我身上脱落了，我靠自己真正具备的能力重建了自信，没有他人的评价、吹嘘或伪装，没有掩饰，没有废话。我再次只凭借着天生的能力学习新技能。脱胎换骨之后恢复活力的感觉给了我力量。

照看基思也对我有帮助。他少有丛林经验，只和一位巴西醉汉在丛林共度过一周的假期。我教他如何照顾自己的脚，如何在臀部因背包摩擦而酸痛的地方破皮前缠上绷带，后来，他很擅长搭吊床和整理装备。

我告诉劳尔和豪尔赫，我们可以一起走到瑙塔（Nauta），届时我会支付他们的薪水，并且给他们船票钱回家。从瑙塔开始，乔、基思和我将有几天顶着烈日走在通往伊基托斯南部的公路上。豪尔赫的胸腔受到了感染，劳尔也在咳嗽。我们整天在潮湿的环境中，乔、基思和我才三十多岁，身体还挺得过去，但是，劳尔和豪尔赫差不多五十岁了，他们的身体已经开始虚弱。豪尔赫还变得有点乖戾，帮不上多大忙了。我想，他只是疲累了，之前的几个星期，他一直很可靠。劳尔声称自己拥有一小块地，有个美国人要买这块地上的350棵树，他有可能大赚一笔。他说，要不是因为如此，他还想继续走下去。

在地图上计划撤退的路程时，我开始担忧即将来临的洪水季。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在水位上升前越过边境，抵达巴西，但现在看来这不可能实现了。这个结果意味着，秘鲁这头（南边）的河岸会因为地势低洼而被水淹没，我必须考虑穿过哥伦比亚，走上北边的河岸的可能性。“哥伦比亚”这个名字让我十分忧虑，我记得我读过划皮划艇探险的报道，那些人在哥伦比亚被射杀了。然而，我们不会乘皮划艇快速通过哥伦比亚，而是徒步通过。

距离公路起点瑙塔镇还有大约一星期的路程，我们要穿越许多丛林。

2008年12月15日，我们在河岸上扎营，我的日记如下：

我们傻傻地往河的东北方推进，一再被错误的“水平线”（河）误导。我们每次以为快抵达河边了，穿过树丛看到的却是沼泽、旧河道或遍布沼泽的湖。有些可以通过，有些则要绕一大段路。最近河流改道了，我们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只能通过树丛听几千米外的船声来判断。

我们在藤条和灯芯草间横冲猛撞，身上布满细小尖刺。它们就像毛发一样，穿透裤子，刺进膝盖和小腿。傍晚五点四十分，我们终于抵达河边。再过二十分钟太阳就要下山了，我们二话不说，全在岸边

砍树枝，立起防水布和蚊帐。接着，我们在微光中匆匆洗完澡，加糖冲泡木薯粉后，把它们当晚餐。

我清楚地记得那晚，因为那天基思和我在河岸上共享了一副蚊帐。他带的iPod可以播放电影，我们一人戴一边耳机，一起看《猎鹿人》（The Deer Hunter）。最后，我们两人都困得睁不开眼。

一个小时后，我醒了过来，发现基思趴在蚊帐外的沙地上吐个不停。劳尔展现出体贴的一面，起来陪在基思身旁，直到他感觉好些。之后，基思回到蚊帐里，也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基思显然还是不舒服，但别无他法，只能继续向前走。我们没有存粮了，必须抵达下个村落再补给。基思提起全部的精神，和我们走了一整天。下午时，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有商店和船的部落。

基思之前在为期一周的巴西旅程中感染了疟疾，现在旧疾复发。在这种状况下，他无法行走。他几乎不会说西班牙语，于是，我问乔是否愿意带他搭船去瑙塔。乔和基思已经建立了交情，因此，他很乐意帮忙。我和豪尔赫、劳尔则徒步前行，与乔在瑙塔会合；基思会在伊基托斯的旅馆休息几天。

成员的这种变动也会带来一种乐趣。和两个老头儿一起走很不一样，我们都很平静，每天都往前推进大段距离。文明的伊基托斯就在眼前，我很高兴：我们会在圣诞节前抵达那里；我们会在城里过节，还有床铺可睡，就像走过一段漫长黑暗的隧道，终于看到尽头的光。这次休息是我最渴望的一次。

让乔和基思一起走的决定再次让我意识到我多么信任乔。虽然我有时候还是觉得他很烦，但他既诚实又独立，我感谢他依旧在我身边。

劳尔、豪尔赫和我在几天后到达瑙塔，看到神清气爽的乔穿着洗干净的衣服和全新的牛仔裤在瑙塔的一家小旅馆等我们。乔和许多秘鲁人一样，习惯把头发梳向一边（像我祖父的发型）。他穿着烫平的衬衫，梳着老式发型，看起来很利落。

变得有点易怒的豪尔赫要求我现在付他薪资，我扣掉之前预付他喝酒的钱时，他非常恼火，像孩子一样发脾气。在我、劳尔和乔最后一次一起出去喝酒时，豪尔赫自己留在旅馆里。那天夜里，我们回到旅馆时，他已经不告而别。但眼下资金很紧张。

劳尔在第二天早上也离开了，但他是和我友善地分别，在之后几个月里我们还偶尔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乔和我往北向伊基托斯前进。我们看着最后101千米的直线道路，傻气地告诉自己，我们可以一次走完，花上一天一夜就要抵达伊基托斯。事实上，我们低估了疲惫的影响，走在发烫的柏油路上，我们花了四天才走完这段路。

在最后一天，一名高壮的男子骑着摩托车朝我们而来。他扯下安全帽，以美式英语大叫：“埃德·斯塔福德！真的是你吗？”

“搞什么？”这位往后梳着灰色油头、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伸出双手、咧着嘴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朝我们而来时，我心里这么想着。他叫作鲁道夫，别称鲁迪，他从当地报纸上知道了我们的徒步之旅。我之前没被认出来过，因此被鲁迪的反应逗乐了。我们抵达伊基托斯时，他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餐，我们感激地接受了。

事实上，鲁迪为我们做了许多事。他和太太马蒂要到利马过圣诞节，他就把家里的钥匙给了我们，让我们在城里时随意使用。鲁迪令我联想到老电影里的帮派分子。他告诉我，他可以把摩托车停在屋外，因为当地的孩子尊敬他。他还喜欢向人传授极具男子气概的绝招：“每当我支持的足球队利马体育学院队（Lima Universitario）赢球，我就请整条街的人喝酒，你知道怎么着？没有人会恶搞我。”他在美国待过，想法很美式，回到故国秘鲁是因为他在这儿的财富和地位，受到敬重。

鲁迪继续说：“我今天去银行，里面没有半个客户，倒有五个职员。我问第一个职员我能不能领钱。‘先生，你必须抽号码牌。’那个印第安人这么说。‘我是银行里唯一的客户，你这个死娘娘腔！’我说，‘不要让我在路上看到你，你这娘娘腔！’那个职员说要叫警卫，所以我又说了一遍‘我会找到你的’，然后我就离开了。”

鲁迪嗓门很大，说起话来也很粗鲁，用英语咒骂个不停，但他很有趣。我们享受着他的慷慨，恢复了体力，也在观光大城伊基托斯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基思来找我们的途中曾在伊基托斯转机，认识了一个会说英语的漂亮女孩——伊冯娜，他在英国有女友，因此对伊冯娜没什么兴趣。但他看到我在他抵达时的悲惨模样，认为我们需要休息，放松一下。乔、基思和我进城，在一家游客熙熙攘攘的酒吧里与伊冯娜及她的朋友见了面。那是秘鲁的另一面，是我不熟悉的一面。我的感官刚适应丛林，化妆、洒香水的时髦女郎令我感到惊奇。伊冯娜有个朋友叫厄休拉，她不会说英语，但我很喜欢和她聊天，因此，我同意隔天在广场上和她再见一面。

“你会骑摩托车吧？”厄休拉笑着问道。她三十多岁，每天健身，身体苗条结实。

“呃……我从没骑过，”我承认道，“我坐后座。”

厄休拉告诉我，她要去接她的狗，我答应和她一起去。她很娇小，比1.5米高一点。我爬上摩托车后座时才意识到，在秘鲁这么重视男子气概的文化里，男人坐在后座是多么好笑的画面，但我努力不去觉得不自在。厄休拉在街头疾驰，最后在一家店门前停下来，要我等一下。出来时，她抱着一只毛发修整过的狮子狗。

“抱着。”她吩咐我。

我遵命，双手接过这只毛发修剪得整齐的狗。

现在正值狂欢时节，对过往的汽车、摩托车扔水球是当地的传统，就在这时候，我对自己的处境大笑：一星期以前，我还拿着大砍刀在沼泽间奋力行进；现在，我坐在摩托车上，被水球砸得浑身湿透，而我的手上还抱着一只惊慌的狮子狗，一个漂亮的秘鲁女人载着我在这座疯狂城镇的街道上狂奔。

我们在这里过了圣诞节，之后又稍稍做了停留，因为我做了个决定。我要大大感谢基思的一件事就是，他让我了解了乔。他们两个从一开始就处得很好，因为基思很努力地去了解他。我得以看到乔身上

许多以前我没留意的方面和我完全忽略的品质，再加上我和乔一起出去了几晚，因此，我们的友谊更深了。

乔想一直走到巴西，因为他没离开过秘鲁，所以需要申请护照。我们填妥了所有表格，鲁迪也帮了忙。我们就等他的护照从利马寄过来了。

鲁迪介绍一些很有帮助的人给我们，例如奥托（Otto）医生，他是城里主要的军医，在应该增加多少抗蛇毒血清的量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注射血清等方面，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

我必须承认，我对迫近巴西的忧虑和未知，在知道乔会和我一起走到最后时减轻了不少，我们现在有更周全的计划，也有更丰富的经验。

现在搞不定的是我们的巴西签证。距我们希望进入巴西的日子只剩几个月了，伊基托斯是最后一个能在秘鲁申请签证的地方。我很恼火，我的探险可能会因为巴西马瑙斯（Manaus）一个又胖又懒的男子而泡汤：我已经出钱请他处理签证事宜，当我向他表达我们担心没有签证和巴西国家印第安基金会（FUNAI）的许可时，马瑙斯那边传来的回应既不友善也帮不上忙。

乔申请护照引起的延误导致基思没有时间再待下去。他必须回英国，不能再和我们一起走。他拍了一些令人惊艳的照片，身体也已经复原，对此行已经很满意。我会永远感谢他：他来到这个地方，全程负担自己的费用，并且成为我需要的朋友，帮助我再次掌控这次探险，也让我看见了乔的好；最重要的是，他拍了一些很棒的照片，可以被我们用来建新的网站，也可以用在报刊上。有好几次，我们在伊基托斯喝威士忌喝到天明，我们闲聊瞎扯或讨论我们不同的音乐品味，我知道基思会成为我永远的朋友，乔和我都很不舍得他离开。

我们沿着泥泞的道路从伊基托斯前往圣弗朗西斯科·德·奥雷亚纳（San Francisco de Orellana）。最后一段道路是一条穿过农田和次生林的泥泞小路。每次到河边，我们就要用上充气筏。现在水位高涨，我们似乎一直在渡河。许多村庄都干净整洁，对我们的行走来说几乎是好得过头了：整齐的篱笆后面是漂亮的小木屋，牛羊将草地啃

得相当平整。在伊基托斯美好的圣诞节放纵自我后，这对我们来说是个简单的热身操。

过了奥雷亚纳，一切都变了。我们划船横渡从北方而下的宽广的纳波河（Napo River），到达一片至今看到的地势最低的森林；回顾起来，我当时可以立刻从谷歌地图上知道我们正渡过一片会被洪水淹没的河流三角洲。但当时我习惯在河边走，没有意识到这是愚蠢的行为。接下来的25千米给我上了一课，我们整整走了十天。

第一天，我们立马遇上了浓密的林木和深水。请你想象一下最茂密的荆棘灌木，上面结满锋利的藤蔓和带尖刺的棕榈叶，接着，请想象这些东西全被泡在满是泥巴水的游泳池里的场景，然后，你只用一把近46厘米长的砍刀在泳池里行进。在树叶最浓密的地方，5米的路要走5分钟。第一天，我们行进10小时，只走了2.4千米。有时候，水深及胸，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脚，看不到前方水下的东西，得在尖刺中摸索着前进。那天，我们到最后竟没有地方扎营，到处都是树和洪水，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挤出林木线，乘充气筏去下游找一块空地或村落过夜。我们用全球定位系统标记走到的位置（这样第二天早上才能返回原地），然后出发去下游。划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发现一块凸出的高地上有一片房舍。我们问居民能不能让我们留宿，他们同意了。我们给他们一些米和鲑鱼准备饭菜，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在小屋里搭起吊床。

2009年1月25日，我们付给一名当地人10新索尔（2英镑），请他用船带我们回到前一天步行抵达的上游地点。他把我们送下船时仍然不确定我们在做什么。

“你们要再走回来？”他讶异地问道。

我们的确是要再走回来的。可怕的一天！

我们开始走的时候是早上九点半。我们带着乔的一个较小的背包、两把大砍刀、一只罗盘、一套全球定位系统、一台摄像机、两包烟（基思对我们的影响还未消退）、一个打火机、一只头灯、一个紧急无线电示位标、1000克木薯粉和500克糖。

我们一出发，地势就开始往下降。一开始，我们涉过及腰的水，之后水越来越深，淹到了胸部。

我观察到一些之前从未预料到的事：当我们整天在水下握着砍刀后，砍刀变得轻多了；如果不想让5厘米长的尖刺刺进膝盖和腿胫，我们要走得很慢才行；尖刺太可怕了，我穿着橡胶靴，尖刺可直刺而入——不骗你，刺进脚指甲、刺进膝盖骨——用力把它拔出来时，旁边的地方会隐隐作痛，而且几乎都会有轻微感染。

我们轮流打头阵，也轮流丧失信心。我知道，境由心生，乐观积极才能让此行令人振奋又充满挑战。但在我消极的时刻，当我被叮、被刺、被咬，或三者同时发生的时候，我几乎陷入了恐慌，想着到底要怎样才能脱离这个针尖地狱。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

乔也有低落时刻，在我比他坚强勇敢时，我可以感觉到。但是，他每次都能很好地平复。

这是巨蟒的国度，还有许多水虎鱼，我仍然很讶异于我们从未被它们咬过。当时，我们很确定距主河道这么近的地方不会有鳄鱼，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被许多鳄鱼环绕着。事实上，除了最大型的黑凯门鳄（以及这洪流外的美洲豹），这些动物全都不想攻击我们。我们对它们来说都太过巨大，难以被吞食。我们越往前走，就越不觉得野生动物是威胁。在写亚马孙时，人们会很自觉地去推广那些传说，把这个地方描写得仿佛危险就潜伏在每根原木之下。然而，事实是，虽然这里有潜在的危险，但人类成为猎物的可能性远比人们想象中的低。对未知的恐惧是这种谣言和文饰最大的起因，事实上，我觉得和乔穿过丛林比在伦敦闪避车流和扒手还安全。

那天下午，森林里的水越来越深，我们无法继续行走。我试着把帆布包举在头顶上，但我的脸已经半淹在水中，因此行不通。我没有惊慌，反而发现这种挑战激发出了我的潜能：我已经完全恢复，在面对野外真实具体的压力时，我的大脑以最佳状态运转着。我们只须适应并且找到方法继续前进。随着情势持续发展，我心生一计，让我们得以继续前进：乔要在河上给筏子充好气，带上帆布包在河里划船，我则带着大砍刀在树丛间游泳；因为船一旦在荆棘堆里行进，马上就

会被刺穿，所以，乔必须在河上。乔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因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一向喜欢用走的，但唯一必须徒步（或者在这种状况下游泳）的人是我。

森林和河的界线很模糊，没有河岸（河岸已在水面下），只有一片汪洋直接涌入丛林。

这个计划不太明智。游泳并不是我的强项，再加上我穿着橡胶靴拿着把砍刀，这让我倒抽一口气。我在森林里噼里啪啦地前进，每到一棵树，就攀着它气喘吁吁地休息一会儿，再以受惊吓的猫的泳姿投入洪水中。最后，我们抵达一块高地，抓着树根爬上河流的陡岸，全身沾满污泥。游泳结束，我的肌肉颤抖着，精力也耗尽了。我把筏子放了气，继续向前走。前一天晚上，我们已经用全球定位系统标记了位于下游的村庄西埃帝·德·胡里欧（Siete de Julio），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只剩300米路了。

最后300米花了我们一个半小时。我们遇上四五次水障，之后终于摆脱困境，浑身尖刺伤，湿淋淋地进入村子。

我们洗了澡，穿上干衣服后，立刻又觉得自己像个人了。我们吃上一顿鱼排餐，我确信鱼是用奶油煮的，但乔坚称不是，他说得对——那条鱼是用它自己天然的鱼油煮的。配着米、丝兰和印加可乐，我们把它吞下了。

隔天清晨风和日丽，森林非常平静，虽然水深及胸，但林地开阔，让我们无须砍伐太多就能通行。蚊子也不是太多。

从地图上来看，前方有条叫阿屯古查（Atuncocha）的支流由北而来，阿屯古查河的另一端是一条等高线。基于阿屯古查河自西北而来的角度，我们决定离开亚马孙河主河道，朝东北方直接向这条支流前进。

由于过去两个小时没看到水面以上有土地，因此，下午四点时，我们决定找到地方扎营后就停下来。我们现在已经身处内陆深处，无法搭船去下游并避开洪水，因此无论如何都得在洪水里扎营。情况看来不太乐观：这里距离阿屯古查河还有700米，森林聚拢起来，而且成

了密林，我们无法在这儿搭吊床，因为树都太细了，无法支撑我们的重量。

到了五点，我找到一块位于水面上的地，1.83米长、0.91米宽，我想，只能在这里扎营了。但没多久，乔在森林里又找到一座3.05米×4.57米的小岛，我们就在那里扎营了。我们的吊床在水上，不过水深只到脚踝。重要的是，有地方生火煮饭。然而若是水位在夜里上涨，我们就有大麻烦了。黑暗中唯一的选择就是，将筏子充好气，让它能跟着水位一起上升。我们把筏子固定在一棵树上以确保安全，因为夜色太黑，我们无法行动，林木也太密，无法乘船穿越，我们必须坐着等待黎明。

写下这些是为了提醒自己：我们即将面临多么惊人的时刻。距离巴西最高水位期还有六个月，高地快速消失，每天我都自问，这次探险是否有可能完成。

2009年1月26日日记：

只要水位再上升一点，这段路就不能走了，有时候我们只有头部在水面上。我们经常必须原路折返，选择别的路径，因为水实在太深了。现在很有趣——我怀疑一年后我是否还会这么想。

1月27日，我们起床时发现，尽管夜里下过雨，但水位没有升高。我从吊床上跳下来，踩进超过15厘米深的水里，全身上下只穿丛林靴。我发现我的湿T恤、湿裤子、湿袜子都还是脏的，我没有照惯例在前一晚清洗它们，我骂自己没能更加镇静沉着。

这座土地坚实的岛是动物的避难所，帆布包上的每个缝隙都有蜘蛛、甲虫、千足虫或蚂蚁栖息。我们拔营后，水位又立即升高，草木变得茂密起来，我们泡在棕色烂泥里，花了几个小时在高到下巴位置的繁密灌木丛间开道后，终于看见前方有些微亮光。阳光洒进森林，我们穿过森林后，看到一潭牛轭湖，湖上长满各种想象得到的尖刺植物。我们将筏子充好气，穿过多刺的草木，小心翼翼地前进。这湖很深，但另一边直接通往森林。我们必须待在船上，在枝干下缓慢行进，穿过边缘被荆棘覆盖的巨大百合叶。

这段危险的航行就像在玩电流急急棒，必须沿着金属线路穿过金属环，但不能碰到它，以免触发警报。我总觉得，充气筏要破了，我们会陷入棕色泥泞的鳄鱼栖息水域。

最后，这片地方终于开阔起来，我们进入目标河流——阿屯古查河。我们从西埃帝·德·胡里欧开始走，一天半后抵达这座峡谷；走过这3000米路就像取得了一次真正的胜利。我们的眼睛还因能够聚焦于远景而高兴着，身边环绕的水上空间让我们恢复了活力。我们像美国人一样高兴得大喊，划船横越峡谷，来到期待已久的可以被视为等高线的唯一高地。

圣罗莎·德·阿屯卡那（Santa Rosa de Atuncaña）位于阿屯古查河的河口，在亚马孙河主河道的岸上。我们抵达那里时，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被邀请入住一栋木桩上的房屋（所有人都乘独木舟进出房门）。那木桩是我见过最高的，大约离地五米。有个醉酒的男人愿意带我们去下一个村庄罗卡艾特那（Roca Eterna），但到第二天早上时，他喝得烂醉，我们只好离开他，继续自己前进。

我们离开圣罗莎，前往罗卡艾特那时没有食物，也不知道距目的地多远，因为罗卡艾特那没有被标在地图上。我们猜想大约需要三天的路程，但村里的店铺什么都没有，因此，我们离开时只带了一袋潮湿的盐。

那天早上进度缓慢，因为高地上林木茂密纠结，我们必须远离河岸，进入更加开阔的洪溢林。我们在一片神秘世界里滑行，所有景物都映照在水面上，漂流前进时，我们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帆布包在背上，漂浮在身后；防水的帆布包真是太宝贵了，若是没有这样的背包，我们不可能这么走的。它们是厚厚的100升容量的收卷式开口的独木舟背包，尽管它们多数时候都半淹在水里，但里面的东西全是干的。

到了下午四点半，我们只走了1500米。我们决定用全球定位系统标记出位置，然后划充气筏到下游的罗卡艾特那。由于时常泡在水里，乔在涉水时觉得很冷，比我还吃力。

我们计划早上再折回来继续行走。这样来来回回的步行让我不快，但至少折返前，我们已经吃饱了，身体也干了，还买了补给

品，我也找不出别的办法。我们已经在一点一点地朝前方遥远的目标推进，而且，我们至少有一个可行的办法让我们得以继续前进。

就在我们漂离河岸进入亚马孙河主河道时，炙热的阳光洒在身后。我把帽子转到后面，避免颈部被晒伤。前方暴风雨来势汹汹地逼近，风势转强，浪也变大，当黑麻麻的雨幕打下来时，乔扯开嗓门高唱宗教歌曲。那种雨砸在脸上就像人跳进冰湖一样，而每一滴打到我时，我都觉得像被冰雹打到那样痛，因此，我又把帽子转向前，保护眼睛。

这一段的亚马孙河有3000米宽。我坐在约1.22米宽的充气筏里，漂在河上，在经受惊涛骇浪和狂风怒号时，我看到筏子上有个安全标志写着“有溺水风险时请勿使用”，这真是让人觉得好笑。

我从英国人的忸怩性格里挣脱出来，加入了歌唱的行列。因为不会唱任何西班牙语的宗教歌曲，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全速唱起了《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这么戏剧化的行为很合乎情境，而乔和我唱着截然不同的歌曲也没关系，我们相隔3米，在雨中几乎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我们相视而笑，就好像赢得胜利般。身处暴风雨中，我们渺小又脆弱，但我们用两根手指对着亚马孙河以及过去一周在浑水里的行进比出愤怒的手势。

等到雨停风歇，我们休息、漂流了一会儿，看到罗卡艾特那就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山丘上。我们沉着地划向一排独木舟时，遇上约二十名神情好奇的孩子，他们帮我们收起充气筏。之后我们浑身湿淋淋地爬上岸，去村里见村长马库斯。两天前，我们在圣罗莎遇见过他。

再次远离大雨和潮湿后，我们满怀感激之情，啜饮着热香茅茶。那是一种甜花草茶。

那晚我算了一下，平均每天走2.5千米是个很难看的速度，照这么走我们可能要走上7年！就算不计算必然要走的道路以及旱季的影响，我确定，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也要再花3年。

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我们必须改变策略，远离河边。我们必须离得够远，才不会受到洪水的影响。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走完了到罗卡艾特那的淹水路段，之后一天，我们走坚实的路面抵达奥兰（Oran）。奥兰是个镇而非村庄，有五金店、餐馆和酒吧。我们入住当地唯一的旅馆，旅馆给了我们一间破旧的房间，里面有张很糟的床，晚上六点到九点供电。要洗澡的话，我们仍得去河边，但几周以来，我们头一次有自己的空间，已经够奢侈了。

2月1日，我们休息一天，等待记者马特·鲍尔（Matt Power）。他要和我们走一小段，为《男人志》（Men's Journal）杂志写报道。乔和我在奥兰悠哉地处理些琐事：充电、清洗装备、喝啤酒，到广场看女子足球。

另一个要来的人是厄休拉（狮子狗和摩托车的主人），我答应她跟我们一起走三天。她搭伊基托斯的快船，隔天早上八点会抵达这里。马特搭慢船，会比厄休拉早六个小时（凌晨两点）抵达。乔和我决定不睡了，等马特来。

马特到的时候，我和乔已经喝了一点酒。船靠近时，马特站在船头，咧嘴笑着跳到草皮河岸上，伸出手用纽约腔问道：“我想，你是斯塔福德先生？”

“嘿，马特，我们去喝酒吧。”我回应道。

马特很兴奋，我们聊了几个小时，然后决定在第二天出发前休息一下。之后，感觉只过了几秒钟，闹钟就响起来了。我知道厄休拉快到了，便心不甘情不愿地起了床。

我很后悔邀请了厄休拉。接待马特是一回事——这对探险有益，能给我们带来非常需要的知名度——但厄休拉的来访比较没道理。她穿着紧身牛仔裤以及一件非常贴身的T恤，画着大浓妆，踉跄地从船上下来。这下有趣了。

我们找到一个名叫马里奥的老头儿当我们的向导。他有一双值得信赖而热情的眼睛，用面粉袋装着他的装备，把面粉袋的带子缚在额

头上。他有六十二岁了，但穿过森林时，可以比我们所有人快上两倍。马里奥熟悉小镇后面的山丘，而我们想前往更高的地方以加快进程。马里奥带领我们穿过了空旷的水牛牧场。我没有定下任何原则，而厄休拉想牵手同行。我牵着小一号的秘鲁夏奇拉（Shakira）穿过这些原始的异国牧场时，可以感觉到背后马特的目光。他一定在想自己从美国飞到这儿到底要写些什么，不过他只是心领神会地微笑着，穿着全套Gortex Pro系列和相配的绑腿跟着我们。

我们跃过延伸到小径上的像加长型礼车般大小的板根，以及瓶装水般清澈的涓涓小溪。尽管有来客，我们仍每天走了15千米左右。以厄休拉的穿着来看，她算走得不错了，这已经远远超出她的舒适范围。她走了三天，绝大多数时候都走丛林小径，穿过小溪，通过原木桥，直到抵达一个叫萨拿利罗（Sanalillo）的部落。我们花了三天抵达萨拿利罗，而马里奥通常一天就能走到。

在第三天，我们进入一片开阔的土地，是丛林最近被砍伐过后形成的，残余的树桩还慢慢燃烧着。这个亚瓦（Yawa）村庄正举行集体劳动，居民全都在土地上工作，喝着声名不佳的玛沙托。红脸的印第安人毫不迟疑地欢迎我们。我们走了三天的山坡路，觉得这种发酵饮料真是好喝。在当地学校里待了一晚后，我安排一艘船送厄休拉回家。

接着有位玩冰上曲棍球的不凡摄影师皮特·麦克布赖德（Pete McBride）和马特合作，帮马特的文章拍些照片。他们两个都很喜欢这趟步行，马特有皮特做伴也放松了不少。他们吃的能量棒和他们的西方观念现在对我来说几乎是陌生的，我觉得他们有点自以为是，也过火了。

尽管精心设计过路线，我们在接近丛林小镇佩瓦斯（Pebas）时还是得渡过大片的洪水。有时候水深及腰，接着又深及胸部，我们必须将所有行囊放进充气筏，游过黑得发亮的积水。

“天啊！”皮特在及腰的水里大叫，他在水里看到附近有个庞然大物。我转过去看，发现那似乎是一条身体弯弯曲曲的阔嘴大鲶鱼，潜藏在皮特和我之间的深水处。怪异的是，这条怪鱼完全不怕我们。

我叫住年轻的向导柏那贝特，问他是否知道那是什么。“电鳗。”他笑着答道。我问他有没有危险。“不要惹它就好。”他说。

抵达佩瓦斯后，我才知道这些亚马孙河电鳗非常危险，它们可以放出500W的电，能致命（不过，据说最常见的死法是被电晕后溺水）。电鳗位于掠食性动物的顶层，位于食物链顶端，因此对谁都不畏惧，因为没有任何动物猎捕它们。我展望未来四个月的水中步行，笑看这荒谬的处境。我们在佩瓦斯与两个美国人道别。他们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并且卸下了许多时髦的行头。乔和我平分他们的头灯、裤子，甚至包括他们穿过的袜子。我们很感谢这两个美国人抛下了这些东西，接着将注意力转向东边的哥伦比亚。

通往哥伦比亚的毒品走私路径

佩瓦斯是座秘鲁老城，没有道路可以进去，交通完全仰赖河流，而且有庞大的同性恋人口。不知什么原因，秘鲁的同性恋者比其他国家都花哨、夸张，也许是因为在这个讲究男子气概的文化里，想要反抗潮流就得走极端，其结果就是，在佩瓦斯俯瞰着亚马孙河的镇广场上，一队队娘娘腔的排球员在球场上扭扭捏捏地走着。惊人的是，他们走动和互动时，举止就像女人，但一开始打球就“变成”了技巧高超的男人，以惊人的力道将球从自己的半场拍到对手的半场。筋疲力尽的对打结束后，他们又迅速转换回娘娘腔模式，以夸张的亲吻和少女般的咯咯笑声庆贺。

自称“佩瓦斯之王”的知名画家弗朗西斯科·格里巴（Francisco Grippa）——朋友都叫他潘乔（Pancho）⁽⁴⁾——住在俯瞰全镇的豪宅里。他让每个行经佩瓦斯的旅人免费住他的宅第，这让镇上唯一的旅馆大为光火。弗朗西斯科说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虽然是秘鲁人，但对自己的旅行经历自豪，也喜欢和造访该镇的人见面。客人如果愿意，可以买他挂在宽广画廊上色彩鲜明的巨幅亚马孙画作。

弗朗西斯科年轻时算是个花花公子，他的现任太太年轻貌美，他过去在城堡般的宅第开的派对至今仍是镇上茶余饭后的话题。

他招待过前年游经这里的斯洛文尼亚的长距离游泳好手马丁·斯特莱尔（Martin Strel），也很乐意为我们的愚行帮一点忙。他对我们很好，我们在他家待了几天，讨论如何从此地徒步到巴西。最后，我们很不情愿地接受现在必须经由哥伦比亚这个结论，很多人提醒我们小心那些危险的哥伦比亚革命军以及毒梟。

弗朗西斯科忠心的管家沃伦为我们找了一名似乎非常专业的向导，名叫璜·罗德里格斯。他是个伐木工，曾在军队待过，是我在秘鲁期间见过的最壮的秘鲁人，他的手臂和双腿使他看起来像健美先生。要不是我知道方圆约800千米内没有健身房，我绝不相信他从没去过健身房；他这么壮是因为他经常拖着巨大的木条在森林里长距离行走。璜很热心，对步行很感兴趣，他熟稔地谈着此地到哥伦比亚边境之间的区域。

他说去哥伦比亚有很多条路，但其中很多条被伐木工和毒品走私犯占用了。我立刻喜欢上了璜：他很专业而且聪明；此外，和许多与我们一起走过的退伍军人一样，他曾在外游历过，因此有经验和智慧，这是从未离开过自己那一小方土地的人所缺乏的。

我们带了21天的粮食出发，这是到目前为止带过最多的一次，背包非常重；璜带了一个大面粉袋，把绑面粉袋的布带缠绕在额头上。倾盆大雨已经成为常态，我想不起来上次晴天是什么时候了。

我不确定是否有特别的原因，但乔和我很快就觉得步行变得艰难了。我们背了21天的粮食，背包变重了；走了许多平路后，我们不习惯走坡路了；璜能很轻易地冲在前头。乔比我还要觉得艰难，我开始有点担心他的健康，他在晚上会胃痛，偶尔还吐血。无论是哪个原因，乔和我都走得异常艰辛。璜显然有点失望，也很讶异于我们无法快速行走；我们得多次要求休息，自己也很困惑自己为什么这么虚弱。

我们途经一个小渔村，璜有个叫博鲁加的朋友在小路旁工作，他问我多个人分担重量是否会有帮助，我立刻接受了这个提议。博鲁加真正的名字叫莫希斯·索里亚·璜内。璜问过后，他立刻同意加入探险。他说远行时长三个星期，他需要五分钟和妻儿告别。博鲁加和璜以前一起在森林里工作，他们都习于背重物以及远离家园待在丛林里。他们负重的能力相当惊人，乔和我背团队装备（通信设备、烹饪工具和医疗器材），大部分食物则由他们两人分摊。回顾起来，他们是整趟行程中最棒的向导，两人都是退伍军人，都曾是伐木工，生来就属于森林，甚至比东戈兄弟还熟悉森林，此外，两人都很健壮，尽管背上负有重物，仍能毫无困难地快步行走一整天。相比之下，我显

然是最弱的。其他人身高都在1.75米到1.68米之间，而我有1.85米高，但对于背重物在密林间行走这方面，他们都比我强。

然而，几天之后，连绵不断的雨让乔的身体状况恶化了。空气变冷以及持续处于潮湿环境似乎对乔的健康有害。

一天早上，我们在一个丛林村庄醒来（那是我们开始横越大片渺无人烟的雨林之前的最后几个村庄之一），我很早就起了床，和璜去看我们要走的小径。那天的水位显然太高了，小径全都被水淹到胸部位置或更高，璜和博鲁加没有和我们一样的橡胶干背包，无法背着背包游泳而不把里面的装备弄湿。所以，我们还不能离开村庄，决定等一天。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乔。

在计划这段路程时，我犯了两个基本错误。

首先，我对璜计算的时间信以为真。当他说这段路要走21天时，我相信了，因为这听起来是个好消息。我应该依照地图来估计，但我没有。

第二，我让乔和璜估算和采购食物。走了7天后，我们只剩下3天份的粮食了，那时，我估计还得走上15—20天才会到哥伦比亚边境。

我们远离了河岸，离得比我预期的还要远，甚至走出了我们1:1000000比例尺的地图范围，那张地图只涵盖河边的区域。我有这段秘鲁境内路径1:1000000比例尺的地图，但河流标示得不是很正确，因为那是张航空导航图，退一步来说，要从1:1000000比例尺的地图上找到精确的位置也很困难。谷歌地图显然是个解决问题的工具，但有一大片可恶的白云笼罩着整个区域，完全挡住了下方的丛林。

我们减少配给，开始在林间寻找食物。经过两天少量配给后，我们进入可能的营地时，乔转过来对我说：“上帝的恩赐！”

“好啦！好啦！”我自言自语，心想他又要开始一段关于上帝的长篇大论了。

看到一只巨大的红腿陆龟在落叶层里筑巢，我才明白他所指为何。巨型红腿陆龟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濒危

动物的国际公约)中的分类是“无危物种”，即不是受到威胁的物种。我们缺乏食物，因此完全没有浪费时间去担心道德问题。

博鲁加肢解那只龟，璜生火，我则聚精会神地学习他们的技巧。璜的生火术和多数人的不同，他完全没有用到小枝条，而是找来5.08—7.62厘米厚的干木头，将其劈开；然后，他把干的那面朝上，当成平台，在湿地上生火；接着，他不断削着另一块原木，制造刨花，将刨花堆在平台上，再把大块原木围着刨花排成一圈（就像轮辐一样）；之后，他用大砍刀从树上切下来的树脂点火。尽管结结实实地下了好几天的雨，但他用了约莫十分钟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博鲁加以大蒜和油烤的乌龟肝也令人屏息。

难以置信的是，我们隔天又找到一只乌龟、一些野生西红柿、各类坚果和一些野生香蕉。博鲁加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惊奇，证明他也是一个能干的渔夫。我们扎营时，他不见了踪影，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抹微笑，手上提着鲶鱼、鳟鱼和螃蟹。他尽可能地把功夫传授给乔；乔也开始爱上钓鱼，而且越来越熟练。尽管未来两周只剩三天存粮，但我们克服了困难，而且士气高昂。我们扛的食物总计如下：

4000克米

2000克盐

13包泡面

一小包味精

没有糖、鲔鱼、木薯粉、咖啡和奶粉，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行经的废弃伐木营地里有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向伐木工人要点食物吃。我们很难在丛林里取得的食物就是碳水化合物，这也是伐木工总是背一大袋木薯粉，其他东西带得不多的原因。

我的经验尚不足以分辨假珊瑚蛇和珊瑚蛇，但我们在河流附近看到好几条体形庞大的红黑黄条纹的蛇。俗话“红与黑，不必畏；红与黄，杀人悍”指的就是彩色的条纹蛇，但这句话源自中美洲，在这里不适用。这些蛇全都有可能致命，它们的毒液是神经毒素，会攻击中枢神经系统和肺部，受害者会因窒息而亡。

通常我们没有遭受珊瑚蛇攻击的危险，因为它们的嘴小、毒牙短，无法穿透靴子。但是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河里洗澡，随手将肥皂盒往岸上一个近便的洞里扔，结果惊醒了一条珊瑚蛇。它以闪电般的速度滑出了沙洞，距离我光秃秃的脚趾只有几厘米之遥。

启程以来，我们六天内没有见到半个人影，但看到新踩的脚印时，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这时候笔记本电脑已经没电了，我仍试着用太阳能板充电，但这在连绵阴雨、阳光很少露脸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接下来的两天，我们跟着脚印走，却完全没有看到前头人的踪影，对走私毒贩的恐惧在内心深处烦扰着我，然而我并不觉得孤独。但是，我们需要食物。

2009年3月2日，我们在河岸高处扎营，仍能看到之前的洪水残留下来的落叶层，从而得知最近水曾淹到三米高——几乎淹到我们的营地。博鲁加消失了一会儿，回来时一脸淡漠地抽着烟（我们的烟五天前就抽完了），说前方有个伐木营地，工人们有食物。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我们已经扎营了，因此决定按兵不动，第二天一早再经过那个营地。我们抵达时，许多强悍的秘鲁伐木工正在吃早餐，大声谈笑。我们马上拿到了意大利面、火腿还有甜咖啡。在配给减量的状况下，食物带给我的愉悦超乎想象，我们狼吞虎咽，每吃一口都非常满足。伐木工人们有个令人推崇的信条，就是要彼此照顾，因此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这些人一点也不在意我的存在，只是拿我的探险取乐。

他们消耗了森林，但我必须说，他们过得相当舒适：有具备冷冻柜的电动船和猎枪，可以猎杀任何会动的生物，在工作时吃得很好，也可以把肉拿出去卖。那天，他们射杀了一只绒毛猴，我看着一个近似人形的身体被剁碎放进锅里。它的幼猴在一旁看着，不断尖叫，让这个场景更加戏剧化。出于好奇，我吃了一小块猴尾巴。和许多住在森林里的原住民部落不同，这些人的存在破坏了森林的生态平衡。

伐木工人说我们已经走到了小路的尽头，但为我们指出了方向。下一段路起先看来并不难：我们抵达阿皮丘阿里河（River Apicuari），然后只须沿着河走，直到再次接上亚马孙河。这在理论上很简单，直到我们看见这条河多么蜿蜒为止。这里仍是谷歌地图上

被云朵遮蔽的区域，因此我估计，如果沿着河岸走，100千米的路可能会变成200千米。

我们当然想走直线，但如果远离河道，我们就无从得知何时甚至是否会再次接上亚马孙河。我觉得无法掌控，只想揭开头顶上的遮蔽物，看清河的形貌，才能订出计划。我们要怎样才能画出正确的地图？

就在我们思索这令人沮丧的问题时，我突然想到，我们可以雇请伐木工开船带我们往下游走，走过的路线会记录在全球定位系统里，这样，我们就能画出详尽的河流地图，还可以在亚瓦部落普拉塔诺（Platanal）买食物，接着搭原船返回伐木营地。这同时解决了两个问题——食物和地图；而且只用付出些微的代价：在狭窄的船上待几天。

我们乘独木舟往返，整整坐了三天两夜，但计划奏效了，我们在普拉塔诺买了10天的食物，并且估计8天内徒步走回这里。现在我们可以做出计划，白天多数时间远离河边纠结缠绕的丛林，晚上再回到河边扎营、洗澡和煮饭。

花时间侦察地形很值得，虽然很耗时间，但我们再次掌握了行程。我很高兴我们克服了困难，能继续向前。事实上，我们只花了6天就抵达了普拉塔诺。在和亚瓦印第安人聊着我们的旅程时，我将笔记本电脑和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放在太阳下充电。我争得17分钟的上网时间，够写博客和回复重要信件，但在我按下“发送”键和我妈通信前，屏幕就黑了，通往西方国家的小窗口再次关闭。

我们回到普拉塔诺时，一名叫维森特的亚瓦老人问：“你们为什么不走小径去哥伦比亚？”我对这明显矛盾的说法不以为然，向他解释道，伐木工告诉我们没有路了。他说，有路，但离开了河道，朝正东通往哥伦比亚，到达洛雷托亚库河（River Loreto Yacu）的边境检查站提耶拉阿马利罗（Tierra Amarillo）。

我们雇维森特当向导，带了6天5人份的食物，朝正东方向前往哥伦比亚。我们知道自己将会极度依赖维森特对这些路径的了解，因为这些路很古老，而且有几条路完全封闭了。和伐木工相比，维森特很

温顺，讲话轻柔，但他知道路。第一天，我们走了13.3千米，这是几周以来走得最远的一天。

我们抵达一条新河流，开始蜿蜒而行，沿着连绵的河湾走意味着我们不会走太远，但这条河非常曲折。我们决定从一道河湾的顶点走直线到另一个顶点，但在只能看到前方15—20米且没有地图的情况下，知易行难。我们远离河岸，试图走更直接的路线，但很快就又接上了河流。这条河很容易辨识，因为这个区域只有一条这种大小的河。

璜如鱼得水，走在前头开路，在雨中从不退缩。他拿大砍刀又劈又砍，缓慢但持续地向前推进。大约一小时后，我们看到了新踩的足迹，以及用砍刀劈出来的林间空地。自普拉塔诺启程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人类的踪迹。我立刻想到了毒品走私犯，尽管浑身湿到骨子里，满身都是汗垢，但我的感官变得更加敏锐了。

接着博鲁加开始大笑。“看那边！”他指着，“那是我们吃午餐的地方。”我们顿悟后全都哀号起来，那些足迹和大砍刀的刀痕都是我们留下的。过去的一个多小时里，我都没有用罗盘，只是盲目地跟着璜，结果我们整整绕了一圈。我们从顶点横越后，的确是往上游前进，我们以为是继续向前的，未料却转了个弯，劈出一条回到起点的路。像机器一样砍了一小时的璜，在这荒唐的错误中最受打击。我们扎营，维森特说第二天早上他就要回家。

那天晚上六点，我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搞什么？”我跳下吊床，在阴暗朦胧的森林里张望。

“砰”，又是一声，乔冲进树丛。维森特是唯一带猎枪的人，而他不在营地。“他一定去打猎了。”我心想。尽管好奇心被挑起，但我刚洗过澡，不想穿着干净干燥的衣服和脆弱的卡骆驰鞋在黑暗中冲进森林。

他们回来时，带来一个坏消息（从我的观点来看）：维森特射杀的不是一只普通的动物，他射杀的是一只獾。所有种类的獾不是被列为濒危物种，就是易危物种，这只大型草食性动物是如此温顺，我不禁感到难过。

维森特是亚瓦猎人，他只把獾当作食物。我理解他的观点，问题在于，它对我们来说太大了，不易搬运，因此，我们只能食用一部分，其余的会被留在森林里让其他动物吃掉。那是一只小牛大小的怀孕的母獾，我们和它的死有关，这惹恼了我。然而，它现在已经死了，我很确定我们必须善加利用它的肉，能带多少带多少。璜、博鲁加、乔和我开始切肉、抹盐，尽可能在火上烟熏，维森特会带他拿得动的分量回部落，我们也尽可能带走能负荷的分量。

这个意外增强了我的信念——不带枪行走是对的，我不希望这次探险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狩猎闹剧。

我们离哥伦比亚的边境不远了，但举目所及没有路径，我们转向四面八方都是茂密阴暗、绵延数里的森林屏障。我们也没有沿着任何河流前行。我在全球定位系统输入眼前的河流穿越哥伦比亚边境处的坐标，得到一个罗盘方位角；接着，我们边走边开路，直线杀出丛林。这里的地形很陡，但我们在树丛里什么都看不到，就像在滂沱大雨中开车，雨刷还出了故障，因此透过挡风玻璃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们依赖罗盘，而且必须相信：方位角是正确的，我们在几天内就会抵达边境检查站。至于在那里会看到什么——武装军队、走私毒贩、铁丝网、入境护照检查站、礼品店还是游客中心——我一点概念也没有。

接着，就在我们极度仰赖全球定位系统的情况下，它出故障了，因为内部潮湿，所有的控制钮都失灵了。我们沿着罗盘方位角前进，前往一个我们全都认为是部落和哥伦比亚边境所在的位置。我们只靠感觉或直觉判断前进的距离，这天走了7000米，或许8000米。

有时候人们需要一点运气，但我们的精确度无与伦比。从普拉塔诺出发后的第四天下午四点，我们听到了音乐声，没多久就到了在提耶拉阿马利罗举办的一场派对。这个村庄位于一块清理过的林地上，在洛雷托亚库河河岸；破烂的茅草屋里住着醉醺醺的友善的原住民，他们请我们喝玛沙托。我们到哥伦比亚了。

这次探险的秘鲁路段现在结束了，花了11个月又两天，只落后原本估计的时间4个星期。乔和我都疲惫不堪，需要休息和时间摆脱酸痛以及寄生虫感染。我们已经在连绵不绝的雨中步行了两个月以上，没

有好好休息过，我的热情、能量和生命力在一点一滴流失，屁股因为背包而发炎、疼痛，脚已经青肿，肌肉衰弱无力。我梦想着有张床的旅馆房间，能有洁白的床单和空调。我不想见到任何人，如果让我独处，我会因为筋疲力尽而痛哭。我只想睡觉。

2009年3月4日日记，提耶拉阿马利罗：

振作起来，斯塔福德。你听起来就像个可悲的蠢材，到莱蒂西亚（Leticia）待两天后，你就会一切如常；好吧，也许5天。

一如既往，每当我们摆脱丛林，我的心思就会转到令人绝望的财务问题上。我已经寅吃卯粮了，累积的债务没有能力偿还，财务失控的感觉一直让我失眠，似乎也将一切乐趣带走了。

我们抵达的边境处没有护照检查站，因此，我们必须搭船沿洛雷托亚库河而下，再换条船前往哥伦比亚城市莱蒂西亚，在那里盖我们的护照戳章，正式离开秘鲁。我们还要再找一些哥伦比亚地图，然后回到边境，走这段较短的哥伦比亚行程（三周）到巴西。

除了探险之外，这也是一次耗费宝贵时间和金钱的旅程。因为财务的问题，这段期间我无法维持一个四人团队，博鲁加有哥伦比亚和秘鲁双重国籍，所以我只好让璜回家。这名大汉知道自己得离开后很难过，我看得出来，璜的自尊受到了伤害，因为我选了博鲁加而没有选他，团队会在没有他的状况下继续前进。我必须理性，不能感情用事，璜没有护照，无法在秘鲁之外的国家通行，因此，他必须回家。

最后我们在莱蒂西亚待了6天，日记显示，我清醒的时候，80%的时间都坐在计算机前处理之前疏忽的账目和这次探险的行政事务。我们负担不起好的旅馆和空调，只能窝在便宜的旅馆里，在粘满汗水的旧床垫上醒来。我的老同学萨姆·戴森说想来和我们走一段，我为他的加入做了安排。当时，我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追着两名在巴西有门路的人跑，以便取得进入巴西境内原住民保留区的通行证。

之前有人安排我们和两名巴西人——卡沃斯（Kavos）和德怀特（Dwight）——联系，据说他们是为外国电影剧组处理后勤问题的最佳人选。尽管不是剧组成员，但我在2008年出发前和他们在巴西见过面，他们同意帮我取得签证和通行证，但要价不菲。没有这些文件，

我就无法继续前进。到了2009年4月，他们的态度和零进度激怒了我。当时我的压力很大，这意味着我无法和乔、博鲁加一起放松，除非我努力推进此事，否则，我们必须原路返回或绕好几个星期的远路向北深入哥伦比亚，才能让探险继续。如果不想绕远路的话，卡沃斯要为我们取得的通行证可就非常重要了。

大家都说，我们即将行经的哥伦比亚南端是毒梟行走的一大区域，非常危险，但重点是，我们想要完成这场探险，因此别无选择。我们和一名来自哥伦比亚纳里尼奥省（Nariño）的提库纳（Ticuna）向导西诺一起回到边境，再次悄悄地徒步进入哥伦比亚。我们没有被发现。

提库纳是哥伦比亚南部和巴西西部的原住民，我们的向导西诺很安静，而且显然完全不知道丛林的路，最后我让博鲁加走在前头，让西诺一瘸一拐地跟着。由于无法使用全球定位系统描绘河流地图，我们依旧盲目地走着。因为洪水，我们无法离河流太近，但我们很快抵达了连串地散布在小径上的提库纳部落。

提库纳部落最棒的一点在于，那里的人都很热情友善，我们在所到之处都看到了开朗的笑容和招手的动作。在秘鲁见到太多茫然困惑的表情后，我们觉得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转变。部落之间的小径全都严重淹水，每当水高过顶，我们就得乘充气筏划过洪溢林。

我们终于说服一名来自哥伦比亚最后一个村庄的当地人告诉我们“小径”通往哪里，但其他人都说唯一的方式是乘船。我们一如既往地解释，说我们不能走水路，因为这次探险的原则就是步行，他们通常会大笑，接着说我们疯了。

不到四小时，我就懂他们的意思了。在某些地方，“路径”在墨黑的洪水下方十米的位置。我非常专心地划着充气筏，穿过看似狭小到无法通行的缝隙（缝隙里满是如针的尖刺）。充气筏是用很薄的橡胶做的，所以才能收得小小的，塞进帆布包里。我的每一分心思都专注在掌舵和停船上，担心充气筏被刺穿——这不只关系到我们是否得游泳，还关系到能否保住我坐着的35千克重的帆布包。

博鲁加划着另一只充气筏，我们两人的桨不断被周围的荆棘缠住，也被拿来拍下颈背上的蚂蚁。现在的湿度接近100%了，蚊子一直

在我们耳边嗡嗡作响，情况并没有变得更令人不快，我仍乐在其中。这是种很难解释的古怪享受，我认为这项划船的任务之所以如此迷人，是因为我全神贯注在当下，没有余裕思考或担心未来。我的每个动作都会立即产生影响，我忍不住被这种挑战带来的兴奋完全感染。

幸好我们是对的：沿着小径可以通过洪溢林，并于下午抵达一个提库纳村庄。

我们的进度良好，但说得客气点，我的情绪并不稳定，我当时的日记读起来像是对我聘来却不知方向的向导的连串咒骂。我还没学会不为无法补救的事气恼。问题是，这些当地人只打算走到下一个村庄，这段路可能只需要两小时，但我必须付他们和乔的日薪一样的价钱。令人难堪的是，现在我已经不再问某些人的名字了，他们就好像同一个讨厌的人，不断换着躯壳，却有同样的性格，同样优柔寡断而且同样是导航智障。当时我知道自己不可理喻，但那是令我恼怒的来源。

4月2日，乔、博鲁加、杰米（一名十七岁的提库纳男孩）和我进入一个叫圣索非亚（Santa Sofia）的小村庄。那一天是探险的一周年纪念日，因此，我请所有人喝啤酒。我们围坐在塑料椅上闲聊，乔和博鲁加喝多了，一直称赞我是个好领队，我听得很开心也很讶异，因为当时我觉得自己离好领队差得远了。

又过了两天，我们走柏油路进入莱蒂西亚。莱蒂西亚和巴西城市塔巴廷加（Tabatinga）毗邻。

我们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到达巴西。尽管筋疲力尽，但看到哥伦比亚和秘鲁都已在身后，我们相当雀跃。过去的12个月里，我跨越整个安第斯山脉，寻找亚马孙河的源头，下到世上最深的峡谷；我行经红区心脏地带，经过无数防卫心强的部落，在箭尖下被拘禁，还被指控谋杀，一星期又一星期地穿越洪溢林；之后越过声名不佳的哥伦比亚南端——尽管在这最后一个月里，我们完全没有见到毒品走私犯的踪影。

我们必须等我的伙伴萨姆，他在几个星期后从英国抵达这里。我可以接受，乔也可以，我们觉得在此关键时刻应该好好休息。在重新

出发前，给身心充电是必要的。博鲁加在莱蒂西亚的夜生活中把钱全部花光后回家了，我替他的妻儿难过，他们一定等着他拿钱回家。

尽管完成了史诗般的英雄事迹，但乔和我知道，我们即将展开此行中最困难的部分：据说那里有凶猛的部落、全新的语言、更糟的地图、更严重的洪水以及无人走过的雨林；部落之间的距离难以预测。想到即将徒步通过3000千米的巴西路段，我们俩都相当畏惧。

(1) 译注：英制重量单位，27英石约合171.5千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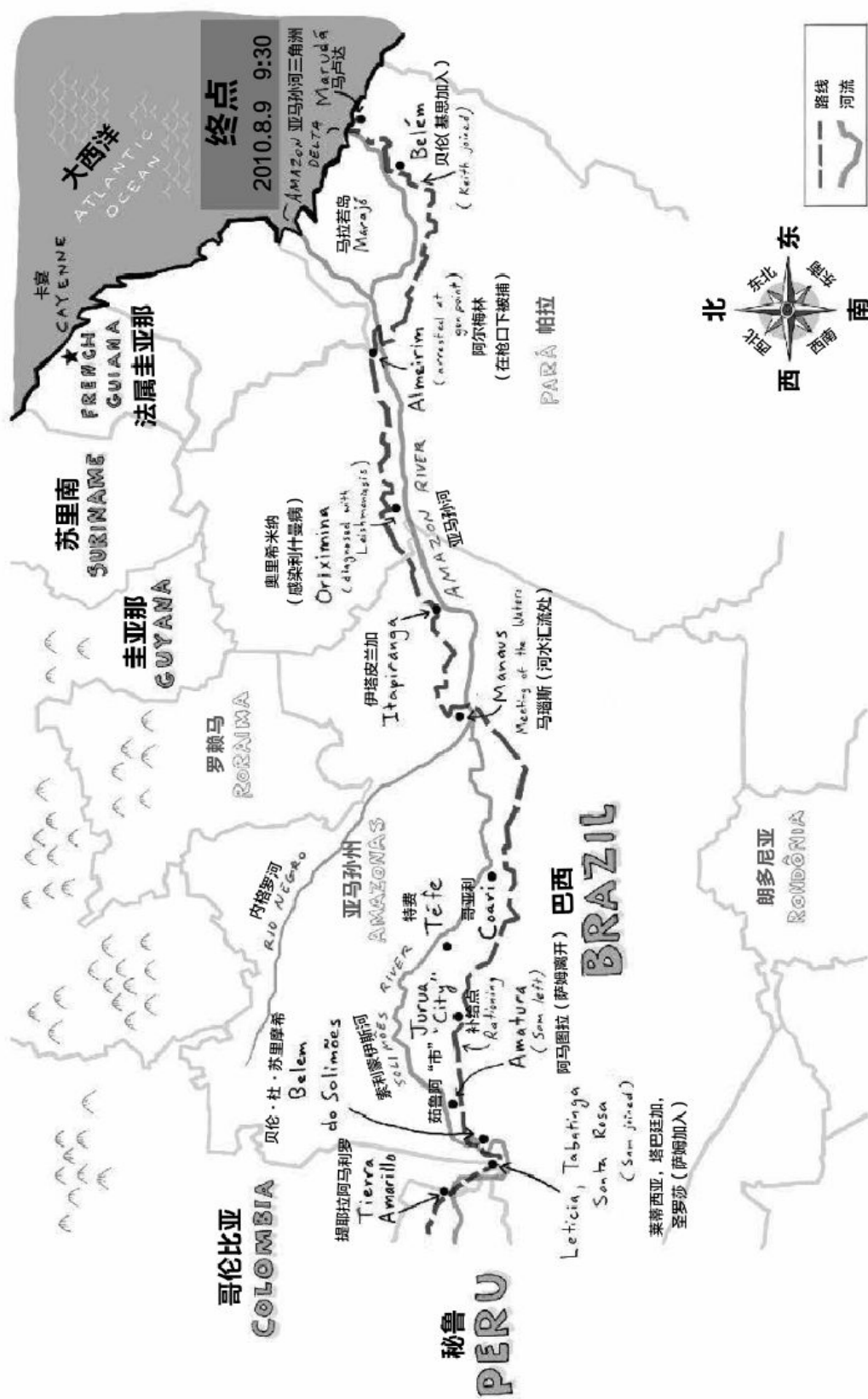
(2) 译注：在低温下长时间暴露于潮湿的环境中，因湿寒引起的脚痛。

(3) 译注：Eddie Izzard，英国脱口秀演员。他在一段关于上帝、耶稣和恐龙的脱口秀中说，上帝在创造亚当之前的6500万年前创造了恐龙，但耶稣到地球传道之后，决定回到天堂调整地球温度，让恐龙灭绝。

(4) 译注：Pancho 是 Francisco的昵称。

Part 4

巴西



进入巴西

办签证和通行证的事会很无聊，我知道，但问题是，这关乎探险是成功还是尴尬丢脸地早夭。卡沃斯有超过一年的时间来处理三件事：可以让我进入巴西并且在探险期间居留的有效签证；进入原住民保留区的通行证；巴西雨林的地形图。我现在已经抵达巴西边境，而他看来似乎一件都还没开始做；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但我和他交涉起来很痛苦。这三件事一件也没完成，我非常愤怒（我原本希望在一年前甚至我离开英国之前就准备好），但我已经付给他1500英镑，所以我现在和他处于尴尬的境地。我选择通过他取得签证，是因为我怒斥了巴西驻伦敦的领事馆，他们已经不再回复我的任何电子邮件。没有地图、签证或通行证，我们的探险就会到此结束。

乔和我入住一家旅馆等待消息。塔巴廷加（巴西）和莱蒂西亚（哥伦比亚）这两个城镇已经合而为一，开放边境，让人们来来往往。河的另一端是圣罗莎（秘鲁），这三个城镇合称三国边境。摩托车骑士从管理较严格的哥伦比亚跨过边境到较宽松的巴西后，会把安全帽摘下来拿在手上；这两个城镇都欢迎观光客（大多是背包客），但能给我们提供的帮助很少，我们拒绝了许多不死心的小贩——他们竭力让我们参加雨林一日游。

4月9日，卡沃斯难能可贵地捎来好消息。他写信告诉我，4月11日，提库纳部落首领会在附近城镇班杰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举行聚会。他已经安排好了：我申请行经提库纳保留区的议题将在会中提出。他说，他们问我是否会拍摄这场会议，这样他们的原住民公共政策意见就能播送出去。

这是一大进展，如果首领们说我可以通过，那就太棒了。这场会议也会让他们在我徒步抵达部落之前先认得我的脸。我很乐意拍他

们，但当时我还没有广播电台的人脉来宣传他们的境况。

这正是我付钱给卡沃斯要他处理的事，因此我很开心。我有点担心这场会议，卡沃斯说会持续一整天，当时我还只会说非常基本的葡萄牙语，因为我过去一年都在说西班牙语，所以，我从塔巴廷加聘请了一位导游当翻译。卡沃斯和他的助手德怀特都警告我这些部落很凶猛。“是全亚马孙最凶狠的。”德怀特这么说，我很紧张。

此刻，我真的认为监管巴西原住民的国家印第安基金会会给我们发通行证，但卡沃斯没有通过基金会走任何官方程序，他说那太困难了。

翻译员、乔、厄休拉（她从秘鲁来看我）和我去见部落首领。我们搭快船从塔巴廷加前往班杰明康斯坦。我天真地想象着在传统的提库纳部落里所有人都穿着传统原住民服饰。

我们抵达一个现代化的城镇，被带到水泥建筑镇公所。各部落约有一百名部落首领和代表聚集在此，他们坐在红色塑料斗式座椅上。

“就我们所知，”提库纳的大头目说，“白人的想法和我们的不同，但他们不再来杀我们了。”

“这是个好的开始。”我扫视群众，心里这么想着。这些首领虽然穿着西式服装，但颈上还吊着美洲豹和鳄鱼的牙齿，有位首领还在他的装饰上加了一只随身听。我身后一名提库纳抄写员正用笔记本电脑记录会议内容。

这个会议不只是为我而开的。来自邻近保留区的首领聚集于此，讨论各项议题和境况。提库纳人很清楚过去的残忍暴行，他们是如此敏感，因此我怎么介绍自己将是关键。

大头目继续说着，讲述故事，提醒族人他们的历史。我了解一些，因此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没有威胁、有礼貌、感兴趣，我瞄了一下右边，昨晚喝了酒的乔，头已经倒向一边，睡得很熟。

到了下午两点，重头戏来了，他们告诉我，如果我能帮助部落，他们就会帮我。我对于他们希望我帮忙的方式仍有疑虑，我因寒碜的

配备而力有不逮。我用蹩脚的葡萄牙语向群众发言，因为他们似乎不希望我通过翻译跟他们对话，反正会议几乎都以提库纳方言进行，翻译也搞不清楚状况。

“我们会让你通行，”在和部落首领们进行过一番冗长的讨论后，大头目最后说道，“如果你能负担今天所有人的午餐费用。”

午餐费总共约25美元，一阵狂喜自我体内升起。我大步向他走去时眼眶泛泪，咧嘴大笑，和他握手。

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这些许可会让我多么振奋。突然间，任何事情又都有可能做到了，这场会议为我注入了新的信心。

三天后，卡沃斯寄来一封电子邮件，说我没有国家印第安基金会的官方许可，但是如果提库纳的首领们都很高兴，那就够了。我知道这样做有点偷偷摸摸，进入这些保留区需要通行证，进入者必须做完医学筛检才能通行，但是当时我已经尽力而为。这些首领让我通行，我们才能有可行的计划。

现在目标非常简单：在巴西尽可能快地赶路。财务问题和时间都很紧张，我必须减少令人分神的事物，努力赶进度。

2009年5月6日，主要赞助商的首席执行官寄给我这封信：

埃德：

展信平安。

自我们上次通信以来，JBS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我们有一些客户拖欠账款或无法在工作完成后支付酬劳，致使我们这个月不能给你津贴了。

我希望在未来几周内能扭转局势，我方有任何变动都会随时通知你。

我很抱歉必须由我通知你这个坏消息。我们依旧会履行职责，也认为这是一项长期投资，希望下次通信时会给你带来好消息。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想谈一谈，可以打我的手机。

多保重，祝一切顺利。

乔纳森·斯托克斯

这个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他们给我的赞助金是我们当时唯一的月收入，虽然不足以支付所有开销。我那10000英镑额度的信用卡已经快满额了，我完全依赖他们每月1000英镑的津贴。在镇上等待要花一大笔钱，我们只得离开，进入花费较少的丛林。希望他们下个月能付钱。

这场探险刚过一年，我仍然觉得，如果有个朋友加入会更有趣，比如基思就很棒，他还帮助我脱离了几个月的阴暗与忧郁。因此，当老同学萨姆·戴森说要加入时，我立刻接受了这项提议。

萨姆抵达时还未办妥签证，但没过多久，他就取得了我们自己也弄得到的三个月观光签证。这意味着，在巴西待三个月后，他必须搭船返回哥伦比亚延签，这非常不理想。

毕业后，我和萨姆在十四年间见过三次，其中两次是在我出发前的几个月。他在学生时期就花很多时间进行过武师训练，事实上，他是个少林武僧。他想来的渴望加上我们的老交情以及他对武术的投入，都是促成他前来的原因。他从未到过丛林，但我认为他能将各项技能运用到丛林生活中。他告诉过我，他曾在中国少林寺做过跑石阶上山的训练，直到昏倒，这种意志力（或体能）是我希望在新伙伴身上看到的。

萨姆和我一样高，约1.85米。他抵达时留着80年代的三分头，再加上武师英挺的站姿，他看起来比我这缩头弓身的疲惫探险家高出许多。他来了之后，我们不停地聊往事和前方的丛林。身边又有朋友的感觉真好。

萨姆、乔和我一起开始的第一段路是从塔巴廷加到贝伦·杜·苏里摩希镇（Belém do Solimões）的八天行程。进入巴西后，亚马孙河的名称就变成苏里摩希河，一直要到约2000千米外的下游城镇马瑙斯后，它才又被叫作亚马孙河。萨姆给印第安警察局上了一堂防身课，警察局为了回报他，安排了两名提库纳印第安人警察向导跟我们同行，他们尽管不熟悉丛林，但很高兴和我们一起走。我们离开之前，

首领（他也参加过班杰明康斯坦的会议，并且同意让我通行）说，我们得帮他家买个瓦斯炉才能离开。他也知道我们别无选择，于是我们给了他买瓦斯炉的钱。

现在是5月，水位几乎涨到最高点，因此，我们必须往内陆前进。和秘鲁不同的是，这里没什么山丘可言，我们只能找高于洪水水位线的路径行走。那两名印第安向导——安东尼奥和桑德列——都年轻有礼，也很高兴外出行走。虽然他们两个不识路（因此我们靠罗盘方位角和萨姆带来的新全球定位系统导航），但我认为带着向导比较谨慎；根据别人给我们的建议，这里是异常危险的保留区，提库纳的印第安人也许可以帮我们谈判，脱离险境。

星期六早上，我起床时稍微站立不稳，因为刚刚在吊床上度过难眠的一夜。我漫步到那两名向导忙着掏鱼内脏的地方，看到捕鱼的收获时不禁笑开怀——每人可以分到两条。他们在火上煮鱼肉汤，渔网拿回来了，也收拾得整整齐齐，这个团队不需要我多说就自行运转，这一点让我很开心。大蒜和洋葱的香味在空气中飘散，大家都食指大动。

不知是什么原因，当地人都不喜欢用盘子盛东西吃，因此我握着平底锅——在塔巴廷加买的——的崭新金属把手。下面以慢动作的方式描述：我看到锅子沿着把手从我手中滑落，掉到了火边。我看到了那两名向导难掩失望的表情，虽然我们把鱼都捡起来了，但美味的汤汁没有了。在这种环境下，食物非常重要，我气恼自己笨手笨脚。

那天稍晚些时候，我们深入丛林，和主河道保持一定距离，来到一个部落。安东尼奥和桑德列建议萨姆和我在部落外等着，他们进去征求首领的许可，让我们进入。越偏远的部落防卫心越强，听说他们如果受到惊吓，会一见白人就杀，因此，我们决定不去惊动他们，紧张地坐在丝兰田的原木上，想着提库纳族到底有多凶猛。他们穿西服吗？会不会让我们通行？

向导带回了好消息，诺莎·席诺拉·巴里希达（Nosa Senora Parisida）部落接受了我们，允许我们进入。我们看到那位老首领的第一眼时，他摇摇晃晃地骑着一辆崭新的本田电动脚踏车，从茅屋处朝我们而来，他显然不太会骑。这个村庄没有什么路，大约只有200米

长，但那辆电动脚踏车无疑是首领地位的象征。他热情和善，还让我们在他的木屋里搭吊床。

乔、安东尼奥和桑德列与当地入玩起了足球，疲倦的萨姆和我在吊床上打瞌睡，因为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而感到宽慰。我不禁好奇保留区到底多么危险，会不会是卡沃斯和德怀特夸大其词，想要劝退我们。也许他们也只是依样重述未经证实的传闻。这个部落的人友善热情。

在这段80千米的路程中，我们跟随罗盘方位角，使用全球定位系统，但大多时候必须自己劈出路径穿越丛林。这套方法让萨姆很震惊，他没有想到这次探险会如此耗费体力，他很容易疲倦。每天我们大多数时间走在及胸的沼泽中，跟着前面的人，而领路的向导负责劈开枝干前进，避开蛇和大蚁窝。走在沼泽里其实凉爽又提神，与走在硬路面上汗流不止相比，这是愉快的选项，尽管我们在洪水里平均一小时行进不到1000米。8天后，我们在5月中旬抵达一个叫皮拉尼亚（Piranha）的村庄，雇了一艘船前往贝伦·杜·苏里摩希。

萨姆和我聊了他的丛林初体验，他点出一些我忽略的事。有人以新的观点来检视我们的方法真是太好了。我们交换的意见之一是将抗蛇毒血清的有效时长增加到48小时，这样，我们可以待在一个地方自行注射。我们知道，我们会待在距离医疗资源有数日之远的地区，如果其中一人被毒蛇咬了，那么，除非我们有足够多的抗蛇毒血清支撑到毒液消退，否则我们根本连带都不用带。

为了记录这趟旅程，摄影对我来说很重要，但两台摄像机都坏了，我们别无他法，只好退回边境取新机。丛林的湿气之重，以致每天使用的高清摄像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个月，整场探险下来，我们用了十台。我不理会不便的海关（他们将是场梦魇），又订购了两台，请敦豪快递（DHL）送来；我选择送到哥伦比亚，因为那里边境开放，而我们在巴西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收件。不像在一般国家只需要签收就好，我必须请律师草拟一份授权书，请公证人检核护照复印件，再请一位翻译写请求信，向海关解释我们的用途；这个过程无聊到令人发火，耗时超过一星期。我们那星期搜肠刮肚，想出了一些好点子；同时，多亏萨姆的建议，我决定在一个我从未听过的新社群网站推特（Twitter）上创建账号。每天要把卫星电话拿出来、找棵倒下的树

（以及从树荫中找到能接收信号的缝隙）会很痛苦，但这完全符合这次探险的精神，因为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在丛林里用推特进行现场直播。

萨姆也建议我每星期在固定的日子和时间更新博客，这样订阅者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新文章。每篇博客都会有一段我自己编辑的视频，因此很及时，也和当周的事件相关。我确信这会大幅增加关注我们的人数，在未来几个月，我们号召关注者时，会引起很大的回响。

我们带着新摄像机回到贝伦·杜·苏里摩希时是6月初。这个破败的城镇不太像原住民部落，房子是木造的，有锡屋顶，但居民百分百是提库纳人。

首领叫维尔马尔·刘易斯·热拉尔多，他对自己的管辖区显然不满意。贝伦有5320位居民，住在772间茅草屋顶和锡顶的小屋里。部落里的两所学校的学生各计545名和1320名，学校里都很拥挤，班级人数鲜少低于40人。和许多提库纳部落一样，贝伦发生过许多次暴力事件，近年来，与家暴、酒精和毒品有关的死亡人数达72人。药物滥用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维尔马尔告诉我，甚至有孩子吸食汽油。

印第安保留区内严禁酒精有其道理，详尽的记载显示原住民对酒精的耐受度较低，大家也都了解，但问题是，他们不只是喝醉酒、呕吐或睡着而已，引用维尔马尔的话——他们会“发疯”。如果让这些部落的人毫无节制地饮酒，他们会变得很好斗，攻击性很快就升高到砍人或开枪的程度。

维尔马尔在讲述这些事情时，表情严峻、哀伤。他是个信仰虔诚的人，很希望能从社会沉沦的漩涡中挣脱出来。他认为问题缘于两方面。

第一，没有足够多的教育经费。不是所有人都能受到好的教育，事实上没有人能上大学。维尔马尔希望政府在贝伦建大学；他告诉我，没有人有钱去塔巴廷加，并且负担得起住宿费，以继续学业。

第二，这里没有工作机会。这是因为该部落位于印第安保留区，就我所知，非原住民公司不能设在保留区。这条法律是为了让当地人

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自主权，但现在变成，就算本地人受到了教育，在贝伦也没有办法找到有薪酬的工作。

居民靠卖作物（主要是丝兰、米和香蕉）赚取微薄的收入。但维尔马尔说，辛苦工作一年，人均收入是560雷亚尔（少于200英镑），严重的水患还会摧毁一年中多数的庄稼，让问题雪上加霜，许多人的涓滴收入因此枯竭。

村里的水完全来自亚马孙河，而村子位于两大城市下游的120千米处，大城市的污水直接排进了河里，因此河水很污浊。

贝伦没有医生，没有医院，只有一家由护士看诊的诊所，药物库存已经告罄。

他们的处境很不妙，不难看出为什么有这么多提库纳人感到未来黯淡，转而向药物或酒精寻求快慰。我们待在那里时，国家印第安基金会的当地代表不得不去看四个正在练习所谓黑巫术的男人。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部落里，这是在绝望中不惜冒险一试的行为，应该被禁止。最近有一个孩子在这类仪式中牺牲，令人毛骨悚然。

印第安警察局在处理暴力事件上做得不错，但这些警察都是义工，他们执行警察勤务时显然无法做农活儿。

维尔马尔说，贝伦·杜·苏里摩希处于向下沉沦的旋涡里，无法挣脱；保留区的法规使得教育贫乏、没有工作机会以及赤贫等问题更为严重。我们接触到的人都很热情大方，孩子们也很开心，笑容满面，这些人挺了过来，但很明显，他们觉得自己被忽视了。

我不知道原住民到底从巴西政府手里拿了多少补助金，也不知道这些声明是否言过其实，但有一点很清楚，不容否认的是，保留区和居民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保留区想要维持、保护自给自足的土著生活方式，而这些住在中型乡镇的人必须靠金钱过活。人们如果分散开来，回归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就不需要钱，能过上勉强糊口的生活，就像我们在秘鲁多次看到的一样。但是在巴西，提库纳人想要电力、电视、方便食品和千万像素的数码相机，因此，他们必须和其他的巴西人做交易赚钱。维尔马尔所做的犯罪统计数据提供了令人不安的证据，显示现行体制行不通。

贫穷和绝望让我联想到秘鲁。我后来得知这在巴西是个特例，巴西最近在亚马孙河流域投入了大笔教育经费，在卢拉（Lula）总统的政策下，家长送孩子去上学就可以获得补助。因此，即使是在最偏远的部落，巴西的年青一代都受过教育，思想开明；然而谈及雨林，似乎仍有许多卢拉不想看到或无法正视的问题。

此时，我从Mongabay.com读到一篇文章，得知企业和世界银行处理巴西畜牧业的方式即将改变。砍伐的林地中有79.9%都成了牧场，现在，世界银行不再向巴西畜牧业龙头公司百力勤（Bertin）提供一笔9000万美元的贷款。我没想到这笔贷款一开始竟然会通过，但拒绝贷款的决定是第一步，意味着全球将不再资助这种毁灭性的产业。

与此同时，巴西三大连锁超市——家乐福、沃尔玛和糖面包（Pao de Acucar）——也表示，它们会停止买卖来自遭砍伐的亚马孙地区重点林地的牧场生产的畜牧产品。

卢拉总统仍旧推动实施一些法令，将大片亚马孙雨林私有化——巴西政府似乎不觉得有必要撇清和农业综合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奥巴马形容他是“世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但就环境方面来说，我认为卢拉太软弱。他空谈气候变迁，对外国想干涉巴西内政的行为动怒。2009年6月，他通过一项法令，原本是要让占有小片土地的开拓者土地所有权合法化，但后来又加入条款，结果让豪夺土地的大地主和商业利益集团也受了惠。这项法律将使高达6700万公顷非法占有的亚马孙雨林的所有权私有化，这个面积大于挪威和德国的国土面积总和。这项法律公然违背了卢拉的环保之说。

我们和维尔马尔道别，回到步行中断的地方——皮拉尼亚。当狭窄的电动船从宽广的苏里摩希河转向较小的支流卡尔德隆河

（Calderon）时，我们突然身在青翠蓊郁的丛林里，我不禁兴奋起来，就好像见到了好久不见的心仪女孩。河道两旁纠结的长廊林垂在河岸上，那是藤本植物和凤梨科植物形成的厚重垂帘。我扬起嘴角，和乔互看了一眼，就好像回到了属于我们的地方。我又爱上了丛林。

从皮拉尼亚村开始，我们再度投入步行。在一段长时间的休息后，头几个小时总是特别不舒服，我们真的很费力；我们的身心都松懈了，抗议我们加诸其上的压力。

现在每天大约有40%的路段位于洪溢林里，我们试图远离河道，从一块高地跳到另一块，但我们已经没有绘有等高线的地图了，因此必须依赖当地人的建议和猜测。进度很慢，这段时间每天只走了5000米，但乔和我经历过更糟的阶段，因此，这对我们来说够舒服了。

萨姆就像先前的卢克一样，带了一双稍小的丛林靴，因此脚趾互相摩擦，脚指甲在长期潮湿的环境下，全都受到感染。这让他更加痛苦，他觉得自己处于一个不愉快又令人筋疲力尽的环境里。

萨姆的脚趾状况很糟，我建议他先别探险，回塔巴廷加休息几天。我也告诉他，用些强力的抗生素对他无害——他身上有上百处咬伤、割伤和瘀青，脚踝像老太太的一样凸出。

有趣的是，此刻我和乔的身上已经没有一点伤痕了，这意味着我们已经适应了行进的方式，不会再跌倒、刮伤，也早就不再对叮咬起反应。我感觉自己和乔的关系比以往更紧密了，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平静有效地持续前进着。

离开塔巴廷加时，我们都胖了，大家在经历食物缺乏的时期后，都吃得过量。但现在，我们的卡路里摄取量严重不足。萨姆有个玩意儿是心跳监控器，仪器显示他每天步行消耗6000卡，这不包含晚上、夜里和清晨。我们保守估计，他和我每天大约可以消耗7000卡，因为我们负重相当；而乔消耗得少一些，因为他比较轻。但是，我们每天3000卡的饮食显然让所有人的摄取量都严重不足。

乔、我和两名新向导恩里克、保罗离开凡达维尔（Vendeval）——萨姆在此搭船——他们的眼里闪烁着聪慧的光芒，一开始就让我很放心，之后更是证实他们是好伙伴。与我们之前的许多临时队员一样，他们是猎人，所以熟悉丛林，习于带着猎枪走进丛林深处，寻找獾及大型啮齿类动物（如刺鼠或像臭鼬的蜜熊）。

6月16日，萨姆在殖民城镇圣丽塔（Santa Rita）归队。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已经从第一个保留区的另一头出来了。我只因为听说了那些可怕的故事，就对进入保留区充满恐惧。我对我的恐惧感非常气愤，从现在起，我和乔对保留区越来越无所畏惧，我们浪费了太多精力去担惊受怕，当有人又要告诉我们危险将至时，我们根本懒得听。

说眼前的路似乎充满不祥预兆是太过轻描淡写了，巴西的这片区域有全世界范围最广的洪溢林。现在是6月，这段河流的水位到达最高点；河水流入巴西后，最高水位会剧烈变动。我们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规划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沿着河行走以加快进度。洪水会造成两大问题：没有地方扎营、搭吊床或生火；行走的速度会大幅减慢。速度慢意味着每段路程会耗时更久，因而需要更多食物，背包也会变得更重。

幸好我了解大部分淹水区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图片以及谷歌地图都清楚地显示，如果我们要待在亚马孙河附近，就必须在此刻横渡到南岸。因为我们把坐标（ -3.564115° ， -69.366513° ）输入谷歌地图，试着在北岸规划路径时，可以看到水流经的弯曲痕迹，清楚显示出淹水的范围。几乎可以不用考虑北岸了。我们必须劈出超过20千米长的路，深入森林，和河岸保持这样的距离，在河湾外围行走。

我们都同意横渡主河道，由于乔和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这样做了，我们很担心要划行的距离。此刻，我们有三只充气筏，但面临的风险是，我们可能会分散开来，到达对岸时，我们会分隔得太远，无法看到对方并且碰头。河里到处都是鳄鱼，浪像海浪一样高，我们的充气筏只由一个气室和轻薄的PVC材质制成。横渡时，我们在河里会遇到麻烦，这令人望之却步。解决的办法是，从圣丽塔雇一艘木船，像划加拿大独木舟那样，所有人搭同一艘船到对岸。我们只花15分钟就走了1500米。

对岸的提库纳族人看到我们时很惊讶，但一点都不具攻击性，看得出来，有些妇女还很怕我们。这个村庄在洪水覆盖范围以外的高地上，因此，他们较少接触主河道上的交通。

这个部落的主要交通命脉是一条10米宽的笔直小河，这条河朝东北方向流，行进40千米后流到圣保罗·德·奥利凡卡镇（São Paulo de Olivença）。我们的计划很简单：一路待在这条河流东侧的高地上，直到我们走到圣保罗，在那里河流又接回苏里摩希河的主河道。从这里放眼望去，苏里摩希河南岸似乎都能行走，尽管我们一路上必须横渡一些大支流，会遇上支流旁洪水泛滥的森林。导航的问题在于，尽管巴西人有很棒的比例尺为1:100000的全国地图，但他们不给我们。我们问过军方、美国私人公司，但只能拿到河流的导航图，这

些图的比例尺也是1∶100000，这个比例适用于导航，但导航图没有高度标识。我们只想待在高地上，以避开洪水，但地图或图片上缺的就是等高线，因此，我们很难根据地图看到高地在哪里。

从提库纳部落到圣保罗，我们走了8天。第8天，我们听到了音乐声，乔老练地猜测声源在6000米外。1000米后，我们行经一个乡下酒吧，里头供应酒，烤肉炉上烤着许多辣鸡翅。我们喝着啤酒，吃了一大盘鸡翅，之后，萨姆和我与当地的孩子在酒吧后面天然的泳池里游泳。

从镇上往东100千米到阿马图拉（Amatura）的路相对来说容易走，地势大都很高。我们沿着高起的地面行走，通常会沿着旧的牲口小径或猎人路径，经过小农场或牧场。

我和乔带路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每半小时轮流一次，领头的人在自己的半小时里做的决定，另一个人必须遵守。我们总是会面临许多选择，但事实是，选哪条路都没有差别。因此，乔和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为了避免浪费精力，带路的人说了算。

我不认为萨姆帮得上忙，但他不断质疑我们导航时做出的决定。“我们为什么要走这里？”他会这么问我。我会为自己的决定辩护，他如果不同意，就会跟我说。但问题是，到了现阶段，我和乔已经进入自动驾驶模式了，从不用言语表达我们的决定，因此，我们遭到质疑时等同于受到了侮辱。更糟的是，乔带路时（他从没有让我们迷路过），萨姆坚持要我把他对乔导航的疑问翻译出来。这当然更糟了，因为这个过程必须通过我来完成。把不必要的挑衅言论翻译出来让我很烦，也激怒了乔，因为他的决定不断遭到质疑。

现在我担心两件事：一个——一如既往——是钱（或缺钱），另一个就是耗费的时间。三个月的巴西签证马上就要到期，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一路退回哥伦比亚的莱蒂西亚，去延长签证。我不仅浪费了时间和金钱，还将这些后勤问题交给一个看来一点都不在乎的人（卡沃斯），这让我非常生气。

我们很确定这一点：被迫休息导致每个人都崩溃了，火气都很大，连乔出了名的好耐性也快被磨光了。有一天，他落后萨姆和我150米，拒绝说话；他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不喜欢团队的状态。

回到巴西的塔巴廷加，我们拿着新的三个月签证，准备重新入境，这时，联邦警察告诉我们，第三次延签的唯一方式就是返回英国，我们无法在哥伦比亚再次延签。我把这个消息转达给卡沃斯，他说，在我们下一次需要延签时，他会在马瑙斯试着办妥这件事。这听起来很没保障，也意味着，三个月一到，我们就必须再次中断探险，而且，我们这一次要往马瑙斯的方向前进。

接着，我收到了卡沃斯寄来的一封信，引爆了一场永无休止的争吵。他写信给我时，附上了一份拍摄行程表，建议我在马瑙斯时拍摄哪些内容，包括拍摄歌剧院以及一些和我无关的事。由于当时的金钱问题和签证问题让我备感压力，我回了下面这封怒气冲冲的信件：

好吧，卡沃斯：

我想，你对这次探险有些误解。我没有摄影行程，也没有工作组。我是一人队伍，基本上要拍一部勇敢的记录片，记录两年来辛苦的步行过程。我没有必要拍摄马瑙斯，我不是布鲁斯·帕里⁽¹⁾，还没有任何广播公司委托我，所以，我没有钱。签证才是我担心的事，也是我唯一要你帮忙的事……

三个月的短期签证没有用，因为当我们需要延期时，我们在丛林里。此外，在我进入巴西时，有人告诉我延签一次后就不能再如法炮制，因为这一年我只能在巴西待六个月！我真的需要整个探险期间待在这个国家的全程签证。我预计在圣诞节抵达马瑙斯，在2010年7月抵达贝伦杜巴拉（Belém do Para）。如果这次探险只因为没有搞定签证就以失败告终，那么我会无法忍受。我已经付了你1500英镑，需要你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以不正当的方式经过了国家印第安基金会区域，虽然我从未取得基金会的正式批准，但我们靠着贿赂和替首领买瓦斯炉通过了！可是，这样不够好，卡沃斯。我们希望求助于你这样的专业人士，让我们的行程完全合法。

我要你做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签证问题。之后我不会再通过国家印第安基金会区域，因此那边已经不是问题。我只要加迪尔（乔）和我的签证。

谢谢。

埃德

7月4日我收到了卡沃斯的回信：

埃德：

那封信不是给你的。我正在处理另一件案子，那个人也叫埃德。

请不要再把我当狗一样。如果再抨击我的工作，我会让我的律师对付你。

卡沃斯

要采取法律行动的威胁言论，让我对卡沃斯绝望。这次探险变得如此停滞不前，都是因为我们在来来回回办理签证延期，他并没有如我希望的方式帮助我。抵达马瑙斯之前，前方隐隐逼近我们的广阔丛林令人却步，我不想再这么消极。

在边境行经机场时，萨姆接到消息说，他的武术学校在接手管理的人手中出了问题。他花了几年的时间成立这些学校，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必须回英国处理。我们也都意识到这个三人团队人数有点多，从现在起，乔和我自己走会更好。我的西班牙语已经进步到足以和乔自在地聊各种话题，也就是说，我不再需要从外面找朋友进来。虽然萨姆和我讨论过再回来的事，但我想这事儿应该不会发生。

我并不是在诋毁萨姆，他在我仍挣扎着振作起来时带来了新的想法，给团队注入了活力，他已经完成他的任务，这次探险也因此有所进展。乔和我有一套运作系统，但非常微妙，很容易被新成员打乱。从那时起，我不再寻求乔以外的丛林伙伴，他完全了解我的目标。萨姆离开，我们并没有庆贺，但默默地满足于我们两人简简单单的相处方式。

饥饿

在秘鲁，住在亚马孙河流域的当地人没有太多接受教育的机会或接收外界思想的途径，因此，我成了“削脸人”，我们是“人体器官走私犯”，在我们经过时，他们会用食指在自己受到惊吓的脸上画圈。在巴西则有另一种关于外国人的传闻，由于怕我是“corta cabeza”（字面意思是“割头的人”），提库纳人会用食指做出割喉的动作。

这类故事有各种版本，但其中许多版本都提到天上有耀眼的强光，也提到死者头部被割下的离奇死亡事件。他们对白人有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不信任感，这再次让我们对这次徒步之旅感到不安。

当一名原住民女子对着我们吼叫，说我们不该在此、我是“割头人”时，我差一点在探险中第一次对原住民妇女动怒。我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迹象：我们又要经历一段人们畏惧我们，直到我们证明自己并不可怕的时期。我在秘鲁受够了这一切，对这种无知失去了耐心，也几乎要崩溃了。在秘鲁那几个月的疑惧，是我想忘掉的一段黑暗记忆。

我和乔重新找回来的积极态度一整天就都被摧毁了。很难说清我们挥别秘鲁那种无知的恐惧时多么开心，在哥伦比亚，人们以温暖的微笑欢迎我们，那种感觉简直棒极了。看到这种问题卷土重来，我们俩仿佛腹部被重重击了一拳。但是，我们应付得来，这无疑和原住民过去在殖民统治下遭受的待遇有关，我们很遗憾这种恐惧还存在他们的生活中。

2009年8月初，我和乔徒步抵达阿马图拉，这个城镇位于高处。最值得注意的是，水位下降了许多，现在，大片泥滩上有许多船只搁浅

在水位线之上。乔和我看到第一个亚马孙洪水季过去的迹象时，咧嘴而笑——那真是一个不寻常的洪水季，是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今后，土地会变得更坚实，河水水位会降低，我们必须多加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11月、12月水位又开始上涨之前尽快赶路。

乔和我静静地喝着啤酒，把地图摊在桌上，冷静思考前方的路径。我们前方的苏里摩希河有道大河湾，大河湾从阿马图拉向北拐到丰蒂博阿（Fonte Boa），接着再向南拐到特费镇（Tefé），就像个大型的云霄飞车。问题在于，这条路径经过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我们现在没有钱买食物、支付住宿费或雇当地导游。由于只剩下我和乔，我们对彼此的能力重拾信心，因此做出了一个在我脑海中盘算已久的大胆决定：我想从阿马图拉取直线穿越河湾，前往特费，这段路的直线距离约有350千米。我预估这段路程要走两个月，整整两个月后，我们才会再次看到主河道。这意味着我们会避开北面位于河岸两侧的城镇和村庄；接下来两个月，我们几乎会孤身待在丛林里，但重点是，非常省钱。

事实上，这个决定的意义不只是这些。我们的探险将进入截然不同的阶段，我们不再行经一个又一个部落，不再距离主河道一步之遥，不再拥有安全的撤退路线。我们将会完全孤立雨林里，要靠自己解决一切问题，不会有船、直升机或医疗团队，也不会有紧急外拨电话打来丛林。我们的保险套餐中规定，在我们发出危难通知后，四名艾克斯梅德的医生会在16小时内从赫里福德郡前往我们所在的任何地方，但保险已经快失效了（因为我们已经耗费了不少时间），而我们没有钱续约。

如果遇上问题，我们就得自己解决，别无他法。计划很简单，撤退的话，我们就得用走的，或者扛着伤员到附近可以用充气筏航行的大河，往下游划（必要时，拖着伤员的充气筏），一直划到有船和马达的村落，接着，付出一切代价也要去最近的医院（也许升级到更快速的船）。一旦我们到了医院，巴西人就会免费救治我们（我们已经试过了），因此，我们只要能到达那里就没事了。

然而危险的是，在偏远地区，有时候距离上一条可航行的河道需要五天，到下一条也需要5天。如果其中一人得了重病或受了伤，行程就不止5天了；要是其中一人不能走，那就不可能办到。如果需要紧急

医疗救助时，我们身处偏远地带，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死。我们慎重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准备好接受这看来无法接受的风险？

“当然。”乔毫不畏惧地说。

“我也是。”我微笑道。

我们的想法是，带大量食物，但严格控制配给，每天吃限量的木薯粉，尽可能地往前挺进。我们不再带鲔鱼罐头、烟熏后的肉类或沙丁鱼。这样的话，我们背的重量会少许多；如果想吃动物蛋白质，我们可以去捕鱼。

我们不断听到关于住在远离河道的凶猛部落的故事，不确定经过这些部落时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不会像住在河边的部落一样文明？他们是否会让我们通行？目前，乔和我对于少与外人接触的部落很放心，我们听过太多夸张的故事了；我们可以应付这些部落，也必须应付。

我们在即将进入的地域遇上大型亚马孙生物的可能性大增：巨蟒——世上最大的响尾蛇；黑凯门鳄——南美洲最大的肉食性爬虫类；长着长獠牙、攻击性强的凶猛野猪群；神出鬼没的美洲狮；当然，还有雄壮的美洲豹。

在我天马行空地想象着我们企图进行的探险时，肾上腺素上涌，令我异常兴奋。我们就要用上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了，也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在丛林里是否会如我们自认为的那么能干。

我们向当地的国家印第安基金会基地申请了进入当地提库纳保留区的通行证，接着租了一只独木舟进入保留区，到邦巴斯图村（Bon Pastur）寻找向导。带给村长的礼物是我们用过的摩托车干电池。这看来也许是个奇怪的礼物，但我们知道，在发电机关闭后，晚上用它来点电灯很方便。而且，我们从未以高高在上的姿态送过礼，在秘鲁时，我就常看到乔把半罐温热的印加可乐送给部落首领。来自部落的两名提库纳人——威尔逊和瓦尔迪尔——同意陪我们一路走到特费。威尔逊胖一点，比较西化，带着友善的微笑，也很健谈。瓦尔迪尔则是地道的狂野亚马孙原住民，皮肤较黑，身材精壮，坚毅的身躯没有一丝赘肉；他很少和我们说话，但我很高兴有这种硬汉外形的人和我

们一起走。他们两个同意隔天在阿马图拉和我们碰头，乔和我回镇上做准备。

那个电池是我们给笔记本电脑充电用的，不太有效又很重，因此，我们把它送了人，同时将卷式太阳能充电板和变频器放在塔巴廷加的备用背包里。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必须依赖村里的发电机，用它来给所有的设备充电，而在两个村落之间，我们必须谨慎使用所有电器以保存电力。

如果你在丛林探险中每天都要移动，我建议你不要用太阳能充电。我们有四片约1.83米长的卷式太阳能充电板，它们就像银箔纸；我们会把充电板摊在罕见的林中空地上，还必须在林间追逐着那一丁点有太阳直射的空地，因为阴影每天都在移动，所以，充电速度其慢无比（如果真的能充到电的话）。事后看来，我应该选择不怎么耗电而且比2000的苹果笔记本还轻的电脑。自我启程后，科技日新月异，现在探险的话，我可以使用12V的掌上设备写博客，还可以用它编辑视频，但我们的计划在它问世之前就已完成。

乔和我聊到雇两名提库纳向导的费用，如果他们全程与我们一起到特费，我们就必须付船票钱让他们回家。我们负担不起，因此问他们可否只陪我们走10天，带我们到塞古鲁港（Porto Seguro）村庄。这么做并不是好主意，然而在没有当地向导的情况下，我们被最偏远地区的冒险吸引着；我们刚形成互补的工作伙伴关系，任何人加入都有可能打乱我们的节奏。

乔为我们买补给。但这次，我们俩进行了细心的分析，拟定了详细的清单，把每样东西都详加计算以减轻重量，好让我们走得更远。我们负担不起奢侈的食物（巧克力、燕麦、花生等等），就算找到支流，也没钱搭船先行考察。

乔和我并不觉得我们的处境可悲，财务状况只意味着我们将体验一段难忘的冒险之旅。我当然担心如果缴不了房贷，我的房子会被没收；但就探险而言，我们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必须以吊床为基地，更加依赖钓鱼和采集觅食以维持健康的状态。在未来两个月内，如果经过规模够大的部落，如果遇到简单的旅馆，我们也会直接通过，因为我们负担不起。

在出发前，我还必须采取行动，扭转财务困境。我虽然还能支付未来两个月的开销，但必须想到，JBS有可能再也无法赞助我们了。撇开经济衰退对他们的影响不说，他们已经非常慷慨，总共花了35000英镑。我必须寻找其他的赞助商或捐款人来资助这次探险，否则我们即使到了特费，也可能必须接受失败的结果，要因为缺乏资金的问题而打道回府。

我在网络上发出请求，请网友们问问他们的公司能否提供赞助，并在贝宝（PayPal）网站设置了捐款按钮，问网友能否给我们捐钱，让这次探险得以继续。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的好友乔治和我母亲芭芭拉在幕后为我大力奔走，和他人谈此事、写信，试着为我募集亟需的资金，我们家的朋友都被问过了，而他们把能想到的补助、赞助金都申请了。

我、乔以及两名提库纳人在8月7日离开阿马图拉。想到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应对财务困难，我只能希望这些努力会有成果，并且体认到我必须专注于眼前这350千米的丛林路，直到再次见到主河道。

从邦巴斯图来的提库纳向导威尔逊和瓦尔迪尔很快就跟上了步调，我们进展得很顺利，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并不十分享受这趟旅程。

第一个目标塞古鲁港距离阿马图拉80千米，但它不在我们1:1000000比例尺的航空地图上。我们在国家印第安基金会的某个办公室里的地图上看到了这个村庄，因此用铅笔把它标在我们的白色地图上，但是，我们后来又在学校里的一幅地图上看到它在别处，也把这个位置标了上去。可笑的是，根据地图上的铅笔记号，这两个可能是塞古鲁港的位置相距30千米（3—4天的丛林路程）。希望其中一个是正确的。

我们在亚马孙丛林里行走，完全不知道何时能抵达下一条河流，所以特意在摄像机袋里装了水当作储备，希望在该区域内能找到有伦敦市中心大小的部落。

我更关注的是我之前的军士长马克·黑尔（Mark Hale）寄来的电子邮件。他现在还在服役。他告诉我，我之前所在的军团（现在是第二步枪营）正在阿富汗执行任务，已经有13人死亡、90人受伤，他们

还要待3个月。这对任何单位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失（而且他们还要继续战斗下去），这也让我意识到，我的探险相形之下只是扮家家酒。

8月20日，在一天走了9000米后，我们闯入一片老田，视线因为突然能看到远处而晃动，瞳孔在耀眼的阳光下收缩。我们已经7天没有看到任何人迹，没有看到小径，没有看到砍下的枝叶，什么都没看到。因此，我们看到成堆甘蔗时，便往发烫的路面一坐。我急着啃甘甜的甘蔗，咬断了假牙。我一边坐着想自己距离牙医多远，一边让甜蜜的汁液沿着我满是胡楂的下巴流下。

就在我们咬着甘蔗，给肌肉补充肝糖时，听到了小电动船震动的声音。我们知道，我们已经靠近人烟了。我们抹了抹嘴，寻找离开这片空旷地的出路，很快就发现一条向东方延伸的小径。小径越走越宽，两名提库纳人走在前头，这样他们才能先遇上人。

我们通过一座小原木桥，已经可以看到远处有茅草屋。我们直接走进部落，向惊讶的居民微笑，说“午安”。他们没有讶异太久，欢迎的方式和外界的并无二致，也很热情。这些人不是提库纳人，而是巴西印第安人和白人混血的后裔。他们远离苏里摩希河，在森林里的小渔村过着简单的生活，靠小河流生。他们说我们现在在塞古鲁港。我在地图上标出了位置，之后误打误撞地前行。这种运气让我暗自发笑：我们往东行进，有时用罗盘，有时只靠太阳，8天后，直接抵达目标部落。更好笑的是，我们地图上用两个铅笔标记出的位置，各在目的地两边的20千米处和26千米处。如果我们确实知道自己往哪里走，那么，能这么精准抵达目的地的概率反而微乎其微。不过，我们沿着主路径走，却完全不知道这个部落在此，这也够惊人的了。就像其他许多时刻一样，我即使没有宗教信仰，也觉得自己仿佛受到了眷顾。我不禁开始思考我们接连不断的神奇运气。

然而，瓦尔迪尔和威尔逊并不喜欢这趟步行，他们疲惫不堪，觉得负担太重，想回家。这也合我们的心意，我们负担不起一直留着他们的费用，因此租了一艘船，在村里送他们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乔和我接着又在村里到处找向导（可能是出于习惯），但没有人想跟我们走，他们是渔民，从未进过丛林。他们住在比我或乔以前走过的都还偏远的地方，却从未踏入丛林，这令我相当意外。这样也行，我们更轻松地接受了从现在开始都要靠自己这个事实。

塞古鲁港的村民对我们很好。他们带我们住学校，给我们食物，并且和我们聊到他们所知甚少的前方路途。走了8天，我们都很疲累，因此决定第二天休息。我懒散地躺在吊床上，在剪短的短裤上缝一条折边；乔则受邀去钓鱼。

塞古鲁港的村民和我们挥手道别，还开玩笑地挖苦我们，说我们会被美洲豹吃掉。下一个目标是一条较小的支流——里奥济纽河（Riozinho），估计有6天的路程。我们知道河上有许多部落，但是不知道在哪里。

离开塞古鲁港时，林地上满是泥巴，这个地方直到最近都还浸在水里。请你想象一个地方，里面满是盘根错节且多瘤的树根、浓密的刺网般的荆棘以及拖着你下陷的泥巴，举步维艰。接着，请你想象自己根本不知道这种路况何时才会终止：一小时后？4小时后？还是4天后？

这段行程的第二天，我几乎可以说是恐慌发作了，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幽闭恐怖感——不只是因为我们无法从环绕四周的封闭的深绿色植物屏障中突围，也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种地形何时会有所变化。这是我们至今穿越的最封闭、最困难也最令人不快的森林。我们找到几块高地（事实上算岛屿），在夜里扎营，但我们无法钓鱼，因为没有河，只有泥巴、荆棘、蚊子和马蝇。

我们花了5天才离开那个湿季河水泛滥的区域——不是说花了5天抵达下一条河流或下一个部落，而是说花了5天才离开围绕着塞古鲁港的河边丛林。

乔和我相处得越来越融洽，我会帮他上基础的英语课，我们可以用西班牙语聊得更久也更深入。在和他只用西班牙语交谈11个月后，他的第一堂正式课程让我发笑：“埃德，当某样东西是多数时，要加s。”我们看过太多人——来来去去的向导、摄影师、记者、朋友——但唯一不变且可靠的人就是彼此，我们开始体认到这一点。

虽然乔和我装作若无其事，但其实我们对于两人团队所背的重量相当震惊。现在，我的背包重达38千克，他的仅少一点，约35千克，当我们努力挥着大砍刀穿越浓密丛林时，这可是相当沉重的负荷。乔

的体重只有60千克，因此他背负了超过一半体重的重量，但我们必须确保有足够的食物让我们撑到下一个部落。

这个重量对乔而言还是太重了，最后他的脚踝严重扭伤。扭伤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件麻烦事，但在我们的处境下，可能会危及生命。我从他身上移除一些重量，他也很勇敢地继续走下去。震惊于此时此刻一点伤能对我们俩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于是，我们更加留意行走以及从倒落在地的大树上跳下的方式。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无法行走，那可就有大麻烦了，因为我们都未曾身处如此偏远的地带。

8月27日，我们经过下一条河流——里奥济纽河——后，再一次碰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直接抵达了一个部落。这里没有商店，不过困惑的村民卖给我们8000克木薯粉、2000克盐和三个蒜头，总共收了我们17雷亚尔（不到4英镑）。我们希望这些东西能让我们撑8天。这就是我们持续前进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和盐；只要能找到够大的河钓鱼，乔和我就没问题了。我们在里奥济纽只停留了20分钟，两人都都不想再多停留。我们比以往更觉得自己属于丛林，渐渐地，我们避开了人群。

有一天，在里奥济纽河对岸，我们发现一潭牛轭湖，决定休假一天；我们可以钓鱼，乔的脚踝也可以休息。一天不走路，两人都受益。

这湖极美，完全远离人烟，呈豆子形状，四面八方环绕着垂进棕色水里的藤蔓帘幕。我们的营地舒适地位于水位线之上。水退了，湖中的鱼非常密集，于是，乔拿出充气筏，带上鱼钩和钓线，平静地钓上一条又一条鱼；我带了另一只充气筏，在靠近岸边阴凉的浅水处拉起刺网。这种网子非常有效率（在英国是禁止使用的），鱼一旦游进网洞里，就会被卡住，就这么简单。在离开网子之前，我甚至取出了几条水虎鱼。湖里的鱼显然很多，这意味着，我们会抓到比一天能吃的分量还多的鱼。我做了干燥架，把它放在火上——这一点也不复杂：只需四根Y形柱、几条横木以及许多细绿枝作烤架。架子大约有一米高，因此，我们只用它来烟熏鱼，而不会用它来煮鱼。其实，我是在做实验，我曾在别处看到别人这么做过，但从未指望它会为我们提供唯一的蛋白质来源。接着，我整个下午都在操作工厂般的流程，从网里取出鱼，把乔钓的鱼也拿来，去鳞片、掏内脏、给鱼抹盐，然后

用烟火把它们均匀地熏制。当盐被揉进手上的伤口时，我的手会传来一阵刺痛。短裤上也沾满了鱼鳞和鱼血。

一天渐渐过去，我穿着短裤和卡骆驰鞋料理鱼，夕阳从湖的另一头在我身上洒下温暖的橘红色光辉。没过多久，乔不再钓了，因为我们已经有太多鱼了，不确定能带走更多鱼。鱼上了绿枝烤架，我们就给它们盖上新鲜的叶子，在熏制的过程中让热和烟循环。

我们在干燥架下煮饭，吃上丰盛鱼汤配木薯粉，就休息和储备蛋白质来说，这是重要的一天。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表明，我们没有原住民向导也能好好地存活到现在。临睡之前，我们查看烟熏水虎鱼，尝了一下，觉得真是美味。它们很咸，而且像牛肉干一样干，在未来几天会是很棒的点心。

隔天早上，我小心翼翼地揭开已经干脆的叶子，看到了30条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烟熏鱼。原本这可以大大提振士气，但发生了一件意外：我的充气筏在水边停泊了一夜，结果被划了个约20.3厘米长的口子。我没找到凶手，但怀疑是鳄鱼干的。到下一条河要走8—10天，我们认为河边也许会有部落，但我的船完全无法行驶。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用一只充气筏渡到对岸，但充气筏不光是用来横渡河流而已，更戏剧性也更切中要点的是，充气筏也是撤退的交通工具。而在没有医疗保险、只剩一只充气筏的情况下，我们等于在悬空走钢索。

走了一星期，过着有烟熏鱼和充足木薯粉的好日子之后，乔和我的运气用完了。9月3日，我们抵达下一条目标河流——米纳拉济纽河（Minerazinho），但是，我们这次没有直接抵达任何部落，因此必须去找。

我们从充气筏的维修工具中用13块脚踏车内胎补丁修补裂缝。补丁之间稍微重叠，这足以让我小心划行，但我每10分钟左右就要用嘴吹一下气。在我们去下游的路上，我以为听到了狗吠声，结果只看到两只水獭栖息在一截原木上。它们随即跳进了水里，但我看到了更多的水獭，算一算总共6只，我们打散了它们。它们有些在上方，有些在下游，互相生气地呼喊，嚎叫时高高露出水面。这些水獭似乎没有因为我们的出现而受到惊吓，也没有逃开，因此，我怀疑附近是否有部落。

划了两天后，直线视距只走了9.32千米，我的充气筏又开始严重漏气。我们完全不知道下游是否有部落，而现在到河口的直线距离有150千米，在那里，我们会接上苏里摩希河，但以这种速度，我们要划上一个月。

现在只有一条出路：我们必须把充气筏放气，走回两天前抵达的地点，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划充气筏让我们的旅程多花了3天，我检查木薯粉的存量，发现只剩下4杯（1800克）了。我看着地图，找到一个标记出的部落——马鲁阿（Maruá）。这个部落在我们东方65千米处，我们估计要走8天才能到那里，因此，我们把木薯粉分成8份，这样才不会让粮食耗尽。这使得我们两人每天分225克——每人每天450卡——连续8天摄取的热量会比一个面包圈的还低。

我们又放了一天假，试着尽可能多抓鱼，但这条河不像那潭牛轭湖，没那么容易捕鱼。我们弄丢了钢丝前导线，那是防止水虎鱼咬掉鱼钩的必备品。乔不是轻言放弃的人，他用我的莱泽曼

（Leatherman）工具钳组，在火上巧妙地将缝衣针锻造成钢丝，现在他又可以用鱼钩和鱼线钓水虎鱼了。我们吃灯芯草当午餐，下午，乔被水虎鱼狠狠地咬了一口，食指被咬掉一块皮。他太漫不经心了，没有谨慎地从鱼头后方抓鱼，反而把食指放到了鱼口附近（这种错误不能再犯），锋利的牙齿划破了他的指尖。乔并不担心那个伤口，填饱肚子的问题更让我们烦恼。在出发之前，我们的精力就已经不足了，而且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食物让我们得以用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离开米纳拉济纽河时，我们带了大约12条烟熏的淡水水虎鱼和7天份的配给木薯粉。我们不断在林地上寻找水果和坚果，偶尔会发现富含营养的巴西胡桃，吃上10分钟后，将剩下的打包当晚餐，然后继续前进。伙食最好的时候，我们吃的是当季水果和坚果，一天摄取的热量也许达到了2000卡；多数时候，我们一天只吃配给的1/4杯木薯粉，再无其他。但是，我们每天消耗超过5000卡的热量。

我们两人的体重都直线下降。除了食物，我们无暇思考其他事情。我晚上睡不着，躺在吊床上幻想着法式小蛋糕和厚腻的烤饼；早上起床就嘲笑自己日渐消瘦的身体像僵尸一样。每当要吃那一小份配给木薯粉时，我们都毕恭毕敬。用餐几乎变成了一种仪式，也是一天

当中最重要的事。木薯粉的口感像大豆蛋白，呈黄色颗粒状，每个小颗粒都成了我们的金块，我们每一汤匙配一点盐地细细品尝。

严格控制配给的第5天，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偶然经过一条美丽的小溪。尽管那天的行程尚未结束，但我们俩都看到了钓鱼的契机。我把刺网放进3米宽的小溪，不一会儿就抓到6条大小适中的鱼。我们无法错过这条梦幻小溪，因此决定当天步行到此为止，开始扎营。乔用竿子和钓线，我则用网子收成，我们两人都大丰收。捕的鱼全进了锅，鱼肉的油脂漂浮在肉汤上，我们吃了三锅鱼肉汤，直到吃饱为止。那滋味真是妙不可言。当食物进肚时，我们的胃发出叹息，仿佛重获新生。脂肪立刻被吸收，我们的脑子重新动了起来。光是吃东西就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实在太饿了，根本没想到要烟熏这些鱼，只想补充营养，不过，我们还是留了些到第二天早上，然后饱足地酣然入睡。

在第8天，也是配给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早餐时吃完最后一点木薯粉，知道必须走漫长的12千米路才能到达马鲁阿。丛林再度变得泥泞、盘根错节，因为这前方是茹鲁阿河（River Juruá）的洪溢林。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会行进得很慢，但我们背上没有食物，加上终点在望，因此，我们以惊人的速度穿过了矮小的黑树丛。

晚上七点，我们已经通过了地图上标记的坐标，而且整整超出了1000米，在意识到这里没有村落后，我们不禁垂头丧气，亏我们还一整天严厉鞭策自己，试图赶在日暮前抵达。现在天色全黑了，我们已经几个小时没有看到水了。我们只好拿出吊床睡觉，甚至没有在矮树丛中清出一块空地，各自只找了两棵树拉起吊床，没吃东西没洗澡就上了床。那天晚上，皮肤上肮脏的汗垢既让人不舒服，也令人心灰意懒。我们从几乎见底的水壶喝了一小口水，试着入睡。

到了第二天早上，经过一夜的睡眠，我们打起精神，在附近棕榈树上找到一些秘鲁赤潮。那是一种有橘色柔软果肉的果实，隐约有股令人作呕的气味。搭配最后一块水虎鱼干，我们喝着残存的棕色水（因为这些水来自水坑而不是河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向前。所有能吃的只剩500克盐了。

对我们来说，没洗澡、疲惫不堪、饥饿的那个早上正是我内心深处希望在探险中体验到的。我们距苏里摩希河（亚马孙河）主河道150千米，下一条大支流茹鲁阿河在25千米外。过去8天，我们每天欠缺的热量超过3000卡，但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将这一实情摆在一边，继续如常地前进。多说无益，没有抱怨，没有分析，只须继续向前。在内心深处，我们期望自己会没事的。

由于没有河流，我们整天吃棕榈芯。第一次在丛林寻找碳水化合物的尝试成功了，但我们必须吃很多这种蔬菜沙拉才会饱。事实上，棕榈芯成了我们的救星。我们通常不会砍倒棕榈树，因为要取得树茎高处的内芯必须砍掉整棵树，而以我们目前虚弱的状态，用大砍刀砍下棕榈树很费力。但是，里面的白肉是我尝过的最棒的蔬菜沙拉。这种棕榈芯分布得相当零星，因此我们密切留意树顶，寻找这种独特的红色树茎。

乔现在看起来像个轻量级的拳击手，而我也从没掉过那么多重量。我通常维持在92千克左右，这段路程出发之前掉到约88千克，等到再度抵达苏里摩希河岸时，我只剩下81千克了。我们经常跌跌撞撞，血糖也不稳定，在意识不清的状况下被尖刺植物刺伤。

第二天情况好转，乔轻易地抓到了一只约10千克重的乌龟。当时是早上，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去处理它，只好带着它上路。我们轮流将这只铅锤重的动物活生生地塞进背包的顶部。

我们终于抵达一条较大的河流，这是一周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河。我开始肢解这只乌龟。我之前看过博鲁加和亚歇宁卡人宰杀乌龟，因此知道怎么下手，但没想到这是如此可怕的工作。你如果不怎么会宰杀动物，那么，最好不要选乌龟试手：你必须把它翻过来，让它的背贴地，再劈砍脚洞之间的龟壳，直到底部松动；接着，你要把底部像豆子罐头盖一样掀起来，可是底部还连接着仍在壳里的乌龟，你必须用大砍刀割下它。在宰杀乌龟之前，你也必须脱掉底下的龟壳。因此，我抓着乌龟现在毫无反抗能力的头部，尽快把它剁掉，杀了它。在我切下其余的肉和移除内脏期间，它的身体还不断抽动。我把所有东西清洗干净，并且用翻转过来的龟壳当碗，把乌龟切成条腌渍。乔做了个干燥架，我们有了一堆肉在火上熏制后，士气大振。我们因为食物有着落而兴高采烈。

我知道有些人会因为我们宰杀乌龟而感到震惊或难受，但我认为必须考虑到当时的情境以及我们只靠一点食物走了多久。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是杂食性动物。在丛林里，我们如果善加利用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资源，就能生存。尽管宰杀乌龟的激烈过程是种折磨，但我不会装作我很难过，因为这是自然的生存方式，乌龟是我们食物链中的一环。我看待动物的眼光开始和当地人一样，我不再当它们是必须保护的珍禽异兽，而是食物。

那天早上，我们走路渡河。那条河大约40米宽，但很浅，我们要跨越的那小部分很简单。一踏上彼岸，我们立刻感觉到那儿附近有人。小径变成了泥土路面的伐木路径，我们沿着这条小径走，希望能通往有人烟的地方。整个早上，我们只吃了乌龟肉干。除了棕榈芯，我们已经超过3天没有吃到碳水化合物。

下午一点左右，我们看到山坡顶上有间锡屋顶的木造小屋，立刻直奔而去。我们走过去时，一名妇女走到了门口。我向她解释我们正在进行的旅程，自阿马图拉后，我在丛林里连续待了37天，我不知道自己看起来像什么样子，但那名女子叫她正在制作木薯粉的先生来和我们说话。当被告知我们从哪儿来后，他们非常惊讶，说，就他们所知，以前没人这样走过。他们正要吃午餐，于是邀请我们同食。

我们把背包丢在山坡一块干燥高温的空地上，沿着梯子爬到位于支柱上的较凉爽的小木屋。里面没有家具，地板中央只摆着一大锅鱼汤、一塑料筒刚做好的木薯粉（还是温热的）以及一擦玻璃盘。女主人给我们每人盛了一盘汤，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坐在地板上，他们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下第一盘，接着吃第二盘、第三盘。我知道那天早上我们已经吃过乌龟干，但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一直是限量供给的，我们也积欠了不少卡路里，这让我们的身体依旧感到饥饿，导致我们不断地吃木薯粉。回想起来，我怀疑那时吃的木薯粉和在巴西其他地方吃的没有任何不同，但当时我和乔就是停不下来，觉得它有最棒的温热口感，觉得拿它和肉汤一起吃是我们吃过的最美味的佳肴。品尝食物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吃之前饥肠辘辘，的确没错，我此生都不会忘记这一餐。下午三点左右，这家人和我们道别，也指出了茹鲁阿河的方向。接下来我们要走30千米，预计要花4天。我们向这家人买了足够撑过这段路的木薯粉，也买了好几周以来没吃过的咖啡、奶粉和糖等奢侈品。

接下来几天，我们会见到整个探险中最可怕的丛林：雨林低矮纠结，树顶不到6米高，盘根错节的黑色枝干挡住我们的去路，每一步都湿闷难行，泥足深陷至大腿，抓到的每根枝条都布满尖刺或蚂蚁。现在是干季的高峰期，我忧惧地想着一年中的其他时节这片森林会是什么样，我猜，那时应该完全不能通行，这证明我从阿马图拉抄近路穿越河湾到特费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们的进度非常缓慢，有一个早上前进了不到400米。从山坡上那户人家得到虚幻的希望后，我觉得我们已经大功告成，能很轻松地抵达茹鲁阿市。我错得离谱。

这段路花了6天。那是我记忆所及最艰困的6天，我走每一步都恨恨的，也不再喜于探险的悸动，也不处于求生模式了。我受够了，自怜自艾，而且整天都气呼呼的。

听到船的发动机声两天之后，我们终于看到日光就在前方。和我们离开苏里摩希河后所见的景物相比，茹鲁阿河非常宽广。它穿过森林，刻画出令人惊叹的峡谷，它的河道不断改变，无情地将棕榈树、阔叶树扯离地面。

尽管缺钱，我还是入住了茹鲁阿市最好的旅馆。以西方标准来说，这并不豪华，但我和乔各有一张双人床和一台空调。在肯定是最难行的雨林里行走了四十多天后，这里如同宫殿。到达茹鲁阿河表示我们到特费的路途已到中点。茹鲁阿市是个潮湿闷热的丛林城镇，木造商店坐落在罕见的土墩高地上，俯瞰低矮、绿色蔓生的亚马孙盆地。如果有人戴着阔边高顶毡帽，把六发式左轮手枪低挂在身上，骑着一匹叫作西尔弗（Silver）的马快步进城，那么，他就能完全融入此地，只要他还会说一点葡萄牙语。

走出探险的饥荒世界，我们进入过度文明的世界，两者间的对比相当强烈，我看见了一个没有超重的当地女孩，但城里其他人看起来就像懒惰和贪婪的化身。

我们也沉溺在这两项原罪里，我体内本应阻止我大吃大喝的调节器出故障了。我像在坐云霄飞车，在饥饿和病态的暴食之间摇摆。在我们奋力地吃着奶油蛋糕和鸡蛋三明治时，我们的身体想要储存一些脂肪，就好像我们刚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一样。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在茹鲁阿市的旅馆房间里，将蚊帐弄出一个小孔，让局域网络电缆穿过。蚊帐外，我把宽带全球局域网的设备盒平稳地放在附近的墙上，朝西方瞄准远在天边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的同步卫星。一连上网，我就在这个从未听说过谷歌的小镇里拥有了全亚马孙最快的网络。我觉得我在城里时可以多花点钱使用珍贵的宽带网络，用它查看新闻以及登录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我搜寻着上个月的新闻。

我读着“军人救战友身亡”的新闻，接着全身发凉。不可能。马克·黑尔——我在军队的第一个军士长，那个给我写信时提到军团在阿富汗死伤情况的长官——已经死了。8月9日（寄信给我的4天后），他在阿富汗桑金（Sangin）附近帮受伤的战友移到安全地点，结果被炸死了。

我知道他有个太太名叫布伦达，还有两个女儿，虽然我从未见过她们；我只能坐在床上承受这令人哀伤的消息。就像多数人一样，我们并没有保持联络，但我赞助过他最近在网络上发起的一项慈善活动，从那之后，我们有过几次信件往来。

我一直很高兴能和马克再度取得联系，他能鼓舞人心，受到许多人尊敬，身为一名年轻军官，他在我父亲死后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长得俊秀，身材健壮，是个橄榄球员，在服役时取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在丛林里努力振作时，我有时会想到马克会怎么沉着、幽默和智慧地面对这些状况。在渐渐接受他死亡的事实之后，想到自己在他死前能和他有这么一点联系，我感到荣幸。

死亡能让人彻悟生命中珍贵的事物。突然间，缺乏食物、在荆棘树丛间擦得满身是伤似乎成了全世界最微不足道的事。我盯着屏幕上他的照片，深吸一口气，接着缓缓吐出来，我要从马克身上得到力量，我要让他对我的典范影响在死后仍能长存。

9月24日，乔和我踏着沉重的步伐离开茹鲁阿市，更费力地背上背包。我们每人背了9千克的食物，足够吃两个星期。我的背包有离谱的40千克重，乔的背包紧追在后，有36千克重。自从卢克在2008年4月离开卡马纳后，我还没背过这么重的行李，但在地图上，前方一片空白，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再次补给。

附近的丛林一团混乱，过去的老农田现在荆棘缠绕，三小时内，我们浑身擦伤，心情低落，勉强走了3000米。已经下午三点半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发现了水和回到茹鲁阿市的大道。理论上来说，我们应该在这里扎营，但这里的蚊子实在太多了。这悲惨的开端让人心生厌烦。

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厚脸皮的想法。

“乔，我们何不把背包藏在这里，回到茹鲁阿市，在床上睡最后一次？”我说。

我想好好睡一觉，但可不想背着这个重量走回镇上。计划成行，我们把背包埋在大堆叶子下，只带了水壶和我的皮夹，走上那条宽广的道路。40分钟后，我们再次回到镇上。

几个小时后，就在之前入住的那个旅馆的房间，乔隔着门叫我：“埃德，警察来了，有话跟你说。”

我走到外面，看到两名警察坐在崭新的警车里。我笑着问警官有什么事。

“我们接获报告，说你和你朋友在郊外鬼鬼祟祟的。我们要看你们的护照。”警察局长用葡萄牙语说道。

“当然可以，”我回答，“但有一个小问题，我们的护照藏在镇外3000米的树丛里。”

毫无意外地，他们不认为这不可疑，于是以走私毒品的罪嫌逮捕了我们。

警察局长不是个和善的人，把我们关起来会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唯一的男囚房已经满了，大约有6个人待在一张张往上叠的吊床上，因此，他们要我们睡在男囚房和女囚房之间的水泥走道上。

没有床，更别说寝具了。一道铁门锁着，我们和外界隔绝了。通过信箱上的窗口，我们可以往外看到警察围坐在桌边玩牌谈笑。我们大概在拍意大利式西部片⁽²⁾。

第二天早上，四名武装警察陪着我们来到藏背包的地方，接着命令我们把包带回镇上的警察局。在警察局，我们先出示了护照，然后，我们必须将包里的所有东西倒出，解释每一项的用途。好笑的是，这些警察对我们疑心的样子，就像一年多前我们在秘鲁遇到的亚歇宁卡人。现在，我们又被要求做同样的事，不过这一次，我猜想警察是因为我们抵达时没有通知他们并解释来意，所以才认为自己被冒犯了。在我看来，他们是在展示权力。

到了下午，整个程序都结束了，我们再次入住旅馆。乔和我饿极了，去吃了点东西，遇到了一家人（美国先生和巴西太太），那位太太在管理国家公园的机构巴西环保署（IBAMA）工作。当我们解释了我们正在从事的活动后，那位太太表示，我们即将经过的是保留区，而我们没有许可是无法通过的。

我意识到现在在浪费时间，因此也在浪费金钱。我表面保持冷静有礼，但内心认为我们又要应付更多的官僚以取得通行的许可了。她安排我到她的办公室会面，之后，我们必须从她的部门雇用一名可信赖的向导，确保我们遵守保留区的规定。我对这些没意见，只是因又被一件麻烦事给耽误了行程而感到泄气。

与此同时有个好消息：我们从贝宝网站募得不少捐款，现在我们有钱在特费之后进行下一段路程了。

我们很快就再次出发了，许可在手，还有一位酬劳昂贵的强制性向导尾随在后。我们在规划清楚的路线上疾行，花了一天就轻易地走过了保留区。我们和那个向导道别，在他和我们短暂相处后，我们的钓鱼技巧大幅提高。接着，我们前往一个看似从没有人进去过的区域。

请想象一片用来训练士兵壕沟战的丛林：原木下是地道迷宫，沟渠向四面八方展开，每一道壕沟约1.22米深；壕沟非常干燥，内有倒落的树作为障碍物；荆棘像约10.16厘米长的钉子，刺割过皮肤就像奶酪刀划过般。

这就是我们进入的丛林，我从未看过这种场景。干燥的壕沟在雨季是天然的排水渠道，但现在是我们的障碍物。这些壕沟令我联想到军事训练场地，这整个场面就像精心设计的胆量测试场所。我们轮流拿大砍刀开路，每半小时换人领队，手上的刺伤越来越多。我们从烂泥中滑落，掉进充满纠结荆棘的沟渠，双膝也沾满了泥巴。我们努力撑起来，从另一端爬出去。我们找到一座原木桥，跨过沟渠时，乔转头对我说：“生命中有许多障碍，埃德，你必须学会如何找到答案。”

“我的天啊，乔，真是金玉良言。”我这么默默想着，翻了翻白眼。

经过这些天，借助马克·黑尔这个杰出典范使自己更强大的希望渐渐落空，我发现自己很难不自怜。每一步都走得疲累又缓慢，有一次，我从腐烂的原木上跌落沟渠，被削掉一块小腿肉，我看到乔的脸上流露出了同情。我也很气自己无法表现得更好。

乔的神色让我瞥见了外界是如何看待我的，因此，在我们扎营、喝了提神的甜咖啡以及吃了最后的油煎咸牛肉后，我开始思考。结论是，我的弱点就在自己的脑袋里，我要把探险当作游戏。我就这么办，至少目前如此。这种方法奏效了。

我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开始每一天，每当挫折出现时，我就努力让自己不去在意，不让它击败我。每当我真的做到了，我就会嘉许自己。我也认为自己懂得了如何面对外界的影响，这进一步提升了士气。每一次割伤、跌倒或被叮咬都让我能再次鼓励自己，我驾驭了局

面，我又彻底爱上步行了，我们开始顺利地穿过丛林。艰难行进成了令人兴奋的事，我们加快了速度，简直就像在打游戏。在漫游行进的路上，蛇、黄蜂窝或原木桥成了必须快速通过、淡漠攻克的障碍。我觉得自己就像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的基努·里维斯——他变得非常强大时，用一只手就可以快速打斗，而且，身体其他部位还很放松。

然而，出乎意料的沟渠仍然拖累了速度，因此到了10月初，我们再度将木薯粉的每日配给减半才不至于断粮。如果没有抓到鱼，每天摄取的热量是1000卡，和抵达茹鲁阿河之前的每天450卡的热量相比算充裕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

10月5日，我们离开扎营的小水坑，带着两升用氢氧化钠处理过的泥水出发。怪异的沟渠森林现在看来像被飓风肆虐过一样，每棵巨木都裂开了，在地上横卧。阳光倾泻而入，矮树丛横生，仿佛服用了一疗程的合成代谢类固醇。我们缓慢到一天8小时只前进了2000米。我们必须卸下背包，用劈砍的方式通过浓密的屏障。一个人砍，另一人拿着两个背包前进。

丛林里障碍重重，加上旱季开始了，这意味着，到了下午五点，我们已经严重脱水了，而且喝的是前一晚从水坑里带来的残余棕泥水。这里的地下水位很低，因此凿井没有用。我们开始担心找不到水，担心没有水喝或用来煮饭，也担心接下来的一晚难挨。我们没洗澡就脏兮兮地入睡了。

就在这个时候，轰隆的雷声响起，低沉持久地回荡在树荫间。光线明显暗了下来，乔和我在渐暗的天色下心照不宣地互看了一眼。

我们瞬间改变了计划。乔放下背包往前急冲，寻找还挺立着的树，这样，我们才能竖起防雨棚。我拖着两个帆布包跟随在后，被一根根多刺的枝干绊住。

第一滴雨从枝干间落下来时，我们正绑好遮雨棚的最后一个车夫结。防水摄像机袋在防水布下方的一端，背包衬里则在另一端；暴雨倾盆而下时，清凉的雨水从遮雨棚流进临时贮水器，就像水经由花园的水管注满儿童游泳池一般。

这场热带大雨只下了6分钟，但我们集了35升水——35升干净的水，无须经过化学处理。

我们洗完澡，喝了咖啡，乔很快地说了声“感谢主”，我们便就寝了，像四周倒落的原木一样呼呼大睡。

到了10月中旬，我们再次进入这辈子待过的最偏远的地区——这的确不是以距离来衡量的，而是以返回文明的天数来计算的。第二个全球定位设备也坏了，因此，我们必须改用地图和罗盘方位角。我带着两份地图，一份是1:1000000比例尺的飞行导航图，另一份是斯坦福公司出版的1:4000000比例尺的南美洲上半部地图。这两份地图没有等高线，也不适合用来做微尺度导航。我估算自上次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后至今所走的距离，试着尽可能在茂密的树丛中直线行进，然而误差范围不断增加，我们也没有办法核对我们的确切位置。

我们经常得在导航图上用铅笔重画河流的位置，因为上面的位置非常不精确，只有地面上河道的大概位置。事实上，我们反而开始使用较精确但较不详细的1:4000000比例尺的地图，我带着这张地图原本只是为了让对我们感兴趣的当地人看看这次徒步之旅的全貌而已，地图上涵盖九个国家。在这张斯坦福地图上，1毫米代表地面上4千米，我们一天很少移动3毫米以上，在距离如此短的情况下计算方位角，很有可能不正确。这是个导航笑话；如果没有危及我们的性命，这就是件可笑的事。

我们带着应急无线电示位标，由于医疗保险早已失效，我们就算拔掉插销，也不会有什么事。没有人会发起救援行动，我们全得靠自己。

远离人迹这一点，也可以根据此地的野生生物看出来。我们第一次在渔网里抓到两只小鳄鱼，在收网时，我们不担心小鳄鱼，我们担心的是成年鳄。

令人感到宽慰的是我们俩很少生病。乔病过一次，但整体来说，我们有强健的体魄，也许运气也很好。我们引以为傲，因此，乔开始说头痛、眼睛发黑、看不清东西时，实在令人担心。

乔感觉非常疼，又病了。我不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但给了他止痛药。温度计的电池没电了，我记得和卢克在赫里福德郡上医疗训练课时的对话，我们都认为要带水银温度计。

到了傍晚，在达成至少找到水再休息的共识后，乔奋力撑完那天的路程。我们来到一个浅水坑，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开凿，让乔直接倒地休息。这个对自己的意志力和精力相当自豪的男人，就这么让背包掉落地面，他自己也随即倒下。

我认为一杯热腾腾的甜咖啡和一顿好菜会对乔有帮助，因此在他一动不动地躺着时，我开始扎营。我挖掘水坑，好用便当盒把水舀到背包内衬做的贮水器里，我捡柴火、生火、煮咖啡。在烧水时，我把乔的吊床搭好，坚持要他用储备水洗澡，让他换上干燥的睡衣。之后，他爬上吊床，立刻睡着了。我开始搭自己的吊床，煮咖啡，准备晚餐。

那天晚上，我意识到我们俩多么依赖彼此。那晚我很忙碌，因为我必须做平常两人分摊的所有事。天快黑时，我把乔叫醒，让他吃晚餐。他看来有所好转，勉强吞下了食物，一吃完就立刻回吊床上睡觉。我拿着手电筒洗碗。

有一种心灵的纯净，只有在你忘了自己并尽力帮助别人时才会出现。要是我们当中有一个在这里生重病，那是会致命的。除了拖着乔或背着乔行走，我们没有其他撤退方式。如果他不能走，他就会死，他也知道这一点。

不过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好多了，部分原因是他的意志力强。我可以感觉到他对自己前一天的状况很失望。那天早上，他起床时认为自己会好起来的。

我在网络上发表了那天的视频博客，讽刺的是，为乔的病情做出诊断的是一位博客读者。有几个人告诉我他的病听起来像严重的偏头痛，他们说得似乎有道理。

上网时，我发现雷纳夫·法因斯爵士的探险信托基金会恢复了赞助项目，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钱。这次我还收到两封电子邮件，

一封来自雷纳夫·法因斯爵士本人，另一封来自环球探险信托基金会的受托人安东（Anton）。

亲爱的埃德（雷纳夫爵士来信）：

恭喜你至今取得的进展。

我想情势对你而言会越来越困难；40年来，我参与过30次以上的大型探险。其中至少有一半失败了，探险家总是要自己做出决定，何时回头，何时继续。

继续下去有时候只是一味地愚蠢和不负责任；有时候却有机会努力克服困难，让情势好转，在这种情况下，击退在士气低落时产生的“脆弱想法”是值得的。只有你才能做出最后的裁决。

无论你在未来几周、几个月做出什么决定，你都要知道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环球探险信托基金会的所有人都以你为荣。

致上我最美好的祝福。

雷

光收到这封信，我就欣喜若狂了，但也讶异于他似乎提供了“退出条款”。在步行时，我有太多时间可以思考，我开始好奇他指的是哪种危险。我崩溃了吗？在博客里写得那么明显吗？我是否不负责任？

乔和我坐下来长谈。正如雷纳夫爵士所言：“只有你才能做出最后的裁决。”我们要放弃吗？我们是不是搞砸了？

安东的来信直截了当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亲爱的埃德：

我看过雷寄给你的信件的副本了。这促使我也想写封信给你！

我们环球探险信托基金会收到过许多探险经费申请。我们提供资助的一项条件是，那个计划必须非常有野心，对于人类成就的进展有深远影响。但是，很少有申请完全符合这项条件。我们的目标是支持那些符合我们“疯狂但非凡”这一条件的探险活动。当我们咨询英国

一位重要的亚马孙研究权威人士时，我们问他对你的探险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次不可能完成的旅程。然而他指出，虽然这是“疯狂”的想法，但你如果成功了，将非常“了不起”，因此，这正是我们要支持的探险活动。正如雷所说，并非所有的探险都会成功，当问题变得太过艰巨时，我们环球探险信托基金会完全能够理解，然而，如果你能坚持下去，前进到其他人认为不可能到达的地方，让这些专家跌破眼镜，那么，你将站在人类成就的前沿。

在英国和远方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关注着你，我们中没有一个能知道你多么低落。愿你顺利渡过这些艰难时刻，你如果应付得来，就会完成一件惊人且极有价值的成就，这已经为你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钦佩。

致上我最美好的祝福。

安东

这封信让我热泪盈眶，在丛林之中收到这样的信多么令人感动，在我身后确实有如此了不起的支持者；我以此来增强我的决心。

现在是10月底，旱季把丛林里的每滴水分都吸干，干涸的河床让我和乔在最细小的丛林藤蔓下可悲地等着，只为获取几滴提神的水。我们想挖掘干涸的河床，希望找到地下水，但通常徒劳无功。

幸好旱季不代表没有雨，只是水位较低，因此，我们不止一次因夜间大雨而得救。现在，我们很善于使用临时贮水器。

由于鱼在水里，饥肠辘辘让我们更觉得干渴。有好几个星期，我们都无法捕到足够的鱼烟熏后带上路，我们仅能糊口——抓到鱼后马上吞下肚，毫不考虑为未来几天储存粮食。我们很满足于在能吃的时候就吃一顿，之后再运用智慧找到食物。

乔老是引用一句在我看来极其浅白的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之前我总是被这句话惹恼，觉得无意义的说教就是在伤口上撒盐，但听过他在恶名昭彰的恐怖组织光明之路活动的秘鲁山林间生存、躲避的故事后，我才开始理解这句话的来龙去脉。

这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食物，抱怨没有意义，一直想也没用，你如果能接受你无法掌握的局面，并且不顾一切地继续向前，就能学会满足于更少的资源。

我们抵达通往特费湖和特费的巴瓦那河（River Bauaná）时，把最后的配给吃完了。此时，我们离下一条也是通往特费湖的大河还有40千米左右，我们做出了一个谨慎的决定：在此地做记号，然后往下游寻找人迹。我们距离特费还有100千米，但决定转向南边，因此不会真的步行通过特费。我们只是没有必要太靠近苏里摩希河，如果距离主河道100千米远，我们就可以避开许多大湖。

我用鲜艳的塑料袋在树上绑蝴蝶结做记号，接着将筏子充气，出发寻找食物。此行和9月在米纳拉济纽河浪费时间的那段行程十分相似，这种相似性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不同的是，我们知道这条河通往特费，因此猜想目的地也许真的人口稠密。

下午四点，我们决定停止划行，开始扎营。由于没有食物，我们要吃东西就得花几小时去钓鱼。我在汇入这条河的小溪口撒网，乔去挖虫子当饵。半小时过去了，网里没有半条鱼，乔也无法找到任何虫子。又过了半小时，还是空空如也。就在我检查渔网时，我听到上游有声音。

“那里有人！”我对他大叫。我们都专注地听着，认为那一定是猴子发出的声音，我进一步盯着看，似乎看到一块蓝色防雨布半遮着一艘船。

“那里有人。”我确定地说。乔和我马上把没钓到半条鱼的事搁在一旁，决定前去做自我介绍（渔夫和猎人通常有很多食物），在我们划向那艘约在100米外的船时，肚子饿得咕咕叫。由于我的一只手在摄影，乔比我先抵达，他向那两人做自我介绍，接着对我大喊，说他们邀请我们一起吃饭。他们煮了鱼汤，还有一大桶木薯粉。

我们又一次不可思议地好运：我们距离特费还有100千米以上，但在吃完余粮的8小时后，就遇上了食物充足的渔夫。我们往鱼汤里倒了一大堆金黄色的木薯粉颗粒，满足地大口吃着。亚马孙河这一地区根深蒂固的好客精神实在令人惊奇，人们通常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要不要吃点东西？你一定饿了！”，之后才问我们打哪儿来。

那两个人已经捕完鱼，准备返回下游。我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和他们一起前往几千米外离这儿最近的村庄。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因为我们需要买食物，所以都挤进这艘小船。小船哗啦啦地往下游去，来到位于一块高地上的小村庄。这个村庄其实只有一户人家，他们提供一间废弃的外屋，让我们在黑暗中拉起吊床。接着，那家人也请我们去吃一顿，因此，我们最后吃得饱饱地上床睡觉了，肠子发出了咕噜噜的声响。

屋主安东尼奥并没有多余的食物卖给我们，但他隔天要去下游的商店，如果我们不介意等，他可以帮我们买回来。乔和我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一天，我们闲散地帮那家人制作木薯粉，把直径3米的巨大平底锅放在泥灶上，让四周燃着熊熊柴火，烘烤着木薯粉，并且用独木舟的木桨在澡盆大小的平底锅里搅拌。刚做好的木薯粉味道好极了，散发出一阵阵就像早晨的传统面包坊飘来的那种香味。

第二天买完食物，安东尼奥同意带我们回到在树枝上绑塑料袋的地方，我们搭起吊床，回味着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幸运、最有效率的一次休息和再补给。48小时没走路，我们就买齐了食物储备：木薯粉、盐、咖啡、糖、奶粉和几头大蒜。我们精神焕发、轻松自在，而且只花了一点钱。

我们连通外界的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和通话设备接连出现故障，设备就是无法开机。除了能在紧急状况派上用场，它们也是我们在探险中视频直播和写博客的必要装备。在我们抵达特费以及有网络的地方后，我必须要求在利马的马莱内将备用的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寄到伊基托斯，然后派乔去秘鲁取回来。这听起来很浪费时间，但当你试着在南美洲跨国邮寄物品时，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去拿比把它当作行李运送安全得多，否则光是办理文书就要花上几星期。乔也喜欢这个主意，因为他必须从特费飞到塔巴廷加，而他之前从没坐过飞机。

对于我请求财务援助的事，人们的回响相当热烈。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的钱为这次探险再入保险，因此，经过我和之前的保险公司克劳斯公司（THB Clowes）讨论后，我们的装备不再入保，但至少我们又有了医疗保险。从事后来看，我不确定我会再入这么专业（又昂贵）的保险，因为我们几乎已经认为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自行撤退。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在探险之路上了，我们无法入标准英国登山

协会（British Mountaineering Council, BMC）保险，因此只能又支付1000多英镑的保险费。同时，我也在网络上订购了一套新的全球定位设备，把它寄到一个新的赞助人皮特·凯西那儿，我同意他过来和我们走三星期，以感谢他慷慨的捐助。他在所有设备都要解体的时刻来到，为我们带来所需的新设备，这些设备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事后看来，只用一张不精确的地图和一只在英国买的甚至无法在南美洲保持平衡的便宜罗盘导航，让旅程更加刺激了；我们只能凑合着用，回归几百年前用的方法，但我们依然在前进，只须更加机警并且留意速度和路径的规划——“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乔和我在一潭宽广的内陆湖的湖边扎了营。湖的水位很低，我们去湖边之前，必须蹚过脚踝深的泥潭，但那里有一大片较高的林地俯瞰整潭湖，我们可以在那儿扎营。由于亟需蛋白质，我们每人拿着一张刺网和两根长竿涉水入湖，在大腿深的地方架起刺网。

在渔网的另一端架上竿子之前，我们已经捕到鱼了。湖里的鱼非常密集，我们的收获很大。我们掏出一条又一条鱼，把它们放到锅里煮，没有一条鱼是水虎鱼（水虎鱼会吃其他的鱼，而且会破坏渔网），因此，我们决定把渔网留置一夜，觉得隔天一早就能大丰收。

夕阳西斜时，营地看来像家一样舒适又美丽，在茂密的林木中待那么长一段时间后，湖边开阔的空间让人感到放松。我们笨手笨脚地走到水边洗澡。日落后，我们在黑暗中打开头灯，正当我们在湖边脱衣，在泥地的木头堆上站稳以保持脚部干净时，我瞥见湖面上尽是反射的光点。

“天啊！”我对乔说，“天啊，看湖里有多少只鳄鱼！”

一开始，乔不认为那是鳄鱼，等他再近一点看，他发现我是对的。满是鳄鱼的湖，以及在水面上反射我们头灯灯光的眼睛数目，证实了我们的担忧。黑凯门鳄是短吻鳄的一种，可以长到5米长，这种身形在水里能轻易地攻击并杀死成人。用渔网收取最后收获的想法泡汤了，而一想到站在大约有15只大型掠食动物的湖边洗澡是多么容易遭到袭击，我们像孩子一样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们走上坡地时听到了巨响，那是鳄鱼从渔网里取食发出的声音。声响持续整晚，我难以入眠。

隔天早上，我发现渔网自长竿脱离，漂浮在湖的另一头，乔的渔网缠绕在我们这一侧湖岸的灌木丛里，两张网都残破不堪，上面有许多大洞。又是一件要替换的东西，然而我们又学到了一课。

出发后不到200米，我们抵达特费河。这条河通往特费，我们决定在此休息，往下游走90千米，到镇上和赞助人皮特碰头。这潭湖在我们回头时是个明显的标记，因此我们向下游划，找船带我们去特费。

我们很快找到一个部落愿意让我们停留、吃饭，并为我们安排隔天搭独木舟到特费的行程。一如既往，我们在巴西吃得好，受到了无可挑剔的款待，晚上，我们用卫星电视看巴西的肥皂剧。

特费之前的名称叫艾加（Ega），19世纪出生于莱斯特（Leicester）的博物学家和探险家亨利·沃尔特·贝茨（Henry Walter Bates）以此为根据地。他待在亚马孙期间，往家乡寄回14000种物种（多数是昆虫），其中有8000种对科学界来说是新发现。他的著作《亚马孙河上的博物学家》（The Naturalist on the River Amazons）记录了他和印第安人向导的探险故事，被誉为“自然历史之旅的最佳著作之一”。

特费就像亚马孙河流域的许多城镇一样，没有道路进入，它坐落在特费河河口的巨大湖泊特费湖的北端。在横渡湖泊抵达特费时，乔告诉我，他虽然没见过海，但现在知道海是什么样了；巨大的浪拍打小独木舟的船头，在湖心可以看到距两岸各30千米的地方。

我们在离开茹鲁阿市的43天后第一次入住旅馆。乔和我尽管认识镇上的人，但整整三天都躲在旅馆里睡觉，只到了吃饭时间才出没，仅此而已，我们和人打交道的欲望大概和孤僻的数学教授差不多。

我们慢慢恢复正常，我送乔回伊基托斯。时间真的很紧张，巴西签证只剩几天就到期了，如果乔延误了，他很有可能再也进不了这个国家，而且我们必须和外界联系，因此乔得回去取件。

尽管希望合法地留在巴西，但我们现在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卡沃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飞到委内瑞拉，试着从那里再入境，但他无法保证我们能回到巴西。很明显，与其被困在巴西之外不能再入境，

还不如冒着被遣返的风险待在这里。我们还有9个半月要走，从现在开始必须不计一切代价避开联邦警察，因为我们是非法移民。

乔带着备用的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回来了，皮特则带着成堆的替换装备抵达，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球定位设备，其他的还包括给乔的新麦克派克帆布包以及给我们俩的新奥特伯格丛林靴。

现在是11月初，我们雇了另一艘小船回大批鳄鱼出没的湖边，航行一整天后抵达。由于天色已黑，船留了下来，我们全都在此扎营；我接上宽带全球局域网，现在有了全球定位设备，我要将新位置更新到地图上。令我厌恶的是，新宽带全球局域网竟然无法使用——可以打电话，却不能上网。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用尽了所有电池的电量，与英国AST卫星通信公司通话，但我不连上网的话，他们就无法解决问题。网络设备在马莱内位于利马的公寓里闲置了好几个月，而国际海事卫星公司显然做过“重大卫星变更”，我们必须为通信盒下载新软件。我们只好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继续前进，接下来三周的博客只能通过打卫星电话给我的前女友克罗伊来写，她的电话号码是这世上我唯一背下来的号码，她在英国发表博客，使用从谷歌上下载的图片。

我们背着比以往更重的东西出发。我估计这段路程需要走24天，中间没有半个部落，因此必须有足够的食物。由于皮特和我们一起走，我花了许多钱买杂粮棒当午餐，这样才能维持一整天的能量；我们买了432条杂粮棒，清空了特费五家商店的所有存货。现在我们的背包其重无比，乔大约背40千克，我背44千克，皮特从未在丛林行走过，因此背35千克左右，但多数时候他背得比我和乔的还重。

路面非常难走，第一天我们来到一片长满茂密珍珠茅的原野，但也只能往前推进。被纸割伤的伤口远不如被珍珠茅割伤的伤口疼；我们好比先浸泡在胶水里的纸，然后被锐利的玻璃划过；我们的手鲜血淋漓，衣服也被刮破了。我们勉力走了4小时后就累倒了，决定扎营。

皮特是英国南方克劳利（Crawley）的建筑工人，体格强健，但他不知道把自己置身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了。

“这肯定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我不知道会这么困难，你得经历过了才会相信，言语无法精准描述。”皮特在第一天过后这么说道。

他还有23天要走。

皮特全身马上被蚊子和沙蝇咬伤，我为他感到难过。他对所有东西都产生了不良反应，我们必须每晚给他服用抗组胺药物让他入睡。我已经习惯在泥地挖掘的洞里洗涤，没有河钓鱼时，我就干吃干木薯粉当晚餐，但突然间，我领会到我们过的生活是多么原始、兽性，皮特显然因前方路途所要面临的身心挑战而震惊，幸好他极不愿意让自己和我们失望，因此，他忍受恶劣的境况和艰苦的长日，鲜少抱怨。

2009年11月12日，我拿着大砍刀在前头劈砍时，无意中踩到了一条壮实、蜷曲着的响尾蛇。在它蓄势攻击时，皮特看到了地面上的影子在晃动。棕黑色的蛇和林地的颜色非常相似，他能看到并且猛然后退避开，这真是奇迹。

这并非罕见的意外，我和乔时常会遇上，而我之所以还记得，大概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待这件事。这也提醒了我们，在那里是多么孤独。我们有48小时的抗蛇毒血清，可以让其中一人存活48小时。从我们行经的林木间撤退是荒谬的想法，即使有可能扛着担架通过枝节缠绕的森林，我们至少也要花上一星期。

很严肃的假设：如果皮特被咬了，而且中了毒，我们能做的只是扎营，把他的脚固定在吊床上，接下来两天为他注射抗蛇毒血清。之后如果蛇毒仍在他体内，他当然就会死，即使不死，他也必须自己走出去。情况向来如此，但第一次从新手的眼中看到这一点，我得以用新的角度看待我们要完成的这次探险所必须承担的风险。

我们的保险也许再次生效了，但说实在的，艾克斯梅德的四人团队从赫里福德郡到底能多快赶到？等他们抵达巴西境内，张罗地图、交通工具和当地向导，接着从最近的可航行河道出发，再徒步走到我们的位置，至少需要好几天。

一星期后，乔、皮特和我走下一段树木丛生的泥泞坡路，平常被林木遮蔽的地平线出现了，这意味着前方有河。走到坡底，我们遇上一片最折磨人心志的林地：竹林和珍珠茅紧密交织着。乔明显地意志消沉了，他因要花好几个小时拖着身躯穿过密布的竹林而感到厌烦。我们知道自己会像蜗牛一样慢速行进，而指关节则会因为近距离砍伐而红肿、流血。

我们的地图没有小比例尺的导航细节，但几个月来我头一次想起谷歌地图帮得上忙。我们仍然没有网络，但已经把图片存在内存卡里了，由于我有一阵子没用苹果笔记本了，电池还有很多电。

我拿出计算机，把利用新的全球定位设备取得的经纬度输入谷歌地图，立刻看到我们所在之处以及前方河流的形状，也看到，如果我们偏向右边行进，就会迎向一个大河湾的顶点。因此，我从谷歌地图上取下那个点的坐标，把坐标输入全球定位系统，得到了一个方位角，再把方位角输入罗盘，我们立马就有了一个新方向，以及到该河流最短的距离。

那个方向极为准确，我们一次也没有走进竹林里。结合科技，我绘出了新路径，这成效让我非常满意。才走1000多米，我们就来到那条宽阔的河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逃过原本梦魇般的下午，我们都替自己感到高兴。

从那时候开始，谷歌地图取代了不精确的大比例尺地图，成为导航的首选辅助工具，在这段路程的剩余里程，我们直接使用了苹果笔记本。从下个大城镇出发前，我们将前方的路径用屏幕截图后，把图片打印了出来，上面还带着坐标方格。这就是我们在接下来9个月里以及前方2000多千米的路上使用的导航方式。

不过，谷歌地图也有其局限。我错误地认为某条白线是通往哥亚利镇（Coari）的道路。那条线的确是人为穿过树林时留下来的，但它不是路，而是一条油管。这是个双重打击：不但我以为能有几天轻松走在道路上的希望泡汤了，而且，油管砍伐过的区域最近又长了植被。我们在赤道的烈日下行进得极为缓慢，此外，由于上方没有树荫控制再生速度，草木疯狂生长，长得无缝无隙。

我们紧张地接近一个人都穿橘色工作裤的营地，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许可就经过他们的地盘，石油公司肯定不会太高兴。其实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油管工人硬要我们吃猪肉，喝咖啡和冰凉的饮料。之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我们离开营地时，他们全都起立鼓掌。在丛林中马不停蹄地行走三星期后，接触到这样的善意不可能不为之动容。人们了解我们的目的，也表示支持，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和在巴

西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这些工人不愿收任何费用，他们只希望我们快乐地启程。

我们在哥亚利和皮特道别，他在三周内减重6千克，但是他坚持不懈，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他有顽强的韧性，他的谦卑和对乔的仁慈让此行对我有所帮助。

我拿着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从旅馆的窗户探身出去，终于在AST的工程师远距离的详细解说下，使用“远程还原至出厂设定”让它重启了。当知道该怎么做之后，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了，但我耗费了48小时，做了所有尝试，直到AST的工程师想到这个简单的解决办法。

乔和我在旅馆的餐厅做“狗饼干”。那是一种富含卡路里的能量点心，用面粉、糖、燕麦、奶油和焦糖牛奶酱制成，以肉桂和姜调味，非常好吃，而且价格远低于杂粮棒。最后我们在市场买了两顶圣诞帽，再次出发，走入树丛。

“全心投入”

2009年12月10日，我已经走了21个月，但还要努力7个月。我坐在背包上对乔说，我觉得好无聊，不是觉得精力耗尽、失望或疲倦，就是觉得无聊。

我可以从乔的表情看出他完全理解。一段9天的路程我们才走了3天，休息也很充足，目前的障碍不是来自体能，而是来自心理。

眼前又是一个远离家人的圣诞节，我们知道届时会在丛林里吃木薯粉配盐，也知道那天会试着走7000米以上，之后如果河流够宽的话，我们会找个地方撒网。每件事都骇人地相似。

这不是我们会不会放弃的问题。我们从未想过放弃；无论是否在虚张声势，我们宁死也不要回家当个失败者。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为此行注入新的活力，因为有时候这段旅程变得像自找的徒刑。

2009年12月17日的博客：

10年前的昨天，我睡在爸妈家的客房里，那栋房子位于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的郊区小村庄莫斯利（Mowsley）。我刚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身为一名年轻少尉，我没有自己的房子，在假期待在父母家，直到第一次到德文郡和多塞特郡军团（Devonshire and Dorset Regiment）报到。

那时天色还很黑，我犹在半梦半醒间，妈妈冲了进来，无法抑制声音里令人惊骇的哀痛：“你父亲死了！”妈妈和我在前一晚载他到皇家医院，那是他痛恨、不想去的地方。在那里，医护人员给他用的

药让他产生了幻觉，问我到底爱不爱他。在那里，我们留下他一人，开车经过酒吧回家。

妈妈和我坐在楼梯顶上，紧紧相拥，泪流满面。我停不下来，一直大声说着：“爸爸，我爱你。爸爸，我爱你。爸爸，我爱你……”我要让他知道，我要设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他。

几个小时后，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们到了医院，他还没整装，嘴巴半阖，身体躺在那里，只剩躯壳。家里最坚强的一员，将大家紧紧相系的力量，已经走了。我让护士将他手指上的金质图章戒指取下来，我戴上那枚戒指，从那天起我一直戴着，直到在秘鲁因为吸引太多阿沙宁卡印第安人的注意，才请马莱内帮我保管，那枚戒指现在在利马。

爸爸在他的年代算高大，约1.91米高。他沉默寡言，具有含蓄不露的幽默感，曾两次对抗癌症病魔。因为从二十几岁开始就接受过时的放射疗法和化疗，后来，他的身体相当虚弱；他是我所认识的心理上和道德上最强大的人，他对妈妈、姐姐和我的爱毋庸置疑。

无论天气如何，他总是戴着平顶圆帽，穿着大衣和威灵顿长筒靴，站在边线上看我打橄榄球（鼻尖上还有水滴），即使在他病重的时刻。他的血小板指数很低，如果被球砸到，他可能会丧命——因为大出血而死亡——但他还是来看我打球，这种支持是为人子永不会忘的。

我写这些文字时，泪水滑落面颊，这是我抒发压力、忧虑和孤寂的方式，并不是因为我还未走出丧父之痛，而是因为在压抑了几个月的恐惧和焦虑之后，我再次让自己的情感受到了触动。不让自己经历这短暂的脆弱的话，我就无法继续下去。这能使我继续向前，使我变得更坚强，使我思考问题更冷静、客观。

亚马孙河不是一般的河流——如泰晤士河——它是水位高涨时冲向森林的大片洪水的中心。泛滥的洪水在某些地方的宽度超过100千米，相当于伦敦到巴黎的距离。河口处每秒钟向大西洋涌进20万立方米的水，那可不是两个渺小、不起眼又无助的漫步者想被吞没的地方。据说，骤发的洪水会在一夜间将营地完全冲走，杀人于无形。

雨季开始了，乔和我好几天没有干木头生火，但幸好我们知道如何使用湿木头生火（到如今已经练习过许多次了）。洗完澡后，我们光着身子吃东西——没有必要穿上干衣服（马上又会湿掉），彼此也早就度过了尴尬期。

圣诞节前夕，我们太过接近苏里摩希河，无法避开危险的洪溢林。现在，我们身处每年都会被洪水淹没的森林里，泥泞的林地越来越潮湿，一天比一天难行。

我们必须避开洪溢林，在洪水来临以前找到高地。高地会是我们最期待的圣诞节礼物。

圣诞节那天，雨下个不停。我们湿漉漉地走了一天，为网站录了一些傻气的视频，还在吊床上戴圣诞帽为网站拍摄玩闹照片。我们扎营时，大雨持续不断，我用湿透的木头生火，乔去看看能不能在河里捕到鱼，我确信他不会碰上好运。

乔去了好久，我坐在雨中想着与世隔绝的孤独圣诞节，但就在天色渐暗之时，乔回来了，带着七八条鱼，把它们穿过鳃串在一根木棍上。

“干得好，乔！”我咧嘴大笑，在附近的小溪帮他把鱼去鳞片、掏内脏。我们炒了一些大蒜，接着加鱼肉块和水。真是大丰收，一份很棒的圣诞节礼物。我们谈笑，乔练习用英语说“圣诞快乐”。

“明年的这个时候，乔，我们就会在家里与家人团聚。”我说道。

我们坐着凝视橘红色的火焰，梦想着外面的世界。

每一天，乔和我的衣服都会被汗水湿透，都会贴在身上。我们每小时休息10分钟，习惯性地拧干上衣，这就是衣服整天最干的状态了，接着上衣会像抹布一样，被拿来擦颈后和肘弯处的沙粒和污垢。在这珍贵的10分钟里，我们坐在背包上，交换疲惫的眼神。

在高度潮湿的环境里，雨水带来清新的空气，但持续不断的降雨也意味着河水正在上涨，流泻出来的水不断渗进低洼的洪溢林。目

前，水只浸湿了我们的靴子，我们的进度还算不错。

12月31日，我们刚刚通过一片茂盛的多刺竹林，来到河边，在及腰的河里清掉灯芯草，腾出空间将筏子充气。我们只须在这里渡河，但现在是新年前夕，我们很累了，却还在这里给筏子充气……

“乔，”我鼓起勇气说道，“我们可以乘坐充气筏去下游的渔村帕里卡图巴（Paricatuba），今晚我们不要孤单地待在丛林里……”他笑了。我确认他也想着一样的事，我们的新年有了新计划。

我们用全球定位系统在此地做下记号，第二天再返回（或者第三天，得看当晚过得如何）。4小时后，我们已经坐在那美丽村庄前方一座水上漂浮屋的木头甲板上，人手一杯啤酒。在我们身后，空旷的坡地耸立在水面上，一座巨大的粉红色水泥教堂矗立在山坡顶端。在我们为新环境干杯时，炙热的夕阳烤着我这外国佬的颈子。

那个晚上的大多时候，我们都围坐着看一块约12.7厘米长的屏幕，听葡萄牙语的巴西热门音乐。我认为我的葡萄牙语进步了——在听糊在一起的鼻音词方面——不过试着了解含糊的喝醉酒般的葡萄牙语真的非常困难，那晚最后在一群非常诚恳的老人拥抱我们，说我们是朋友的模糊记忆中结束。

隔天起床，乔很想休假一天，因此我检查电子邮件并且记账。我们两人在新年前夕花了12英镑。对于这次放纵，我没有太大的罪恶感，那些啤酒清凉又解渴，会让你露出满足的微笑，非常值得。

1月2日，我们必须回到上次步行结束的地方，因此雇了一只木船和一名笑容爽朗的矮胖船夫阿马拉尔，让他开船带我们回上游。他的引擎在我们身后突突作响，我们必须回到那天离开的确切位置。在接近全球定位系统导航点时，我开始给带我们到下游帕里卡图巴村的筏子充气。我站在窄船的船头，正对着充气筏吹最后几口气，把它充得像鼓一样紧绷，一阵强风把我和充气筏都吹进了河里。我并不担心提早浸到水里，转过身傻气地笑着，准备接受乔的嘲笑，却看到我弄翻了整只船，两名稍微惊慌的船员正忙着打捞落水装备，船和沉重的引擎都消失在混浊的水中了。乔抓住了装有我钱包和全球定位系统的干袋子，阿马拉尔则试着解开缠在3米下河床芦苇里的外挂引擎，我拖着沉没的木船到浅水处，尽快把水倒出来，才好回到犹在惊慌的阿马拉

尔身边。他现在还在水最深的位置，展现出绿巨人浩克般的力量，把发动机拖上来，放在船上。我们又聚集在一起了，令我们大为宽慰的是，丢失的只有一把那天买的大砍刀。情况原本可能会更惨重。

乔和我为我的笨拙道歉，因为引擎进水了，阿马拉尔现在必须划船回去。我们渡过河，度过最愉快的一天，穿过意外地干燥开阔的洪溢林，不需要用到那把已经无法使用的大砍刀。下午两点，我们走进帕里卡图巴村，听说那只船还没回来。我必须雇另一只独木舟展开搜救工作，寻找可怜的阿马拉尔。

我和新船夫阿尔瓦罗走遍了整段河，进行彻底的搜寻。有趣的是，他长得很像电视剧《办公室风云》（The Office）英国版里的克里斯·芬奇（Chris Finch）。“芬奇”和我静静地互看一眼，都下了结论：阿马拉尔一定在波涛起伏的危险河流里溺毙了。我们去一家之前在途中没有经过的水上漂浮屋查看时，找到了微笑着啜饮咖啡的阿马拉尔，他正在太阳下晒引擎。

徒步走到帕里卡图巴村最棒的一点就是，在空旷的河岸上方、在粉红教堂的后面，有一条通往马瑙斯的宽广公路。眼下我们已经避开了洪水，预计只要走10天就会抵达那条公路。

任何事都是相对的，当你已经走了639天的路，一段10天的路程，穿越村人记忆中没人走过的未知丛林，看来是小事一桩。我们带着充足的补给和高昂的士气去寻找BR-319公路，知道到了马瑙斯就能充分休息，就能受到帕里卡图巴村热情的接待。我们感觉就像已经放假了。

但在恶劣的丛林走了4天后，乔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世上没几个人会跟着你经历这些。”

他说得极是，这10天里没什么令人开心的事，没有美丽的河流，鲜少野生生物，只有一片又一片凌乱的次生灌木丛，我们必须不断劈砍才能前进。也许是因为马瑙斯近在咫尺，我们每小时都在算时间，脑子卷进会把人逼疯的绝望漩涡，我们在战斗还没结束时就降低了防备，因此让走这段路有多难多慢的负面想法动摇了信心。

我们必须改变策略，努力再次控制自己的想法。我的方法每天都不同，但我记得我唱过《全心投入》（Dedication）这首歌，这是英国广播公司以前一档儿童节目《破纪录者》（Record Breakers）的主题曲，由节目主持人罗伊·卡斯尔（Roy Castle）演唱并吹奏小号。我已经好几年没听到这首歌了，是乔的态度让这首歌在我脑海里盘旋不去。

有一天早上，乔从湿滑的原木上失足摔倒，发现大砍刀自手中滑落，在着地时，他本能地去抓刀子，结果刀锋自他手指上落下。我看着这一切以慢动作发生，他脸上惊恐的表情说明了一切，我祈祷他不要断了任何一根手指。他紧握着手，仓皇地从另一端过来。我迅速拿出医药箱，他的左手四指被严重切伤，其中小指被割得最深。我给他清洗过后，给他擦上碘酒，我们用胶带紧紧缠住他的手止血。乔依旧很勇敢，要继续前进，但我告诉他就地扎营。有时候坚持下去没有必要，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反正这条河流附近是极佳的营地。

下午两点半，乔开始钓鱼时，他的手仍然很痛，他不想受到伤势的羁绊，因此在我生火时，他在蜿蜒的河里找到一片流速缓慢的水域，往水中抛下鱼钩和钓线。

我煮了少量配给的米和豆子、黑咖啡当晚餐，要他过来，但他让我把食物放进便当盒，他晚点再吃。我独自吃完后，六点二十分左右，天色渐黑，我爬上床，在惬意干燥的吊床小窝里看书。八点，我刚看完书，就看到乔的头灯在树丛间上下晃动，朝忽明忽暗的柴火而来。

“我们有晚餐了！”他宣告着，咧着嘴甩下一尾鲶鱼。在黑暗中我看不到鱼，但我知道它在哪儿。他花了五个半小时捕获这个战利品。我起身掏鱼内脏，煮鲶鱼，乔则去洗澡。

吃鱼时，我赞美乔惊人的耐性。这条鱼补充了我们两人几天以来所需的蛋白质。面对这样的赞美，他只是一贯地淡然以对。钓鱼一直是乔在枯燥的步行时的娱乐，但这一次，我猜想他展现的这种坚持不懈的毅力是在砍刀事件后再次驾驭丛林的方式。

我回想到卢克和我如何格格不入，又想到乔和我的关系又是如何不同，我们互相尊重、技能互补，二人团队运作得非常顺利。我很幸

运，有乔与我同行，是他的全心投入让那首歌在我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荡着。乔学会了那个词，并且会在走路时拉开嗓门用英语唱着：“你需要的就是全心投入！”

BR-319是一条笔直横切亚马孙河的“开放性伤口”。那时是2010年1月中旬，我们踏上这条地表裂开的道路，意味着从塔巴廷加开始穿越的大片丛林已到了终点。一旦铺上路面，这条路就会从马瑙斯延伸到西南方的波多韦柳（Porto Velho），将在亚马孙雨林切过一道疤痕。一天的交通流量将会是两部四轮传动卡车。

我们走这条路前往东北方的大城马瑙斯，头几天走在直射的高温日光下，我把丝质睡袋的内里垫在帽子下，避免脸和颈子晒伤。随着在道路上走的时间渐长，身体开始吃不消，我们成了被烤焦的行尸走肉；乔比我还难受，他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那辛苦漫长的一天结束后，我们停在一片废弃的道路修筑工地上，他直接倒头大睡。到了第二天中午，乔还不太能走，我们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下来，讨了点水给乔喝。我认为他觉得自己皮肤黑，不会中暑，但在我看来，他就是中暑了。他完全没有用东西遮掩，而且他正在服用脱氧羟四环霉素对付疟疾，对光非常敏感。

几个月来，我头一次决定留下乔，独自前进。我并不担心他，他可以休息到复原后，搭那家人的摩托车追上我。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单独行走是一种解放，我还唱着歌。那天下了两个小时的大雨，然而我觉得自己坚强又自由。晚上，我在路边废弃的茅草棚里休息，非常清楚这几个月来我是头一次真的孤身一人。

到了第二天，乔觉得好多了，我们在稍往北一点的地方会合，继续一起走。与我们聊天的人说，这条路的邻近区域其实是森林保护区，甚至要有许可才能砍树盖屋。这是个好消息。但那人也说，到了2014年，这里全会铺上新路面。我不禁担忧起来，增加的交通流量对该区域的整体环境而言并不是件好事。

后来我有个主意：在夜间行走。我们可以在凉爽的夜里行进，不用忍受白天的闷热。

我们在傍晚五点出发，两小时后（就在天黑之后），开始下雨了。丛林里的雨很清新，可以让人消暑，但在漆黑的空旷道路上，当

凛冽的风穿过湿透的T恤时，这又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没有保暖或防水的衣服可穿，到了十点，我们已经语无伦次、筋疲力尽，有体温过低的风险。

现在我们不得不去寻找避雨处，但我们找不到够近的两棵树，所以无法搭起防水布。邻近的森林已经被砍光了，没有月亮，更糟的是，路的两边已经淹水了。电线杆上有条异常现代的光纤电缆，它穿过这片荒野，仿佛在嘲笑我们，因为这些电线杆是我们所见唯一垂直的长柱子。但它们显然也间隔太远了，无法为我们所用。

雨打在脸上，刺痛了我们，我们试着去敲住户的门，请求他们让我们避一避。我们不用吞下整本《柯林斯袖珍英葡词典》，也知道人家叫我们滚蛋，从他们温暖安全的家里传出既响亮又清楚的叫我们滚蛋的声音。

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乔已经像具僵尸——他怕冷。我们在秘鲁的洪水中就发现了这一点，但这是他最冷的一次。

别无选择，我们只能颤抖着继续前进。几百米外有灯光吸引我们的注意，因此我们向前迈进，从远处可以看到在敞开门的房子里一名男子的身影。不知怎的，我立刻就知道他和其他人不同。我走在乔前面（他现在已经失去求生欲了），勉强挤出笑容，问他能不能让我们借用周边的树搭防水帆布。

“当然，”那名男子微笑道，带着毫不迟疑的热情，“另外，请用一些炸鱼和饭。”

这个略带《圣经》意味的故事在我穿着干衣服吃着多汁的鱼肉问他叫什么名字时结束。

“弥赛亚。”他答道。我笑着摇摇头。

在巴西的七八个月里，我和乔有95%的时间没见过道路，甚至连小径都很少见。我们一般都在封闭繁茂的丛林里走，往任何方向看都只能看到几米远。我们轮流走在前面，每半小时轮换一次，手持砍刀在树丛间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劈出通道。

大部分当地人搭船行经亚马孙河的偏远区域——庞大的水道系统使之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不幸的是，这并不符合我们那有点荒谬的承诺：走完河流全程。因此我们就像村里的猎人，背着比他们的负重重20倍的重量，在茂盛的雨林里前进。自2009年5月跨过哥伦比亚国界后，我们平均每天走7000米这样的路途。

但等我们逐渐接近河口时，亚马孙河的河道发生了变化。接下来两个星期里，阻力最小的路线是进出马瑙斯的道路。穿着卡骆驰鞋踩在平滑的柏油碎石路面上，我们感觉很怪异，而且，我们可以听到成群的吼猴在荒凉的丛林路边嚎叫。有时候我们一天走40千米或45千米，这种梦幻般文明的大道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往大西洋和家大步迈进。

2010年2月16日，我们抵达苏里摩希河南岸，必须渡河到北岸的马瑙斯以继续旅程。我们知道，这里距离大西洋约1800千米。令人忧心的是，渡船出发处有个联邦警察检查站，而我们现在是非法移民，如果联邦警察检查我们的护照，我们可能会被拘留、关押、驱逐出境。联邦警察有权力阻止任何人进入马瑙斯。在我们走过穿着制服、表情严肃的警察身边时，我的心狂跳起来，而他们连眼睛也没眨一下。

眼前就是我们离开哥伦比亚后一路散漫地追随的苏里摩希河，以及从北方圭亚那盾山（Guiana）而下的宽广黑色河流内格罗河（River Negro）的汇流处。湍急的苏里摩希河带着沉积物，因此呈混浊的棕色，而内格罗河是条黑河，意味着它的流速较慢，在这种流速下，植物的单宁酸被过滤出来，因此河水呈酸性且颜色深如茶，也较温暖。两条河汇流后，河水仍然彼此分离，前行几千米后才混合，这两种分明的颜色能引起惊人的视觉效果。两条河汇流后再度成为亚马孙河。

乔和我顺利地划到河的北岸，马瑙斯就在那里。我们从河边的川崎工厂继续行进，穿过马瑙斯繁忙的小巷。在我们闪避轰隆隆的巴士，冒险通过亮着黄灯的斑马线时，一个遗忘已久的世界从我的潜意识中挣脱出来。

另一个再度开启的世界是爱情，我的前女友克罗伊从英国到马瑙斯来看我。我们一直以Skype和电子邮件保持联络。尽管对我们两人而

言，这次见面显然有些冒险，但我们还是认为，如果她能来与我们共度一段时间，将会很有趣；事实上的确很有趣。

但是在她的来访接近尾声时，我预料到自己无法给她承诺，而我覺得她希望我能做出承诺。我还有6个月的丛林路要走，不希望自己因为有人在外面等电话或担心我而分神，我如果要完成这段旅程，就必须自私。这总是带点牺牲，因此在她离开时，我们都还是单身。

除了一直都在的乔和我永远珍爱的妈妈，克罗伊依旧是整段旅程中最支持我的人。她完全了解我，作为在我最沮丧时随时都能让我求助的人，她值得我记上一笔。她也为我做了许多工作，寻找环境相关的议题，把这些内容放到网站上，在我心力交瘁或力所不逮时，她也让这方面的工作持续运作。我们仍是最亲密的朋友，我也希望这份情谊能一直保持下去。

克罗伊离开了。乔和我在出发前去马瑙斯一个大型购物中心采买补给。我们踏上手扶梯，乔差点没站稳，他惊讶地环顾四周，发现扶梯全都自动地往上走。我理解他，他以前从没见过这玩意儿。

2010年2月底，我们离开这座城市，踏上公路前往伊塔皮兰加（Itapiranga）——距离我们134千米。我们在一个肮脏的路边村庄过夜。要是我们又饿又累的话，这里会是个受欢迎的地方：笔记本电脑可以充电，有自来水，还有厨娘为我们煮易饱的餐点。但我们不特别饿，也不特别累，我们刚在马瑙斯充分休息过，因而能看清这里的真实样貌。

这是个垃圾满地的破败村庄，似乎没有人特别在乎个人福祉。我们在一间小屋里过夜，这里的味道闻起来像户外厕所；小屋就在学校旁，男孩子会来这里抽烟、小便。我打开水龙头时，生平第一次因为洗澡水发出的恶臭而直往后退；从色情杂志撕下来的页面在我的吊床底下，被踩成了垃圾。“洗澡”后，我仍觉得这个房间非常恶心。我的房间很“高级”了，乔的房间角落里有一坨人屎。

我们有四面墙和屋顶，因此我实在不该抱怨。尽管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我还是要抱怨：给我们满是骇人的自然景象的丛林，我们可以过得很好，通常到最后还会爱上它，但这个肮脏的地方有种摧毁人灵魂的气息，我必须承认，我从未问过它的名字。

唯一令我感到好笑的事是，当我们上床后，我听到啪的一声响，乔的吊床松脱，他重重地摔落在地。尽管他喘着气，而且很痛，我仍然忍俊不禁，笑到流泪，还持续了好几分钟。而咒骂、喘息、咕哝声不断从他房里传来。

“那个外国佬话不多”

3月初，我被左臂二头肌上一个类似溃疡、持久不愈的伤口所困扰。那只是新年那天被沙蝇叮咬后的一个小小的开放性伤口，经过9个星期，伤口依旧潮湿（流脓），“火山口”只有一颗豌豆大小，而整座“火山”足足有一枚十便士硬币大，并不痛，但有个清晰的发炎红肿的圆块，就是无法痊愈。

我认为那是热带性溃疡，用消毒药粉进行治疗，并且依序服用氨苄青霉素和甲硝唑，因为我无法取得氟氯西林。这些药完全无效，因此尽管我们已经离开潮湿的丛林一整个月了，还走在干燥乏味的道路上，但身体还是有一小部分让我觉得烦心，让我无法置之不理。

来自博客的大众意见——特别是两位医生约翰·詹姆斯（John James）和卡罗琳·鲍（Caroline Baugh）——让我知道，我最可能患的是利什曼病⁽³⁾，以目前的状况来说无须担心，但这种病有6%的机会变异成黏膜皮肤利什曼病，可能会破坏我的软腭（口、鼻），让我毁容，并在我的脸上永远留下大洞。我认命了，打算继续与它共存几个月，因为我希望继续往前走，不想结束探险。

从马瑙斯开始的道路网到伊塔皮兰加镇为止，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一天，之后继续向丛林出发，从那里穿越低矮的沼泽地。所幸有条路贯穿其中，剩余的堤岸让我们远离大部分洪水区。

乔走在前头时，我看到他把砍刀举上肩，像拿来复枪一样，假装对着他前方的某样东西开枪。我在他身后东张西望，发现好像看到了一条超过两米长的巨蟒。

我迅速地卸下背包，拿出摄像机上前摄影，那条勇敢的蛇不但没有逃之夭夭，看起来反而很感兴趣，把颈子展开得像眼镜蛇的一样，朝我而来。我停住，往后退一步，它也停下来。

我搞不清楚它到底有没有危险，虽然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一条小巨蟒（对人类无害），但现在因为它缺乏斑纹和它的头型而糊涂了。

我把照片寄给在圭亚那的伙伴阿什·霍兰（Ash Holland），结果证实那是一条拟水眼镜蛇（巴西水王蛇）。乔和我以前都没见过“水蛇”。美洲没有真正的眼镜蛇，它们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它们和亚洲眼镜蛇长得相似，它们同样有虚张声势的防御表现，包括伸展喉咙和颈部——这些恰恰就是我所看到的。

几秒钟后，它钻进了矮树丛，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它。这个新景象让我反思自己对待身边一切未知的惊奇事物的方式。对每天所见事物保持兴趣其实比你所想的还困难，尤其是在我们精力耗尽的时候，我意识到，主动强迫自己去学习也是保持心态健康的一种方式。

我即使不知道那是什么，也可以努力去查资料，并且可以再次思及雨林。我对丛林失去兴趣已久，只把它当作必须克服的重重难关，而鲜少去欣赏一束束穿透参天阴暗的树照射进来的阳光，也很少停下来领会壮观的林木之美，或是布满苔藓的板根之美；我无视鸟类，懒得拍摄在头顶上尖叫、晃动枝干的猴群。我认为身边的自然奇观还不如粉白的墙壁，现在，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和愚蠢。我可以让大脑接收这类刺激，以免自己变得无趣又具杀伤力。

我需要的只是给大脑提供正面的刺激。探险很简单，现在我所有的问题来自一个孤独、无趣又迟钝的大脑，懒散又无聊的大脑会攫住负面的思想和问题，并且夸大这些问题，直到我的心智被完全消磨。如果我不主动地保持积极的态度，这样的状况就会经常发生。

进入圣塞巴斯蒂昂（São Sebastiao）前必须横渡一条大支流。从水上看过去，这个城镇非常美丽，有尖顶教堂和颜色柔和的房子。港口上约有30名男女看着我们划充气筏上岸，看着我们把充气筏放气后捆到背包里，接着走进镇上最近的旅馆；我觉得自己就像肖恩·康纳利在《金手指》（Goldfinger）中扮演的詹姆斯·邦德，他脱掉保温潜水衣时，露出了燕尾服和红色康乃馨。之后，我们绕行14千米，到

了乌鲁卡拉（Urucará）。我们一路上寻找坚实的土地行走，偶尔稍微浸水，所幸还能保持某种节奏越过低地。我们从乌鲁卡拉往北进入后方的山，从这里还有100千米才会抵达雅梦达河（River Nhamundá）。在那里，我们会再次遇到部落和人。

我的靴子终于解体了，我在乌鲁卡拉买了一双最大码的橡胶靴，但这双靴子对我来说太小了，看来亚马孙没有太多46码的鞋。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得忍受这双便宜货。我们买了15天的粮食，背着45千克重的背包上路。我很清楚，先前的800千米路是道路，现在背着这样的重量返回丛林会让身体无法适应，但我们预料到在山丘上不能钓鱼，因此必须尽可能多带东西上路。我们带的食物可以让每人每天获得2000卡的热量。

探险进行到这个阶段，我也很讶异于丛林竟然有如此多的山。我们行走在坡地上，得吃力地穿过一路向上盘根错节的荆棘。从谷歌地图上打印出来的图上没有等高线，往四周看，只能看到15—20米的距离。我们就像在能见度为零的极地导航，无法选择方向，更不可能做出明智的路径规划。

到了坡顶，我们的小腿酸痛，肺部灼热，喘不过气来。我们只想着能有平坦的山脊，可以让我们沿着它行走以保持同样的高度，然而裂缝般的裂口隐隐逼近，我们必须爬下去，一次又一次。

这里的林木间隔很宽，要不是在坡地上的话，我们是可以快速行进的。在费劲地上下攀爬时，我们很少用到砍刀，第一天走了3000米，5个小时后就停了下来。那天我们没有精力捡柴火，但日子一天天过去，背包渐轻，我们的小腿也更有力了。

我的两个小脚趾和脚前掌都磨出了大水泡，捆再多的胶布也无法改变这双便宜的靴子太小、鞋底太硬、没有避震垫这个事实。我可以穿着它，但每走一步路都让我皱眉，我必须紧缩脚趾，不让趾头碰到靴尖。

3月14日，走了5个半小时后，我停在小溪边汲水。乔和我都卸下背包。我装水加氯，背起背包。乔把背包和衬衫都脱掉，两腿叉开站在溪里，用水壶往头上浇水。

“你不想洗澡吗？”乔问我。

“不，老兄，我想抵达营地后再洗。”我答道。

“我不晓得我们在赶时间。”

“我们没有赶时间，乔。我只是累了，我想抵达营地。”

乔因为我催他而生气了。轮到他带路时，他决定给我个教训。

他以飞快的速度走上树木丛生的险陡坡地，他要让我看到，如果赶时间，我们可以走多快。我非但没有要他慢下来、别做蠢事，反而决定加入这场幼稚的战局，而且想赢。

我们穿过树丛，一路爬坡，5分钟后、10分钟后、15分钟后，每次乔转身，我就在他旁边，尽力装作若无其事、沉着冷静的样子。两人都挥汗如雨，但没有人想慢下来或停下来，我们越走越快，爬上山丘，25分钟后爬到山顶，正好到了每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们放下背包，乔显然很气自己没能狠狠地把我抛在后头。我们刚开始在秘鲁一起行走时，他可以轻易地把我甩在后头，现在我虽然上气不接下气，但跟上他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们两人的怒火都一触即发，但谁都没说什么。

“乔，你几岁？”

“三十。”

“比较像十三岁。”我抨击他。

“我以为你在赶时间。”他反驳道。

我们怒目而视。这是快要真正起争执的一次，我们迎向彼此愤怒的目光。

“你没事吧，埃德？”

“没事，你呢？”

接着，僵局被打破了。我无从解释，但我们同时看到了自己的愚蠢，并开始嘲笑自己。紧张的局面立即缓和下来，我们仿佛从此行最艰难的25分钟的气力比拼中得到了快感。我们的心情依旧激动，腿部肌肉也犹自抽动着，我们握了握手。就是这样。

这个意外并不寻常，因为尽管我们都会心情不好的时候，但那时候我们多半不会理对方，也不发一语，等着坏情绪过去。这是我们头一次正面杠上，幸好这次战斗是以爬坡来表现，而非打上一架，但这仍是一次交锋。没人有损失，因此我们俩都不介意，只是更了解彼此了，也更懂得如何一起行走了。

最后，乔在一棵棕榈树下找到了四颗野禽蛋，为那天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我们用炒蛋和咖啡当晚餐庆祝。

每天傍晚，我们在用谷歌地图打印的A4地图纸上标出全球定位系统坐标追踪进度。我们正慢慢向东移动。

3月18日早上十点，我们在乔领路走到的一座巨大山丘的丘顶休息，在严格控制的10分钟休息后，该我领路了。我没有往我们想前行的方向走，没有走下陡峭的坡地，反而决定冒险一赌，转向右边继续沿着山脊往上爬。这种冒险一赌的带路方式的问题在于，在树丛里，我们最远只能看到前方15米远，而且我不知道我推测的这个方向是否对我们有帮助。我有个预感，这座峡谷呈环形剧场形状，山嘴会转回我们行进的方向。走上山脊，更多的光线流泻进来，我们所经之处几乎平坦，左手边则是一面陡坡。没过多久，左边的陡坡开始不同，我们又转回想前行的方向上。脚下的叶子就像来自英国秋天的林地，我们没有走险恶的下坡，而是进一步往上爬，我们只是绕行，并且在这最怡人的森林里维持在同样的海拔高度上。

我露出微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下方我们避开的那座大峡谷。我一直确信我们的运气会有所不同，地势会开始下降。整整一个小时，我们沿着穿过雨林树荫的最美山脊行走，维持在这个海拔高度上。清爽的微风从敞开的一侧吹进来，我们的左脸颊一阵凉爽。

成群的松鼠猴在我们头顶上的树木之间跳跃，看来应该鲜少有人行经此处，我们距可航行的河有5天的路程，猎人不会走这么远。我的

直觉没错！这片漂亮的森林成了这次探险中最令我愉悦的路段。我渴望吃牛奶饼干。

现在我们对扎营这件例行公事已经很熟练了，夜晚成了一种享受。克罗伊带来了新的轻型六角形防水布吊床（她买的，感谢她），因此我们用乔的旧防水布做防火屏。有一块9平方米的干燥空地煮饭、吃东西、储存柴火和晾衣服是一大奢侈，多背一块防水布非常值得。我们在帆布下方直直地挂上一条粗绳，这是用来晾白天在河里洗的衣服的晾衣绳，因此，我们每天早上都有干燥干净的衣服穿，这样不仅更卫生，也提高了士气——衣服甚至暖烘烘的，就像刚从晒衣橱⁽⁴⁾里拿出来的一样。

我们会砍长长的Y形树枝，在煮饭、吃东西时，在火苗上空撑起防水布，这样烟才不会熏到眼睛。即使我们扎营时下雨了，并且持续下一整晚，到早上我们还是会有干衣服穿，会有干木头生火。

我便宜的卡西欧表带子断了，我用背包里的冰镐固定带代替。它虽然不好看，但很管用，我一路用到了探险结束。

之后的丛林越来越封闭，我们走得越来越慢。我任由脚痛影响我。有一天，我穿过四个黄蜂窝，通过最后两个时，我可悲地愤怒咆哮，那是我难受的一天。我的情绪失控了，我想回家。

离雅梦达河还剩两天路程时，我的手机闹钟在5：45和5：55响过两次，我全都不理会。在6：40自然醒来时，我往吊床外看见了让人愉快的景象，乔已经生好火，煮好早餐。我们提早出发，一起顺利地走了6个小时。但接着我又颓丧起来，乔看出我又要崩溃了，建议我们停下来扎营。

听他这么说，我真高兴。通常大多时候是我做决定，但乔和我太了解彼此了，现在我们清楚对方的底线，知道对方何时需要休息。

我们晚餐吃了500克的米，喝了用两便当盒奶粉冲泡的热牛奶。就像在喝花蜜一样，我可以感觉糖流经肌肉和大脑，为我枯竭的“电池”充电。最后两天，我们还剩3天的食物，因此配给相当充裕，我们也很享受。

2010年3月22日日记：

我会想念这种生活的。我知道自己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次探险也不是一直都很容易，但我会想念只有我和乔在树林间煮着简单食物、掌握步行节奏以及放松的夜晚。

今晚，我们翻出了斯坦福地图。这次探险看来会在8月中旬结束，6月中旬（洪水高峰期），我们将横渡亚马孙河三角洲的“颈部”。我们需要一些刺激激励我们继续向前。

这支太空笔倒着写时效果太好了，很适合在吊床上写日记——我猜也适合航天员。

我们穿过这片丛林的时间压力来自一次和一名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的会面之约，因全球定位系统无法开启，我不知道我们距离河流还有多远。幸好他取消了会面之约，压力也随之解除——反正我们也会放他鸽子。沿着山脊走虽能让我们保持在同一海拔高度，但也更难让我们确定自己是否偏离方向，我们只能估算自己走了多远。

3月24日这天，我们走了9500米，终于抵达雅梦达河。探险到此刻，我这辈子从没这么瘦过，当我和乔漫步在沙质河岸上，眺望这显眼的黑水河时，我整段路都得提着短裤。

我们必须找人给我们提供补给，因此划船往上游去。令人惊讶的是，上行非常容易，因为黑水河的水流很慢。我们抵达一户人家，马上受邀吃午餐。男主人叫西罗，他在屋后的空地种西瓜，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吃，鲜甜的汁液从我们微笑的脸庞滴落。那户人家隔天要到下游的雅梦达市，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好机会，可以买新的全球定位设备，将所有电器充电，买食物，买新靴避免脚上磨出水泡，还可以休息。

现在是3月底，从哥伦比亚边境到现在所在之处，我们花了11个月，穿过了2000千米史上从未有人徒步走过的雨林。这条河有2000米宽，几乎像湖，船只在平缓的河面上突突响地前进，就像海上邮轮；这条河是巴西亚马孙州和帕拉州（Pará）的界线，我认为我们可以在5个月内通过整个帕拉州，结束这段探险。

有两样东西买不到：大一点的靴子和全球定位设备。我们被告知必须到马瑙斯才买得到全球定位设备，但我不打算这么做。在哥亚利花那么多时间修理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后，我现在很了解这个装置，它里面有个简单的全球定位模块，只显示度和分。它无法精确定位，但可以说出我们是在方圆1000米内的某处。这对我来说已经够精准了，我们会以宽带全球局域网为主要辅助导航工具继续前进，而我的脚依旧塞在同一双小靴子里。

我们返回上游，在上次中断步行的西岸下船。我们把小筏子充满气，慢慢地划过偌大的黑色“镜面”，却不经意地直接进入一个因被岛挡住而无法在河面上看到的小村落，我起先担心我们会受到何种“欢迎”。

事实上根本不需要担心，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和整村人坐在教堂外用葡萄牙语玩宾戈游戏。我赢了一大串皮法尤（一种可口的橘色水果），一对年轻夫妻把水果煮了让我和乔当晚餐。

我在村庄里发现，在50千米外，穿过丛林在62°磁方位角的地方有些矿井。这些矿井像大疤痕，从谷歌地图上能轻易看见。那里通往一条路，我们也许能用上那条路。根据村民的说法，那50千米无法行走，但我们带上8天的食物出发了，对我们的疯狂之举颇为得意。

3月29日，走完第一天后，我用从宽带全球局域网取得的数据在地图上画出第一个直径2000米的圆圈，判断我们大约走了8—12千米。这真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我们整天在沼泽、洪水区和浓密刺藤中行走，如果我们真的走了10千米左右，那真的了不起。

我们整天披荆斩棘，没什么动力。有一次，我几乎脱水昏厥，我尽量不让自己用舌头清理那个利什曼病伤口，因为我觉得这样会增加它变异的可能性，或是让病菌扩散到嘴巴上。

我拿出宽带全球局域网导航，也就顺便检查了电子邮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人——巴里·麦卡锡——赞助了6000英镑。乔和我为此起舞，这真是一笔很慷慨的捐款。

乔和我决定这次带一样新食材——面粉。我们总会带一些调味料、盐和食用油，这次，我们决定加一点面粉为餐点增色。写到这

里，我知道其实只有乔和我对它有兴趣，但只说下面这一点就够了：乔在制作酥皮沙丁鱼的细节上花了很多心思，也非常用心地揉面团，我发誓我从未这么享受过酥皮点心。多了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夜晚变得更有趣，也鼓舞了我们。

亚马孙州这侧的雅梦达河地势较缓，但有许多倒落在地的树木拖累了我们的行进速度。第4天，我们抵达一条最近开辟的泥土路，尽管这不在我们的计划里，但我们决定沿着这条路走。最后，我们来到一户人家门口，他们让我们进去过夜，还请我们吃热腾腾的炖牛肝。

我们和这对中年夫妻聊天的时候，他们建议我们抵达特龙贝塔斯（Trombetas）后向联邦警察局出示护照。我没想到特龙贝塔斯也有检查哨，乔和我默默地互看一眼，都知道我们绝对不能接近特龙贝塔斯。

这家人说这条新路通往矿井，他们没提到这是条私人道路，我们也没问。这只是一条没铺柏油的路。

因此我们改变计划，继续沿着这条路走，通过矿区，但在抵达特龙贝塔斯前离开这条路（为了避开联邦警察），进入丛林。我们没和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碰面也是好事，因为特龙贝塔斯就是我们约定见面的地点，如果我们到了那里和他见面，接着立即被捕，那就糗了。

4月2日，我们提早出发，在这条路上走得很快。我们在早上经过巴西环保署的一个检查站，由于我们是非法入境的，我们远远地挥起了手，开玩笑地向公园管理员的猴子大喊“好可爱的猴子”，一步没停地继续走在道路的另一侧，而管理员也没拦住我们。我们成功地进入矿区南边的国家森林保护区。

天色渐黑，我们决定和这条路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我们是非法入境的，而且没有得到许可就进入森林保护区扎营。我们沿着小溪前进了约100米，然后进入树丛，尽可能不砍伐、不发出噪音地扎营，并确保我们的烟不会飘向公路方向。

隔天一早，我们从南边接近矿区，看到了一幅惊人的景象：一座露天开采的铝土矿场，大片雨林被彻底铲除，大量开采铝土矿。矿场里有大型的工业用输送带，矿业公司有自己的铁路，将一车车未经处

理的矿土运出去。除了马瑙斯城，我还没看过将雨林改变得如此彻底的案例，这些伤疤在谷歌地图上清晰可见。我们只要搜寻特龙贝塔斯，往南边就可以看到它们。

我后来得知这座矿场有全面的再植计划，他们改种100种不同的当地物种。改种之后，这里仍然是完全不同的森林，但至少没有被铲平，没有变成牧场。

就在我们快走出这座矿场的另一头时，一名穿靴子的男子过来喊我们。我们走向他，他强势地要我们留在原地，等他给上司打电话。我们知道自己是在私人土地上吗？显然，巴西环保署检查站那位养宠物猴的管理员打过电话，他们等了两天，要阻止我们继续赶路。

那家公司叫北河矿业公司（Mineração Rio do Norte, MRN），断然拒绝我们行经他们的土地。矿区经理开着车窗不透光的闪亮的黑色轻型货车过来，立刻告诉我们不能再走这条路，因为这是私人土地，他要亲自载我们到特龙贝塔斯的联邦警察局。这就是那种你觉得自己陷入大麻烦却无法逃脱的时刻，我决定撒个弥天大谎来脱困。我向他解释我们的探险，除了一路上都要徒步前进（这是事实），我们一路上从没有坐过车（完全是谎言），如果他要我们上他的车，我们走的两年就全都白费了。

他虽然自负，但并不冷酷。我向他保证我们会原路退回去，横渡亚马孙河，走另一端，这会多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但我们不能搞砸了——不能上他的车。

那人接受了，他的助手拍了一张我们的照片后就放行了。他们警告我们小心美洲豹，我们两个都笑了。

“我是说真的，”他在背后大喊，“这里有很多美洲豹，常常会走到路上。”

我的确相信这个地方有很多美洲豹。那天我们就看到了巴西刺鼠和野猪，吼猴也在我们身边不断嚎叫，尽管此地正在开矿，这里的野生动物种类仍相当丰富。

一离开他们的视线，我们就立即溜进树丛，在他们的私人土地上照原订计划向东行进。我们没有浪费时间，没有折回，他们在丛林里也永远找不到我们。眼不见为净，我们又再次惊险地避过了联邦警察。随后，我在网络上收到几个巴西人给的警告，他们说帕拉州的人会比我至今遇到过的任何一个原住民都危险，农业综合企业、伐木厂和矿厂在此地的规模相当庞大，挡人路者命不长矣。我打算不去为这些威胁烦恼。

从这里往东，离特龙贝塔斯河有46千米。我们有5天的粮食，问题是，我们比预期的还要偏南，因此我们得往亚马孙主河道靠拢。

隔天早上，该来的还是来了，我们遇上了及膝的洪水，接下来洪水淹到了腰，再到胸。我们从一块干地跳到另一块，一如过去在洪溢林里的情形，我们的进度降到一小时只前进几百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的食物不够我们走到特龙贝塔斯河。

我有了个主意。我们在一座3米×4米的岛上，雨刚开始下，但我需要用电，我们在岛上搭起了防雨布。我必须知道洪水的范围，于是拿出了笔记本电脑，翻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我临行前寄给我的那张洪溢林资料的旧图片，那是一张很大的8MB的图片，上面没有任何坐标方格。接着，我用宽带全球局域网得到了一个直径2000米的圆圈，画在打印出来有经纬度的谷歌地图上。之后，我将两张地图摆在一起比对。我可以根据河流的形状在电脑屏幕的洪溢林图片上找出代表我们所处的圆形区域，我马上看到了一道有色的细线，这意味着洪水穿过了这个区域，也意味着这个区域通常会很干燥。我们如果继续走下去，花不了几个小时就能走出狭窄的洪水带。

我们收好电子器材和防水布，继续通过洪水区。不到一个小时，水位降到腰间，接着降到膝盖，之后我们又回到了硬地上。这又是一个证明神奇的导航科技奏效的例子，否则，我们又得往回走好几天，直到我们能买到更多的食物，或是选择另一条路径走。唯一能给我们所需信息的地图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那张图了。

我坐下来，脱掉橡胶靴子，倒出里面的积水以及洪水带来的细枝和叶子，再拧干袜子。从这里到特龙贝塔斯河都是干地，我很确定我们可以不引起注意就避开这个不友善的矿区。

那晚，乔在酥皮里放了点糖，我的欣喜程度又提高了。就算是神户牛排或北京烤鸭，我也不会拿这块酥皮换的——真的非常好吃。

4月8日，我们抵达一条通往特龙贝塔斯河的猎人小径，与一户巴西印第安人和白人混血的家庭待在一起。他们说有一条小径一路通往奥里希米纳镇（Oriximina），我们可以在那里划船渡河进城，然而事实不完全如此。

那条小径很快就到了尽头，我必须承认我已到了厌倦的地步，对乔很暴躁。我们都筋疲力尽，需要休息，但又极度渴望徒步走到奥里希米纳，免得又要再回来用步行把这段路补上。我变得相当不可理喻，值得赞美的是，乔在这段路程中一直容忍我。他也累了，但他没有我的烦恼：钱、时间压力和远在英国的制作公司之间的龃龉（他们要改变规则）。我还得努力让这次探险顺利进行，但乔只须一直走，我羡慕他的从容、悠闲。我觉得自己就像在沼泽地通过移动互联网经营一家企业，因为没有钱在英国聘请运营经理，我必须处理每一封电子邮件，必须协调好整个探险的各个方面，全靠着严格限制使用时间的电池和每个月有限的宽带网络。我很难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能控制好，但我知道这不是乔的错，我不能再把气出在他身上。

沿着河边走会经过许多农田和有工人住的独栋房屋，我们会在一些人家过夜。晚上我经常为葡萄牙语苦恼，吃饭时觉得自己像社交毒药，因为我只想着爬回吊床睡觉。但乔在这方面很了不起，他学习葡萄牙语学得比我快，而且对这些人真的感兴趣，他会选其中一个主题——宗教、林业或农业——聊上好几个小时，他的笑声常在，令人愉悦，这些农家在他的陪伴下都很放松。我必须说，他觉得好笑的事并非每次都让我觉得有趣，但是他的笑声有趣，而且我确信我们遇上的那些人之所以如此欢迎我们，是因为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听到那些人说“那个外国佬话不多”时，有时会觉得厌烦，我觉得自己很难跟他们解释清楚，这次探险对我而言是磨难，再说我时不时得奋力保持专注。晚上是最糟的时候，因为黑暗中我看不到人们的嘴，而脑子太疲累，无法翻译葡萄牙语。

到了早上，经过一夜睡眠，我有了较多的精力，会特别努力地去和那些人聊天。但是，如果有人想接触人群，学习不同的文化，我绝

不建议用像我一样的方式旅行，我几乎总是因为太累而不在乎。

2010年4月13日，我订了回家的机票，为了降低成本，我必须先订下这张票。由于还有4个半月要走，我把信用卡放到桌上时很紧张。仍有很多未知的事可能会发生，不过，必须在限期内完成探险的决心能提振士气。我预计在8月29日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

4月22日，一道银白色的闪光出现在我们眼前，接着一声巨响划破温暖潮湿的空气，一根距我和乔3米远的电线杆，在猛烈的热带大雨中被雷劈了。我们不住地微笑、大笑，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以应付危机状况。我们在雨中几乎像漂流般地过了街，咧嘴大笑，高喊着：“老兄，门儿都没有！”我们就像电影里的比尔与泰德一样。

每次遇到会有危险的严重意外时，我们和多数人一样，会加倍紧张地行动起来，试图解决问题。我们的感官意识会增强，对时间的感知慢下来，我们都有生存本能，身体有一套设定，会尽其所能地帮我们应付紧急状态；在危急时刻，我们会变得非常专注、有能耐。

人们常会问我们如何应付这些危险：涉过有黑凯门鳄的水域，接近致命的毒蛇，或遇上凶猛的部落。老实说，这些时刻都令人感到刺激和兴奋，时间也过得很快；这些危险帮助我们摆脱了更具杀伤力的状态——枯燥、无聊。

乔和我开始无法从休息中恢复体力，经过两天的休息，我们走路依旧像僵尸，完全没有恢复精力的迹象。

到了现在，探险已经变成不断重复同样动作的牢笼，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们都不可能一直保持乐观的态度。我们的大脑渴望新的刺激，对每天和当地居民平静、客套地讨论我们多么疯狂这些事感到厌恶。我有时候根本不在乎雨林的命运，只想见朋友、看运动比赛、上夜店。让他们砍光整片雨林吧，我只想在我第一个外甥出世时在场。长期的疲惫会耗尽人对所有事物的热情，有时候，我们经过兰花丛中的大树、交织成一整片的藤蔓植物以及河床布满砂石的清澈小溪，却完全没有留意它们。这些能帮助我们度过这一天吗？不行？那就去他的。

在内心深处，热情、动力和信仰依然在。乔和我嘲笑那些问我们有没有想过放弃的人。毕竟我们经历了这些日子，放弃只是一个荒谬的概念，我们当然不会，不会走了两年之后选择放弃。内心深处，我们都有要成功的强烈决心。

是我们善变且容易疲倦的大脑引出了问题，我的目标就是要驾驭大脑，危险容易应付，是那些单调平凡的日子让我们感到难以克服。

我在奥里希米纳看皮肤利什曼病时，检验结果呈阳性。我说服医生给我整个疗程的静脉注射药物，因为我还要继续前进，他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在接下来的21天，我必须自己找血管注射。我之前练习过打针，但从没实际尝试过（也从未在自己身上注射过）。替自己打针多少是个考验，有时候很容易，有时候则会把手臂弄得血淋淋、一团糟，会让自己不舒服。

从奥里希米纳开始，乔和我进入了完全不同的雨林。这里充满了高乔文化，举目所及全是牧场，烟尘弥漫的漫长道路连接起亚马孙河北岸上的小镇，多数雨林早已被夷平。

每个城镇都更像得克萨斯州的偏远乡镇而非亚马孙的城镇。我们几乎看不到原住民的面孔，这里是殖民者的土地，似乎肤色越白，就能得到越多的土地和钱财。我在这里也认出了来自阿根廷的文化特征：高乔人的服装风格类似，也喝玛黛茶（玛黛茶是用热水冲泡干燥的玛黛茶叶而成，装在挖空的葫芦里，大家一般用金属吸管轮着喝）。我很难把悠闲自在的阿根廷文化和这种农业综合企业联想到一起，阿根廷的畜牧业比较合理，那里有上千公顷的大草原或天然牧场，生产最上等的牛肉；而在这里，每一块肉都是从原本苍翠繁茂、丰富多样的雨林产出来的，每当我被这些农场主人的慷慨和拉丁牛仔风格打动时，我同时也知道这是一个我反对的产业。

从后勤上来说，这里是我们的梦幻天堂，有很多买食物的地方，有一条可以穿卡骆驰鞋行走的宽广灰色道路。我们本可以此作为脱离丛林喘口气的灰色步行假期，但我们都不想耽搁，因此，我们每天挺进大段距离。走完这段贫瘠的农业路段，我们再次回到了丛林里，也更接近终点了。

这时候，美国广播公司决定来此为我们拍摄几天。摄影师兼制作人是一名新西兰人，叫巴特·普赖斯（Bart Price），他想雇一艘快船来和我们会合。我提议为他安排，而他同时也试着从马瑙斯找有门路的人替他处理这些事。我不知道他遇人的运气如何，但因为我当时正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不需要乔，因此派他到圣塔伦市

（Santarém）为那个美国人找最棒的快船。乔很喜欢这个任务，尽可能和人们接洽以找到最好的船。他花了3天时间，终于找到一艘非常适合新闻团队的船。

我向巴特回报我们找到船了。他要我直接订下来，我很高兴乔不负所托，巴特也很满意。

巴特在清晨抵达，我们立刻和他去喝酒。打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他在战火摧残下的幽默感和愤世嫉俗的观点。他是个大汉，个头比我高，身体也过重了些，长期在全球各地做战地报道。他有很多故事可说，但最后话题回到了船上。他跟我说，在马瑙斯交涉的那位中间人是个“没用的笨蛋”，告诉他“不可能”在圣塔伦找到快船。我笑开了怀，立刻知道他是和谁交涉了。“他是不是也叫卡沃斯？”我问道。乔能找到上好的船，我感到很骄傲，卡沃斯根本连试都懒得试。

拍摄进行得很顺利，几天后，美国广播公司的另一名记者比尔·韦尔（Bill Weir）也加入了。我们一起在丛林里拍摄了一阵子。这有点拖累我们的进度，但我认为，如果没人知道我们，这场徒步的意义会小很多，而这次的拍摄会剪成好几则新闻，在他们电视网的不同节目里播放，此外，能打破日常惯例也很棒。最后，这两人满意地离开了。

我的第一个外甥阿奇不久后出生了，这又是一个提醒我错过了家乡生活的例子。我们继续前进。

2010年5月14日日记：

每次我写下日期，总觉得自己是在未来，我们真的在2010年吗？天啊。

5月中旬，我们走完了道路路段，准备重返丛林。但是，地图上的道路结束了，而地面上的道路却连绵不绝；过去三年来，新的伐木小

径向东延伸，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小径一路通往阿尔梅林（Almeirim），而我们正希望在那里最后一次横渡亚马孙河。我们一向很清楚没必要让日子过得太辛苦，于是决定寄放沉重的装备——靴子、充气筏、桨和钓具等道路上不会用到的配备——轻装走上崭新的道路，越过山丘；等我们到了阿尔梅林，我们会再坐船取回重装备。这意味着我们的背包会从每人40千克减到约10千克，棒极了。

当然，无可避免的事又发生了。新路在帕鲁河（Paru River）中断了，我们必须以减重后的路上装备穿越丛林。在见过那么多星期的灰尘和牛粪后，再次走在树荫下真是太好了，但我们毫无准备。

进入丛林时，乔穿凉鞋，我穿卡骆驰鞋，感觉有点裸露又脆弱。我绝不会建议任何人穿这种鞋子进入丛林——我们多次跌倒，而且脚上扎了许多荆棘。如果没有人可以出借独木舟，我们就得把背包当漂浮物，游泳渡河。因为速度减慢了，也没有工具钓鱼，我们必须把剩下两天的配给分成5天份。

我们减半的限量晚餐包括共吃的一包拉面汤包和一份沙丁鱼。我们的气力和情绪都很低落，感觉有点猝不及防。

农业区又有新玩意儿等着我们——扁虱。我们全身都是扁虱，它们非常小，我们如果不仔细看，会误以为只是身上发痒而已。另外我们两人的喉咙也都被感染了，在乔为我抓背后的扁虱时，我正努力挤出膝盖上的粗黑荆棘。真是令人心满意足。

我们蹲在帐棚雨罩下的一小块空地上，四周都是丛林屏障，昆虫高而尖的嗡鸣声就像丛林的心跳声，一束束微弱的夕阳光辉洒进高耸的树丛，让明亮的绿叶和远处的暗影形成强烈的对比。

由于长期的步行，再加上还有两个月要走，我们都有点沮丧；我们远离了我们在乎的人，一再重复着早已不感兴趣的事情。

我们从丛林里出来，走上往南到阿尔梅利镇及亚马孙河岸的小径，登上最后一座山丘，往下可以看到小镇的后方和眼前广阔的河流。一辆警用摩托车上面坐着两个人，他们上了山丘，到了我们面前，停了下来，后座的人下了车，掏出枪，大喊：“双手举起来！”

“时候到了。”我心想。联邦警察逮到我们了；他们追踪了一路，我们就要进监牢了，就要被指控在巴西非法居留了。他们命令我们进警车，就在我要拿起背包时，持枪的警察大喊起来，要我别碰它。

我的肾上腺素上涌，脑子闪过各种做法；我们只须回答问题，举止有礼，并且尽可能轻描淡写地提及非法入境的事，这些是当地警察而非联邦警察，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在警察局，我们又一次被搜身，又一次把背包清空，接着他们检查护照，然后还给我们，说我们可以走了。我一头雾水，问他们逮捕我们的原因，原来是有线报说我们携枪械从北方接近这座城镇。他们发现我们没有武器就放行了，还向我们推荐好旅馆。我想，举报的那个人一定是看到了摄影机上的吊杆式麦克风。不管是因为什么，当地警察完全忽略了护照上过期的签证日期，我们再次松了一大口气。

在阿尔梅林的旅馆阳台上，我决定必须专业地处理探险时的心理问题。所有有探险经验的人都告诉过我，探险时心理问题是最困难的一环，但怪异的是，我从未费心学习或接受心理训练，勉强让探险进行了好一阵子，但总是陷入不快的负面心境。我想多了解人类的大脑，上网研究了人类的基本需求，这样我就可以在和目前压力有关的情境下理解我的精神状态了。

我也拿到了一位神经语言程序学大师菲尔·帕克（Phil Parker）的电话，看他能否帮助我更有效地掌控自己的心态。我和菲尔谈过三次，每次约一个半小时，他告诉我一些非常简单的技巧，帮我对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也帮我从因自己太过专注于单一任务而造成的强烈幽闭恐怖中解放出来。

并没有什么神奇的解决方法，但和像菲尔这样了解大脑的人谈话的确能让我得到慰藉。我想，我从对话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能自由选择对任何事情的反应方式，我可以反应得小一点，选择最适合当下任务的心境。

我们要从阿尔梅林最后一次横越亚马孙河，到彼岸有28千米，大概是在马瑙斯横渡时的两倍宽，乔和我相当狂妄地想用我们的小橡胶筏渡河。

最后冲刺

亚马孙河就在眼前，我们自定义的“渡河后必须走回出发地点正对面”的规矩又迈向了一个新境界。我估计我们这次到对岸时会往下游偏移50千米，因此，为了抵消借水流前进的距离，我们必须走50千米。因为南岸（往回走的那岸）都是低洼地，无法行走，所以我告诉乔，我们出发前必须沿着北岸往下游走50千米。

谷歌地图上显示这里有路，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天轻松的行程。即使谷歌地图显示这里没有路，这里也的确有条泥土路，而且路的两旁长满树木，在谷歌的卫星地图上看不到这条路。这条路通往内陆，远离河道，通过一大片叫圣雷蒙多（San Raimundo）的稻作区，小径在那儿到了尽头。圣雷蒙多最初是个殖民部落，一位美国人来此，决定在洪溢林种稻。他从四周引进当地劳工，付给他们还过得去的薪水，让他们住在附近一个叫佩斯奇萨（Pesquisa）的村庄。这个尝试最终失败了，但在种植期间，他们砍伐了大片雨林，砍伐过的迹象至今都能在谷歌地图上看出来。

圣雷蒙多位于一片高崖上，高耸于稻田之间，瞭望整个亚马孙河三角洲，这是入海前最后一个重要的高地。和一名应该是照管这些废弃建筑的老人谈话的结果令人忧心。他说，我们选择的这条路径是无法行走的，从这里到海之间没有足够的硬地可走，唯一的方式就是坐船。这位老人在此处工作生活了20年，直言不讳地嘲笑我们太天真，我希望他有一天会读到这本书。

因为不想在圣雷蒙多和这位“末日预言家”待在一起，我们走下峭壁，来到工人居住的小村庄佩斯奇萨。这里的居民是当年的种稻工人，他们继续居住于此，靠捕鱼和种植传统的木薯类作物维生。

我们受到了最友善的欢迎，主要是因为整个村庄看来都处于乐陶陶的半醉状态。我们拖着步伐走在一条脏乱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垃圾以及微醉、衣不蔽体的巴西人。不到10分钟，村长就要我们把这里“当自己家一样”，一名叫纳萨雷特的妇女带着挑逗的笑容为我们做炸鸡。

从这里开始，后勤方面很容易安排好。但是，所有人都说这里会发洪水，我们只能沿着一条紧邻老农田的小溪行进，一路通往亚马孙河的主河道，走我们要弥补的50千米路。

隔天早上，我们沿着一条堤岸走。那一定是淹水稻田上的旧路，路的每一边都有淹水农田。我们顺利地行进了5000米，不久就遇上了浓密的刺藤和珍珠茅，被迫离开堤岸，走进水中。一踏入芦苇丛，我们就被成群的吸血蚊围攻。我们在取代了稻子的芦苇和杂草间奋力行进，希望这些草长得够茂密，希望这里不会有鳄鱼。

我们左手边有一片条带状森林，紧邻被莱欧利斯河（Raiolis River）淹没的稻田。堤岸已经无法行走，待在农田里也没有意义，因此，我们向左往林木线行进，一路上刻意制造噪声吓跑鳄鱼。

杂草丛生的农田上空亮白的日光被古老阴暗的树丛遮住了，我们身处阴凉的洪溢林里，走在及腰的棕色水中。没多久，树木的间距拉开了，我们不用劈砍就能行走。我们在阴暗幽僻的世界里大步前进时，一路上可以看到明亮的水道就在左手边。

我们找到一块高出水面的干地过夜，虽然面积不大，但双脚能踩在干燥地面上。我们在树间拉起吊床，吊床相当接近水面，但别无选择，我们只能就地扎营。我们希望晚上上游不会下雨，因为吊床只比水面高出几尺。就在我们爬进睡袋时，乔告诉我水位已经上升了，这是个不祥的预兆，无法逃过这一劫的感觉随着水渗了进来，我们扎营的地面慢慢地变成了一片几厘米深的水域。已经不可能睡觉了，我们达成共识：只要水位再上升约0.3米，我们就将筏子充好气、收起吊床，往河上推进，在暗夜中寻找部落。不过，水位没有再上升，凌晨两点左右，我们两个都在这水乡泽国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莱欧利斯河上的第一个部落是艾斯比里托·度·桑托（Espírito do Santo）。我们遇上了留着长发、圆胖、胡须脏乱的阿林多。阿林

多和他儿子正在捕鱼，但一无所获。一眼就让人觉得奇怪的地方在于，为了在河上固守阵地，他往下游划。这意味着，不是我们跟错了河，就是这条河在往高处流，但我确信这是不可能的。

阿林多带我们去他家，让我们待在用木桩架在水上的单间小屋里，那房子有道长长的平台延伸到河里。我们坐在太阳下，在平台上洗澡，他的好几个孩子在一旁泼水玩闹。

接着我终于明白了：“阿林多，河水每天往坡上流两次吗？”

“对啊！”他说道，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显而易见的事情。

我微笑着，很高兴自己终于想通了。不过，身为地理系毕业生，没能早一点搞清楚确实蛮丢脸的。探险结束前两个月，河水已经受到潮汐的影响，每当海潮进来，河流就会改变流向。

我们一直维持着良好的进度，但我担心亚马孙河南岸的森林。我们还是必须横渡整个三角洲的颈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走过许多淹水区域，意味着速度将会慢下来。我们的进度已经落后11天，8月底我还要赶飞机。

在洪溢林步行的最后三天，景色非常优美，视野开阔。我们没有太多负担，享受着秘境的美景和清静，就像洞穴探险家细细品味待在地下鲜为人知的阴暗世界的孤独。我们也找到尚未为人所爱却绝美的环境，已经适应而且渐渐爱上了这种环境。我们终于抵达莱欧利斯河口，从附近人家找来一艘船，快速地在几个小时内往上游航行50千米，回到阿尔梅林。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河流可能会带着我们往下游偏移的距离，准备好最后一次横渡亚马孙河主河道。

我们在6月11日和12日从阿尔梅林横渡亚马孙河，划行总距离约49千米。我不会吹嘘自己走过这段路程，因为这非常简单，没什么好担心的。充气筏比任何独木舟都平稳，能毫不费力地随大浪起伏，在横渡到约2/3的路程时，因为天色渐黑，我们在岛上一户立在木桩上的小屋前停下来。隔天，我们继续划，到了南岸的小村庄维拉金霍（Vilazinho）。

接着，我们开始穿越丛林密布的亚马孙河三角洲，前往400千米外的贝伦市。在维拉金霍，有两名热心的渔夫和我们一起走了头一个小时，他们说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伐木小径，他们的确帮了大忙。在接下来5天的路程中，我们爬升到海拔71米高的地方，如果思及塔巴廷加（我们是于2009年4月从这座城市进入巴西的，它现在在我们西方3000千米处）只有海拔81米，那么，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高地。我们穿越特别干燥的路面，进展非常顺利。

我一直在自我训练的神经语言程序学相当有效。掌握这种简单的知识让我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心情，让我大开眼界。我只须辅导自己，判断哪种心情最适合处理当下的局面。愤怒有帮助吗？当然没有，因此我变得更开心。每当我察觉有一股负面、低潮或愤怒的情绪袭来，我就指导自己平复下来。现在，我能掌控自己的情绪了，这大大提振了我的士气。这种训练的效果不会消逝，因此，自我指导的次数越来越少。乔不再是事情出错时备受怪罪的焦点，我负起全责，专注于如何积极解决问题。

我又开始梦想未来的探险，当时我想划船走完刚果河全程，这会是次极端危险又令人兴奋的探险，我确信还没人做过——我错了，一名叫菲尔·哈伍德的英国人在2008年我刚开始探险时就划完了全程（靠了一点帆船的帮助）。但这个梦想让我好几个星期都能专注于正面的事情。

开阔干燥的森林让我们大展拳脚。我们不只追上了落后的进度，甚至超前了。

6月底，绵延数千米的美丽的洪溢林又把我们拉回现实，我们涉过深茶色的味酸的水（颜色稍微像柠檬）。

距离大西洋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但我们如孩子般兴高采烈地谈彼此对未来的憧憬，仿佛第二天就能到家。我的脑海里全是未来的探险，乔则梦想着到莱斯特郡后成为橄榄球场上的边锋好手。

在真正的丛林里走完最后一段路程是件很棒的事。我们恢复了惯例，米和豆子是主食，重量再次上身。我们觉得自己很强健，也摆脱了牧场道路上令人无精打采的单调乏味。

我们身上仍满是扁虱，我的背包破损，乔的靴子用线绑着，宽带全球局域网设备用胶带和电缆带修补，但都无所谓了，现在有股难以动摇的成就感在我们俩心里滋生。还有一个多月要走，我们能保持这种积极势头吗？

我们从东南方抄近路穿过三角洲，垂直横渡湖泊和河流。在湖边，我们的蚊帐在风中鼓起，背部在薄薄的吊床上发冷。

有只小马蝇寄生在我脑袋上，之前就有小马蝇寄生过。它们只会带来一点不便，仅此而已。成年母马蝇把卵产在蚊子的身子底下，当蚊子咬你时，卵随之落下。受到体温的刺激，这些寄生虫就在肌肤里生长，幼虫吃你的血肉成长。被咬的感觉就像被针扎一样，很烦人，特别是在要睡觉的时候。

要把马蝇弄出来的话，必须先杀死它，因为几乎不可能活生生地把它挤出来。闷死它是最简单的方式。我有一小管用来修补东西的强力胶，乔只在马蝇呼吸的开口处搽了一点，在几小时内它就死了。隔天，乔用树枝尖刺划破皮肤（因为皮肤把它包住了），只消把它挤出来，接着轻轻地把整条幼虫拉出来。真是爽快。

我们抵达卡休阿纳湖（Lake Caxiuana）后，在小镇波特尔（Portel）休息，但我们坐立难安，根本不累也不觉得需要休息，只想走路。

6月24日，进度相当快，因此，我把航班日期提前三个星期到8月10日。只剩下47天可以行走了，我们火力全开，带着冲劲和意志通过所有类型的丛林。

通常走出丛林来到河边时，我们往往不会遇到商店，因此只能买当地住户卖的东西，一般来说只有木薯粉或米，但那时乔和我兴致高昂，觉得什么东西都好，一有机会就大口大口地喝冰凉的巴西莓汁。那黏稠的紫色饮料是当地新鲜的巴西莓磨制而成的，在当季盛产而且是主要食物，此外似乎也富含营养。

不出所料，在我改签航班日期后，森林又开始变得难走了。我们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在半沼泽地上努力保持进度，然而双脚深陷烂泥里。

我们比以往更容易地挺过艰险的丛林并保持幽默感。在巴西东部，我们所走过的雨林全被开发过了一一所有的大树被砍倒，次生灌木丛横生，零乱的伐木小径诱使我们走往不同的方向，但我们行进更加快速，紧跟着直线罗盘方位角，拿着大砍刀，让一切听凭命运的安排。

我们横渡卡迈拉比河（River Camairapi）后，选了一大片看来是天然草原的陆地行走，向东前往雅昆达河（Jacundá River）。7月10日，我们一天走了23千米，但又快被太阳烤焦了，休息时躲在最小簇的灌木丛下。

我们沿着一条输电线的方向加速行进，但没多久输电线就转了方向，我们被迫回到丛林里，隔天是两年半来最难行的日子之一。

我们希望抵达雅昆达河——距离那条输电线只有11千米。一开始有条小径大致和我们的路线一致，但一如既往，小径很快转向，远离了我们的路径，因此我们算出到河边的方位角，投身矮树丛中。

一开始，丛林里只是枝叶纠缠着，让我们的速度慢下来，就像有刺的铁丝网障碍。接着，地面没入水中，我们在沼泽地行进。

此刻我们的幽默感也失效了，前阵子轻松的日子似乎降低了我们的耐受力。乔痛恨往回走，因此当我建议回到小径上另寻路径绕过沼泽地时，他拒绝了，我勉强同意继续向前。

但这么做真是太蠢了，在沼泽地又走了一小时后，我们还有4000米要走，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

我们开始恶声恶气地与对方说话，相互怪罪，在探险中，这是很糟的行为，但我们都失去了洞察力，我完全无法让自己冷静下来。

“真是明智的决定啊，乔，谢啦！”我幼稚地在他努力把脚从泥中拔出来时激怒他。两人都怒气冲冲，失去了平日鼓舞自己、朝光明面看的能力。他只是回瞪我。

我们的坏情绪让情况雪上加霜。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以极缓慢的速度悲惨地行进，距离目标河流约1000米时，沼泽变得更深，我们

在盘根错节的树木间游泳。

丛林变得非常繁密，我们必须卸下背包，把它们挂在探出水面的树枝上，拿砍刀往前开路。到了晚上六点，已经渐暗的日光被乌云完全遮住，闪电和雷声宣告一场猛烈的热带暴风雨来袭。雨打下来，刺痛了我们，但我们必须拿出头灯继续前行。

坏心情烟消云散了。我们知道让自己陷入负面情绪会使情况更严重，现在我们必须合作。在成簇芦苇间颤抖着过夜的恐惧感取代了沮丧，雨穿透单薄肮脏的衣服，打在身上，我们没有惊慌，但急切地想突破重围。扎营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够大的树绑吊床，也没有硬地面。小小的火蚁不断咬我，马蝇也加入其中，我们努力在雨中不让帽檐下的头灯灯光熄灭，继续向前行。

随着天色黑下来，丛林也逐渐转成芦苇丛，我们知道自己离目标近了。晚上七点，我们把筏子充好气，在高涨的河里大大松了口气。在狂风暴雨中，我们必须大吼才能让对方听到。

在完全不知道附近有没有人居住的情况下，我做了记号，打算第二天一早返回。上游1000米处的闪烁微光给了我们新的干劲，我们拼命地划了过去。

住在木桩小屋里的人一开始很怕我们，有人要我们继续向前划。在天黑后抵达部落不是个好主意，这些部落的居民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因为他们认为夜行者不是好东西。我坚持不懈地请求（稍微有点乞求），有人终于让步，允许我们爬上他干燥温暖的家。我们颤抖着，向他谢了又谢，他告诉我们西班牙刚赢得了世界杯。又回到常态了，我们洗澡，穿上干衣服，喝咖啡。

每到这种时刻我都会怀疑我能否忠实地表达出穿上干短裤捧着一杯甜咖啡时那种欢欣鼓舞的情绪。乔和我不需要对彼此道歉，我们已经像兄弟一样，知道是那些棘手的时刻扭曲了我们的行为；我们如果要提，也只会嘲笑自己被困境影响了。

也许只有在真正的绝望过后才能感受到全然的满足，我们在一小间木造储藏室拉起吊床，伴着木桩下的水流声入睡。

从雅昆达河起，我们必须穿越丛林，走一条通往卡梅塔（Cametá）的公路。这是整次探险的最后一段丛林路程，而且现在的行程很赶。我们必须接待一名来自伦敦《都市报》（Metro）的记者，他要来和我们走几天，接着我们要尽快走到公路上。

我现在几乎只用谷歌地图导航，发现有一条最近开出来的小径通往卡梅塔公路。我们抵达小径，准备脱掉丛林靴换上公路鞋时，我发现了自己的失误，这条白色的南北向细线是条废弃的杂草丛生的电信线路，走这边会比直接穿越次生丛林慢上两倍。这里曾准备开路的，但在印第安人烧桥抗议这种侵入性的基础设施后，计划就被搁置了。这条输电线曾给奥埃拉斯镇（Oeiras）供电，但后来很多电线杆倒了，电缆纠结，和藤蔓交缠在一起。在它们被废弃的这些年间，光线照进这片长方形区域，形成一道约80.47千米长、9.14米宽、9.14米高的荆棘丛。

只剩下13天可走，乔和我接受这项挑战，快步通过这片绿色的乱树丛。有漂亮的雨林，也有令人难以忍受的雨林，而我们拥有后者。此刻就是这种黑色幽默驱策着我们，我们在休息时不时地交换心照不宣的眼神，以及共享一份自怜，命运在我们以为丛林时光已经结束时，又多给了我们一段，导致我们抵达贝伦的道路系统后必须增加每天的里程。

我们一面同心协力地冲破荆棘丛以取得进展，一面和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做串流视频电话，这些已经不足以用“超现实”来形容了。而这在日后带来了许多访问量，能干的公关维基·里默把他们都安排好了，从那里起他们每天在小径或道路边上采访我，直到我们抵达大西洋。在摆脱丛林之前，每天采访前的半小时我们都很焦虑，因为我们要在林荫间找个足以让信号穿透的空隙。

我们心底有一小部分其实很高兴道路没有出现，让我们多走几天丛林路，新生的急迫感和必须完全专注在任务上的决心为我们重新注入了热情。

“别无选择了，”乔笑着说，“我们必须抵达。”

7月31日这天在清晨五点静悄悄地展开，我默默扇风，让余烬复燃，以便在黑暗中煮饭。当天色渐明时，我们拔了营，努力在废弃的

输电线间行进。身旁的森林不是珍珠茅丛就是浓密的竹林，我们在珍珠茅丛和竹林之间迂回行进，寻找最快速的脱困路径。

我们都知道这一整天左手边都有条河流，也经常遇到当地人。早上9：30，我们途经一户人家，被告知一个好消息：距离目标桥梁（标示着文明起点的桥梁）只剩一小时路程了。我们毫无怀疑之心，天真地任由情绪高涨。

在接下来幻灭的两个小时后，一位正在修理独木舟的好心男子告诉我们还要走一个半小时。又一个小时后，一位矮胖的女士也这么说。

就在两点之前，我们看到了残破的木桥，爬过桥墩基柱，走进iPhone 4和用两指滑动屏幕的世界里。

恣意扩张的城市意味着我们已经逼近贝伦了，我们的蛮荒之旅最后无可避免地在城市告终，但乔和我并不埋怨，我们已经走过够多的雨林了，文明的诱惑在此刻最受欢迎。

我们必须在卡梅塔渡河。我们花了一整天划船，晚上七点摸黑到了贝伦这头，找了一家便宜旅馆，查看地图和距离。现在开始，我们每天要走55千米（每天步行11—12小时），在剩下的最后一周抵达海边。

我们的兴奋之情被疲惫浇熄，每天路程结束后录制视频让我到凌晨两点才睡觉，而我们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赶路。

我们现在变得有点像在整天盯着时钟看。倒数路标不时打断我们的公路步行，告诉我们还有多少千米的路要走。这一刻，我们离贝伦还有86千米；12分钟后，“嘀嗒”，85千米。

在赤道烈日的烘烤下，我们嘴唇干裂，T恤褪色，我们开始怀念起雨林树荫下的阴凉。

现阶段，乔和我一般而言会稍事休息，恢复体力，但时间压力让我们不得松懈每日的里程。

在秘鲁和我们走过一段路的摄影师基思·迪卡泰尔前来拍摄最后一段路程。我和乔都很高兴他归队，他尽管因为椎间盘突出住院一个月，仍决意要来拍一些精彩的照片。他对摄影的全心投入几乎要了他的命。有一次，他躺在马路中央的柏油路面上拍照，听到卡车驶来的声音时，他连忙回到路边，那辆卡车由北向南驶过；卡车通过后，基思想继续拍照，他走回马路中央没有往南向看，一辆摩托车急转弯才避开他，这次险些就撞上他；濒死经验把他吓得愣在原地，他接着大笑，当作得到了一次教训。

8月4日晚上11:32，只剩下5天，还有260千米路要走，我写完每日博客，把闹钟设定到两点闹铃，打算起床后继续行走。最后一段路程会把我们累垮，因为白天体力透支，晚上又没有足够的睡眠恢复体力。前一晚因为在凌晨两点到机场接基思，我根本没有上床，更别说睡觉了。

有别于丛林的是，这里的道路已经城市化，并且归私人所有，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人家的花园里扎营。因此，我决定把基地设在贝伦，雇一辆车每天载我们进出，以便继续行走。然而我并没有考虑到车程，因此每天行走了12—14小时，还要花4小时来回，还要参加采访、写博客和编辑影片，这意味着，睡觉是被忽略的一大奢侈享受。如果重来一次，我会雇一星期的露营车和司机，每天结束后就瘫倒在后座上。

第二天也是一样：早上4点起床，7点开始步行，晚上10点抵达波多·杜·阿拉巴里（Porto do Arapari），处理信件以及行政工作，凌晨1:27上床。

我们必须从波多·杜·阿拉巴里渡过一片水域，抵达贝伦，之后继续走向大西洋海岸。迂回的道路太过遥远，不是个可行的选项，因此我们最后一次拿出充气筏使用。

“贝伦周遭的潮水很危险，”人们如此警告，“水位起伏很大，水流可能非常强劲。”

乔和我听了进去，但也忽略了这些建议。这两年来，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夸张的负面信息，我们的反应很冷淡，甚至有些不屑一顾。

我们忽略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要在8月9日这个限期以前抵达，那么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此，隔天清晨，我们启航，开始此次探险中最后一次渡河。

那天是8月6日，朝阳只在地平线上露出半张脸，洒下温暖的光，柔和了水面。

“看，很简单。”当我们慢慢划离南岸时，乔笑着如此说道。但就在我们停止划行，花两分钟时间抹防晒油时，全球定位系统划破了宁静，提醒我们，我们正在快速倒退。

我们奋力划行，企图冲破这片倒流的水域，用力划了约3千米后，才再度变得轻松，重新提上了速度。剩余的10千米让我们松懈了下来。

但眼看最后一段航程就在前方，卫星导航预估的抵达时间开始推迟，下午一点……两点……三点……看来水流又变速了，我们正快速往海那边漂去。

我想都没想就立即改变路径，往最近的堤岸划去，而非预计抵达的港口；乔紧跟在后。大自然向我们展示了它惊人的力量以及人类的脆弱，我们向海那边急驰而去时，贝伦嗖地从我们眼前的左方飘忽至右方，我们像两块漂在水渠里的软木浮子。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往对岸靠近，在右手边，城市消失了，海滩、岩石从左边朝我们而来。我们的胸口、手臂感到灼热，我们突破重围，进入一块相对平静的水域，努力在满是垃圾的淤泥滩登陆。我们气喘吁吁，互看一眼，默默地松了口气。

“我就说吧，很简单。”乔微笑道。

最后一个重大阻碍已经被抛在身后，但我们这天还是要继续步行，尽可能远离这座城市。我们最后一次收起充气筏，往北穿过繁华的城市街道；街上还残留着世界杯的黄绿装饰。

8月7日星期六这天，我们计划整晚向前推进，这样星期天晚上才有时间在马卢达（Maruda）休息——距离星期一早上要走上的海滩只

有最后一点距离了。

星期六凌晨三点，我们还有85千米要走。走路时，我睡着了，和有时候开车非常疲累的惊恐感觉类似。我估计，如果停下来躺在路边睡个20分钟，我就能恢复。

躺着的时候我突然奇痒无比，狂乱地抓着，但痒得令人发狂，最后，我发现全身起了疹子，我无法行走也不能躺平。

这是个超现实的梦一般的经验，我在路边躺了一小时，要求打求救电话。我太累了，无法思考剩下的路程，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在极度疲累的状态下，头部着地昏了过去。

在我昏倒期间，基思被找来了，他把我们送上出租车。我只睡了几分钟，症状就几乎都消退了。尽管我脸色惨白，但头脑恢复了清醒。

后来决定，我们需要三小时的适当睡眠，因此前往马卢达的旅馆。我从强制的休息中醒过来时，感觉焕然一新。我写了博客，接着搭上雇用的汽车，返回昏倒的地点。

乔和我在正午开始行走。现在再无选择，我们必须走整个下午和晚上，完成剩余的85千米，我们希望在太阳升起时抵达海滩。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在哪一天走过这么长的距离，更遑论是在这样的时间压力和身体状况下。有一车的巴西记者跟着我们。

我的身体在接近终点时决定停工，这让我有点惭愧，那一天——最后一天——是整次探险中最长的一天。

那晚的确很漫长，虽然我们一开始以每小时5000米的速度快速前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速度渐渐慢了下来。黎明前，我接到来自马瑙斯的爱尔兰朋友克莱夫的来电，他说他有个新闻团队想来拍摄，但被他挡下来了，因为他不希望他们拖累我们的进度。

两大新闻媒体——美联社和路透社——也来了，还有多家巴西电视台。

太阳开始升起，乔和我已经麻木了。双腿紧绷，我觉得小腿肌肉仿佛随时会撕裂。此时，克莱夫才允许新闻团队出发。

在灰白的晨曦中，他们就像突击部队一样蜂拥而来，在我们行走时，顶上的卤素灯让人睁不开眼睛，狗仔式的闪光摄影更让我们失去了方向感。没有人说半句话，他们已被简短地告知：要等到我们转过弯走上马卢达海滩时才能进行采访，届时会是早上八点左右。

媒体的出现以及大家的目光提振了我们的士气，我们几乎飘飘然地过了街。当天色渐明时，新闻团队轮流和我们一起走，采访我们。这真是不可思议的经验，感觉很不真实，但发现所有人对我和乔做的事这么有兴趣后，我们感到相当自豪。

大约有4000米的路有几个朋友同行，他们和我们一样兴奋。我们一行大约10人一起走，直到还剩最后500米时，他们留下我和乔，让我们独自完成这段旅程的最后一段路。

我们感觉到自己接近终点了，因为闻到了空气中的咸味，听到了远处浪花拍岸的声音。接着，我们转过弯，看见朋友和新闻团队都在海滩的另一端等着，在他们身后，穿过几顶游客遮阳伞，就是大西洋。

我们抵达遮阳伞时，投宿的旅馆主人要介绍我给一些人认识，但我必须推辞。只剩下50米的沙滩要走了，乔和我丢下行李，开始狂奔，我们咧嘴大笑，向海滩猛冲，手牵手向大海奔去，直到被浪花绊倒。我们纵身于咸咸的海水中。

我们紧紧相拥，有点不确定接下来要做什么。我非常高兴，而乔脸上的表情也是纯然的喜悦，他出生在秘鲁中部，从未看过海，这样的初体验真是了不起。

基思带我们更进一步地走到海里，拍了些照片，要我们跳进浪里嬉戏；我现在处于头晕目眩、情绪激动的状态，很高兴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拿出自己的摄像机，录制了此行的最后一段视频日记；远离所有人，我最后一次对我的数码朋友倾吐秘密。我激动不已。

乔和我在沙滩上拿着赞助商的大幅旗帜拍照，接着克莱夫给我们一人一瓶香槟。在我快速地教会乔如何打开酒瓶后，我们像一级方程式赛车手般摇晃着香槟，接着把香槟倒在彼此的头上；周围闪光灯四起。

结束了，900多万步，蚊子和蚂蚁叮咬各超过20万次，860多天行走8000多千米——当中733天有乔做伴——被黄蜂蜇了约600次，被蝎子蜇了10多次，10部高画质摄像机、6双靴子、3部全球定位设备，以及1次吉尼斯世界纪录。骄傲感与满足感充盈于胸间，我此生不会忘记这一天，没有人能从我们身边夺走。

后记

到了8月9日，全球已经有900多篇文章报道我们的事迹。我回到伦敦，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头两个星期，我上了各种电视和广播节目，还受邀到皇家地理学会演讲，并成为该学会的一员，也成为雷纳夫·法因斯爵士的环球探险信托基金会的理事。

反思过后，我对我们的成就相当自豪。我们为慈善团体募得的款项只有27000英镑，但和全世界的学校建立了联系。这些事进行得比我想象中的还顺利，这主要归功于威尔士亲王的雨林急救网站，我在上面有个每两周为孩子们发布文章的博客。和学校的联系是我在未来探险中希望能发展起来的。2011年1月，我在英国做了一趟校际旅游，见到了孩子们谈到亚马孙时脸上流露的兴奋之情；他们急切地告诉我他们所知的那片神秘遥远的丛林。

这本书在2011年2月完成，那时，探险已经结束六个月了；写到这里时，乔的签证申请通过了，他应该会在6天后抵达英国，他计划和我母亲待在莱斯特郡，学英语并且加入当地的橄榄球队——石门队——他的新历险正要开始。

我现在住在伦敦，写我的第一本书，正计划新的冒险，目前靠着在世界各地做励志演讲为生。这次经历以我认为不可能的方式改变了我。我在军队待过，在阿富汗与联合国工作过，在世界各地带队进行过探险活动，当然在这种脉络下，光是一次探险不会对我的性格产生太大的影响。事实上，尽管在这次探险之前累积的经验帮助我完成了这个疯狂的梦想，但那些经验和这本书上记载的经历、事件一比都相形见绌。我发现自己现在对周遭的一切更冷静、更满足了，我也因此感到愉悦。现在我的自信来自自身，而非他人的意见，我知道自己是

谁、能力如何，我一再面对自己的各种弱点，大致上来说，我已经学会了如何驾驭弱点而不致被拖累。

亚马孙河流域的树木依然在倒下，当局仍未严格禁止伐木的活动，在两年四个月里，我从未见到任何一个政府主动制定亚马孙禁伐政策，一个都没有。

但我仍然保持乐观，情势正在改变，秘鲁、哥伦比亚、巴西的孩子向我引述“地球之肺”这样的词，知识分子也为他们的森林感到骄傲，热心于环保事业。只要这种观点的声浪在升高，并且取得了一些主导地位，我就会对良好的价值观终能获胜这一信念怀抱希望。我相信全球对环保问题的重视足以让这一切成真。